

文化与语言

(论文集)

王福祥 吴汉樱 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编者的话

近年来,有三门密切相关的语言学科同时在我国传播:一门是语言国情学,一门是跨文化交际学,另一门是文化语言学。这三门语言学科研究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是侧重点不同。它们都是以研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为主旨,以提高语言教学质量和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为目的。语言国情学七十年代初兴起于前苏联,侧重于研究俄语词语文化,跨文化交际学,源于美国,始于六十年代,侧重于研究交际文化,文化语言学,开创于中国,兴起于八十年代中期,侧重于研究汉语同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民族习俗的关系。而伴随语言学则是三门语言学科共同的研究课程。

语言国情学、跨文化交际学、文化语言学均属于宏观语言学,都是新兴的交叉学科。它们同文化学、社会学、交际学、社会语言学、语言心理学、语用学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三门语言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又都同语言教学和日益频繁的跨文化交往有着直接的联系。积极开展文化与语言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本论文集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三门文化语言学科兴起的历史、研究的内容、理论基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近年来我国开展语言国情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研究的部分成果;文化与翻译;文化与外语教学;伴随语言学与教学。因限于篇幅,每个方面只能选几篇文章以飨读者。其中大部分文章是已发表过的,有的作者进行了增补;有的文章是新写的;有的文章篇幅过长,编者作了适当的删减。选编此论文集的目的是想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特别是外语教师和研究生们,来从事文化与语言方面的研究工作,相互启发、积极交流,共同努力把我国的语言教学,特别是外语教学,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疏漏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编者

1993年7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1
01 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 邵敬敏	1
02 文化语言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评邢福义 教授主编的《文化语言学》..... 李先焜	12
03 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	游汝杰 20
04 浅谈语言国情学	赵爱国 32
05 对开展国情语言研究的几点思考	张中华 37
06 语言国情学及其发展	孟庆和 46
07 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	贾玉新 51
08 试论外语教学中的跨文化交际研究	胡文仲 59
09 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	王得杏 68
10 语言与文化综论	林纪诚 俞青海 77
11 俄语中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词汇	丛亚平 91
12 词汇文化伴随意义的跨语言(俄汉)对比研究	吴国华 98
13 “词汇背景”小议	郭聿楷 105
14 谈伴随意义的几个问题.....	孙国军 114
15 论词的文化伴随意义与翻译.....	王秉钦 125
16 从汉语看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可译性问题.....	钮菊生 137
17 简论俄语成语的文化价值.....	宋传伟 148
18 略论俄汉语成语的文化差异.....	于延春 158
19 俄罗斯言语文化一瞥.....	周民权 165
20 浅谈俄语中的言语礼节.....	李林章 173
21 礼貌用语漫谈.....	薛丽山 181
22 论英语称赞语的交际模式.....	邹为诚 194
23 英语委婉语的交际功能与构造原则.....	于海江 202

24	PHATIC COMMUNION 四题	朱永生	209
25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义位移研究	魏春木	217
26	文化差异和不可译性	关 钰新	226
27	从跨文化角度看习语翻译	冀一志	233
28	论东西方思维方法差异及其翻译	王秉钦	243
29	文化翻译与语用学	刘先刚	255
30	文化·语言·翻译	刘重德	262
31	文化背景知识、文化背景学和外语教学	俞约法	272
32	社会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	司徒双	300
33	文化与语言习得	李磊伟 李文英	310
34	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化	杜瑞清	316
35	社会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	王伟华	324
36	英语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	崔校平	333
37	语言·文化·外语教学	束定芳	340
38	伴随语言手段与伴随语言学	刘光准	354
39	俄语体素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国情色彩	智亚男	362
40	俄罗斯人的身势语与中国俄语教学	刘 刚	371
41	体语学研究 with 外语教学	刘汝山	385

关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反思

邵敬敏

文化语言学的创立主要是中国新一代语言学者的杰出贡献。所谓新一代,即指十年动乱之后培养成长起来的一批以硕士、博士研究生为主体的中青年语言学者,他们思想敏捷、思想活跃、勇于创新、长于开拓,一方面继承了中国语言学界“务实”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不墨守成规,力图开创出新的局面。1985年游汝杰、周振鹤在《复旦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方言与中国文化》,提出了建立“文化语言学”的倡议:“我国境内的语言,据一般的估计有六、七十种之多,几乎每一种语言内部都有方言的差异。如果将如此丰富的语言材料和历史悠久、多姿多彩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是不是可以称之为文化语言学?它跟德国的人种语言学、美国的人类语言学及拉波夫近年所倡导的社会语言学有所区别,应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边缘学科,应该把中国语言学和文史研究结合起来,探索语言与文史的内在联系。”^①这一设想迅速得到了各方面的积极响应,尤其是青年朋友对此表现极大的热情,很快以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为中心掀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热,并经过六、七年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出版了一批专著及论文集,例如: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申小龙《中国句型文化》(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年),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王建华《文化的镜象——人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姚亚平《文

化的撞击——语言交往》(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0 年),史有为《异文化的使者——外来词》(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等。

必须指出,虽然大家打的都是“文化语言学”的旗帜,但实际上在一系列理论、原则、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并已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②。游汝杰等的开创立功、陈建民等的新思路、申小龙等的冲击波在不同程度上都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研究目前仅仅只能说是不同的流派,还不是什么学派,因为从总体上看,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不够完善与成熟,有的还比较肤浅,有的甚至漏洞甚多,具体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有的更是雷声大雨点小。有人把这三种不同流派分为三个层次:“文化认同派”的研究归为高层次;“文化参照派”的研究则属于低层次,而“文化表现派”则为最低层次^③。这种提法不仅违背客观事实,有自我标榜之嫌,而且不利于各个流派的团结与相互促进,因而极大多数同志对此是不赞同的。

文化语言学之所以在 80 年代中期产生,这决非偶然,有其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深刻的语言学发展的内在因素。从外因上讲,这是受国际上以及国内其他学术界“文化”热的影响,试图沟通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从而重新确认语言本身的文化价值;从内因上讲,这是对前若干年汉语学界偏重于形式研究,热衷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种反思,试图摆脱旧理论模式的束缚,在文化、社会、历史、心理等方面获得深层的诠释。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文化语言学的诞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发展的一种历史必然。1986 年以后文化语言学不仅在语言学界,而且在其他相邻学术界产生了轰动效应,并形成了持续几年之久的研究热潮。进入 90 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评估前几年有关研究的得失,对若干理论问题作出进一步的反思。

1. 我们很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文化语言学属于解释语言学的

范畴^④。这句话至少有三层含义(1)它不属于描写语言学,与描写语言学有着根本不同的研究目的、对象、范围。解释是在描写基础上进行的,没有描写也就无所谓解释;反之,解释又将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的描写,然后作出新的解释。这种螺旋形的循环上升正反映了语言学研究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进程。因此,描写与解释都是具有层次性的,不能笼统地讲,描写是低层次的,解释是高层次的,或者片面地讲,描写只是研究的初级阶段,解释才是研究的高级阶段。^⑤(2)解释语言学要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追根究底的解释,因而必须调动人类所有的知识,包括自然的与人文的,人文的又包括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等等,因而描写可以也应当是多侧面的,解释同样也可以也应当是多侧面的。文化是解释所要依据的一个重要侧面,但解释语言学的内涵相当丰富,如果狭隘地把解释语言学仅仅理解为就是文化语言学,那实际上恰恰是取消了文化语言学独立存在的价值,同时也抹杀了其他语言学的客观存在。(3)文化语言学是文化学与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既可以从文化到语言、也可以从语言到文化进行双向研究,相互验证,以弥补各自研究的不足。有人不适当地夸大了它的作用,把“文化语言”说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于对汉语特点的深刻反思和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认同而建立了一种新学科,又是一个包括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语言民族学、语言人类学在内的大学科。”^⑥如果以为文化语言学可以囊括一切,成为一门无所不包的大语言学科,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学术上不够成熟的表现。历史上曾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夜郎自大的笑话,有人总是有意无意地贬低其他学科,总是编织种种神话来证明别的学科应该从属于他所研究的那个学科,这种盲目拔高本学科地位的做法,最终总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从根本上讲,它违背了科学分工的系统观,而且无视本学科自身的特点。

2. 人类学一般分为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前者以自然属性的人类的进化发展为研究对象,后者则以社会属性的人类的文

化心理为研究对象。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相结合便形成了人类文化语言学。西方一般叫人类语言学,中国则叫文化语言学,它们各自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基础、研究目的以及侧重面都不相同,因而两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形成各自的研究特色。但从本质上讲,凡是文化总是属于人类的,而人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生物,正是由于它具有社会文化属性。因此,中国的文化语言学与西方的人类语言学,是相同的种子在不同季节不同土壤里开出来的花朵。我们既要看到它们之间的种种差异,也要承认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同一性。当然,为了显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特色,特别强调它与西方人类语言学的不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因此而断言,这是完全不同的并行不悖的两门学科,则难以令人信服。由于人类学的调查与语言材料的不足,在中国,至今还没有产生真正的人类语言学,它的部分任务已由文化语言学承担下来了,只是中国目前的“文化语言学”是深深地打上了“汉语”的烙印,因此严格地说,只能说是“汉语文化语言学”,还不能说是“中国文化语言学”或者“文化语言学”。

对语言来讲,影响它的因素是多维的。从人文科学角度讲,主要是文化、社会、心理、交际、民族、历史等方面,如果把语言看作为一个内核,那么文化等因素便构成了一个围绕这个内核的六面体,它们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作为科学研究,必须有意识地把研究对象“净化”,采用单维的视角。如果从文化这一侧面来透视语言,就形成了文化语言学,如果从社会这一侧面来透视语言,就形成了社会语言学,等等。但单维的视角并不排斥研究时引进多维的因素,如果在文化语言学研究,引进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民族的、交际的因素,就有可能形成再下一层次的分支学科:社会文化语言学、心理文化语言学、民族文化语言学、历史文化语言学、交际文化语言学等等。我们在这里讲“六面体”,只是举其主要方面来说,严格地讲,它应该是个“多面体”。因为还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语言,而且每一个面也不是平坦的,

而是凹凸不平的 ,不是平等的 ,而是参差不齐的。当阳光照射在这样不规则的多面体上 ,才会闪烁出奇异美妙变化无穷的光彩来。

3. 文化语言学 ,介于文化学与语言学之间 ,它既不研究语言本身 ,也不研究文化本身 ,而是着眼于两者的关系及其相互影响。因此要它同时承担起研究语言或文化本身的任务 ,是不公平 ,也是不现实的。目前 ,人们从各个角度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从而形成好些不同的观点 ,这在科学研究上 ,尤其是一门学科初创阶段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代表性观点是认为语言包括在文化之内 ,是文化的一部分。有人说 :“语言显然可以包括在‘文化’之内 ,不过语言在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它不仅是文化的组成部分 ,而且是人类文化诞生和发展的关键 ,又是文化传播的工具。”^⑦ 也有人说 :“语言是文化的符号 ,文化是语言的管轨”。“严格地讲 ,语言和文化不是一般的并列关系 ,而是部分和整体的对待关系 ,或者说是点面对待的一种特殊并列关系。文化包括语言 ,语言是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文化。”^⑧ 我们认为这样的命题是自相矛盾的 ,语言不可能既是文化的工具 ,又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语言与文化相互交叉 ,相互渗透 ,形成血肉相依的关系。但是 ,它们毕竟是两码事。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之一 ,文化是语言最重要的属性之一。语言与文化的产生并非同步 ,它们的发展也不并行 ,而且 ,它们的各自的内涵与外延也不相同 ,因而 ,它们既不是并列关系 ,也不是点面关系 ,而是两者局部交叉渗透关系。这里所指的语言 ,应作广义理解 ,即包括语言系统与言语运用 ,因为只有这样理解 ,才有可能正确认识语言与文化的复杂关系。至于文化 ,一般理解有三个层次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心理文化。语言不是文化 ,因而不能简单地把它归属于哪一层次的文化 ,有人认为语言属于制度文化 ,这是比较牵强的。^⑨ 事实上 ,语言同这三种文化都发生关系 ,在语言中都可以找到这三个层次文化的投影。语言具有文化性 ,又具有自然性 ,人文性又具有多个侧面 ,因而我们认为语言的局部与文化的局部发生交叉渗透关系。换言之 ,语言本身有跟文化无关的

东西,文化本身也有同语言无关的东西,如果时时、处处、事事都试图在语言中寻找文化的内涵,那么必然是作茧自缚,陷入进退维谷、牵强附会的尴尬境地。至于有人把语言看作“一个民族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一种世界观”,还语言“以本体论的地位。”^⑩那我们是更不赞同了。这种“语言决定论”,其实并不新鲜。不是也常常有人在鼓吹什么“心理决定论”、“宗教决定论”、“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吗?说到底,都是一种妄自尊大的心理在起作用。在我们看来,语言就是语言,超越真理一步就是荒谬。历史事实证明:一个民族可能全盘接受了另一种民族的语言,但他们的文化则仍有相当的保留;反之,一个民族在文化上受到另一民族极深的影响,而他的语言却可能基本上保留下来。这说明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制约,但并非谁必然决定了谁的整个面貌。

4.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是不均等的。好比阳光照射,阳的一面照得到,阴的一面则未必。反映在语汇(甚至包括文字)上最浓烈、明显、突出、集中,而在语音、语法上比较清淡;反映在言语的使用上比较显豁、典型,而反映在语言系统本身上则比较含蓄、隐蔽。语言的产生、发展、变化同文化当然有着密切联系,但是,除了文化因素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不要过份夸大文化的作用,更不要采取“唯文化论”的立场。如果试图对语言的每一种格式、每一种现象、每一种变化都要从文化中去寻找唯一的答案,那么,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将极大地妨碍我们去接近真理。这种“唯文化论”的具体表现之一即是对“文化通约性”作用的不恰当的估价。

有人在分析汉语时,认为可以有两个“科学的参照点”,其一便是“汉语与中国哲学、艺术、文学乃至思维方式方面所具有的文化通约性”。^⑪什么是“文化通约性”?从来也没有人给它下过确切的定义,按我们的理解,似乎应指这些学科所具有的民族文化方面的共性吧。那么,文化通约性作为语言甚至包括哲学、艺术、文学、

美学研究时的一种文化背景来看待,作为固有属性之一来分析,不但可以而且也是必需的。但是,每一门学科都有它自身的规律、特点,跨学科的“文化通约性”的参照系数是相当有限的,如果过份夸大它的作用,并希图以此来“规定汉语的整个结构蓝图”,那将会从根本上使这个学科庸俗化。在我们面前放着纵横两条轴:一条是汉语和世界其他语言,作为语言所具有的“语言共质性”,另一条是汉语作为汉人使用的语言同汉民族的哲学、艺术、文学、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文化通约性”。这两种不同层次的共性都对汉语发挥着作用。问题在于这两种属性哪种是本质的、起主导作用的属性?分歧之所在是我们认为“语言共质性”起主导作用,而有人则认为“文化通约性”起主导作用。问题还在于,我们在强调“语言共质性”的同时,也承认“文化通约性”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认为是它们共同决定了汉语的本质及其面貌,而不是片面强调“文化通约性”而有意无意地拒绝承认“语言共质性”。

5. “唯文化论”的具体表现之二即是把语言研究的最终目的说成是纯意义的。有人指责汉语语法研究“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西方近代科学的形式化宗旨,把形式化作为语言分析的终极目的。”^⑫这种指责,只要稍微读过一些汉语语法学史的人就会明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从《马氏文通》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语法研究从来也没有以“形式化”为语言分析的终极目的,即使是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盛行之时,汉语语法学家还是相当重视语法意义的研究的,这也正是汉语的研究不同于西方结构主义语法理论的可贵之处。至于从70年代末以来,人们的认识更是有了一次飞跃,朱德熙先生早就明确指出:“语法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弄清楚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⑬胡附、文炼先生也认为:“句子分析的终点是确定句型,但确定句型并不等于完成了析句的全部任务,句子复杂的语义关系须通过进一步的句法分析加以阐明。”^⑭可见,语法研究,语言研究,既可以从形式入手去寻找它所表达的意义,也可以从意义入手去寻找它所依赖的形式,关键是

要沟通两者关系,得到相应的验证。那么,不同意这种主张的人是什么看法呢?他们认为:“语言分析的终极并不是形式,而是内容。”^⑮这一命题,从根本上讲是割裂了形式与意义的辩证关系,是历史上试图以训诂学为依据来研究语法学的旧学说的一个翻版。当年,在中国文法革新讨论中有位先生“退而结网”,不正是结了这么一张网吗?^⑯历史早已证明了这条路是个死胡同。在目前新的形势下,这种主张单纯搞语言“意义”研究的观点只不过给旧训诂学涂上一点“文化”的脂粉而已。在语法研究上,我们历来反对纯形式的研究,也反对纯意义的研究,只有把两者沟通起来的研究才是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对汉语来讲,语法形式比较隐蔽、曲折,往往不如形态变化丰富的印欧语那么容易捕捉,这确实增加了汉语语法研究的难度,但如果因为汉语语法形式标志难于寻找而干脆放弃了研究,那岂非历史的倒退?有人甚至干脆断言:“汉语不可能有西方语言那样有形态变化的单纯、独立的语法学。”^⑰虽然这里加了一个限制性定语“有形态变化”,但是问题在于:一种语言有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同有没有语法形式完全是两码事。换言之,形态变化只是语法形式的一小部分。如果用有无形态变化来衡量汉语有没有语法,恰恰是戴上西洋语法的有色眼镜在观察汉语。

6. 据说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导致汉语是一种根本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的语言。有人甚至于认为:“如果说西方语言是一种严格受形态规定制约的‘法’治语言,那么汉语则是没有形态制约的人治语言。”^⑱显然,如上所述,如果把“法”仅仅理解为“形态变化”,那是十分肤浅的;“法”应指语言内部客观存在的各种规律,是说该语言的集团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循的。所谓“形态”只不过是这种“法”的外部表现形式之一。一位教师,戴了红校徽,他的身份一目了然。如果没戴红校徽,难道我们就不承认他是位教师了?因而,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汉语也不例外,都是有“法”可依的,都属于“法治语言”,没有“法”的语言是不存在的;

而当人们使用语言来进行交际时,在“法”制约的范围内可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话语表达得更准确、更完美,这时我们或许可以把这种现象称为“人治言语”。“法治语言”与“人治言语”,这两者相互辩证地依存着。换言之,世界上只存在“法治语言”和“人治言语”,而根本不存在什么“人治语言”。由于这一错误的基本立论,导致一系列在我们看来是很难自圆其说的观点。例如什么“语素粒子的随意碰撞可以组成丰富的语汇。词组块的随意堆迭、包孕,可以形成千变万化的句子格局。”^{①⑨}如果汉语的语素和词组真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组词造句,那么当然不必再花力气去寻找什么语法规律了!然而这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只不过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而拿去教外国人学汉语,则更是误人子弟!又例如什么“汉语不仅实词内部,虚词内部各类功能都有虚实之分,可以互相转化,而且实词和虚词两大部类也可以互相转化。”^{②⑩}这种“玄而又玄”的理论更叫人目瞪口呆。什么叫“实词”?什么叫“虚词”?什么叫功能的“虚实”之分?内部如何“转化”?外部又如何“转化”?“转化”要不要什么条件”等等,都是一笔糊涂帐。如果说只要依靠人的“主观意识”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那岂非自欺欺人?!

7. “唯文化论”的具体表现之三即是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根本矛盾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汉语的人文性与汉语的科学主义”。^{②⑪}这一命题初听似乎很新鲜,但问题在于:汉语研究以前对人文性重视不够,是否因为汉语学的科学主义所造成?科学主义是否等于西方结构主义语法理论?是否等于纯形式的研究?如果把“科学主义”的所有权拱手让给西方某种语言学理论,那显然是幼稚的。在我们看来,汉语研究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包括对人文性挖掘不够等等,恰恰是因为我们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不够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主义是语言学,乃至一切科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人文性与自然性,是每种语言都具有的两种基本属性,语言与

语言相比,人文性与自然性都存在着共性与个性。不要片面地认为:人文性必然是个性,自然性必然是共性。不论揭示哪种语言的人文性与自然性,共性与个性,都要依赖于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那么,与科学主义相对,是否还存在着一个“人文主义”呢?如果把人文主义理解为运用人文知识、原理来研究某门学科,那么它正是科学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事实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从来也不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因此,声称“汉语的人文性与汉语学的科学主义”发生根本对立的冲突是一种危言耸听的提法,其实质问题是要抛弃汉语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而去追求所谓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把语言看成一团泥巴,你爱怎么捏就怎么捏,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不需要任何客观的标准检验的。我们认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根本矛盾在于:语言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还不够科学,还不足以充分揭示汉语的特点与规律。这正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主攻方向。

8. 文化语言学的兴起,无疑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它弥补了长期以来汉语研究的这块空白,为我们开拓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语的人文性。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文化语言学的杰出贡献在于作了“历史性的反拨”,即“实现我国语言学在质态上由描写型走向人文型的历史转折”。^②我们认为这种提法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典型观点,将描写型与人文型对立起来本身就是片面的,进一步预测中国语言学向单纯的人文型转化更是危险的。在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历史上,我们已不止一次吃过简单化、绝对化的亏,因此,我们认为,中国语言学健康的发展方向应该是:

- (1) 多元型:即各种语言学理论并存互补。
- (2) 渗透型:即多种分支、边缘学科交叉渗透。
- (3) 发散型:即语言学向人文、自然型的其他学科发散。

(4) 开放型:即语言学向社会向科学技术开放,以适应其发展的需要。

显然,仅仅一个“人文型”是无法承担起中国现代语言学所面临的艰苦而繁重的历史重任的。

文化语言学将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大家庭中占有它应有的一席之地并发挥它独特的作用,但如果因此而排斥、贬低其他兄弟学科,或者试图去占有它不应占有的核心地位,那不仅是可笑而且是可悲的。

附 注

- ① 实际上,游汝杰、周振鹤在198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1)中已发表了《方言和文化史研究》,但该文影响并不大。
- ② 参阅拙文《说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流派》,《汉语学习》1991年第2期。
- ③ 这里所提的三个“派”同我们所说三大流派范围大致相同,但对其特点与作用的评价则存在很大分歧。
- ④ ⑦ 游汝杰《语言与文化学》,《语文导报》1987年第5—6期。
- ⑤ 拙文《论汉语语法学发展的历史趋势》,《语言学通讯》1989年第1—2期,曾有类似提示,现在看来不够恰当,故应修正。
- ⑥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申小龙《论汉语的文化特征与文化语言学方法》,《汉语学习》1988年第2期。
- ⑧ 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序,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 ⑨ 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第9页。
-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⑱ ⑲ ⑳ ㉑ 申小龙《走出麻木与悲凉》,《书林》1989年第2期。
- ⑬ 朱德熙《语法答问》,商务印书馆1985年。
- ⑭ 胡附、文炼《句子分析漫谈》,《中国语文》1982年第3期。
- ⑮ 张世禄《训诂学与文法学》,《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商务印书馆1987年。

(原载《语言文字应用》1992年第2期。)

文化语言学——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评邢福义教授主编的《文化语言学》

李先焜

在众多语言学著作中,又增添了一本有创新意义的新著,这就是由邢福义教授主编、武汉地区一批中青年语言学者执笔的语言学著作《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我们认为这是一本有价值的著作,希望对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符号学有兴趣的读者认真读一读。

什么是文化语言学?该书作者给予的定义是:“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之间关系的科学。……是语言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文化语言学》第1页)作者一开始就提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犹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一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序”第1页)根据这一基本观点,本书上编是“语言——文化的符号”,下编是“文化——语言的管轨”。

这种交叉学科的研究,目前在许多学科中都得到开展,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与重视,例如,生物化学、数理语言学、工程热物理等等,但是对语言与文化的交叉研究又有其特殊之处。这在于语言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与文化的各个部分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与文化既是部分与整体的包含关系,又是形式与内容的制约关系。一般说,语言属于制度文化的层次,但一

切文化知识又都依靠语言来记载与传播,即使是属于文化物质层次的现象,也只有通过语言的命名、阐释,才有意义。因此,编写《文化语言学》,实际上要同时处理这两种关系。这也是本书首先遇到的难以处理、但终于给予了成功处理的问题。

建立一门新的学科,特别是交叉性学科,必须确定它与相邻学科的关系,本书的作者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了文化语言学与一些相关学科的关系与区别。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主要是由于“文化”这一概念本身涵盖得比较广泛。正如作者所说:“它包括人类所有的社会教化,创造活动及其成果。人类全部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都是社会教化创造的产物,因此,所有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文化现象。”(第28页)“语言”虽是一个内涵相对确定的概念,但其外延、使用范围,却极其广泛,它涉及从古到今、从中到外的一切文化现象。因此可以说,文化语言学涉及到一切文化现象,一切学科,要划定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划清与相邻学科的界限,是一件非常复杂细致的工作。作者重点讨论了文化语言学与人类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的关系。作者认为,它们之间关系密切,但并非完全等同。文化语言学是具有最广泛的综合性的一门学科,它包括了早期人类学、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的内容,而后者则可看作文化语方言学的分支,这些分支学科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文化。

将语言与文化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其突出的优点就是能“还语言以血肉之躯”,使人感受到了活生生的语言,它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载负着具体文化内容的语言。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研究,即回复到语言得以存在与表现的具体文化背景中去进行研究,从而发现语言的很多有趣的方面。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语言的许多现象,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语言中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引起种种新的思考。”(“序”第1—2页)例如,他们探索了汉民族文化对汉语语法的形

成和发展的深刻影响,注意到汉语语法重“意”不重“形”的特点。形式上框架简明,没有繁多的标记;表意上灵活多样,隐性语法关系十分丰富。他们注意到一个普遍的现象,理解汉语,特别是阅读汉语古籍,最主要障碍不是语法。正因为这样,我国古代率先出现的语言学著作是讲词义、讲文字、讲语音的《尔雅》、《说文解字》、《广韵》等等,而不是语法学的专著。他们进一步从中国古代文化背景探索到,汉语这种重“意”不重“形”的语法,跟汉民族的含而不露的文化心态等等因素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联系。此外,汉语语法的意合性和汉人思维的领悟性,汉语语法的简约性和汉人俭朴实用的价值观,汉语语法的灵活性和汉人思维的辩证法也有一定的联系。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的确,汉语没有西方语言那种繁多的语法形态变化,但是汉语的语义表现力并不亚于西方语言,这是有其文化背景原因的。《文化语言学》一书,特别是下编,对此作了多方面的研究。由此我们得到一定的启发,近年来中国逻辑学界进行了中国古代逻辑史的研究,苦心孤诣地试图寻找出类似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公式与规律来,但终究难以求得,其根本原因恐怕也跟中国的语言及其文化背景有关。这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逻辑,中国古代的逻辑也表现在它的语义与语用的丰富性上。例如中国古代的词义解释法就比亚里士多德的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更加丰富多样,中国古代的推理更多的是采用语义推理的形式而非三段论式。逻辑学家们也要象《文化语言学》的作者们那样,不要拘泥于西方固有的格式,而要从文化根源上探索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样可能收获会更大一些。

一门新学科的建立,不仅要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还得有其特定的方法,这种方法是由其特定的对象的性质所决定的。《文化语言学》的作者认为,他们使用的方法应是文化学方法和语言学方法的融合和提炼。由于方法具有多层面、多内涵、多属性和非封闭性、相对性的特点,文化语言学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他们概括出三种主要的方法:一是实地参与考察法,也就是一种调查方

法 ;二是共层背景比较法 ;三是整合外因分析法。作者指出 :“文化语言学的较之特殊点 ,就在于比较过程的多重性。”它可以进行历史的比较 ,也可以进行共时的比较 ,作者所称的整合外因分析法 ,是将某个或某种文化要素看作整个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从而探求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他们将语言作为整个文化的一个子系统 ,致力于研究语言对其它文化要素的影响 ,也研究其它文化要素对语言的影响。例如 ,汉语语法具有“意合性” ,他们认为形成这一特点的原因不在语言内部 ,而在于某种外部因素即汉民族思维的领悟性。这些方法的定名是否恰当 ,还有待商榷 ,但从全书来看 ,对这些方法的具体运用还是比较成功的。全书所使用的材料是非常丰富与多样的 ,这体现出作者充分使用了各种调查的方法。作者进行了古今的比较 ,各种语言之间的比较 ,各种社会背景的比较 ,都是很具特色而且颇具成效的。更使人欣赏的是作者使用的结构分析的方法 ,从语言的结构 ,特别是古字形的结构的分析探索古代社会的文化背景及其演变。作者研究了古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 ,特别是古汉字的形体特征 ,看出古代物质生活方式的特征、风俗制度的变化 ,等等。由于古苏美尔文字、古埃及文字没有流传下来 ,古汉字却流传演变至今 ,分析古汉字的结构以探索其文化背景 ,就更显现其特殊的意义。例如对“姓”字的分析 ,指出“姓”是汉族词汇中最古老的成员之一。《说文解字》中说 :“姓 ,人所生也。古之神圣人 ,母感天而生子 ,故称天子。因生以为姓 ,从女 ,生 ,生亦声。”这就是说 :“姓”是“生”的派生词。因为是群婚 ,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所以有“感天而生子”的传说 ,有“因生以为姓”的方法 ,而“姓”字也就只能具有从“女”从“生”的形体结构 ,这既是“姓”的词源结构和书写形式所蕴含的文化意义 ,也是族外群婚存在的“语言化石”。(参阅第 98 页)这种分析方法确实体现出文化语言学的特殊的方法 ,正如古生物学家通过分析化石以寻求远古生物的形态和当时的地貌气候一样 ,文化语言则通过对“语言化石”的分析以寻求出古代的文化特征与结构”

《文化语言学》除了确立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并采用了特定的研究方法外,还有其符号学方面的价值。符号学(Semiotics)是最近二三十年蓬勃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研究符号(sign)的一般属性、符号在信息传播过程的作用、各种符号系统的特殊性。现代符号学的创始人一个是美国的哲学家、逻辑学家 C. S. 皮尔斯(1839—1914),另一个是瑞士的语言学家 F. D. 索绪尔(1857—1913)。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中文版第 37 页)。近年来我国对符号学作广泛的介绍,翻译了不少符号学名著,国内学者也有不少从事符号学的研究,并出版了一些内容新颖充实的符号学著作,如俞建章、叶舒宪合著的《符号:语言与艺术》,肖峰的《从哲学看符号》,中国符号研究会编的《逻辑符号学论集》等。《文化语言学》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一本符号学的著作。该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语言是文化的符号”。全书正是根据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述。作者引述了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的话:“所有的文化都基本上依赖符号,尤其是依赖发音清晰的语言而产生并永存”,“文化是依靠超体质语境的符号表达出来的事物和事件”。(《文化科学》)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语言以最典型的形式在自身中表现了文化活动,是文化的表达符号。”(《文化语言学》第 79 页)。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曾举过一个很好的比喻:“语言还可以比作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中文版第 158 页)其中思想就是指一个个的观念,声音就是表达该观念的符号。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也正是这种声音符号与文化观念的关系,它们是象纸一样的一个事物的两面。根据观念论的语义理论,所谓观念,也就是一个符号的意义。通过语言的结构去分析它所反映的文化内容,实际上也就是通过分析去阐述语言中所包含的意义。例如,在上编第一章第二节中谈到词汇系统显示的婚姻形式,举出“上古汉语中‘出’和‘姪’这一对称谓正是男从女居情形的写照。”(第 98 页)依据《尔雅·释亲》的解释:“男子谓姊妹之子为

出,女子谓兄弟之子为姪”这正说明族外群婚,男从女居,对于男子来说,其姊妹之子必然要离开自己的氏族;“出嫁”到对方的氏族,所以称之为“出”;对于女子来说,其兄弟出嫁到对方氏族,与对方氏族女子所生之子,必然要“嫁”到自己氏族中来,所以称之为“姪”,姪者,至也。如果不是男从女居;“出”和“姪”的称谓的命名之意,就都是不可理解的。(参阅第99页)。我们现在仍使用“姪”字,但已不使用作为“姪”解的“出”字。如果不从当时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我们就难以正确理解这两个字的涵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语言学》可以看作是“历史语义学”。而根据莫里斯的观点,语义学是符号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两个组成部分是“语形学”与“语用学”)。而广义的语义学,也就是符号学。实际上这本书还涉及到一些语用问题,即涉及符号与符号的使用者的关系、涉及符号使用的语境等问题。这本书通过对甲骨文的分析,指出古代文字的形成与记录文化背景的方式大致有三种:一是象物方式,二是象事方式,三是象意方式,这是我国传统的训诂学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但是由于有许多实例的分析,使我们想到,这种三分法与美国皮尔斯所作的图象符号、索引符号、象征符号的三分法极其相似。皮尔斯还指出,每一个符号实际上都具有这三种属性,只是看哪一种属性占据主导地位而已。在我们的汉字,特别是古汉字中,也同样难以对上述三种组成方式作截然的划分。从古汉字的分析上,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是一个有丰富的符号学传统的国家(参阅拙著:《中国——一个具有丰富符号学传统的国家》,英文稿载《国际符号学会第四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法国出版),中文稿(删节)发表在《江汉论坛》1990年第1期)。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化语言学》也是一本优秀的符号学著作。

还值得肯定的一点是这本书的作者们很强调的“湖北意识”。这是过去在学术界与学术著作中少见的一个名词。据书的“编后记”说,在1988年12月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武汉地区中青年“语言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几位老一辈学者还郑重提出,希望

湖北中青年学者多有一点历史责任感和‘湖北意识’，紧密团结，积极进取，协作编写出一本《文化语言学》，为这门新学科的建设作出我们的贡献。”提出这个“湖北意识”是老一辈学者对湖北中青年学者的一番希望和鼓励。这一批中青年学者果然在这种“意识”的鼓舞下，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著作。由此可见，强调“湖北意识”，并不是要搞小集团、小帮派，搞排他主义，正好相反，它是要求一个地区的同一学科的学者紧密团结，积极进取，各人发挥所长，不搞门户之见。湖北地区语言学界形成了一个学术集体，而且贡献出了自己的成果，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希望他们能继续保持这种精神，不断创造，不断前进，而且能将这种精神推广到其它地区，其它学界，进一步发扬光大。

至于这本书存在的某些不足之外，由于本文作者不是搞语言学专业的，不一定看得准，仅提以下几点，供书作者参考。一是虽然书的作者对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作了反复的分析与比较，但使人感到仍有某些不够明确之处。书作者强调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文化相互关系的科学，它既不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又不是文化学的一个分支。但是书作者又认为文化语言学是人类语言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它似乎又包含社会语言学，两者有合流的趋势，而民族语言学又是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样，就很难说文化语言学不是语言学的分支。而且，从本书的写作倾向来看，仍然使人感到是偏斜于语言学方面。二是有些内容安排与材料使用上前后有些重复，如对亲属关系称谓方面的分析就曾反复出现。三是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作者在一定程度上持支持态度（见第71页和第220页）。如果作者真是持这种看法，就应该作更多的论述，以加强说服力。四是将语用学解释为就是“语言的运用”，似乎过于简单化。语用学是 pragmatics 一词的汉语译名，它有着确定的科学涵义，根据莫里斯的解释，语用学是指谓那种符号和它的解释者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卡尔纳普则认为语用学不仅研究符号和符号的解释者之间的关系，也应当研究符号的所指与符

号的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将语用学解释为就是语言的运用 ,较通俗 ,但不够精确 ,严格地说 ,并非所有语言的运用都是语用学问题 ,因为语形学、语义学同样包含一个运用问题。

总起来说《文化语言学》是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可能他们所探索的问题、所采用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 ,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看法 ,但这并不会减弱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他们已经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今后就有待于书作者以及其他有志者作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初版的序”中说：“一切事的开头总是困难的。这句话 ,在任何一种科学上都是适用的。”看来 ,对《文化语言学》自然也适用。我们预祝这门新学科的繁荣与发展。

(原载《语言文字应用》1992 年第 2 期)

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

游汝杰

一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弊端和革新

本世纪初开始形成的中国现代语言学几乎是全盘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特别是结构主义的学术思想,其结果是利弊参半。就其有利的一面来看,积累了大量用音标记录下来的语言材料,并且促使中国语言学现代化;就其弊端来看,由此产生下述两大后果。

第一,结构主义只注重描写语言的形式,分析语言内部结构的指导思想,不但割断了语言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联系,并且使语言学应有的实用或应用价值大为降低。中国传统的小学,就其通经致用的初衷来说,其价值远远胜过现代舶来的语言学。小学能够助人读古书、写古文,而现行的语法,对于读古文或写今文用处甚微。在50年代人们曾期望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能大大促进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但是现在看来,它的作用远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大。倒是利玛窦的《西儒耳目资》以来的汉字拼音化运动,对普通话的教学工作有些助益。虽然今天的语言学常常自诩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但是国内知识界普遍认为,现代语言学是不知用处何在的可有可无的冷门学科。而在高等学府里,语言学“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境遇也已司空见惯。

第二、西方的语言学是建立在印欧语言研究的基础上的。汉语的性质跟印欧语大不相同。汉语的特点是单音节语素,在句法中语素的独立性较强,印欧语的特点是词的形态变化,词在句法中

独立性较少。以语法研究为重心的中国现代语言学,从马建忠《马氏文通》比附拉丁葛朗玛,到王力参照O·叶斯泊森“词三品”说,到现行的种种语法论著,大多只是移入西方的理论、术语、概念和方法而已。不少地方难免削足适履,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虽然文法革新派早就看出“照搬照抄”的弊病,但是积重难返,几十年后的今天,汉语语法学在因袭的重负下,依然是步履维艰。对汉语语法研究虽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是至今仍然是异见歧出,未能趋于统一。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语法学的困惑”,在别的领域,也存在类似的“困惑”。

由于上述两大弊端的发展,中国语言学越来越萎缩,而不是越来越繁荣;语言学家越来越躲进象牙之塔,而不是走向广阔的天地。在50年代,现代汉语的语音学、语法学、修辞学和描写方言学,由于适应当时的人文生态环境,曾经有过它们的黄金时代。今天的语言学只有加以革新,才能适应变化了的人文生态环境,才能自立于人文科学之林。

革新语言学似乎可以从下述三方面着手。第一,把语言学从象牙之塔中解放出来,既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中研究语言,也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且不仅仅停留在研究上,还要使语言学在社会生活中起到应用的作用。第二,在中国文化背景中考察中国语言的特点,从而建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第三,把语言学与别的学科结合起来研究,从而逐步改变语言学“不食人间烟火”的现状。近年来,关于把语言学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已经讲得不少,但是把语言学与别的人文学科结合起来却几乎完全被忽视了。上述第一方面大致相当于社会语言学,笔者构想中的文化语言学的内容则大致包含在第二、三方面中。

二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目标

转换生成语法的旨趣是研究拟想的人怎样用有限的规则生成无限的句子,着重点是语言能力;社会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社会的

人跟别人交际的时候怎样使用语言 ,着重点是语言运用 ;文化语言学的旨趣是研究同一个文化圈的人的语言跟文化现象的关系 ,着重点是语言的背景。

中国文化语言学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中考察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在宏观上结合文化背景研究语言和方言生成、分化和融合的过程。在微观上从文化背景出发 ,寻找某一种语言或方言的各种特点生成的原因。这样就把语言学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 ,把语言学 and 人文历史、人文地理、文学、戏剧、音乐、民俗等结合起来 ,既利用这些学科的知识来解决语言学自身的问题 ,也利用语言学的知识去解决这些学科的有关问题。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主要目标可以分下述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 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和方言

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在历史上的积极创造 ,那么语言就是原始人类最重要的创造。语言的诞生使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发生剧变 ,语言是人类成为万物之灵的关键 ,语言是人类世代积累起来的极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是文化现象 ,而不是自然现象 ,这是显而易见的。

自然现象一般说来只有共性 ,而没有民族的个性 ,文化现象虽然也有共性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民族的或区域的个性。例如化学反应中西一律 ,但是绘画风格中西迥异。因此研究自然现象的学科四海咸宜 ,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却不能强求一律。例如物理学中西无别 ,文字学却相违甚远了。

语言既然是文化现象 ,那么语言学也应该有民族的或区域的个性。这一点可以说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了。现在是该反思的时候了。一方面 ,因为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化(包括哲学)及其语言的基础之上的 ,所以需要考虑西方的理论有哪些是适合汉语研究的 ,哪些不适合 ,哪些适合的程度有限 ;另一方面要从中国文化背景中出发做些实际的研究工作 ,力图重建符合中国语言事实的理论。下面举例说明上述两方面的问题。

有一位方言学家借用英语形容词“级”的语法范围,将苏州方言形容词分成4级:^①

原级	潏	新	
弱化级	潏笃笃	新簇簇	(后加法)
强化级	冰冰潏	簇簇新	(前加法)
最高级	冰潏结骨	簇崭全新	(扩展法)

英语的形容词“级”有形态变化,规律性很强。吴方言的形容词不能与之比附,因为第一,只有一部分形容词有前加、后加和扩展形式,并且每一种形容词变化的类型也很有限,大多只能跟其中的一、二种类型匹配;第二,每一种变化类型所适用的形容词也很有限。如“簇”或“簇簇”只适用于“新”;第三,有的附加成分词汇意义很明显,如“滑溜溜”。事实上,吴方言形容词的程度表达法,并不象英语形容词那样能够类型化和形式化,从而归纳出整齐的规则,所以英语形容词“级”并不适合吴方言研究。笔者在调查研究上海口语语法中体会到,不必拘泥现成的理论框架,倒还是从吕淑湘先生的“表达论”^②和张世禄先生的“语气涵盖结构”说^③出发,能更成功地分析方言语法。^④

欧洲19世纪盛极一时的历史比较法,为印欧语的系属归类和原始拟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比较法早就被引进汉藏语研究,但是至今收效甚微。究其原因,除了从事的人较少,记录的材料不足等原因之外,还得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历史比较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汉藏语研究。

我们认为历史比较法对汉藏语系适用程度较差。理由如下。

第一,古代汉藏人的文化背景和印欧人不同。历史比较法是建立在原始印欧人大规模集体迁徙这一文化背景的基础上的。亦即建立在语言的谱系树分化的假说的基础上。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人口迁移是蔓延式的,不象欧洲的畜牧社会,常常需要大规模的长途迁徙^⑤。民族或民系的杂居、交融、接触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语言的宏观演变并不一定是印欧语言的谱系树型的。

第二,汉藏语的历史文献就语种、数量和年代的久远而言都远远不及印欧语。以下列出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举例)各语种现存最早文献的年代。汉藏语系:甲骨文,前14世纪;藏文,9世纪;西夏文,10世纪;缅文,11世纪;泰文,13世纪;傣文,13世纪。印欧语系:Hittite,前17世纪;Greek,前8、9世纪;Pali,前5、6世纪;Sanskrit,前4世纪;Iranian,前5、6世纪;Gothic,4世纪;Amenian,5世纪;Tocharian,7世纪;English,7世纪;Cetic,8世纪;Slavic,9世纪。

汉藏语系中的甲骨文虽然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但不是表音的,另4种表音的文字中,傣文的创制时代虽然推定为13世纪(据罗美珍《西双版纳傣文》,载《民族语文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但是注明年代的最早的傣文文献,是晚至1800年抄刻的。所以较有价值的文献实际上只有藏文、缅文和泰文3种。文献的短缺大大增加了拟测工作的困难,而印欧语系的文献不仅种类多,历史久,并且同一个历史时期往往有两种以上文献可资比较,这是印欧语系历史比较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第三,历史比较的重点,一是比较形态;二是比较基本词汇,以求出语音对应规律。从印欧语的立场看,语言中最稳定的因素是形态变化。汉藏语缺少形态,因此只能从基本词汇的比较入手。欧洲的历史比较最重视的基本词汇是数词和人称代词。古代印欧人的经济核心是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商业往来,数词的稳定是不可缺的,因此比较数词容易获得成功,汉藏语的数词不稳定,不少语言明显借自汉语。如泰语、壮语,只有“一”是本族语固有的。“二”以上即借自汉语。其他所谓“基本词汇”也并不怎么稳定,往往很难辨别同源词和借用词,这又给比较工作带来困难。

第四,印欧语中每一个词常常至少有两个或三个音节,又有形态变化,因此确立同源关系和语音对应关系较为可行、可靠。汉藏语的语素多是单音的,且少形态变化,音韵结构又普遍较简单,音韵面貌的相似或“对应”难免带有偶合性,所以往往难以作出严格

的同源关系的证明。因此, A. 梅耶说:“对于这些语音,如果要想得到一些真正的证明,就非另找一个新方法不可。”^⑥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认为历史比较法并不能照搬来研究汉藏语系。也许从古代中国的文化背景出发,从语言的借用、接触、交融、底层、类型这些角度,来建立汉藏语系比较语言学更为合理,更为有效。

方言地理是一种人文现象,研究方言地理必须考虑它的人文背景。西方的方言地理学理论,特别是划分方言区的同言线法并不一定适用于汉语。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跟中国文化的固定特点关系很大。人们不难发现:旧府州辖境内的方言内部有很大的一致性。因此,在给现代汉语方言分区的时候,可以把历史行政地理列为重要的参考项,在府境长期稳定的地区尤其应该如此。^⑦笔者还曾发现南宋时代的行政区划和现代方言区划,事实上有许多重合之处。历史行政地理还可以作为拟测古代汉语方言区划的重要线索。^⑧

从中国文化背景出发研究汉语,建立不同于西方的理论,以上只是举例而已,实际上还有不少领域有待进一步开发,例如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的固有特点和汉语语法特点的关系^⑨、底层文化和底层语言的关系、地方文化和人名地名的关系等。至于婚姻制度和亲属称谓、文化交流和外来词、民间心理和忌讳造词法等则是过去已经研究较多的领域。

(二) 把多种人文科学引进语言学

本文所谓“人文科学”包括各种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对语言研究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这方面人们已经注意到的似乎只是人文历史。常常看到某些描写语言或方言的著作,在头上戴上一顶人文历史的帽子。实际上这些人文历史的材料和语言材料往往是油水分离的,未能有机结合。除了人文历史之外,哲学、逻辑学、文艺学(包括文学、戏曲、音乐等)、地名学、人名学、民俗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种人文科学都有助于语

言研究。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目标之一就是利用这些学科的知识，解决语言学自身的问题。

从结构主义的立场来看，只能就语言本身来研究语言。事实上语言学上的有些问题光凭语言内部材料，根本不能解决，或者难以解决。但是如果利用语言以外的材料和语言学以外的知识，则不难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下面举一个例子。

语言学界普遍认为构拟古声调的困难很大。有的语言学家认为：“古声调构拟虽然是一项十分有吸引力的课题，可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找到可靠的方法，使我们在这个领域里往前迈一步。”^⑩笔者曾利用音乐学的知识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线索。

印欧语言是以轻重音为超音段的主要特征的，轻重音能够辨义，所以西方的诗歌和声乐作品的节奏和旋律是以强弱拍相间为基础的。^⑪汉语的主要超音段特征是声调。这个特征对于旧体诗词和声乐作品的节奏和旋律有着明显的影响。事实上，中国的声乐作品是以字音的声调为基础的。这种现象从地方戏曲、旧体诗词的吟诵调和各地民歌都可以观察到。这样看来，只要找到古代配词的声乐作品，我们就可以从它的乐曲的上下行的趋势来研究古代声调的调形。这样的材料也是有的，例如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此书收有上溯唐宋，下至明清的古曲4466曲。

笔者曾将宋代词人姜白石的17首词和它们的旁谱拿来比较，发现在乐曲进行中，字的调类和旋律的高低升降的关系很密切。可以从中归纳出至少3条规律：①当去声字在前，平上入声字在后的时候，乐曲是上行的；②在含平声字的两字组中，不管平声是首字或后字，它在乐曲中的相对音高都是较高的；③在含入声字的两字组中，入声字不管处于前字或后字位置上，它的音高比去声或上声都要高些。这些规律完全可以作为拟测姜白石时代的四声调形的依据。^⑫

（三）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

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别的人文学科的知识来解释语言学的有关问题,另一方面语言学为解决邻近学科的有关问题也可以大显身手。

常常看到哲学、历史学、文学、民族学、地名学等领域的论著,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解决各自的问题。由于没有语言学家的参与,这些研究往往发生错误或无法深入。例如近年来《金瓶梅》的方言系统和作者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参加讨论的学者都试图寻找作品中见于今天某地的方言词汇,据以判断作者的籍贯,结果各家各执一端,异见歧出。从语言学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的词汇在两地语音形式不同,但是词源是相同的;二是现代某地的词汇不等于明代某地的词汇,事实上每一种方言词汇都是处于不断消长和替兴的过程中;三是方言中的词汇是开放性的,容易互借,不象语音系统和句法结构,那是封闭的,不易借用。所以,由于缺少语言学素养,他们的研究结果大多缺乏说服力,并且往往互相矛盾。

下面提供一个利用语言学知识解决戏曲史问题的实例。

元末明初的四大传奇中只有《白兔记》的作者没有着落,这在戏曲史上是一个悬案。1967年发现明代成化年间刊刻的《新编刘知远还乡白兔记》。这是现存最早的传奇刻本。成化本的前场对白中有一段文字说明这个演出本的编者是“永嘉书会才人”。戏剧界都信以为真。永嘉今称温州,如果编者真的是温州人的话,那么它的方言系统也应该是温州话。但是经过笔者的初步研究,结论并非如此。

成化本中有许多别字,如将“常熟县”写作“长熟县”。写别字的客观原因自然是别字和正字在写者的方言里音同或音近。所以比较分析别字和正字的音韵地位,可以推断作者的方音系统的某些特点,进而断定作品的方言系统和编者籍贯。笔者曾将作品中全部别字加以归纳,分成6类。结果发现每一类别字跟与之相应的正字,在北片吴语中都是音同或音近的,在南部的温州方言中两

者的读音却大相径庭。又通过跟冯梦龙《山歌》等同时代吴语材料的比较,最后得出结论:成化本的编者决不是温州人,而是吴语区北部人。^⑬

中国文化语言学将帮助我们从先入为主的西方语言学理论的成见中解放出来,创立适合汉语实际的理论。它将大大拓展语言研究的视野,使语言学摆脱与其他人文科学和社会生活隔绝的状态,成为一门可以与国内别的人文学科相争雄的有用的学科。

三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源流

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早在19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德国语言学家W. V. 洪堡特在著名的论文《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论爪哇岛上的卡维语》绪言,长达350页)中首次讨论了语言结构和人类精神的关系。到了本世纪初年,美国的人类学家F. 鲍阿斯和他的两个学生A. L. 克虏伯、E. 萨丕尔,以及萨丕尔的学生B. L. 沃尔夫致力于调查美洲印第安人的语言和社会,创立了人类学语言学。在欧洲稍晚些时候,英国的社会人类学家B. 马林诺夫斯基曾在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群岛上研究过土著的语言与社会。继上述欧美学者之后,西方继续有人利用人类学语言学的方法分析诸如亲属结构之类问题。近年来则有人采用生成语法的某些概念来分析宗教仪式或别的人类文化行为。

有的语言学家认为人类学语言学也可以称为文化语言学。^⑭不过我们所谓“文化语言学”跟鲍阿斯等人创立的人类学语言学有所不同。人类学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文字传统的语言和较后进的社会。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和研究语言来了解社会历史和民族文化,开初它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萨丕尔—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似乎越出了上述范围。因为它主要涉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所以可以纳入心理语言学中,^⑮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没有文字传统的语言和社会,而且包括已有文字甚至有

大量历史文献的语言和高度文明的社会。它是语言学和文化学的交叉学科,两者的结合研究是双向的。

最早试图把中国的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学者,是一些西方的汉学家,如法国的 M. 格拉内、H. 马伯乐,美国的 B. 劳佛,他们在本世纪初曾发表多种有关论著。法国汉学家的研究重点是汉语和汉人思维、逻辑的关系,试图拿汉语的特点证明汉人心智的特殊性,劳佛的《中国—伊朗篇》收集、排比了许多有关语言接触与文化交流的材料,资料丰富,时有创获,但不成系统,缺乏理论。

在 30 年代,中国的一些民族学家开始对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进行实地调查,罗香林、刘锡蕃、徐松石三人先后都有重要的著作发表。特别是徐松石的《泰族壮族粤族考》^⑥和《粤江流域人民史》^⑦材料丰富、创见甚多,其中也不乏涉及语言学的内容,这两本书的缺点是,所提供的语言材料不够准确,全书也欠精审。

30 年代末至 50 年代,国内许多语言学工作者曾在西南地区大规模调查研究少数民族的语言与社会,但是已发表的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著作还很少。罗常培先生曾著《语言与文化》一书(1950 年北京大学出版)。遗憾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引起语言学界足够的注意和广泛的兴趣。虽然这本书还有缺点,其中受 N. Y 马尔语言学思想的影响是次要的,主要的缺陷是:篇幅不算太长(正文 108 页),而内容兼赅古今中外,因此未能深入展开。不过这本书仍不失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开山著作。笔者受罗著的启发,前几年初步探索了方言和中国文化的种种关系,撰成《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1986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学识浅陋,成书仓促,此作尚不成熟,只是为建设文化语言学聊尽绵薄而已。

建设文化语言学的主要困难有二:一是文化学所涉及的范围太广阔,语言学又过于专门化,各方面的学识很难兼而得之。二是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其系统性最强,研究方法最精密、最特殊。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结合在一起往往产生不平衡现象。尽管语言学方

面的研究可以再深入下去,但是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却不需要如此深入的研究。语言学不得不游离出来,自成天地,其结果是语言和文化难以密合。在目前草创阶段似乎可以分头做些专题研究,积少成多,最后汇成巨流。

语言具有物理、生物、心理、信息、人文等多方面的属性,语言所涉及的范围是很广阔的,所以要真正了解语言的性质,必须从多角度来研究它,语言学的传统范围显然是过于狭窄了。霍凯特早在1967年就对当时的“纯形式研究”感叹道,这不是一个“突破”,而是一个“崩塌”。^⑩从语言学发展的轨迹来看,18世纪是哲学的世纪,19世纪是历史比较的世纪,20世纪是描写和转换生成的世纪,21世纪将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世纪。文化语言学试图把语言和别的人文学科学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揭示语言自身的奥秘,也促进邻近学科的发展,它的生命力在未来的语言学潮流中将会充分显示出来。

附 注

- ① 叶祥苓《苏州方言形容词的“级”》,载《方言》,1982年第3期。
- ②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56。
- ③ 张世禄《关于汉语的语法体系问题》,载《复旦大学学报·语言文字专辑》1980年9月。
- ④ 见《上海市区方言志》语法部分,待刊。
- ⑤ 详见桥本万太郎《语言类型地理学》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 ⑥ 梅耶《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第34页,科学出版社,1957。
- ⑦ ⑧ 详见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第3、4章。
- ⑨ 申小龙《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文稿,待刊。
- ⑩ 朱德熙《在中国语言和方言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载《中国语言》,1986年第4期。
- ⑪ 详见 Matthew. Y. Chen, The Interfacing of Language and Music,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Vol.4, No. 3, 1984。
- ⑫ 游汝杰《宋姜白石词旁谱所见四声调形》,文稿,待刊。

- ⑬ 游汝杰《成化本白兔记的方言系统》,文稿,待刊。
- ⑭ 吕叔湘《漫谈语言研究》,载《中国语文天地》,1986年第1期。
- ⑮ 桂诗春《心理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
- ⑯ 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
- ⑰ 中华书局1939年出版。
- ⑱ 转引自王士元主编,游汝杰等译《语言与人类交际》中文版序言,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原载《语言社会·文化》1991年)

浅谈语言国情学

赵 爱 国

语言国情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是苏联近二十年来产生的一门崭新的语言科学,它为对外俄语教学的深入实践与发展奠定了新的教学理论基础,并为外国人学习和掌握俄语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已引起我国俄语教学界广泛注意和重视。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叶·韦列夏金(Е·М·Верещагин)和维·科斯托马罗夫(В·Г·Костомаров)为这一新学科的创立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工作,他们合著的《语言与文化》(《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一书,较为全面而系统地论证和总结了有关语言国情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被认为是苏联语言国情学方面的权威性著作和语言国情学教学法指南。

一 语言国情学的理论基础

世界是通过语言来认识的。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质不仅仅限于交流思想一方面,而且体现于多种功能之中。对语言国情学来说,其理论基础主要基于语言的以下三种功能:

1) 语言的交际功能(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语言是交际者传递信息的手段,是“ 人类交际最重要的工具 ”,也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可以说,没有语言就谈不上交际,没有交际就没有社会,没有社会就没有现实中的人。此外,语言的交际功能还集中表现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双重作用上,即它不仅可以把己认识的某种思想传递给他人,而且也同时从交际对方获得新的思想和信息。所以,交际功能是语言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

2) 语言的文化载蓄功能 (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или Культуроносная, накопительная функция)。语言具有反映、记录 and 储存信息的能力。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社会是不可分的,语言总是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完整地、协调地反映文化,并将其固定下来,世代相传,成为民族文化和知识的载体和集体经验的贮藏器。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群体角度看,语言作为社会现象,成为操某种语言和具有同一种语言文化的全体成员所获得的世界信息的贮藏器,语言被看作是本民族的共同财富,是民族文化真正的镜子;另一方面,语言作为个人财富而反映人的个性,是人所有的生活经验的贮藏器。语言中包含的知识、意义和思想区分着人的情感、意向、注意及心理行为,并将它们联合成统一的意识。简言之,语言是真正的“教师”,它所传授给人们的是其本身世代积聚的全部知识、民族文化和文明。这一点对语言国情学来说尤为重要。

3) 语言的指导功能 (Дирек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即引导、影响和培养人的个性的功能。人可以通过语言对对方施加影响,人也可以从语言中得到知识并受到教育。语言中包含的丰富的民族文化语义可以激发和刺激人的思想,纠正或改变人的行为。从哲学角度看,语言具有推理(确切地说是逻辑推理)功能,它符合人的认识思维过程,从而成为每个人思维活动的物质基础。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语言的三种功能尤其是文化载蓄功能为语言国情学的创立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贮藏器和载体,在客观上使语言单位成为国情知识的源泉。对学俄语的外国人来说,学习语言国情学就必须首先学会从语言单位中吸取丰富的国情知识,即从俄罗斯语言中学习和掌握苏联国情。

二 语言国情学的特点

《语言与文化》一书的作者认为,从教学法角度看,用社会学教学法教授的国情知识,叫普通国情学 (обще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而用语文教学法教授的国情知识,叫语言国情学。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换言之 ,普通国情学与语言国情学的教学资料是相同的 ,只是教授的方法(即向学生传授国情知识的途径和手段)不同 ,以及巩固、运用这些资料的方法不同。语言国情学有以下五个特点 :

1) 语言国情学的课文属于规范的专用于报刊和文学作品的政论、口语、会话语体。可以这样形象地比喻 :如果说普通国情学材料首先给读者以信息 ,即影响人的智力和合理记忆的话 ,语言国情学材料则刺激人的形象思维 ,影响人的感官 ,培养人的兴趣 ,因而在传输国情信息的同时 ,作用于人的情感和文学形象记忆。

2) 语言国情学材料与所学语言国的语言不可分割 ,因为正是语言本身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知识。

3) 语言国情学教师应注意着重讲授外范畴和术语性质的国情知识 ,使用的是最常见常用的词语。

4) 语言国情学可以单独(作为专业)授课 ,在典型情况下是语言课的一部分。

5) 语言国情学的教材被严格限定在语言教材之列。

三 语言国情学的定义

《语言与文化》一书作为目前苏联对外俄语教学中语言国情学教学法指南 ,其作者对语言国情学下了这样的定义 :语言国情学是对外俄语教学的一方面 ,它为保障教学的交际性 ,解决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之任务 ,而在语言教学法上体现语言的载蓄功能 ,向教学对象进行文化移入(即向其介绍苏联现实生活中的典型形象) ,其教学法属语文教学性质 ,即通过俄语和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介绍国情知识。这一定义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是语言 ,二是国情 ,三是教学方法 ;其要点有四 :一是在对外俄语教学中必须向学生进行苏联国情知识的“文化移入” ;二是介绍苏联国情知识的手段是俄语 ;三是苏联国情知识来源于俄罗斯语言本身 ,即反映俄罗斯民族文化语义的词汇 ,因为俄语不仅是苏联国情信息的源泉 ,而且是显

示和贮蓄这些信息的手段 ;四是贯彻语文教学原则。这里尤其强调“通过俄语”和“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这两点 ,因为这是语言国情学区别于普通国情学的主要标志 ,也是教授和学习语言国情学的方法、手段的集中体现 ,它从根本上保障了语言国情学中“语言材料、与国情知识的同源性(гомогенность)。

因此语言国情学成为对外俄语教学中“真正的独立的方面”。过去语言教学传统地分为四大类——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和修辞学 ,现在必须加上一类——语言国情学。语言国情学的教学过程 ,就是借助于语文教学法 ,提供、巩固和运用苏联国情知识的过程。

四 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作为一门综合性科学是许多学科研究的对象。比如 ,地理学可研究形成文化自然背景的自然条件 ;经济学研究物质文化中的生产与商品关系 ;社会学用以研究意识形态、社会道德和社会制度 ;历史学可以研究文化遗产 ;民族学和民俗学可以用来研究过去的物质与精神财富 ,等等。语言国情学研究的对象当然包括上述有关国情方面的所有内容 ,但它的方法与途径不同 ,它是研究在外语教学过程中用所学外语向学生传授所学语言国文化的方法与途径的科学 ,即研究“在俄语教学过程中用俄语介绍苏联典型生活现象的来源和方法”。简言之 ,语言国情学研究的对象是语言教学过程中提供国情知识的方法及手段 ,旨在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语言学习所必需的国情知识 ,提高对所学外语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使苏联教育工作者认识到 ,对外俄语教学不能仅限于语言本身的变格变位及遣词造句等语法和修辞范畴 ,必须跳出语言本身的范围 ,深入到语言外部的现实生活中去 ,才能完善地理解和掌握语言 ,达到交际目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仅仅把语言作为一种符号进行传授 ,偏重语音、词汇、语法 ,而忽视了语

言的文化载蓄功能和语言中所储存的民族文化语义知识的传授 , 结果使外国学生常犯语言国情错误。尽管他们的发音正确 , 语法上也无懈可击 , 但说出来的话语却往往不符合苏联国情 , 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此 , 对学俄语的外国人讲授语言国情学 , 可以帮助他们大大提高对苏联典型生活的理解及语言运用能力 ; 对学俄语的学生来说 , 语言国情学为其学习俄罗斯语言和了解掌握苏联国情提供了一条新的有效的途径 : 在俄语学习中掌握一定的苏联国情知识 , 同时通过国情知识的了解和掌握 , 来丰富、补充所学语言材料 , 加深对语言的理解 , 提高语言的实践能力和运用水平 , 达到真正掌握俄语的目的。

(原载《外语教学》1988 年第 3 期)

对开展国情语言研究的 几点思考

张中华

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在研究结构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时,都没有把语言和社会联系起来。但语言毕竟不是独立于社会,而是存在于社会之中,并服务于社会的。语言的社会属性决定了语言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应把语言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于是,研究语言与当代生活、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历史、语言与民族文化相互关系的国情语言学应运而生,开拓了俄语研究的新天地。

(一)

国情语言学这门学科兴起的时间还不长,只有将近二十年历史,而且由于还处在边缘学科的境地,因此,国情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界说。如从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一词的中文译法上,就可对目前中国研究这门学科的现状略见一斑。有人译为国情语言学,有人译为语言国情学。译法的不同,反映的乃是重点的不同,反映研究者是对语言更感兴趣,还是对文化更侧重,把哪个当做工具,哪个为哪个服务的问题。我认为,既然语言和文化是局部和整体的关系,语言是文化的内核,那么两者必须有很大一块地带重合,因此试图对这个译名作出非常明确的划分,似乎毫无意义。如苹果早在 5000 年前的石器时代就被人所知了。苹果的悠久历史反映在各种语言的词汇和成语中。这个词在自己的意义中保存了各民族生活中的共同点和差异,保存了他们中间历史形成的概念、观念等。如在很多语言中都把健康的

小姑娘、年轻姑娘和年青妇女比做 как румяное яблоко。在俄语中用“连落苹果的地方也没有”来形容人多拥挤。英语用苹果表达另一种意义：an apple off another tree, 即 совсем другое дело。而法语又用苹果这个形象作俗语性感叹声：aux pommes, 即 здорово, красиво。(bath) aux pommes, 即 первый сорт 等。由此看来,每一种语言中形象意义的形成都是自己独特的历史、社会条件、民族风俗的结果。那么,研究这个内容的学科该叫什么呢?在这里,我用国情语言学这个术语,因为从苏联国情语言学奠基人 E·M 维列夏金和 B·Г 科斯托马罗夫二氏的理论来看,它是联系社会文化对语言进行研究,是语言研究的组成部分。它应当被看作是语言学和语言教学的一个新分支。它以语言为中心,综合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以称名单位为剖析的对象,一方面研究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的语言诸因素的变化,一方面联系语言对社会、文化进行研究,从语言诸因素的变化探究社会文化诸因素的变化,透过语言的变化现象,把历史的或当代的社会生活奥秘揭示出来,展示蕴含在语言体系之中的、反映民族文化特色的国情知识。也就是说,根据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这门学科的研究包括从语言研究文化和从文化研究语言这两个方面,而且方法是系统贯通的。

维科二氏认为,国情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一是揭示语言中(主要是称名单位)的民族文化语义,二是在语言课上展示、巩固、活用这个民族文化语义。目的是通过俄语,并在掌握俄语这个新的语言代码的过程中,向外国学生介绍苏联的文化。他们是把国情语言学作为对外语言教学的一个方面提出来的,并把它列为与语音、词汇、词法、修辞并列的第五个方面。尽管我国学者对其中的—些问题尚存异议,但这门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是无庸置疑的。这门学科的很多重要问题已被深入探讨,已有了不少方法论和基础理论著作,如 E·M·维列夏金和 B·Г·科斯托马洛夫合著的《语言和文化》、《词的语言国情理论》、Г·Д·托马欣的《国情语

言学的理论基础》等 积累了不少有价值的描写资料。他们认为 , 国情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在语言教学和语言教学法里的运用 , 以达到语言教学的目的。它一方面包括社会语言学的内容 , 一方面又包括如何传授语言的民族文化语义 , 使学生搞清词语的实际所指 , 词语的文化伴随意义和词语的使用范围等。欧美早在七十年代初就提出语言教学与文化目标在课堂上真正结合起来的问题 , 但至今没有一个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的理论、方法。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近年也意识到文化在对外语言教学中的重要性。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1990 年 5 月 10—13 日召开研讨会 , 强调加强文化教学是语言教学本身所要求的 , 但还无适当的解决办法做到在语言教学过程中既巧妙地传播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 又无强加于人之嫌。苏联在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对我们颇有借鉴意义。苏联提出的国情语言学理论 , 试图解决语言教学与文化目标结合的问题 , 为完善对外语言教学做了不懈的努力。这也是国情语言学的实际意义。但受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方法所决定 , 国情语言学也象目前许多其它边缘新学科一样 , 强于实证 , 弱于立说。而且由于它不具有象结构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一解释诸变”的特点 , 和它对社会文化发展较敏感 , 致使它的系统性也不如前两者 , 所以它的哲学力量比前两者单薄得多。但我认为 , 正是由于它的敏感性 , 才使它更具丰富多彩的特色。

(二)

根据维科二氏的观点 , 不论是对国情语言学的定义 , 还是对国情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 都是在语言教学法术语中进行的。但本文作者认为 : 国情语言学也可以从语义体系的角度去研究。理由和设想如下。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的体系 , 如韩礼德所说 , 在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语义系统组成的语言的意义系统之间 , 存在着一种实现的关系 : 语义通过词汇—语法得到实现 , 词汇语法通过语音得到实现 , 而语义又是文化的一种实现。语言又是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民族表现形式,语言的基础是词汇,词汇的核心是词义,因此,语言 and 文化的真切关系,应当从词义与文化的关系来说明。这个词义除去语法意义、上下文限定义、修辞意义,还有概念义和民族文化语义。民族文化语义是语义民族性的一种表现,是指附着在词汇概念意义之上的伴随文化因素。它反映使用该语言的人民对客观世界独特的认识和态度,记载该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和长期积聚下来的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传统习惯、思维方法。因为文化传统与语言习惯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情语言学应当是语义学中一个专门研究国情语义的分支学科。因此,我很赞同王德春先生“应从国情语义的角度研究国情语言学”的提法,这也是把国情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纳入科学轨道的另一种方法。

从教学法观点来看,语义系统包括两个方面,既就词内关系而言的语义构成,和就词际关系而言的语义关系。下面我们从这两方面进行举例分析。

因为人们是通过范围、概念、名称来看世界的,而我们如此这般地看世界,又主要是我们的文化使然。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关于语言决定思维的基本观点失之偏颇,但它还是有可借鉴之处的,如我们可以从该假说中得到有益的启示:不同的语言,对世界事物的概括往往是不同的,因为文化影响了语言,所以学习外语时,要特别注意反映民族文化的称名语言单位,而且应不止于那些约定俗成的符号。因为对别种语言词汇的这种初步认识,只局限在信号性的、技术性的很窄的语义范围内,只掌握了单词的个别涵义,还没有理解它的 *подтекст* 和意义的各种色彩,而是应当通过它逐步熟悉民族文化的全部内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语言,充分发挥其交际工具的作用。

我们这里所说的具有民族文化背景色彩的语词,主要指的不是那些某一个民族所特有的语词,因为对于它们接受过来也就是了,据维科二氏统计,就俄语而言,这类语词仅占积极使用的俄语

词总数的 6—7%。我们指的是那些不完全对应词,也即背景词。关于俄语中的背景词,可以肯定地说,每两个当中就有一个,以自己的词汇背景区别于相近的外语词。而且这类词语,我们是透过母语这块透镜来观察的,很容易用母语的概念来代替外语的概念,不注意它们在内涵和外延上的差异,因此,也正是这类词语在交际中构成严重的障碍和困难。

根据单个词符号的传统的“语义三角”理论,Symbol 要通过 Concept 才能与 Referent 产生联系,Symbol 和 Referent 之间有的只是一种“诱嫁关系”。细想,现实中我们所感受的确实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经过解释后的想象世界,也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观的 meaning。作为文化价值观的 meaning 的领域是充满联想、象征的领域。由于 Symbol 和 Referent 之间的关系是任意的,所以语词的意义不在词语本身而在于人。Symbol 和 Referent 之间的密切关系集中表现在形象比喻上,比喻所使用的喻体,常受一个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生态环境等影响,民族文化语词打上了自己本身的独特的印记。如人们常用枫叶喻指加拿大,而用桦树喻指俄罗斯。俄语文化中的 береза 这类词语最能反映语言载体的历史和民俗风情,它们所蕴含的象征和情感意义,就是民族社会心理的投影,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深层的文化传统。

不同的语言社团各具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他们的世界观的系统的线索。那么,怎样才能“通过词”来了解其民族文化语义呢?要想理解一个词位的意义,就得对其进行符号解释,因为人们只有借助符号使主观意识客观化,才能把自己所感受的意义传递给他人,并能够接受和理解别人传递来的意义。这个过程也就是语义成素分析,也即维科二氏所说的 семантизация。

拿两个概念对应词,分别进行背景语义化,就能找出它们的异同点。试比较俄语 белый, красный 和汉语的“白”、“红”。(见

文末附表)

可见,义素的异同,就是文化间的特性和共性的外化形式。符号与意义间的象征性的一致倾向产生于人们对相同客观事物之间的共同感受,而差异也是明显的,因为文化背景影响着对语义的理解,文化差异造成了语义的非对应性。

汉俄语文化在汉俄语词汇中分别得到反映,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决定了不同的搭配关系,如汉语文化中“白丁”、“白衣”、“白身”均指平民,没有功名的人,因为古代中国平民着白衣。“白文”指不附加评点、注解的书的正文。“白眼”表示鄙薄或厌恶。“白面书生”指年轻识浅、阅历不多的文人。“红尘”指人世间。“红豆”象征爱情或相思等。而在俄语中无此搭配。但俄语中的特殊搭配汉语中也没有,如:Белая кость 喻指贵族,белое мясо 指鸡肉和小牛肉。белые стихи 指无韵诗,белый билет 在口语中指免服军役证,белая ворона 指标新立异的人,белое оружие 指白刃武器,красная строка 指文章每段的第一行,красное словцо 指妙语、俏皮话等。

词汇背景还确定词的意义搭配的界限:个人只有在这个范围内选择,如只能用“红尘”表人世间,而不能说“白尘”等。尽管如此,符号与意义毕竟不是一回事。符号往往能“背叛”意义,当符号被作为一种与它所象征的事物相分离的东西来理解时,一些符号就不仅代表某种别的事物,而且是一种既定的思想方法。如 два 的社会文化意义说明,文化中的符号往往能以一种人们所不期望的方式影响这个文化。俄语中的 два 在从前俄国人的概念里,是一个不吉祥的数字,由此引申双数不吉利。但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一般来说却正相反,如送礼要送四合礼,待客上菜不出单儿等。可见,数字的使用也涉及民族文化心理问题。

以上,是按传统的语义三角理论对单个词符号的意义所做的分析。其实,意义是在具体的语境上下文中的。只要信息的发出者是一种文化的成员而接受者是另一种文化的成员时,就发生跨

文化传通。那么,在一种文化中编码的信息必须在另一种文化中解码。

文化差异在编码和解码过程中的作用,是跨文化传通中的首要问题。当一个信息离开被编码的那个文化时,这个编码携带着编码者所要表达的意义,当它抵达将被解码的文化时,发生一个变化的过程:解码文化的影响变成信息含义的一部分,原始信息的内含意义就被修改了。如在汉语文化中被编码的用来比喻无法摆脱困难窘迫的处境的“他没法下台”这个信息,到了俄语文化中解码时,解码文化的影响变成了信息含义的一部分:Он просто не знает, как выбраться из неловкого положения. 不能说 Он не может сойти со сцены,因为 сойти со сцены 这个表达中没有比喻摆脱困难窘迫处境的这个转义。又如在汉语文化中被编码的“这个小伙是块材料”这个信息,到了俄语文化中解码时变成了:Парень хоть куда. 而不能说 Он хороший материал,因为 материал 没有比喻适于做某种事情的人才这一比喻义。再如汉语中的“我给他点颜色看看”这个信息,到了俄语中说成 Я ему покажу, где раки зимуют. 而不能说成 Покажу ему цвет. 因为 цвет 一词没有有意显示给人看的厉害脸色这个转义。在俄语文化中被编码的信息 Онтряпка 到了法语中成了 nouille,到了英语文化中则成了 pea soup. 这类惯用语蕴藏着人人皆知的生活常识,因本体和喻体有些相似点,能够从喻体联想到它的本体。如果你掌握的只是约定俗成的符号,那么你得到的只是有关客体的信息,并没有掌握国情语义的信息。要想了解它们的国情语义,就得了解它们所反映的传统文化在语言中留下的痕迹。这几个例子中,虽然各民族对同一类现象或人使用不同的喻体来进行比喻,但语义是对等的。

再举一个意义被修改的例子。如在俄语文化中编码的“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这个信息中的“白”进入到汉语文化中解码时,信息的内含意义可能就会被修改了。因为“白”、在传统的中国文

化中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如红白喜事。传统的中国文化认为结婚穿红才好,红是喜事的象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文化造就和限定了每一个作为传通者的个体,人们的传通行为和赋予信息意义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着文化的制约。总之,俄汉语两种文化的成员各自受其文化背景和生活经历的影响,对词汇及表达的赋义也各具民族文化特点,因为文化决定了各自的认知结果。

文化不仅决定了人的认知结果,它还制约着语言形式。爱斯基摩语“雪”的词多,这是雪的文化所赋予,汉语亲属词分得细,也说明了语言的使用受文化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当外国人与中国人进行交际时,对表示亲属关系的词语常常感到非常困难。比如在上义词“人、亲属”这个共同义素下,它的一组下义词共同组成一个在语义上互相依存但又互相限制的语义场。现在对下列亲属词进行语义成素分析。

отец	长辈	
father	直系	父亲
père	男性	

在这四种语言中,义素相同,也就是说,这几个词语完全对应。

	同父母	
брат	同辈	兄
brother	男性	
frère	年长 < ±	弟

这四种语言中,义素相交,兄弟和 брат, brother, frère 之间的共同义素:男性、旁系、与自己同辈、同父母。但汉语还要加上比自己年长或年幼的义素。在这一例子中,汉语的称谓精细,另三种语词概括性强。不同语言间的词语相互难以对应的,可以通过义素分析来加以辨别,从而揭示语言间的差别。但在翻译时,要做到义素对等,如果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义素对等的词,则要创造义素对等的词组。如:старший брат = elder brother = frère aîné = 哥哥。亲属称谓词分得细,与汉民族的血统、辈份、长幼等血亲观、伦理观

有深刻的联系。

总之,义素分析可以更深刻地了解语义,并使之形式化。一个人只要掌握了语言的语义,就能自由地进行编码和解码。掌握大量的表示相互关系的词,对提高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能力有很大帮助。掌握词语的民族文化语义,是将语言知识转化为交际能力不可缺少的条件。

(三)

当今之世,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变得日益重要。但由于人们的交际背景、社会制度、思想方法、观念、心理、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差异,在交际过程中常常存在信任 and 理解的障碍。要想促进相互间的理解和信赖,就得首先学会理解别人行为的意义。也就是说,在进行跨文化研究时,要展示隐含在语言系统中的反映一个民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心理状态、社会习俗、是非标准等文化因素,提高我们在有意识的和有意图的交际中的技能。

究其根源,我们学习俄语和与俄语有关的知识,就是为了达到与苏联人进行有效传通的目的,而学习语言及其文化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要想做到有效传通,输出、输入的信息量应基本相等,入超和出超都不恰当。三句话不离本行,话又说到对苏联国情语言学的研究上来。我们不能只是把它介绍过来,进行单向研究,而应当以俄语及其所蕴藏的文化为参照系进行广泛的比较研究——“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其实,它们是相互参照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在寻求理解别的文化的同时,也在仔细地考察自己的文化。在我们研究俄语及其所蕴藏的文化时,就可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来承受和容纳外在的体系。当然,差异决不会因相互的融合而改变,而是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找到构成交际阻隔和文化冲突的差异,然后才能知道在跨文化交际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我们能够施之的影响,并把交际中的消极因素降到最低限度,排除文化障碍,做到与目标语社团成员交际的有效性和得体性。

(原为洛阳“ 文化与语言学术讨论会 ”的报告 ,1991 年)

语言国情学及其发展

孟庆和

七十年代以来,苏联语言学家和教学法家在作为外语的俄语教学实践中,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作为外语的俄语教学(РКИ)已经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语言国情学(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就是在这一领域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1969年8月,国际俄语教师协会(МАПРЯЛ)在莫斯科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语言国情学的问题,并有一个专门的俄语国情学小组对此问题展开讨论。该会于1971年和1980年先后召开了二届语言国情学专题国际讨论会。

在1971年的“国情与作为外语的俄语教学”国际专题讨论会上,苏联学者Е·М·Верещагин和В·Г·Костомаров提出了在教学中建立除语音、语法、词汇、修辞之外的第五个科目——语言国情学。1973年,由这二位学者合著的,全面论述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重要著作《语言与文化》(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1973、1976、1983年连出三版,第二版获苏联教育科学院克鲁普斯卡娅奖金)问世。这是第一本从理论上探讨和研究俄语语言国情学的专著,它的出版标志着语言国情学的诞生。此后,俄语语言国情学便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重要的教学原则贯穿到作为外语的俄语教学的整个过程之中。

按照Е·М·Верещагин和В·Г·Костомаров(1976)所下的定义,教授外国人学俄语的语言国情学是使外国学生在学习俄语的过程中,通过俄语来了解现代苏联的现实、文化的一种教学法^①。这就明确了语言国情学与国情学(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这两个

概念的区别。

国情学(或曰国情课)是系统地向学生介绍所学语言国文化的学科(这里的“文化”不只包含文化历史因素,而且包含社会政治因素)。它不强调提供信息的方法与手段,既可用所学外语,也可用学生的本族语,甚至还可以用媒介语向学生介绍所学语言国的文化。它是一门知识课,不是语言课。

“语言国情学研究显示民族文化语义(Националь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семантика)的语言,可见,语言学性质(更确切地说是社会语言学性质)是它固有的属性;同时它又深入研究与这种语义紧密结合的教学方法、方式,当然也就具有语言教学法性质。但是,语言国情学不能理解为两种研究对象——语言国情和教学法的一般的、机械式的结合。这是因为语言国情学分析民族文化语义是包含在语言教学过程中进行的……。它的最终目标只限于语言教学法范围。”^②因此,在外语教学过程中讲授语言内涵的民族文化语义是语言国情学的基本内容。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用来表达思想,进行交际的工具。语言的功能主要是交际功能。把语言的功能称为交际功能,这一术语本身就包含了和语言相关的心理、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常识,其中具备所学语言的语言国情知识,则是实现这种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为语言不仅具有交流思想的交际功能,而且同时还具有载蓄功能(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是操该种语言民族的文化的载体(Носитель)。外语教学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让教学对象掌握语言表达方式,而且要掌握每一语言单位所内涵的准确语义,尤其要掌握那些与本国国情不一致的他国事物和现象的概念。在外语教学中讲授语言中包含的国情知识,以加深学员对语言的理解,从而提高和完善他们的语言交际能力。这就是语言国情学要解决的问题。

语言国情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词汇,包括成语性词组、成语、谚语、格言、典故等在内的语言称名单位(Номинативная

единица) ,以及无声语言(手势语、表情语、习惯行为语)等。

一个国家的语言是这个国家文化的一面镜子。词汇是语言的基本单位 ,它本身就涵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语义 ,体现着本民族的传统风俗习惯、民间文学、历史事件、社会制度、文化艺术、科学经济等。语言国情学把反映两国共有事物和现象的词叫做对应词 (Эквивалентная лексика) ,对应词的词汇概念意义可以直译 ,绝大多数通过翻译即可理解。如俄语中的 книга (书) 一词 ,它的语义成份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доля) 与英语 book、德语 buch、法语 livre、汉语“ 书 ” ,完全一致(对等) ,只要译成相应的词即可理解。然而 ,掌握了词的概念意义并不能说已经掌握语义 ,具备了交际能力。因为每个词除去概念意义外 ,还具有反映国情的词的背景 (Лексический фон) 。词的搭配及其使用情景往往都由词的背景所决定 ,而这些背景知识正是正确运用语言达到交际目的所必不可少的。例如 , пеня 和 штраф 两词在词典中均解释为“ 罚款、罚金 ”。然而 ,在苏联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罚款 ,前者指因未能按期交付房租、水电费等而必须缴纳的为数不多的滞纳金 ,后者则指因破坏法规、违反交通规则、酗酒等必须缴纳的惩罚性的罚款。又如 продавец 一词意为“ 卖主、售货员 ”。但苏联商品店里人们招呼女售货员一般则用“ девушка ”(原意为姑娘) ,对上了年纪的女售货员才用“ продавец ”。由此可见 ,不掌握词的背景知识 ,就很难达到准确使用语言的目的。即使是对应词 ,但在两种语言中各自的背景知识、使用范围、搭配关系也不尽相同。

在不同国家的国情中除了一部分相同或相似的事物和现象以外 ,还有一部分各国特有的事物和现象。语言国情学把表示本民族特有事物和现象的词叫做非对应词 “ 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ая лексика) 。非对应词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 ,含有极丰富的国情内容 ,在他国语言中无法找到相应的词和表达。因此既要学习这些词的形式 ,又要建立新的概念 ,掌握该词特有的背景知识和国情民俗语义。这些含国情意义的非对应词虽然为数不多 ,却具有

不可估量的作用。它们对于熟悉本国国情的本民族来说,不会发生任何障碍,但对外国人来说,往往会带来困难,造成不解其义或误解。俄语中的非对应词,据统计仅占有6—7%,但却据有中心地位,因为它们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国情内容,比较鲜明地反映了苏联的历史和现实,一般必须通过描述才能弄清词义,无法直译。如 совет, большевик, 英、汉语只能音译为 Soviet、苏维埃, bolshevik、布尔什维克。

苏联学者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将俄语中的非对应、有背景的词分为七类,并已按分类内容编写了一套语言国情系列词典。词典所收条目主要反映十月革命后苏联人民的新生活、各民族的风土人情、传统习惯、各历史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成语、典故以及民间文学中的常用语等。当然,对外国人来说,这七类远未概括所有的非对应词,尚且所谓“非对应词”只是相比较而言。例如对中国人来说 колхоз (集体农庄)并不是非对应词,而对美国人来说则属非对应词了(英语为 kolkhos),因为他们很难用概念相似或相近的语言来表达。即使是对应词的“колхоз”,我国的集体(国营)农场与其相比则存在着不同的背景内容。至于成语、谚语、俗语、格言等,更是外语教学中必须从国情学角度加以解释的对象,使学生更确切地了解其中的含义,不致产生误解。

人们用以交际的手段不仅是有声语言,还有无声语言,即表情、动作、手势等。不同的民族所使用的无声语言也是各有差异的。所以,在外语教学中对无声语言所包含的国情知识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随着语言国情学理论的深入研究,苏联以及其它国家的语言国情教学活动也积极开展起来,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经验。

语言国情学理论首先被用来指导编写教材。匈牙利学者在对教学的各个阶段做了广泛的调查后认为:“学生们有关苏联的大部分具体知识是在学习俄语和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获取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他们对该国(苏联)的生活及其文化的大体

知识。教科书作为传播国情知识的源泉作用在开始阶段尤为重要。”^③匈牙利、蒙古、印度等国已经或者正在编写贯彻语言国情学原则的俄语教科书。苏联在 1977 年编写了语言国情教学大纲,接着又根据语言国情原则为现有的供外国人学俄语的教材编配语言国情注释。如供操德语者使用的《大众俄语》(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для всех)的语言国情注释已于 1980 年出版。继该书之后,近年又编写了大量语言国情教科书。按照什么原则来选择和编写含有国情意义的课文,如何在教材中反映语言国情问题,如何确定对应词、非对应词,始终是各国俄语学家研究的课题之一。

目前,语言国情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尽管国外语言学家在语言国情学的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某些分歧,但是,语言教学必须同国情知识的传授紧密结合这一原则思想已为大家所接受。

注 释:

- ① 引自《Вопросы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го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 页。
- ② 引自《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莫斯科俄语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37 页。
- ③ 同①,第 76 页。

(原载《国外外语教学》1988 年第 1 期)

美国跨文化交际研究

贾玉新

跨文化交际是在美国兴起的新学科。本文拟就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主要的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这一学科研究的多学科性,它的理论建构以及这一学科研究的范围和内容的作一般性的论述,藉以把美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状况介绍给读者。

一、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兴起

近年来,跨文化交际已是我国外语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这一门学科的兴起和发展却与外语教学无关,尽管它的研究成果对外语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美国有关学者的看法,跨文化交际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美国国内外急剧变化的形势直接相关。概括地讲,有三个因素促成和发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这些因素包括: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产生的世界性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紧缩所带来的全球意识;美国本土产生了众多文化、亚文化,及异于主流文化的文化群体,以及这些群体之间频繁交往需求的国内意识;还有美国人在当今文化交织而且多变的世界上想成为善于跨文化交往的现代人的个人意识。

不同文化人们之间的交往是历史上早已存在的事实,然而这一领域的系统研究却是近十几年的事情。由于当代科学技术,尤其微电子通讯网络的兴起,以及以“交叉”或“综合”为特点的世界性的“大学科”的诞生,一个全球性的交往和传通正在形成。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正面对一种全新的国际生活,这种新的生活“无

论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甚至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各种文化交织的产物”。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和合作已经是回避不了的现实。然而,世界在时空上的紧缩并不能使人们在心理上的距离自然消失。即使人们共享一种语言,也无济于事,因为语言仅是日常生活中人际间相互交往所涉及的众多代码之一,而且语言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在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他们在编译码过程、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以及篇章或话语组织方面的差异,因此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交往时常会有“咫尺天涯”之感。诸如教育、科技、贸易、能源、经济、企业管理、公共事业、商业乃至战争等众多方面的问题都牵连着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低效率的交流和沟通、相互间的误解,以及其它交际障碍,都可能导致无尽的灾难。文化上的差异使不同文化背景人们之间相互理解与和睦相处始终是困难的。显然,认识跨文化交往的过程,了解这一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产生什么后果,并解决和避免交际中所产生障碍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运而生了。

随着全球性一系列变化,美国国内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变革。从历史上看,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融合的国家,而今天美国又面临着新的融合——在美国又涌现了诸如“妇女解放”、“老年人”、“贫困者”、“争取有色人种权益”、“激进主义”、“女权主义”,乃至“同性恋权益”等形形色色的支流或亚文化及其群体。不同群体在文化取向、时空观念、信仰、价值观念以及对社会的要求等方面都有着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也造成人们在相互理解和交际过程等方面的困难。人们在彼此之间交际的失败中越来越认识到,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已经迫在眉睫,这种国内各亚文化及群体之间迫切希望相互理解、相互交往的需求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构成一股促进力量。

在这样千变万化的国内外形势之下,为了受益于文化交织的社会环境,美国人取得了这样的共识,那就是应当成为具有跨文化

交际能力的现代人。这种个人心态构成跨文化交际领域兴起和发展的第二种促成因素。根据有关学者的观点,美国人之所以迫切地想成为善于跨文化交往的新人是因为:在经济上,跨文化交际能力可能使美国人享有广泛的就业机会,因为从政府机构到地方的众多部门极需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掌握还可以帮助人们预见和解决在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具备这种能力会极大地改善人们的自我认识,促使人们对自己文化重新审度;在心理上,这种能力和知识也可以使人们发现新的乐趣和满足。

总之,在当代这样各种文化相互交织的时代,人们面临着新的选择,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合作和相互依存已经成了新的生活方式。这种时代特点促使人们普遍意识到跨文化交际研究已势在必行。

二、跨文化交际研究机构和团体

跨文化交际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一经兴起,就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因为这一领域受到诸如政府机构、国务院、外事机构、联合国、农业界、商业界、教育界、卫生界、劳动福利界、银行界,以及科学技术界等众多机构和企业的关注。尽管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组织和发展各种学术活动,没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博士和博士后研究规划,但自七十年代后期起,美国言语交际协会(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专设了国际交际委员会来指导和组织有关研究活动和出版有关学术刊物。位于夏威夷的东西方研究中心就设有专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系和专业。商业界的跨国公司和企业,如洛克菲勒国际公司,国际商业电器公司和通用米尔斯公司等为了满足国际业务需求筹建了数量可观的“实用跨文化管理协会”、“研究和教育中心”和“培训中心”等等,以培训国际性谈判人员,产品推销人员,以及驻外服务人员等。很多大学中的交际系或专业都把跨文化交际当作正式课程,很多研究生把这一学科当作主攻方向。实际上,每个大学主管国外留学生的外事部门就是跨文

邻学科对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概念的界定、研究方向、范围和内容以及所用术语等提供了建设性的帮助。可以讲,没有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交际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难以想象的。

首先,以 Sapir, Whorf, 和 Malinowski 等为代表的人类学家关于文化与语言/交际的关系的理论、文化相关论以及关于交际环境的理论; Hymes 的交际能力观念和 Hall 近年来关于意义与环境关系的论述及在此基础上所发展的“强交际环境”和“弱交际环境”的思想等都为跨文化交际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对本学科的影响似乎更具体,这一领域中关于语言和社会结构或社会格局的关系的论述,语言是社会行为的观点,语言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的观念,有限语码和完备语码的概念,社会语言相关论,语用规律以及话语规则等方面的成果,都为跨文化交际研究规划了具体的方向、范围、和内容,这一领域所采用的术语也基本上成了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的术语。影响较大的代表人物当然离不开学者们熟知的 Labov, Fishman, Halliday, Bernstein, Hudson 和 Wolfson 等社会语言学家。

社会心理学科所揭示的关于信息解码过程的本质,文化模式与思维方式的关系,行为的知觉过程,言语社团与其对不同文化的言语的态度,以及领域和无领域依附感的认知理论等对跨文化交际理论建构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其它学科,诸如文化学、哲学、民族交际学、交际学等所提出的很多理论和观点对本领域的兴起和发展都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里不再赘述。不言而喻,我们说跨文化交际与其它学科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它的建设和发展完全依附于其它学科,实际上它有自己固定的研究方向、范围、内容,有其独特的体系和研究方法。

四、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建构

跨文化交际的系统理论建构始于七十年代,尽管一部分人认

为时机还不够成熟,但多数学者认为条件已经具备,而且针对当时研究状况,提出“没有什么比理论更实用的了。”当时,关于理论建构的论文纷纷出笼,学者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派大好形势。概括起来,有三种思想观点:一种是以 Robert Merton 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观点,这一派学者们主张以经验研究为基础,通过大量观察和调查研究,对原有的假设和理论进行验证、修改和完善,从而建设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这种观点问世不久就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它的致命弱点在于它排斥了与相关学科相互合作的可能性。针对这种思想,以 Gudykunst 和 Halsall 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提出应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即应综合利用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这一观点显然具有时代的特点,因此颇有吸引力。但影响最大的是 Sarbaugh, Gudykunst 和 Dayey 等学者们在八十年代初期所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在博采众长,采用相邻学科的有关成果的同时,必须以普通交际学的交际论为核心,因为① 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和同一主流文化同人际交往过程所涉及的变量基本一致;② 任何人际间的交际在本质上都是跨文化交际,差异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根据这一观点,跨文化交际可能包括不同国家、民族、种族,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支流或亚文化群体,不同语言社团,乃至陌生人或个人之间的交际等等。这样,跨文化交际可以是大到国际之间,也可以是小到个人之间的交际。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似乎不合乎逻辑,但一经深入考察,尤其结合美国众多民族、种族或文化融合而成的国情,这一观点还是有道理的。目前,很多学者不仅接受了这一观点,还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这一理论。实际上,在这一理论提出之前人们普遍认为跨文化交际和同一主流文化中不同亚文化群体或个人之间交际完全是两码事。

五、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范围和内容

自八十年代起,跨文化交际研究的范围更加宽泛,内容也更加

丰富。突出的变化表现在学者们不仅像传统的做法那样重视研究言语行为的跨文化差异,而且还重视探索交际者如何参与复杂而且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在探索表面形态差异的同时,学者们还用演绎的方法追本溯源,揭示造成交际行为等方面差异的深层文化结构。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发现交际失误的原因,才能达到跨文化交际时少犯错误。

从研究范围来看,文化间差异广泛多变,跨度很大。有的是关于跨东西方这样文化差异极大的人之间的交际;有的是关于同一主流文化中不同亚文化群体成员之间的交际:美国中产阶级和城市贫民之间的交际,主流文化的美国人和同性恋团体成员之间的交际就是其中两例;有的是关于颇为接近的不同文化成员之间的交际——例如,都讲英语的美国人和加拿大人之间的交际;而有的则是关于文化差异极小的人之间的交际——美国文化中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主张发展的产业者之间的交际就属此例。总之,文化差异可能相去甚远,大至天壤之别,也可能差异甚微——差异主要表现在对环境的感受和赋予意义的方式方法方面。

学者们所研究的内容极为丰富,而且客观全面;有数据,有实验,有批判,有肯定,也有保留。文章出自百家,论域广泛,思想有见地。概括起来,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专题。

1、跨文化交际的理论概念。在这部分,学者们主要讨论诸如交际、文化、社会、跨文化交际等概念,还论述语言或非语言行为与文化的关系,以及复杂多变的交际过程等。这一部分提出和讨论的问题构成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理论基础。

2、跨文化交际的哲学思想。这一部分的讨论主要涉及到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方向,动态多变的交际过程,文化、知觉、赋义及交际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交际过程所涉及的因素等。本领域著名学者 Gudykunst 认为交际过程受制于社会、文化、心理及环境等因素,这种观点与社会语言学家所提出的有关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讲,这部分内容是本领域研究的灵魂。

3、影响跨文化交际过程、交际行为及编译码过程的诸因素。这一部分探究交际行为、译码过程与环境的关系,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究诸因素的内涵。譬如,文化环境可能包括价值体系、宇宙观、文化取向、社会规范、生活方式等。实际上,在这个专题讨论中,学者们把注意力从理论转向到实践方面。

4、言语和非言语行为的文化异同

文化诸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规定人们对外界行为的感知和译码方式,决定人们的交际行为。因此,文化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人们在上述方面的差异。学者们围绕这个专题探究不同文化的人们在信息解码、言语和非言语行为、以及时间、空间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当然,学者们在进行比较和分析的同时,还追本溯源,探究这些差异的深层文化结构。显然,这一专题的讨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为它提供了大量的实例。

5、有效的交际。关于这一专题学者们不仅探究了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典型错误,还从认识的角度分析了与观念、成见和偏见相关的因素。有的学者认为,对不同文化行为的认知应经过描绘→解释→评价的过程,然而人们惯常忽略“描绘”阶段,而且往往又跃过“解释”的中间环节,这样,他们只经历“评价”这一阶段,因此必然以自己的文化为准则对别人的行为评头品足,所以势必产生交际障碍。有的学者还认为,为克服这种习惯性的认知心理,人们应充实自己,使自己成为具有超脱精神的“第三种文化人”或“跨文化人”,应对不同文化有高度容忍精神。成为这种人的标准是:对不同文化的交际行为能够想象并产生情感相通;具有开放型的心理;能准确感知文化的异同;对不同文化的行为能做出准确描绘和解释,而且不轻易做评价,等等。这一专题的讨论是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归宿。

(原载《外语学刊》1992年第3期)

试论外语教学中的 跨文化交际研究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研究可以采取不同的角度,从大的方面可以从研究价值观念和哲学思想入手,也可以从社会心理研究入手,但是,对于外语教师来说,我认为主要还是要结合外语教学的需要,从与语言教学有关的某些方面从事研究。价值观念的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首先掌握大量的材料以后,才能有效地进行价值观念的研究。

我认为,结合外语教学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可以从以下九个方面进行:

- 1) 研究词汇的文化内涵;
- 2) 研究词汇缺项;
- 3) 研究有文化内涵的人名和地名;
- 4) 研究常用的文学典故;
- 5) 研究语篇结构;
- 6) 研究文体特点;
- 7) 研究语用规则;
- 8) 研究讲话顺序;
- 9) 研究非语言交际;

对词汇的文化内涵的研究

词汇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人类学家早就注意到这一点。爱斯基摩人对于雪做了十分细致的分类,在他们的语言中有

许多与雪有关的词。又例如,在我国云南丽江地区纳西族的方言中,母亲的阿注^①、自己的父亲和舅舅用同一个词,这反映了这一地区纳西族的婚姻制度,由于一个女子可以有几个阿注,不是一夫一妻制,所以许多孩子不知道生父是谁,孩子常常由舅舅照顾,反映在语言上就是用同一个词表示三种不同的关系。^②

词汇在长期的使用中其意义或扩大或缩小,同时有些词由于经常在某些场合使用逐渐积累了一些联想的意义,也可以称为文化内涵。这部分意义通常在词典上是查不到的,没有大量的阅读很难体会词的确切意义。因此,对于词的文化内涵的研究十分必要。在不同的语言中,词的文化内涵呈现出十分不同的情况。对比英语和汉语可以看到下列情形:

1) 英语的词和汉语的对应词指示意义相同,文化内涵也大致相同。例如,英语中的 fox 具有“狡猾”的含意,汉语中的“狐狸”也有类似的意思。属于这类的还有:

banquet — 宴会

festival — 节日

bureaucracy — 官僚主义

2) 指示意义相同,文化内涵部分相同。例如, family 在英语中指的是丈夫、妻子和孩子,通常不包括上一代人,但在汉语中却常常包括祖父母,这与我国大部分家庭的构成有关。又比如, birthday party 与“生日晚会”似乎相同,但仔细考虑一下,又会发现其中的区别,我们的生日晚会远不如西方的 birthday party 那样普遍,具体作法也不尽相同。

3) 指示意义相同,文化内涵不同或相反。owl 在英语中没有不好的意思,相反却可以说 as wise as an owl,在汉语中“猫头鹰”常表示不吉利。“龙”在汉语中经常和吉祥的事物用在一起,例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藏龙卧虎”“生龙活虎”等等。在英语中 dragon 指一种凶猛的动物,用来指人常包含贬义,例如: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这样解释: If you call a

woman a dragon ,you mean that she is fierce and unpleasant. “ 凤凰 ” 在我国古代传说中是百鸟之王 《史记》中有这样的句子：“ 凤凰不与燕雀为群。” 我们通常使用时 ,总含有祥瑞的意思 ,例如：“ 龙凤呈祥 ” 攀龙附凤 ” 等。但在英语中 phoenix 是神话中的一种鸟 ,在阿拉伯沙漠中生活五六百年后自我焚化 ,并由此得到再生。所以 ,在用 phoenix 一词时 ,常包含“ 再生 ” 的意思 ,例如 ,Religion ,like a phoenix ,has been resurrected from the ashes of the revolution.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在英语中 ,peasant 常含有教育水准低、保守狭隘的意思 ,而在汉语里“ 农民 ” 却没有这种含义。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 ,China Daily 现在报导我国农村情况时通常用 farmer 一词。

4) 指示意义相同 ,但只在一种语言中有文化内涵。例如 ,中国人民对于松树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松给人以坚定不移、高风亮节的联想 ,但在英语中 pine 并没有这种内涵。我们常用“ 虎 ” 形容勇猛威武 ,例如：“ 虎将 ” 虎劲 ” 虎威 ” 生龙活虎 ” 藏龙卧虎 ” “ 降龙伏虎 ” 等 ,因为我们把虎看作百兽之王。在英语中 ,狮子取代了老虎的位置 ,Collins COBUILD English Language Dictionary 对于 lion 的引申意义是这样解释的 :a person or a country that is considered to be strong and powerful ,and which other people respect or fear ,对于历史上的查理一世常称为 King Richard ,the lion-hearted ,以此说明他的勇猛超群。

对词汇缺项的研究

英语中有一些词很难译为确切的中文 ,例如 ,最明显的是 privacy 一词 ,译为“ 隐私 ” 或者“ 秘密 ” 或者“ 私事 ” ,都没有把 privacy 的真正意思表达出来 ,据说 ,俄语中也没有合适的对应词。^③ 原因大约是我们的价值观念与西方的价值观念不同 ,传统不同 ,我们对于 privacy 不象西方人那么重视 ,因此 ,也就没有一词能包括 privacy 所表示的那些意思。象 hippie ,punk 固然可以用音译的办

法译为“嘻皮士”和“朋克”,但不了解西方文化的人看了这些词还是不知道究竟这是一些什么人。party 也是一个难译的词,它既不是“晚会”,也不是“聚会”,晚会上常常有演出,聚会通常有政治或其他目的。香港人译为“派对”,显然是音译,但更易造成误解。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里把 have a party 索性说成是“开 party”,这显然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应词而采取的临时补救的办法。

汉语中难找到妥当的英语对应词的情形也很多,例如,中医里有许多说法要译成能懂的英语就很困难,什么“阳虚则外寒,阴虚则内热”,什么“肾亏”“上火”都很难译。主要是因为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不同。有些中餐的名词已经进入了英语,例如, chowmein, dim sum, tofu, 但大量的中餐菜名还只能是解释性的。涉及我国政治生活的词语有些是极难翻译的,例如,我们常用的“精神文明”一词就颇不好译,译为 spiritual civilization 似乎忠实,但绝大部分英语国家的人士实际上不懂它到底是什么意思。类似的情形还很多。

对有文化内涵的人名和地名的研究

Waterloo 是比利时的一个地名,由于拿破伦 1815 年在那里惨败,改变了整个战局,从此, to meet one's Waterloo 就获得了“遭到决定性失败”的意思。Dunkirk 是法国北部的港口,1940 年英国军队被德国打败后从敦刻尔克撤退,从此, Dunkirk 获得了“仓促撤退”“困难局面”的意思。可以说: to stage a Dunkirk, a Dunkirk for their foreign policy 等。象 Cinderella, Shylock, Hamlet, Cleopatra 等人名都已经具有固定的文化含义,不了解与这些人名有关的故事和文学作品就很难理解这些词所代表的意思。有些人名与当代的文化生活有关。例如, Marilyn Monroe 代表性感明星,这和梦露在电影中所塑造的形象分不开与大众媒介的宣传也密不可分。

汉语中这类词语也很多,王佐良先生指出:“只要我们中国人一用‘江南’二字,表示‘长江’以南的意思,江南秀丽的景色马上

就会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在那里可以看到最好看的园林,最漂亮的美人。”^{④④} “上海”也是富有文化内涵的地名,说“无锡是小上海”,意思是无锡象上海那样繁荣发达,只是程度上有差别而已。诸葛亮、关羽、张飞、曹操、刘备、贾宝玉、林黛玉对于使用汉语的人来说,每个名字都具有明确的含义,在我们心目中代表相当固定的形象。

对于文学典故的研究

在英语中,用 Pandora's box 时的意思是某一个过程一旦开始就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解决不了的问题,至于为什么会有这层意思,必须知道希腊神话中有关 Pandora's box 的故事。Rip Van Winkle 是 Washington Irving 写的一篇短篇小说,讲的是 Rip Van Winkle 一觉醒来世上已经过了 20 年,Rip Van Winkle 常用来表示落伍的人。有时开玩笑指“沉睡的人”,例如:Lawler 的 Kid Stakes 一剧中有这样一句话:Why don't you and Roo go off on your own for once? I'll get Rip Van Winkle off to bed.^⑤ A Catch-22 situation 的意思是进退维谷、左右为难,但要真正了解它的含意还要回到 Joseph Heller 的小说 Catch-22. George Orwell 写过一本小说,题目是 Nineteen Eighty-four, 1949 年出版,作者预言到 1984 年极权主义发展到顶峰,控制人们的一切活动。这本书的政治含义是明显的,矛头针对当时的苏联。小说出版后影响很大,其中的许多人名和词汇变成了英语的一部分,例如, Big Brother, Doublespeak, Newspeak 等。

汉语中的文学典故也十分丰富,例如,空城计,杯弓蛇影,十面埋伏,四面楚歌,东施效颦等。

语篇结构研究

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对比还不多,美国人 Robert Norton 在韩国教书时发现学生口头能讲清的到了作文时常常表达不清,他原以

为是学生的问題,回到美国后,他进一步作了研究,把韩国的散文家和美国的散文家的同类文章作了对比,发现他们在写同类题目时语篇结构不同,美国人通常是从抽象到具体,从一般到个别,韩国人则相反。^⑥英汉对比在我国目前还偏重于词语,有的学者扩大到句子^⑦,个别学者涉及篇章,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还开展得较少。

文体对比研究

在英语和汉语中文体都有正式与非正式之分,其间还有许多层次。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杂志 Beijing Review 的文章采用了过分正式的文体,使国外读者很难读下去,宣传效果不好。英语文体总的倾向是趋于简练,与口语愈来愈接近,这与本世纪以来广播的迅速普及有着密切的关系。英语中法律语言是最严格最正式的,用词和句子结构都务求严密,不留漏洞,因此,句子通常较长,词中多音节的源于拉丁语的“大字”较多,但近年来英语国家中有一批学者在开展简化法律用语的运动(Plain English Movement)。书信也是如此,不仅亲友之间的信件常用谈家常的语气(chatty style),即使谈公事的信也都简单明了。例如,作者给编辑的一封信可以这样写:

Dear Editor,

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Please find enclosed my manuscripts. If there is any inappropriacy in either form or content, please feel free to change it. However, if the change is a major one involving substance, I would appreciate your letting me know beforehand.

Best wishes

Yours sincerely,

Signed

同一封信如果用中文写,文体会有一定的变化:

编辑先生:

大札敬悉,现尊嘱将拙稿寄上,文中内容形式不妥之处甚多,务请斧正。唯改动若牵涉实质问题,烦请事先告知,在此预致谢意。谨祝

编安

签名

比较这两封信的文体,我们可以看出,在同样情况下,中文似乎要求比较正式的文体。用词也很两样。这与中文书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文言文的影响有关。自然,中文书信也可以有不同的写法。

在许多别的情况下,英语和汉语在文体方面也有区别。究竟是那些方面有差异,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都是值得研究的。

语用规则的研究

英语中有哪些主要语用规则目前还没有人能够说清,对于中国学生在跨文化语用方面的失误目前文章中大都举例说明,还没有系统的研究。要在原有基础上提高,必须搜集大量例子,加以分析归类,逐步总结出中国学生典型的言语语用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

对于讲话顺序的研究

在平时面对面谈话不易发现我们的讲话顺序与英美人有何不同,但在电话上英美人常感到不适应中国人的开头与结尾。在英语国家受话人拿起话筒先报电话号码或单位名称或自己的名字,因此,听到我们说“喂”或“Hello”往往不知所措。不少英美人反映中国人有时会突然结束谈话,他们思想上毫无准备,然而我们自己并没有这种感觉。问题可能出在讲话顺序的不同和过渡性的话的

缺乏这方面。事实上,不仅开头、结束方式不同,中间的话题的过渡也采取不同的技巧。

如果研究深入,可能会发现中国人的讲话顺序与英美人还会有其他的区别。即使在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例如,在美国下级通常讲话更积极主动,抢着讲话以取悦于上级,而在英国,上级在讲话中采取主动,下级要多听。设想一个美国职员和英国老板在一起谈话,其中的问题可想而知。

对于非语言交际的研究

美国教师布罗斯纳安和中国教师耿二岭在这方面已经作了不少研究^⑧,目前这一领域正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在非语言交际中,还有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例如,在时间和空间、体态、服饰、音量、微笑、沉默等方面我们和西方人都有区别,这方面的研究比手势和其他研究更少。

总之,环绕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题目。对于外语教师来说,研究与语言本身紧密相关的题目容易取得成果。许多教师已经认识到在教外语的同时应该教给学生文化知识,但教师手上缺乏可用的参考书和教材。如果能够在几年内编出几本词典和参考书,说明词的文化内涵,介绍有文化背景的人名和地名以及文学典故,探讨中英文在文体和语篇方面的区别,给教师以实际帮助,那么,跨文化交际研究必将出现新的局面。

注释:

- ① 阿注指丽江地区纳西族姑娘可以带到家里同住的男性朋友,通常有一个主要阿注,几个次要的阿注。
- ② 周振鹤 游汝杰著《方言和中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00页。
- ③ 关钰新《文化差异和不可译性》《外国语》,1990年第6期。
- ④ 亨德森《翻译作品犹如“土耳其挂毯的反面”》《翻译参考》,1980年第12

期。

- ⑤ Ray Lawler , The Doll Trilogy , Currency Press , 1985 , p. 60.
- ⑥ Robert Norton , “ A comparison of thinking and writing patterns in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In Hu Wenzhong (ed). Selected Reading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 Hunan Education Press , 1990.
- ⑦ 毕继万 《汉英句子结构差异引起的思考》,第三届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
- ⑧ 布罗斯纳安 《中国和英语国家非语言交际对比》,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1991 年。

耿二岭 《体态语概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88 年。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93 年第 1 期)

跨文化交际的语用问题^①

王得杏

一 引言

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经常会发生故障。跨文化交际已经引起语言学家的重视,成为语用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交际”这一术语既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我们当然更为关切前者。研究跨文化交际的故障问题,对于我们的外语教学有实际意义。近年来,国内也开始重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如邓炎昌、刘润清(1989),何自然、阎庄(1986),何自然(1988),胡文仲(1985,1988)等。

在跨文化交际里产生故障、冲突和误解,不仅同发音、语法和词汇有关。发音正确,懂得语法,掌握相当数量词汇的非本族语者在同本族语者交谈时也会产生故障,引起误解。非本族语者在跨文化的交谈中经常不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时显得没有兴趣、缺乏反应,有时又口气过于肯定或显得盛气凌人,等等。这说明还存在其它方面的重要障碍,影响有效的交际。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一方(或双方)对另一方的社会文化传统缺乏了解,因而出现不恰当的言行,这是产生交际故障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的文化要求不同的行为,这是一种文化规约。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说话方式或习惯不尽相同,是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故障的另一个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各自有一套说话规约或习惯,如怎样开始交谈和保持谈话继续进行,怎样

组织信息 ;怎样表示话语的连接 ;怎样表示强调 ;怎样表示礼貌 ,等等。人们的说话方式是在成长过程中、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 ,是很难改变的。甚至在学习另一种语言的时候 ,人们也倾向于保持自己的说话规约。人们在交谈中自动地、不假思索地遵循自己的说话方式。在交际中人们通常考虑的是要说些什么而不是怎么说。一旦决定了说什么 ,就会自动地、下意识地选择适当的说话方式。在跨文化的交际中 ,人们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说话方式来解释对方的话语。这就可能对对方的话语作出不正确的推论。在跨文化交际时 ,交谈双方难于自觉地发现谈话方式上的差异 ,主动采取弥补措施以防止发生交际故障和冲突。

跨文化交际的过程既涉及文化的规约也涉及语言的规约。这两类规约在不同文化里的差异就是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根本原因。语言学者把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故障称作语用失误。

在跨文化交际中 ,人们在哪些方面容易发生语用失误呢 ? 这是研究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用学必须回答的问题。本文根据笔者最近所做的一次语用能力测试结果 ,探讨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容易发生语用失误的几个方面 ,及英汉文化规约和语言规约的一些差异。

二 语用能力测试

这次语用能力测试的对象是刚刚结束第三学年英语课程的 110 名学生。

测试试卷是 50 个选择题 ,并附有简短的情境说明。测试题的内容只涉及日常生活 ,在词汇和语法结构方面对参试的学生不会造成困难。

以下是测试结果的几项计量统计 :

平均分 34.1 ,中位数值 34 ,标准差 3.5。

测试对象的答对率

40—49%	50—59%	60—69%	70—79%	80—89%
--------	--------	--------	--------	--------

1	8	50	45	6
---	---	----	----	---

全部试题的难度

难度指数	题数
0.01—0.19	1
0.20—0.29	1
0.30—0.39	4
难度指数	题数
0.40—0.49	6
0.50—0.59	5
0.60—0.69	10
0.70—0.79	4
0.80—0.89	7
0.90—1.00	12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表示集中趋势的平均分和中位数值这两个统计量非常接近,标准差也比较小。因此可以认为平均分和中位数值代表了参试学生的语用能力的一般水平。统计数据表明,答对率在59%以下的有9人;在60%至79%的有95人;在80%以上的仅有6人。数据还表明,试题难度指数在0.7以下的共有27题,占试题总数的54%。根据以上数据,可以认为这份测试题的难度较高,大多数参试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分处于中等水平。

三 语用差异

根据上述计量分析的结果,难度指数在0.7以下的27道试题可以看作是参试学生语用困难之所在。这些试题涉及称呼、问候、介绍、寒暄、告别、请求、询问、提议(供)和道歉等言语行为。现逐一作简要说明。

3.1 称呼 各种语言都有特定的称谓系统和使用规则。人们相见时用姓名称呼对方,这是包括说汉语和英语在内的许多言语社团里通常使用的称谓形式。但同汉语比较,英美称谓形式与使用规则有一些特点,比如“名”(first name, FN)的使用。这次测试中有一道题,问学生应如何称呼未婚妇女 Mary Brown(此题的答对率为 0.23)。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两种语用失误。一是有些学生错用了 Miss Mary。英语没有“称谓词+名”(TFN)这种称谓模式,汉语则可以用“名+称谓词”这种模式,如可以说“安平先生”等。不过,汉语中也不大说“淑贞小姐”,而更常说“赵小姐”或“赵淑贞小姐”^②。所以在这一点上,英汉两种语言有同也有异。学生忽视了英美基本称谓形式只有两个:(1)“称谓词+姓”(TLN)(2)“名”(FN)。二是许多学生对在英语里使用“名”(FN)作称谓语感到踌躇,如称呼 Mary Brown 为 Mary。这里中国学生显然是混淆了用“名”作称谓在英汉两种语言里的不同文化涵义。在汉语里,熟悉亲密的人之间可以只称“名”。但在美国社会里,用“名”称呼对方并不一定表示双方很熟悉或关系密切,适用范围要广得多。

3.2 问候 问候语的使用遵循相互性原则。甲向乙致问候,乙必须也向甲致问候。“问候”大概是开始谈话的最通常方式之一。各个言语社团都有问候语,但其语言形式和使用规则不尽相同。不过,各种语言的问候语有一共同点,即都使用为数甚少、相当简练的一些语言形式。或者说,“问候”言语行为大多是高度规约化的,甚至可以说是仪式性的,使用的是模式化的套语。例如,在英美社会里,同事或同学之间在一天里初次相见可以说:Hello. How are you?(测试中此题的答对率为 0.37)但有不少学生在测试中选择了 Hello. How are you getting on?这句话暗示说话人已经知道对方正在干些什么事情,因此询问进展情况如何。如果实际情境并非如此,那末把它用作一天里初次相见的问候语就不合适。

3.3 介绍 “介绍”言语行为也是规约化的,并且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在英美言语社团里,影响选择“介绍”的语言形式的主要因素是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情境。据此,可以区分正式的介绍和非正式的介绍。比如,把校长介绍给新来的教师要比在社交场合介绍两位朋友正式些;会议过程中的介绍要比晚会上的介绍正式些。

在正式介绍中,通常要使用称谓语加姓,并且介绍者介绍时和被介绍者在作出反应时使用的语句较长,词语也较正式。在非正式介绍中,既不使用称谓语,也不用正式词语和长句,往往使用省略句。所以,在测试题中,当一位学生被介绍给一位教授时,他可以说:Hello, it's nice to meet you, 然后(或同时)与对方握手(此题答对率为0.52)。可是,有一些参试学生却选择了How are you?作为被介绍者的反应用语。这句话用在这种场合下显然不合适,因为它是熟人之间再次相见时的问候语。

3.4 寒暄 寒暄语通常包括问候、告别、有关天气的应酬话和其它闲谈。其中的“问候”已在3.2说过;“告别”将在3.5里谈;本节只说有关天气的应酬话。寒暄的基本社会功能是在社会接触中调整人际关系。在包括说汉语和英语在内的许多文化里,在交谈的开始阶段寒暄几乎是一种普遍习惯。不过在某些情境里,人们又通常避免寒暄,如交谈双方在当天已经见过面并交换过寒暄语。

寒暄时使用的语言是高度规约的。因此,听话人几乎总是能够判断说话人在进行寒暄。就使用最频繁的有关天气的寒暄语来说,这里所谓谈论天气的词语是指对于天气状况的一种评论或一种预测,如Nice day, Quite a storm last night, Going to clear up, It's a fine day, isn't it?等。但不能仅仅说“It's raining today, isn't it?”这种关于天气的简单陈述。在这次测试中,一些应试者有过这种语用失误(此题的答对率为0.68)。

3.5 告别 称呼、问候、介绍、寒暄都属于谈话的开始语。告

别则属于谈话的结束语。告别语的功能之一是巩固交谈双方的社会关系。这一功能可以通过使用多种不同的结束语来实现。比如,可以使用对对方健康表示关怀的词语,如 Take care now, Watch how you go, Hope your cold gets better soon, 等等。这里应该注意的是英汉两种语言的差别。汉语里,人们常常对病人说,“多喝点开水”、“多穿点衣服”之类的话以表示关怀与安慰;但在英语里,人们绝不会说 Drink plenty of water 这一类的话。在这次测试中,有些应试者就缺乏辨别这种差异的能力(有关试题的答对率为 0.62)。

以上所说的对于对方健康表示关怀的词语在话语分析里称作前结束语 (Schegloff & Sacks, 1973), 接下来交谈双方交换告别套语, 如 A: Bye. B: Bye. 这时候谈话才真正结束。初学英语的中国学生有时忽视交谈是个双向过程, 结束谈话要经过交谈双方的协调, 达到双方同意才能顺利地结束, 因而在交谈中表现出很唐突。如象这次测试题中所列, 说出 I have nothing to say, so good-bye 这样一类的话来。

3.6 请求 “请求”言语行为的特点是, 听话人有接受请求或拒绝请求的选择自由。听话人对于“请求”的反应, 仅仅说一声 Yes 或 No 是不够的, 他必须在接受或拒绝“请求”之间作出选择。回避对方的请求只是拒绝它的方式之一。但有一些“请求”在许多情况下不能为听话人所拒绝, 例如在餐桌上经常说的 Will you pass the salt?

“请求”言语行为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 如请求提供信息、请求澄清、请求说明、请求证实、请求评价和请求采取行动等等。这次测试结果表明, 识别“请求采取行动”对中国学生很重要。例如, 对 I Wonder if you'd mind posting this letter for me on your way home, John? 回答说 I don't mind 是不恰当的, 因为这是一个要求采取行动的“请求”, 恰当的回答是 Yes, sure (此题的答对率为 0.65)。

3.7 询问 “询问”言语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请求”,即请求提供信息。一般地说,“询问”紧跟着的是“回答”。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有时也会对学外语的学生造成困难。从本次测试结果看,中国学生有时分不清语用问题与元语言问题。在测试中,对

X (a native speaker) : what the hell do they want this lot recorded for ?

what's the point ?

Y (a non-native speaker) : A. What do you mean , what's the point ?

B. what's that mean , what's the point ?

这道题的答对率相当低(0.4)。大多数学生在作答时都选择了A。这样,Y就向X提出了一个语用意义问题即X有什么权利对交给的工作发牢骚?可想而知,Y这么一问,X必然更生气,两人会更激烈地争论起来。其实,这里发问人Y(一个非本族语者)只是不懂得 what's the point 这个句子的意思,即是说他提出的是个元语言问题。在英语里,通常用 what does X mean?这个语言形式对元语言问题发出询问;对语用意义提问才用 what do you mean by X?这个形式。所以这道题的恰当选择应该是B。

3.8 提议(供) “提议(供)”(offering)与“请求”有相似之处,即有可能为对方接受,也可能被拒绝,例如:

A : Like a lift ? (提议(供))

B : 1) You saved my life. (接受)

2) Thanks , but I'm waiting for my friend. (拒绝)

所以,人们在作出“提议(供)”时也总是尽力避免遭到拒绝而陷于窘境,常常使用的方法是先进行试探或者不要过于直接地提出“提议”。本次测试中有一道题问应试者:在街上看见了位外国人是迷了路,你想帮助他,应该怎么说呢(此题的答对率为0.42)?有相当多的应试者选择了 what can I do for you?这句话用在这种

场合下不太恰当,因为愿意提供帮助的意愿表达得过于直接了当,好象那外国人肯定需要你帮助似的。其实,并不能肯定那外国人真的是迷了路。另一个选择:Can I help you at all?就比较恰当,它表达的“愿意提供帮助”的意愿比较一般,不是十分直接与肯定,带有试探的口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遭到拒绝也不致使自己感到难堪。

3.9 道歉 “道歉”言语行为是说话人公开承认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或没有做应该做的事。“道歉”的功能是补救某种无礼的言行,建立或恢复谈话双方的融洽关系。知道在什么时候和怎样道歉,是许多言语社会里礼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道歉”言语行为的条件是,道歉者必须是真诚地道歉,同时道歉者也希望受到冒犯的一方能表示宽容,接受道歉,如说一声 That's all right。这样,一个“道歉”言语行为才算完成。这里尤其要注意的是,“道歉”言语行为使用的语言也是规约化的。在汉语里,接受别人的道歉经常是说:“没关系”,但在英语里,It doesn't matter 不能用来表示接受道歉而应该说,That's all right, That's OK 或 No, problem 等。在这次测试中有不少应试者因分不清英汉两种语言的这类差异而导致语用失误(有关试题的答对率为 0.31)。

四 结束语

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社会文化知识是构成交际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的说话方式或说话习惯也有差异。文化理解和文化比较应视为外语教学的必要组成部分。交际是双向的过程。为了在跨文化交往中避免交际故障,人们至少需要具备两种能力:一要能感觉到进行中的交际不完全成功;二是能发现交际故障之所在并知道采取怎样的补救措施。

注释：

- ① 本文初稿曾经王还教授阅，谨致谢忱。
- ② 此例系王还教授提供。

参考书目

- Levinson, S. 1983. Pragmatics. Cambridge : CUP.
- 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 CUP.
- Oatey, H. 1987. The Customs and Languag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English. Shanghai :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Schegloff, E. A. & Sacks, H. 1973. Opening up closings. In Semiotica, 8, 4.
- Thomas, J, 1983.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 In Applied Linguistics, 4 2.
- 邓炎昌、刘润清, 1989, 《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北京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何自然、阎庄, 1986, 中国学生在英语交际中的语用失误——汉英语用差异调查。《外语教学与研究》1986 年第 3 期。
- 1988 《语用学概论》, 湖南教育出版社。
- 胡文仲, 1985,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与外语教学。《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 年第 4 期。
- 1988 《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90 年第 4 期)

语言与文化综论

林纪诚 俞青海

早在本世纪初,现代语言学的鼻祖索绪尔就指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应把共时性的语言研究和历时性的语言研究区别开来。这种原始的语言系统观,把后人的研究视野引向共时性的语言结构性和体系性上面,开了对语言系统本体研究的滥觞,大大推动了语言的发展。从哲学的角度观察,对语言系统进行本体性的研究,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可行的。因为语言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有其自身的内在组织规律,对语言系统进行本体的研究,旨在揭示构成语言大系统的语言系统、词汇系统、句法系统以及语义系统等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从而进一步揭示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的组织规律。但任何有规律的系统不可能是全封闭、完全独立的,而总是和其他系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越密切,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就越明显。所以,单纯的本体性研究往往是片面的,并不能充分揭示语言系统的内部机制。

我们知道,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的这种“社会性”说明,语言系统不可能是一种存在于真空中、独立发展、自生自灭的系统,人们的言语表现形式无时不受存在于语言之外的社会要素的制约。换言之,语言系统内部诸要素无一不与社会大系统的诸要素发生联系,而且这种联系不是简单的对应,而是纵横交错、此渗彼透、全方位的联系。所以,只有把语言系统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加以考察,才能更为有效地揭示语言系统的本质及内在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语言学冲破了语言本体性研究的束缚,开了跨

系统研究的先河。

“社会语言学”，顾名思义，理应是广阔无垠的社会各层面和语言系统的各层面之间的比照研究。然而，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视野并非象“社会”那样广阔。他们揭示的主要是社会大系统中某些要素，如地理环境、社会地位、人际关系以及性别等对人的言语的影响。概而言之，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与人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显而易见，社会语言学所揭示的言语的“社会性”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它的研究范围未能涉及构成社会大系统最重要的要素——文化。

文化社会学认为，文化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人类社会都离不开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语言只是构成文化大系统的要素之一。因此把语言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定能更加广泛地揭示言语的社会性，同时也能加深人们对语言文化功能的理解。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冲破语言本体研究的樊篱，拓宽语言研究的社会面，把视野转向广阔的文化局面上，使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在理论上十分必要，而且在外语教学实践上亦颇有价值。

(一)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人不仅是“社会人”(social man)，而且是“文化人”(cultured man)。中国人用筷子吃饭，日本人盘腿席地而坐，印度人耍蛇，法国人喝洋葱汤，美国人吃麦片粥，这都反映各民族各自的文化。事实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始终发生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下，文化无所不在，无所不存。然而，我们却很难给“文化”下一个完整的科学定义。

自从十九世纪人类学问世以来，关于文化的界说一直是众说纷纭，各持一端，至今社会科学诸领域对文化的定义仍无统一的认

识。但在探讨语言与文化之前,有必要对“文化”概念进行必要的阐释。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E. B. Tylor),在其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并且将它的涵义系统地表述为:“文化是一种复杂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后来,美国一些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如奥格本(W. F. Ogburn)、亨根斯(F. H. Hankins)以及维莱(M. M. Willey)等人,修正了泰勒的定义,补充了实物的文化现象,把泰勒的定义修正为:“文化是复杂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社会上习得的能力与习惯”。^①由此看来,文化的辐射范围甚广,包罗万象,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经验、感知、知识、科学技术、理论以及财产制度、教育、语言等都属文化现象;大则如宇宙观、时空观、人生观、价值观;小则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切社会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语言方式、等级观念、道德规范等等,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为了探讨方便,我们不妨把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视为一个系统整体,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乃是形成文化系统的无数要素的具体形式,也就是一个一个的文化现象。例如,中国人的寒暄方式,日本人的敬社方式,英国人的饮茶方式,法国人的饮酒方式等等。这种文化现象是超个人的和非心理的现象。虽然从人的心理和行为上可以反映出一定的文化特征,然而,就人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自身来讲,它还不是文化现象,而是一种形为有机体的表现形式。只有当个体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行为成为社会中普遍观念和行为模式时,或者说成为一定社会和社会群体的共同意识和共同规范时,它才可能成为文化现象。文化如此,语言亦然。个人的言语行为并不能直接成为民族语言的构素,只有当个人的言语行为和社会普遍接受的语言模式相一致时,它才能成为语言系统的构素。

如果把社会群体扩大到整个民族,那么“共同意识”和“共同

规范”则是民族文化的体现。由于民族区域生态环境不同,文化积累和传播的不同,社会和经济生活的不同等等,各个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异性”或曰“个性”。例如,对待宗教,犹太民族和希腊民族就大不相同。犹太民族把上帝视为终极原因和万能的神,上帝支配着宇宙、万物和人类,尽管人类有无穷无尽智慧,也不可能摆脱神威,故有“谋事在人,成事在天”(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之说。这种对神的绝对服从,从一开始就占据了犹太民族的思想,而变为根深蒂固的文化心理。希腊文化则不然,在人与神的关系上追求着一种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即个体的人与理想神的自然和谐统一,这与中国道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不谋而合。如果我们把《圣经》和希腊神话对照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犹太民族唯基督之意是从,唯上帝的爱而爱,人类现世的物质的利己欲望必须克制,否则就逃脱不了上帝安排的诸如洪水、饥饿、灾荒、战争、疾病等无穷无尽的处罚。而希腊民族则追求着一种现世的享乐精神,因为人的爱就是神的爱,人的精神就是神的精神。这种不同的文化心理表现在民族性格上,则是犹太人的孤立、孤独和希腊人的活泼、健美(cf 司马云杰,1986*284)。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在西方悲剧性的文学作品中时常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样,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同东方文化加以比照,我们将会发现东西方民族的文化差异更为显著。

由于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亦即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之间自然会呈现不同的文化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差异反映到语言层面上,则表现为语言差异。正因如此,任何跨文化的研究,如比较文化、翻译、外语教学等等,都不能只从本国文化的接受心理去考察语言差异,而应兼顾文化差异。从文化差异出发去研究语言差异,才能有效地把握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

如前所述,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人,既是社会人,又是文化人,同理,语言既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但是特定的语言并非总是和特定的文化相对应。恩伯尔(Ember)(1963)认为,基于“地理隔离”(geographical separation)标准,应把那些不居住在一起、但说同一种语言的民族描述为不同文化。例如,世界上有许多说英语的民族,他们彼此具有地理上的隔离,因而组成了不同的文化。所以,尽管英美两国民族都有着盎格鲁撒克逊这一共同的文化遗产,但地理隔离使英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产生了差异。这种差异虽还不足以使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分裂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系统,但它在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中的反映是显而易见的。又如,以西班牙语为第一语言的人,除西班牙本国外,广泛地分布在中南美各国、非洲西海岸和美国南部各州。显然,这些人都在各个地区建设着自己独特的文化,不能把使用西班牙语的地区都统一起来看作同一种文化。此外,我们也常说拉丁文化,这不单是指说西班牙语的人,也包括说法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其它语的人的文化。相反,在一种文化(或文化区)中,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语言或语群也是常见的。上述拉丁文化就是一例。此外,以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日尔曼文化、基督教文化这四大文化要素为共同基础的西方文化,实际上也包涵许多语言(或语言群)。

但是,我们说一种语言不一定与一种文化相对应,并不意味着语言和文化可以割裂开来。事实上,语言与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中国清代,皇帝后宫佳丽三千,妻妾等级分明,汉语中有关后妃名称的词汇因而就很丰富多彩,如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等,也是中国清代宫廷文化的一个侧面写照。英国是一个君主制国家,贵族内由君主封给的爵位等级严明,和这种爵位文化密切相关的是英语中的爵位名称,如公爵(duke)、侯爵(marquis)、伯爵(earl)、子爵(viscount)以及男爵(baron)等。“爵士”(sir)虽然也是君主加封的,但却不属于贵族。同理,爱斯基摩人有关雪的词汇较为详尽,这反映了他们的雪的文化;日语里

关于鱼的词汇非常丰富,这说明日本人同鱼的文化有不解之缘。凡此种种,都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的表象反映,还未能揭示语言与文化的本质联系。

由于“任何语言都是习得的行为方式的复杂体”(G. Reginald, 1960:12),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却不能说文化就是语言。因为语言系统只不过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换言之,文化不等于语言,文化大于语言。然而这种包容关系只是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一个方面。从符号学的角度看,语言以外的符号(如莫尔斯电码、聋哑人的手势、图形、海陆交通信号等)也能表达某种意义,但人类的经验和行为主要是由语言符号的意义来体现。这就是说,文化大系统不可能独立存在于语言系统之外,反之亦然。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颇类似于内容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但与上述提到的包容关系显然是矛盾的。因为从哲学上讲,如果把文化视为内容,语言视为形式,则内容不可能包含形式。由此可见,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语言系统本身是构成文化系统的各种要素之一,另一方面,文化大系统的其它要素都必须由语言来表达,从而达到演进发达。没有语言作为媒介,人类的服装系统、食物系统、汽车系统、建筑系统、家具系统、电影、电视、广告和出版物等系统就不能产生并发展至当今这种发达的程度。换言之,我们可以观察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的语言和作为文化传播媒介的语言这种双重性质。这种双重性质确定了语言与文化的不可分割性,正如法国著名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84)所言:“无论从哪方面看,文化都离不开语言。”

(三)

以上论述清楚地表明,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镜像反射,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展现在眼前的乃是这个民族绚

丽多姿的文化形态。由于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不同民族的文化自然会迥然不同。这种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

词汇是语言的基本构素,是语言大系统赖以存在的支柱,因此文化差异在词汇层次上体现得最为突出,涉及的面亦是最为广泛。上文提到的中国清代宫廷后妃的名称以及英国贵族内的爵位名称就是文化特异性的突出例证。这里我们不妨再举数例,以资佐证。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大凡兴工动土,都要察看地形环境,看它是否得“风”得“水”,然后择宜土、避凶地。这就是古代相地术中的所谓“风水”。清人范宜宾注郭璞《葬书》云:“无水则风到而气散,有水则气止而无风,故风水二字为地学之最重,而其中得水之地为上等,以藏风之地为次等”。“风水”之义,由此可大略窥知。可是,西方文化中只有相面术(physiognomy),却无相地术。在西方文化里,大凡信奉基督教者,死后一般均葬于教堂墓地,并不考虑什么“风水”。兴工动土虽亦择“宜地”,但一般无“避凶”之意,而是出于对建筑本身的考虑。这种民族文化特异性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表现为“词汇空缺”。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十分发达;“神”的传说已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少神的名字,如主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文艺女神缪斯、春天女神维纳斯、小爱神丘比特等,在文学作品屡见不鲜,已被西方词汇吸收。相形之下,中国文化虽然亦有神话的一席之地,但“盘古”、“嫦娥”、“伏羲”、“女娲”、“牛郎”、“织女”等等,乃是中国文化独有的“土”神,和西洋人的“洋”神风马牛不相及,不可相提并论。

汉语中的表亲关系泾渭分明,表兄和表弟,表姐和表妹,区别甚严,既要说出性别,还要分出大小,而英语却笼而统之,一律称为cousin;同理,英文中的uncle和aunt在汉语中亦无外延相同的对应词,如下表所示:

表兄 表弟 表姐 表妹	} cousin	伯父	} uncle	伯母	} aunt
		叔父		婶母	
		舅父		舅妈	
		姑父		姑母	
		姨父		姨妈	

汉民族严格区分亲属关系,源于汉民族的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结构非常重视亲属特征——无论哪一方面的社会关系,都必须按亲属称谓的规定;不论是丧礼还是婚礼,承继遗产,以至一人犯罪,株连九族,均按亲属系树的等级办理。(陈原,1983)这种严格的区分导致了汉语亲属称谓的复杂化。试看:仅“孙”一级的称谓竟有七代之多——孙、曾孙、玄孙、来孙、仍孙、云孙等!^②难怪国外《红楼梦》译者常常望汉语称谓词而兴叹不已。

此外,汉语、德语、法语中均有人称代词的尊称形式,而英语中却无“你”的尊称形式。与尊称相近的是语言中的“谦词”。谦词在汉语中尤为丰富,在古书中常可见“牛马走、仆、妄、不佞、贱事、固陋、私心、谨、再拜”等谦词,现代汉语中,人们亦间或使用“敝人、寒舍、贱内、贱姓王”等谦词,这是汉民族“满招损,谦受益”的民族心理在汉语词汇层次上的反映。但在印欧语言中,我们却无法找到这种谦词,因而“敝姓”只好说成“my name”;“贱内”只好说成“my wife”。

总之,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词汇空缺”现象十分普遍,确非寥寥数例能概括。但上述例证已足以证明,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之间存在着互为映照关系。

然而,“词汇空缺”只不过是文化汪洋中的一滴水,更能反映文化差异的乃是不胜枚举的词汇的词义联想。我们知道,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总是存在着词汇对应关系,这是双语词典的编纂基础,是跨文化交流的基本条件。但“对应”并不等于“对等”,即使表达的理性概念(rational concept)相同,往往因文化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联想意义(associative meaning)(Leech, 1983)。例如,

中国人喜欢用“月有阴晴圆缺”象征人的“悲欢离合”，因此“满月”常能勾起美好幸福的联想，而法国人却常用“满月”形容人的“圆滚滚的大面孔”(un visage de pleine lune)。英语中的“gay”本意为“cheerful, merry, happy”。但在今日谈艾滋病色变的美国，gay 会使人联想到同性恋，这种联想在不谙美国文化的一般中国人的心中就难引起共鸣。又如，对英国人来说，“professional”一词在

He is a professional.

She is a professional.

中，可能引起大相径庭的联想意义：

He is perhaps a boxer.

She is likely a prostitute.

这是英美娼妓文化触导的定向思维结果。由此可见，上述这种受文化背景制约的、通过联想而产生的“超语言信息”差别，或曰“文化信息”差别，是无法通过词汇对应来弥合的。

正因如此，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不了解语言所负载的这种“文化信息”，有效交际势必受阻。在翻译过程中，所谓要戒“望文生义”，不外乎有两层含义：一是要弄清词、句及语段在特定上下文中的字面意义，二是要吃透附加在语言之上的文化信息。把“milky way”翻译为“牛奶路”，那是不懂天文学而贻笑大方；向外商推销国产“白象牌”电池时，在广告中大肆宣扬“white elephant”的性能，却不知“white elephant”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有“笨拙”的含义，以致聪明反被聪明误；在外籍教师休息室的门上写上醒目的“Restroom for Foreign Teachers”，使外籍教师啼笑皆非，这是在字面意义对等和文化对等之间随意划等号的结果。

翻译如此，阅读理解亦然。试想，若把莎翁名句“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理解为有骄阳似火的“夏日”，岂不是冤枉一代大文豪的匠心？所以，朱光潜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英文中shepherd, sea castle, nightingale 等词对于英国人具有较为丰富的

联想意义,对中国人则不然。同理,中文中的风、月、江、潮、梅、松、隐逸、礼、阴阳等词对于中国人所引起的联想和情趣,也会令西方人感到茫然”。^③无怪乎当中国人毫不留情地痛打“落水狗”时,西方人的同情心可能会油然而生,此乃文化差异所致也。

总之,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由于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下不断使用,获得了附加在理性意义之上的不同联想意义,因而会引起不同的心理反应。不了解这联想意义差别,就不能吸收语符所承载的全部信息容量。

就文化差异在句法层次上的体现而言,最典型的情形莫过于汉语和西方印欧语言之比照。众所周知,汉语是一种意合语言,不象印欧语言,没有繁复的变位、变格、形态变化,因此汉语的结合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而主要取决于语义上的搭配是否合乎事理,正如黎锦熙先生所言:“国语底用词组句,偏重心理,略于形式”。^④汉语的这种文化特征是和汉族人在哲学上重了悟不重形式论证,在艺术上主张“神似”的悠久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中国画崇尚写意,寥寥数笔可勾勒出一幅“陆羽高风”图,但画面只有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如果画一个酒壶,一个酒杯,便可题“陶潜逸兴”。这就象汉语的句子组织,没有人,人们却可以意会到施事语,没有茶或酒流入杯中的过程,人们却可以意会到动作语,杯中不画各色的茶和酒,人们却可以意会到宾语,壶口并不一定向着杯,甚至壶柄向着杯也不要紧,这又很象句子语序灵活,词语组合方面的意合特征。^⑤相比之下,印欧语言却是形义融合,意在则形达,句子结构比较严谨。

西方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的是自然时空观,尤其偏重空间的真实性。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的是心理时空,尤其偏重于时间的逻辑性事理性,即使是空间,也常常表现为流动空间。这两种时空观的对立,反映在句法层次上,则表现为印欧语言的空间型构造和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样态。具体地说,印欧语言的句子

是以限定动词为核心(焦点)控制(透视)句内各种成份之间的关系 ,因此 ,句子的复杂化只能通过扩充句内各成份的丰满度 ,前呼后拥 ,递相迭加来实现。而汉语则按逻辑事理的顺序横向铺排 ,意合、流动、气韵三位一体 ,因而在结构上往往“ 极层累曲折之致 ,呈风起云涌之貌。”^⑥

由此可见 ,不同的文化心理造成了形态不同的句子结构模式。在使一种语符转换成另一种语符时 ,单纯追求形似 ,就难免削足适履 ,破坏各自语符系统独特地神韵。所以模仿印欧句子模式的“ 欧化 ”汉语 ,和汉民族根深蒂固的文化接受心理是背道而驰的 ;同理 ,以中国的思维习惯创造的“ 中式英语 ”和英美人长期形成的文化接受心理也是格格不入的。

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语言系统的词汇层和句法层上 ,在语域层上也不例外。外国朋友到中国人家里做客 ,见到主人的妻子时 ,说一句“ Your wife is really beautiful ”之类的恭维话 ,在西方文化类似的语境里亦未尝不可 ,但汉民族文化显然难以接受这种率直的恭维方式。同理 ,中国人在街上碰到熟人 ,问对方“ 你到哪儿去 ? ”是寒暄的套话 ,无可厚非 ,但西方人却认为这种探询隐私未免有点多管闲事。晚餐上对客人说“ Bon appétit ! ”这是法国人的文化习惯 ,德国人亦有类似的说法 (gute Appetite !) ,但英美人和中国人则不然。尽管在英语和汉语中 ,可以组合成“ good appetite ! ”和“ 好胃口 ! ”这类表达方式 ,但在这种场合下 ,英美人和中国人都无这种表达习惯。分手时说声“ 再见 ! ”,堪称世界文化中的普遍现象 ,可是日本人的“ 再见 ”与众不同。“ sayonara ”的含义为“ 久别 ”,且郑重 ,而“ Itté mairimasu ”的本义为“ 去去就来 ”。所以 ,汉语中的“ 再见 ”,英语中的“ good-bye ”,用日语来表达时还须视交际的语境而选择恰当的表达方式。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 ,只注意语义对等 ,而忽视语域的文化特征 ,就难免导致“ 文化冲突 ”(cultural clash)。

基于上述讨论 ,我们以为 ,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

中,不仅存在着萨丕尔和沃夫提出的“语言相对性”(linguistic relativity),而且还存在着“文化相对性”(cultural relativity),而且“文化相对性”和“语言相对性”相互作用,在形成一个民族特有的思维习惯和语言模式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长期以来,我们对语言的认识受到工具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认为“语言是工具、武器,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⑦就语言的基本职能而言,把语言视为工具亦未尝不可,因为所谓“工具”无非是内容的表现形式罢了。然而,这种狭隘的“工具观”很容易把人们导向工具主义,使人们往往只注意工具本身,即语言系统本身,而忽视语言系统之外制约语言的因素,如文化。在外语教学中,“工具主义”语言观的流弊尤为突出,学生自感掌握了外语这门“工具”,但在跨文化的言语交际中,却时常碰到操作“工具”之难。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一种语符系统,其传递信息的方式并非如镰刀割麦。“镰刀”作为工具,和“麦子”不是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但对于语言,情形则不然。语言媒介和它所承载的信息,总是形影不离,无法分开的,两者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内容,就是上文所述的文化系统。因此,我们不能,实际上也不可能把语符系统和文化系统断然分割。

萨丕尔指出:“言语是一种非本能性的、获得的‘文化的’功能。”^⑧对于儿童来说,在习得母语系统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地习得本国的文化系统;在内化(internalize)语言系统内部组织规则的同时,也会内化文化系统中的种种规范(norms)。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外语教学中冲破工具主义语言观的樊篱,树立崭新的文化语言观是十分必要的。

所谓“文化语言观”,概而言之,就是从文化的角度观照语言,

不是把语言视为独立于文化系统之外的纯形式的语符系统,而是把语言系统视为文化大系统的要素之一,而且是构成文化大系统其他诸要素赖以存在的基础。学习语言必须学习文化,反之亦然。这种科学的“文化语言观”不言而喻,要求外语学习者在学习外语的同时,大量接触所学语种的文化,而且应培养一种强烈的文化习得意识(consciousness of culture acquisition)。

诚然,接触外国文化的最佳途径,莫过于置身所学语种的民族氛围之下,耳濡目染,不断熏陶,以便达到以异国文化心理观照异国语言的理想境界。但身临异国文化环境并非是唯一途径。以心理、观念的形式保存在风俗、艺术、宗教、哲学、伦理、道德规范、政治法律制度等之中的各种文化现象,必然要诉诸语言文字。因此,大量阅读与上述文化现象有关的书籍亦不失为接触西方文化的有效途径之一,尤其是建立在语言艺术之上的文学作品,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同样能生动具体地反映西方文化。研读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对十九世纪法国的文化背景可略见一斑,透过狄更斯的现实主义小说,可以窥见十九世纪英国文化形态的一个断面,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会自然而然地把读者带入十九世纪的俄国,使读者有身临其境,如见其人之感,而中国的《红楼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绝非只是一出催人泪下的悲剧,贾府荣辱兴衰的文化“小气候”乃是中国文化“大气候”的一个缩影。

如前所述,文化不是天生固有的知识系统,而是和语言一样,是后天习得的。正如有人有天生的语言习得能力一样,人也有天生的文化习得能力。习得本国文化,如同习得本国语言一样,往往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行为过程,而习得外国语言文化则不然。没有强烈的外语习得意识,就不可能掌握所学的外语;同样,没有强烈的文化习得意识也不可能习得外国文化。而且必须指出的是,这两种习得意识密切相关,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近年来,我国与外国之间的科技交流频繁,文化交流日盛,这

种开放气候迫使我们更新观念 ,排除传统的工具语言观的过多影响 ,用文化语言观去指导外语教学。我们不仅应把语言与文化的探讨深入开展下去 ,而且应使之理论化、系统化。在外语教学中应努力培养学生的文化习得意识 ,使文化规范的教学与语言技能的培养同步进行 ,俾学生在有意识的外语习得中习得必备的文化规范。唯此能真正发挥语言表达思想 ,交流感情之功能。

注 释

- ① 转引自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
- ② 参见郭璞注《尔雅》
- ③ 朱光潜《谈翻译》
- ④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
- ⑤ 参见启功《古代诗歌 骈文的语法问题》
- ⑥ 参见张汝伦、申小龙《论文化语言学》
- ⑦ 高名凯《语言学概论》
- ⑧ 萨丕尔《语言论》

参考书目

- 陈原(1983)《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
- 冷德熙(1988)《文化组合论》,载《南京大学学报》1988 年第一期
- 司马云杰(1986)《文化社会学》,山东人民出版社
- Barthes , Roland (1984) , Elements of Semiology , Hill & Wang , New York
- Hymes , D. H. (ed)(1964) , Language in Culture and Society , Harper & Row , New York
- Reginald , G. (ed)(1960) , Culture in Language Learning , Rutgers : The State University , New Brunswick , N. J.

(原载《教学研究》1989 年第 3 期)

俄语中反映民族文化 特点的词汇

丛亚平

目前,苏联语言学界较为重视研究反映民族文化特点、具有附加意义的词汇,这种词汇在不同的语言中反映了民族文化的异同,值得引起重视。

在苏联语言学界中,附加意义(коннотация)在大多数场合下,被理解为词的语义中带有感情色彩的成份。根据 O. C. 阿赫玛诺娃的定义:“附加意义是词(或表示)的补充内容,是产生于词的基本意义之上的附加语义或修辞色彩,表达各类不同的感情色彩和评价色彩的意义,赋予话语的一种庄重的、轻松的、戏谑的、令人愉快的……色彩。”

在语言中,词汇和语义最能充分、生动地反映出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不同的语言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不同的情景中,每一个词汇除了它的基本词义之外,都会得到独特的语义,带有各民族文化特点的、陶冶性情的附加意义。

民族文化的异同,反映在词汇上,还能引起各种带有感情色彩的、形象生动的联想。例如,一些在字面上完全等值的两种语言词汇在不同民族中,经常可以引起相同、部分相同、不同的联想,而一些在字面上完全不等值的两种语言词汇却可以引起相同的联想。

文化上的近似和差异,在语言的交际功能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中苏两国文化上的异同,既体现了文化共性,也体现了文化个性。后者反映到词汇里,经常引起俄语学习者联想上的差异,形成不正确的理解和概念,在语言学习和使用上造成“张冠李戴”,

选词 ,用词不当的错误。因而尤其值得研究。

我们初步将俄语中反映民族文化特点 ,具有附加意义的词汇分成四类 ,以供学习和研究。

一、两种文化中 ,在社会意义 ,感情色彩上完全等值的词汇。例如 ,俄语中 голубь 汉语中“ 鸽子 ”,都是和平或爱好和平的象征。中国人甚至把鸽子称为“ 和平鸽 ”。俄语中的 радуга 汉语中“ 彩虹 ”,在两种语言中都可以引起“ 欢乐、美妙 ”,等联想。俄语中 красный , белый , левый , правый ,除了称名功能外 ,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表示左的 ,右的政治派别 ,以及政治倾向。如 : Главнейши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м центром был Царицын , туда бросали и белые и красные лучшие силы , а на северном фронте у противных сторон не было перевеса ... С середины ноября красные перешли в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М. Шолохов. Тихий Дон/ 汉语中 ,这些词“ 红的 ,白的 ,左的 ,右的 ”具有相同的社会意义。俄语中 орел 象征着值得骄傲的 ,勇敢的人 ;汉语中的“ 鹰 ”也具有同样的不称名 ,表评价的转义意义。俄语中 пень 常指那些没有感情的 ,愚蠢的人。Разве этот пень может что-нибудь понять ? 在汉语中也常讲 ;“ 这个人笨得象个木头疙瘩。”

在不同的语言中 ,这些字面完全等值 ,意义完全等值的词汇引起了等值的带有感情色彩和形象生动的联想。这证明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 ,除了差异之外 ,还存有等同方面 ,反映各民族文化的接近。

二、在一种文化中存在 ,而在另一种文化中并不存在的附加意义词汇。正是这类词汇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重视。在语言交际中 ,在阅读文学作品时 ,我们经常碰到理解上的障碍 ,甚至引起概念上的糊涂。主要原因是对所学语言国的文化特点了解不甚。例如 ,俄语中的 шляпа 除了“ 帽子 ”这个基本词义之外 ,还有附加意义 ,表示“ 萎靡不振 ,无能的人 ”。— Ты же типичная шляпа , а не внук декабриста. (К. Г. Паустовский. Северная повесть) 而

在汉语中“帽子”怎么也不会引起同样的联想。苏联人开玩笑时爱讲：Я — шляпа. 这个句子在初学俄语的中国人中肯定会引起困惑不解，不明白帽子同评价一个人有什么关系。因为在汉语中无论如何都不会讲“我是帽子”。

这类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对客观世界的不同认识。例如 берёза 是苏联典型的树木，在传统的俄罗斯生活，以及苏联人现代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берёзовый сок，берёзовый веник，берёзовая каша，береста...）但对苏联人来讲，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祖国的象征和化身。在许多歌颂祖国、歌颂胜利的诗歌和文学作品中都能碰到“白桦树”这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词。Я покинул родимый дом，Голубую оставил Русь. В три звезды березняк над прудом Теплит матери старой грусть.（С. Есенин）

总而言之，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中，同一客观事物可以包含不同的含义，引起不同的联想，具有不同的内涵。这正如俄语中的 фикус，汉语中的“印度橡胶树”，虽然同是一个词，但中国人怎么也不会联想到，这是家庭舒适、家庭生活美满的象征。而俄语和汉语中的 сосна“松树”；дракон“龙”，虽然字面上完全等值，但苏联人在讲这个词时，怎么也不会联想到“松树”代表忠诚不渝、坚韧不拔的性格；“龙”是吉祥之物，中国古代皇帝的象征。

在俄语中这类具有附加意义的词汇虽然为数不多，但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特点。例如：жук“甲虫”除了基本词义外，还具有“滑头、骗子”的含义；бiryok“离群的公狼”可表示“孤僻的人”，заяц“兔”→“无票乘客”，гусь“鹅”→“滑头，不讲信用的人”；кит“鲸”→“主要人物，台柱”；мешок“口袋”→“笨拙的人”；колпак“帽子、罩”→“缺心眼的人”；свистун“好吹口哨的人”→“只会吹牛皮的人”；тряпка“抹布”→“孬货、孬头”；слизняк“蛞蝓”→“懦弱的人，无骨气的人”，等等。这类词汇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它使作品的语言更加生动，更加形象化。以下例举三

个例子：

1. В городе у него была семья , дети — двое , кажется.
Нюра знала это , но почему-то отказать не могла — принимала. Все жалели Нюру. а этого **гуся** осуждали (Шукшин. Капроновая ёлочка)
2. — Семён , ездил к сыну-то ?
— Ездил . . .
— Ну как ?
— Никак. Как пил , так и пьёт. С работы опять прогнали , **свистуна**.
(Шукшин. Непротивленец Макар Жеребцов)
3. Он отодвинул его (письмо) , склонился на руки.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 , что у него даже заболело сердце от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глупости и беспомощности. // Попугай ! Что это , Майя ? Что это , Майя ? Тьфу ! . . . **слизняк** // . Это , правда , было как горе — эта неопределенность. (Шукшин. Страдания молодого Ваганова)

在文学作品中 , 我们还可以经常碰到 рябина “ 花楸 ” ; черемуха “ 稠李 ” ; калина “ 荚 ” ; вишня “ 樱桃树 ” ; ива “ 柳树 ” 等词。它们除了单纯的称名功能外 , 象征着姑娘以及年轻人的爱情。苏联人通常讲 , 这种植物虽然美丽 , 但非常忧愁 , 如同年轻人的爱情。拿 рябина 为例 , 花楸的果实是红颜色的 , 营养可口 , 但吃起来 , 嘴里总留有一股涩味。这正如美好的爱情中包含着恋人的甜和苦。

在汉语中也有类似的词汇 , 被苏联人所不能理解。例如 : 汉语中 “ 黄牛 ” 常常被比喻为 “ 任劳任怨 , 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人 ” ; “ 井底青蛙 ” 被比喻为 “ 见识浅薄 , 目光短浅的人 ” ; 绵羊 — “ 顺从听话 , 无主见的人 ” ; 蚕 — “ 忠心耿耿 , 勇于献身的人 ” ; 刺猬 “

→“自高自大,碰不得的人”;臭虫”→“令人生厌的人”等等。

在反映民族文化特点的词汇中,还可分出一类带指小表爱后缀的词,表主观评价意义。这类表主观评价的词(如 голубчик, бабенка, девка, братец, букетик, дружок...)具有十分强烈的感情色彩,是汉语中所缺少的特殊表达方式。在翻译中,有时碰到这类词汇,很难处理,不尽能把原作者的感情色彩全部翻译出来。

例如: Мужчина подошел к стойке, расстегнул доху. — Сто грамм, голубушка, и чего-нибудь... — вытянул шею, разглядывая полки. — Чего-нибудь на зубок. (Шукшин. Капроновая ёлочка)“一个男人走近柜台,敞开皮袄,说道:‘来二两,亲爱的,再随便来点……’他伸长脖子,瞪大眼睛望着橱柜,——‘再随便来点什么磨磨牙。’”

三、在两种文化中,社会意义、感情色彩不等值的词汇。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中,字面上完全等值的词汇可有不同的涵义,可引起不同的联想。例如,相同的词语在一种语言里会引起形象生动的联想,而在另一种语言里却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甚至会引起相反的联想。俄语中 аист 在苏联人心目中象征着家庭的宁静,家庭的幸福,以及家庭中孩子的出生。Аист на крыше — Мир на земле! Аист на крыше гнездо с аистенком Ночью и днем бережет. Ну, а в том доме под крышей девчонка Счастья так ждет... (песня. Аист на крыше) 俄语中的 журавль 对苏联人来讲,是忠诚祖国的象征。他们认为,每年秋天,鹤成群结队地飞走,啼叫声悲切,流露出对家乡的依恋,对祖国的思念。因此在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 аист 和 журавль 的形象;而汉语中的“鸛”、“鹤”,在中国人的概念中,却是延年益寿的象征。苏联人不喜欢 плакучая ива,因为它象征着忧愁;而中国人却认为“垂柳”象征着生活的宁静、安宁。俄语中的 кошка 是家庭幸福的象征。在苏联,每当乔迁新居时,按传统习惯让猫先跑进新居,意味着给新居带来了家庭幸福。而汉语中的“猫”却被人常说成“猫是奸臣,狗

是忠臣”。俄语的 *сорока* 在苏联人中引起的联想是搬弄是非。例如：— *Ей же , понимаешь , делаешь лучше , она в слёзы. Бабыё !—Треписся много. —* сказал Федор. — Как *сорока* на колу. У вас все в роду трепачи были. Балаболки. (Шукшин. Капроновая ёлочка) 而汉语的“喜鹊”在中国人中引起的联想却是喜事临门。

在不同的文化中 ,表颜色的词也会引起联想上的差异。例如：*белый* 会引起苏联人纯洁、美好的联想 ,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 ,白颜色却代表着不幸和死亡。俄国人认为 *желтый* 象征着对爱情的背叛。因此 ,俄国人从前非常忌讳给女人送黄颜色的花。// *Напрасно старался , — усмехнулся 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 Все мои цветы желтые , а желтый цвет , говорят , цвет разлуки//.* (Виталий Закруткин. Матерь человеческая) 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 ,黄颜色代表着古代皇帝的威严和权力。

更为有趣的是 ,在两种语言中 ,表动物的词也会引起各种不同的联想。例如 :俄语中用兔子来比喻胆小鬼——“ *трусливый как заяц* ”,汉语中却用老鼠来比喻胆小鬼——“胆小如鼠” ;俄语中用狮子比喻勇敢的人——“ *храбрый как лев* ”,汉语中用虎进行比喻——“虎胆英雄” ;俄语中用马来比喻吃苦耐劳的人——“ *выносливый как лошадь* ”,汉语中却用骆驼来赞美意志坚强的人 ,如此等等。

四、在两种文化中 ,社会意义 ,感情色彩不完全等值的词汇。这类附加意义词汇在某些方面会引起不同民族的共同联想 ,而在某些方面却会引起不同的联想。这反映了各个民族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民族文化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例如 ,俄语中的 *волк* 和汉语中的“狼” ,除了“凶残”这一共同形象外 ,也有意义的差异。俄语中 *морской волк* ,中文译为“海狼” ,但这不是贬义 ,而是对有经验的老水手的赞扬。再如 ,俄语中的 *медведь* 和汉语中的“熊” ,除了共同象征着“头脑简单 ,笨拙的

人”之外,在俄国人的心目中,熊还象征着心地善良的主人、未婚夫。Хозяин в дому, что медведь в бору. Медведь — хозяин。俄国人中有一句话:谁在睡梦中看见熊,谁就在不久的将来举行婚礼。由于熊在苏联具有“体态笨重、心地善良、嗜好甜食、主人、未婚夫”等形象,人们十分喜爱它,赠送给它许多名字,即有父名、姓全称,也有表爱的昵称。全称为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Топтыгин,昵称为 Миша, Мишка, Мишук...。有趣的是,它的姓别于一般的姓,另有一翻含义。Топтыгин 源自动词 топтать,意味着熊的体态笨重和力大无比。

综上所述,具有附加意义的词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文化的特点。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学习语言的人不能仅仅满足于一般的听、说、读、写、译的熟练技巧,还应该充分重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注意文化之间的雷同与差异,应该通过学习语言了解别国的文化、历史、风土人情,以此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知识才能不断丰富,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才能更深入一步。

参考书目:

- ① Брагина А. А. Лексика,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страны. М. 1981.
- ②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 1983.
- ③ Говердовский В. И. История понятия коннотации. 《Филологические науки》о 2. 1979.
- ④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М. 1980.

(原载《中国俄语教学》1988年第2期)

词汇文化伴随意义的跨语言 (俄语和汉语) 对比研究

吴国华

近三十多年来,有不少论著在对词进行语义分析时,程度不同地注意到了词的伴随意义(коннотация),但观点各异,对相关语言单位的研究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也就更谈不上文化伴随意义词汇的对比研究了。

О. Ахманова 认为,所谓伴随意义,是指词的物指意义以外的各种附属色彩;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 等则从翻译学角度论述伴随意义:——某一语言社团范围内人们对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感应;法国语言学家 A. Martinet 与此持相反观点,认为伴随意义是附属于词的个人感情联想,社会语言学家 А. Д. Швейцер 等则把词的社会变体看作伴随意义。同时,也有学者从根本上否定伴随意义同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如 L. HJELMSLEV)。

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语言国情学的诞生,词的伴随意义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语言国情学创始人 Верецагин, Костомаров 给伴随意义词作了如下定义:——能引起感情、伦理和审美联想的词。按照他们的定义,伴随意义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社会文化背景基础上的附属义和由语言手段(如词缀构词法等)而产生的附属意义。

应该说,学者们的观点基本上反映各自学科的特点。也正是因为如此,各家观点又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基本上同意 Ахманова, Верецагин 的观点。然而,考虑到语言国情学问题的现实性,我们试图将伴随意义分为:(1)文化伴随意义

(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 (2) 修辞伴随意义 (стилев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前者指受民族文化制约(即形式上未表现)的附属义 ,如 : берёза , рябина ;而后者则指受语言手段制约(即形式上表现)的附属义 ,如 : Анюта , домик。文化伴随意义应是语言国情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鉴于我们对文化伴随意义的理解 ,我们对文化伴随意义词汇作如下定义 :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中指称意义相同的中性词 ,但在一定的民族文化领域又具有特殊的感情评价意义和文化历史联想。例如 ,俄语 рябина (山楸果)可喻指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少女 ,而在中国文化中该词却引不起任何感情联想。

民族文化不仅在普通名词中 ,而且在专有名词中也有所反映。因此 ,我们将能引起文化历史联想的某些专有名词也归入文化伴随意义词汇之列 ,诸如俄罗斯文化中的 Волга (伏尔加河)——俄罗斯文化的摇篮、大河之王、母亲河 ;中国文化中的“ 延安 ”——革命的摇篮 ;“ 苏州 ”——茉莉花城、园林城、东方威尼斯等。

分析表明 ,具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词汇通常与民族文化有着密切联系。我们通过对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取舍 ,并按其指称意义分为以下八类 :

1. 动物 (медведь , лев , журавль , грач , кукушка , сова , кит)
2. 植物 (гвоздика , иван - да - марья , красные маки , ландыш , незабудка , липа , дуб , осина , калина , малина)
3. 颜色 (красный , жёлтый , зелёный , голубой , белый , серый)
4. 数字 (три , семь , тринадцать , тридцать три)
5. 民俗形象 (жар - птица , баба - яга , Иванушка - дурачок)
6. 人名 (Александр , Анна , Екатерина , Иван , Макар ,

7. 地名(Бородино , Киев , Москва , Тула , Ульяновск)

8. 纪念日和传统节日(9 мая , 7 ноября , Проводы Зимы)

上述八类中 ,以动物和植物最为有趣 ,它们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须知 ,文化伴随意义和民族日常生活、地理、民俗、宗教 ,以及价值、审美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 ,俄罗斯人十分喜爱 берёза 白桦)——“ 祖国 ”、“ 俄罗斯少女 ”、“ 少女的纯洁和善良 ” 的象征。这和它在俄罗斯的广阔分布、广泛用途 ,以及它参与民间传统节日等不无联系。有趣的是 ,得到我国人民厚爱的竹子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古人云 :“ 食者竹笋 ,庇者竹瓦 ,载者竹筏 ,穿者竹皮 ,书者竹薪 ,履者竹鞋。”

研究结果表明 ,人们对某一事物的褒贬态度主要取决于下列因素 :1) 取决于该事物在民族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见上例 берёза) 2) 取决于事物在民间创作中和宗教神话中的角色。例如 ,俄语词 иван - да - марья (蝴蝶花) 具有“ 忠实 ”、“ 永不分离 ” 的象征意义。此意义源出于俄罗斯民间故事。传说 ,很久以前有叫 Иван 和 Марья 的兄妹俩不幸分离 ,长大成人后邂逅相遇 ,并产生了爱情。Иван 娶 Марья 为妻。不久 ,他们无意中发现了自己的血缘关系 ,可俩人不愿再度离别 ,就化成了一种黄紫相间的小花 ,人们称之为“ иван - да - марья ”。3) 取决于事物本身的特征 (形象、味道、颜色) ,例如 , калина (荚) 那“ 白色的花序 ”、“ 鲜红的果实 ”、“ 苦涩的味道 ” 分别与下列感情色彩相对应 : а. 少男少女初恋的柔情 б. 强烈的欲望 в. 不可名状的痛楚 г. 出嫁后的痛苦生活。值得一提的是 ,事物的特征是文化伴随意义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但不是决定的因素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心理、民族审美观和价值观。

社会的发展影响词的文化伴随意义的形成或消失。以俄语词 “ красный ” 为例 ,在古代俄罗斯“ 红色的 ” 乃是“ 善良 ”、“ 漂亮 ” 的

标志。随着时代的变更,它获得了新的喻义:“革命的”、“共产主义的”象征“用鲜血换来的自由”。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发展变化影响着文化伴随意义的形成或消失:1)一些过去评价色彩为贬义或褒义的词汇会向相反的方面转化;2)一些过去没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词汇可以获得伴随意义;3)现在具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词汇随着社会的发展可能会消失。此外,文化伴随意义还具有“双重性”的特点。所谓双重性,是指某一个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同时附属有赞成与不赞成、褒与贬截然相反的感情色彩。例如,“熊”是俄罗斯的民族图腾,一方面它象征力量、勇敢、俄罗斯汉子、俄罗斯森林的主人,另一方面它又常喻指笨拙和懒惰等。有关俄罗斯民族对该动物的态度,在B.达里词典中可以见到鲜明的例证。在该词的词目中,作者列举了俄罗斯民间对该动物的各种称呼,如 чёрный зверь, лесник, хозяин。属于此类的还有 пава(孔雀)等。

通过对俄汉语中此类词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俄汉文化渊源上的差异在词汇的文化伴随意义上反映尤为明显。根据其功能特点,我们拟将其分为下列五类:

1. 共有事物,文化伴随意义不同或截然相反。

俄语中的 сойка(喜鹊)是“绕舌者”、“贼”的象征,而在汉语中乃是吉祥的象征,常用以喻“幸福”等。俄罗斯文化中的 журавль(鹤)常常象征“春天”。例如:

Вот уж снег последний в поле тает.

Тёплый пар восходит от земли,

И кувшинчик синий расцветает,

И зовут друг друга журавли.

(А. К. Толстой)

汉语中无此附加意义。汉文化中“鹤”象征“长寿”,因此有“鹤寿”、“松鹤延年”的说法。

俄汉词汇的文化伴随意义的差异也体现在颜色词和数词上。

汉文化中,白色是丧色。而在古代俄罗斯,白色乃是美丽的象征。对白色的肯定态度一直延续至今。婚礼上新娘通常佩白花,穿白礼服,戴白手套,穿白鞋。可在汉文化中白花、白鞋一般限于葬礼等场合。在汉文化中,双数是吉祥数,单数是冥数。因此,汉民族中作为结婚等喜庆活动的礼品应该为双数,作为殡葬等白事的礼品数为单数。与此相反,俄罗斯人作客时给亲友的鲜花数通常为3、5、7、9枝,祭悼亡人时则要送由双数组成的花束。

2. 共有事物,文化伴随意义部分相同。

俄汉语中,сокол(鹰)均有相同的文化联想和感情色彩:勇敢、敏锐、敏捷等,均可用以称呼勇敢的飞行员。然而,俄罗斯文化中未婚妻可用其来称呼“未婚夫”(常用ясный сокол形式);母亲用其称呼“心爱的儿子”等。

ива(柳)两种语言中都有“忧伤”、“少女的美丽”附加意义。然而,在俄语中该词还可喻指“女人的凄惨命运”;而中国文化中又有“离别”、“避邪”等附加意义。

3. 共有事物,仅一种语言中有文化伴随意义。

俄语词черёмуха对汉民族来说,仅仅是语言符号“稠李树”而已,而在俄罗斯文化中却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春天的象征。此义常见于俄语诗歌中,例如:

Сыплет черёмуха снегом,
Зелень в цвету и росе.
В поле, склоняясь к побегам,
Ходят грачи в полосе.
(С. Есенин)

属于此类的还有:дуб——力量、豁达的象征,рябина——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少女的象征;鸳鸯——喻“吉祥”;白头到老。松树——喻“长寿”;坚韧不拔”。

4. 不同的事物,文化伴随意义相同或近似。

当指事物迅速涌现时,俄语中常说:“как грибы(после

дождя)”(雨后蘑菇),而汉语中却说“雨后春笋”。这里的 грибы 和“笋”虽是不同事物,但功能相同。俄语中的 журавль ,汉语中的“雁”也有着相同的文化联想:春天。属于此类的有:

красная гвоздика	} 英雄(烈士)的象征	杜鹃花
красные маки		山茶花
красный тюльпан		木棉花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同事物功能相同,但其中有的仍存在着细微差别,如俄语中的 вол (阉牛)和汉语中的“黄牛”都可指“劳动者”,但前者通常是指“不推辞的、无怨言的劳动者”,但又有“迫不得已”的意味;后者则多指“自觉自愿劳动的人”或“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人。”

5. 特有事物具有鲜明的文化伴随意义。此类词汇最具民族特色,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例如,俄语中的 русская печь (俄式炉子)、русская баня (俄罗斯蒸气浴)、тройка (三套车)、русская изба (俄式木房)、самовар (茶炊)、борщ (红菜汤)、квас (克瓦斯饮料)、матрёшка (套娃)、сарафан (萨腊范)、кичка (旧俄妇女戴的双角帽)、жар - птица (火鸟)等;汉文化中的“炕”、“房子”、“粽子”、“元宵”、“月饼”、“灵芝”、“梅花”等。

以“русская печь”和“梅花”为例,русская печь 是俄罗斯农舍的中心。它是俄罗斯家庭、家庭舒适、安居乐业的象征。许多生活风俗习惯、仪式典礼、迷信传说都同炉子有关。炉子是俄罗斯人热情好客的象征。接待客人时,他们通常按“倾自家之所有”的原则。此外,炉子是尊敬老人的象征,这是长者的“合法的”位置。汉民族中的“梅花”喻“坚毅”、“坚韧”,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梅花的五朵花瓣象征愉快、幸福、长寿、顺遂、和平;一说象征汉、蒙、回、藏、满五个民族的团结。

分析表明,由于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一个普通的词往往会附有文化伴随意义。不同民族文化又会赋予词汇不同的文化感情色彩。文化伴随意义不同于修辞伴随意义,是形式上表现的附属意

义。它主要包含潜在的受民族文化制约的感情色彩和评价色彩。两者相互联系,其总和概括地体现了人们对事物的褒、贬态度。

语言现象的对比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对包含在不同民族语言中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对比却是近十余年来的事。该领域的许多问题有待探讨。毋庸置疑,联系文化研究语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本文原为俄文,载波兰《Linguistic and oriental studies from Poznan》1991 年第 1 期)

“词汇背景”小议

郭聿楷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语言国情学的萌芽思想在苏联产生。几次国际性会议的专题研讨,特别是维列夏金(Е. Верецагин)、科斯托马罗夫(В. Костомаров)合著的《语言与文化》(《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和《词的语言国情理论》(《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二书的问世,可说已标志着此学科趋于成形,语言国情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逐渐被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所承认。

语言国情学的出发点和任务单纯而明了:学习外语的同时,应了解此语言使用国的民族文化知识,并为此建立一整套教学法体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个民族的文化在其语言中表现得最为全面和完美。学习语言同时应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民族文化,这是不言而喻的。可见,语言国情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无疑是正确的。这门学科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各国俄语界异乎寻常的重视,引起某种“语言国情热”,这不是偶然的。

然而,一门新的学科在其诞生之初不可能尽善尽美,理论上不免有各种缺陷和破绽。因此引起人们的议论和非难,也在所难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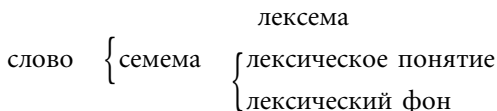
苏联语言国情学的创始人出于作为外语的俄语教学的需要,抓住一个掌握语言中十分关键的文化国情知识问题,将此构想揉进语言单位的语义结构及外语教学法体系中,这本身不能不说是一种开拓性创新,对俄语教学的价值毋庸置疑。但是,如果对这一学科的价值过分夸大,对尚不成熟的理论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则

难免失之偏颇,走入极端,理论上产生弊端和漏洞。

本文想就语言国情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词汇背景 (лексический фон, 也译作“词衬”)发表一点粗浅看法,希望引起俄语界同行的思考和批评。

维、科二氏认为,词的语义 (семантика) 不只限于词汇概念 (лексическое понятие), 词中还有与语言的载蓄功能 (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相联系的语义成分,在每个词的周围形成各种各样的信息光环,即非概念性语义成素 (непонятийные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е доли)。词的所有非概念性语义成素即构成词的词汇背景。例如, книга 一词的概念意义中包括五个语义成素: 1. 作品 2. 印刷品 3. 由纸页组成 4. 印有语篇 5. 装订成册。除此以外, книга 中包含的一切语义内容,均属词汇背景之列。维、科二氏这样解释 книга 的词汇背景:当我们听到或看到 книга 这个词时,我们会回忆起各种有关 книга 的谚语和箴言名句: Любите книгу — источник знаний; Ему и книги в руки; Сшита, да не рубашка с листьями, да не дерево; без языка, а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我们还会联想到:书如何出版、发行、何处可买到书,何处可借阅书,书的形状如何,书有何用处,书保存于何处,何人写书,何人出版了第一本俄语书.....还会联想到与 книжный 一词有关的各种信息: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книжный магазин, 以及 книготорговля, общество книголюбов, библиотека, 《Книж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В мире книг》等等。一言以蔽之,与 книга 直接、间接有关的各种知识和信息, книга 一词所能引起的一切联想,都是 книга 一词的词汇背景。维、科二氏将俄语词 книга 和英语词 book 作了对比,认为二词概念意义相同,但词汇背景有别:如苏联出版的多为硬皮书,只由国家出版社出版,书价低廉,出版份额极大,书中无宣扬战争、种族歧视、色情之类内容,这一切都反映苏联的社会生活现实。而在英国,大量出版的为软皮、软长条形袖珍书,常以系列形式出版.....(157—59)

维、科二氏认为,词汇背景不是个人现象,它与词的概念和词本身一样是社会现象,亦即语言现象。词汇背景中的基础语义成素是使用语言的集体中所有成员共有的固定现象(1,58)。这一思想在《语言与文化》和《词的语言国情理论》两本书的图示中体现得一清二楚。



图中 семема (义位)指词的全部语义内容, лексема (词位)指词的声音外壳(2,26)。由此可见,词汇背景属词的语义内容中包含的固定成分,它与词义中表概念的成分一样,应是语言体系现象。

维、科二氏认为,词的语义(семантика)中除表概念的成分外,全部非概念语义成分均属词汇背景。两位作者还使用 план содержания, означаемое 代替 семантика,视其为同义术语。但 семантика (或 план содержания, означаемое)具体指什么?这一点两本书中都未作明确、肯定的解释。

“意义”可以说是语义学中争议最多、最不确定的概念。значение, смысл, понятие, семантика, содержание, означаемое 以及 денотат, референт 等术语在传统词汇学及现代语义学中含义相当不确定、不统一。但是,如果使用某一术语,就应明确界定其具体内涵。

现代语言学对词义的探索已进入更高的层次,从不同角度、不同相互关系认识词义的构成。例如,利用符号学关系去认识词的语义内容,将词义分解为四部分:1. 能指意义(сигнифик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即概念意义,也就是一般词典中对词的释义;2. 结构意义(структурное значение),表现为词在语言体系中的相互关系;3. 语用意义(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表现为使用语言的人与词的相互关系;4. 语境意义(ситу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表现为词与具体语境中所指对象的关系(5,91—108)。又如,英国当

代语言学家利奇 (G. Leech) 在《语义学》一书中,将词义区分为七种:理性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6, 13—29)。无论对词义怎样区分,有一点是明确的:各种现代语义学理论都不再将词义理解为单纯的概念意义(或理性意义、逻辑意义)。

维、科二氏词汇背景理论中所说的词的“全部语义内容”显然不是现代语义学中词义的结构整体。他们所说的词汇背景应是附加在概念意义(理性意义)上的一部分指物语义成分,或者说,是概念意义的外围或延伸。根据现代语义学理论,概念意义加词汇背景不应是词的语义整体。所以,把词汇背景解释为从词的全部语义中除去概念以外剩余的全部语义成分,或词的全部语义减去表概念的语义成分即等于词汇背景,是不够精确、科学的。这样,“词汇背景”的概念也就不明确了。

莫尔科夫金 (В. Морковкин) 在《О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и и некоторых смежных вопросах》一文中对词汇背景(他称为 сигнификативный фон)的概念作了更为具体、明确的界定,认为词汇背景是从所指意义(денот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中除去能指意义(сигнификативное значение)所剩余的那部分语义成分。所指意义中可区分出核心部分和外围部分,核心部分即构成能指意义。而所指意义以外还有“所指认识”(денотативно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即带有个人特点的、直接、间接得来的对客观事物的各种印象(4, 60—63)。可以看出,莫尔科夫金的词汇背景概念已不同于维、科二氏的模式——词的全部语义减去概念等于词汇背景。但是莫尔科夫金未明确解释,词汇背景是否是永远固定于词义中的语言体系现象。

词的概念意义是客观事物在人的思想中高度概括、抽象化的反映,它只能包含同类事物中那些最基本、最典型、最具区分功能的一般性特征。如上文所举 книга 一词的五个基本义素即是。作为词义基础的概念意义这种高度抽象、概括性特点,是人类思维能

力发展的结果,也是语言可以表达、描述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积蓄浩如烟海的知识信息的奥秘所在。同是一个 *книга* (或 *book*, 或“书”),既可表示苏联的书,也可表示英国、中国、日本、印度的书,既可表示现代社会中的书,也可表示几千年前的以绳索穿木板做成的书,等等。

维、科二氏虽然把词汇背景与概念意义明确区别,但由于把词汇背景看成是词义中固定的、社会性的语义成分,因而这种成分就应永远附着在概念意义上与其形影不离。于是麻烦就产生了。如果一个操俄语的苏联人想用 *книга* 表示英国出版的袖珍小说或中国古代线装书,那该怎么办?如果此人说: *Это английская книга.* 或者 *В музее я увидел древн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книги.* 此时 *книга* 中的“固定成分”——词汇背景还存在不?如果有关苏联书籍的知识、信息永远固定在 *книга* 的词义中,那么一个苏联人岂不只能用此词表示苏联的书才能正确无误?而当他用此词表示其他国家的书时(如说出上述两个句子),由于此词中仍有词汇背景存在,岂不就注定会犯错误,造成所谓“文化休克”!这样,语言交际岂不成了问题?

利奇划分的七种词义中,与维、科二氏所说的词汇背景相接近的是“内涵意义”。然而利奇强调,内涵意义是附带的,不稳定的,不是意义的基本组成部分,经常随着文化、历史时期和个人经历的变化而发生很大变化。而与内涵意义对立的“理性意义”则是明确的、稳定的(6, 17—18)。

维、科、二氏将词汇背景中社会性的语义成素按其起源区分为语言间的和民族文化性的,语言间的又区分为全人类共有的和地域性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们在解释词汇背景的地区和民族差异时,似乎过分夸大了不同民族生活中客观事物的差异对词汇语义的影响,常常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生活中的客观事物具有的民族特性与词汇的语义直接联系起来。例如,他们在《词的语言国情理论》一书中解释 *солнце* 的词汇背景时,认为 *невосходящее*

солнце 这一语义成素只能存在于北极地区民族的语言的词汇背景中, белая ночь 这一语义成素在非洲赤道地区民族的语言中表示“夜”的单词中不可能存在。又如他们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解释 книга 一词的词汇背景时,列举的也都是与苏联社会的现实生活有关的信息。也就是说,在维、科二氏的词汇背景理论中,某客观事物的民族文化特征几乎就等于该民族语言中表示该事物的词汇的语义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将语言与真实世界等同了。我们可以还拿“白夜”作例子。在中国国土上看不到“白夜”,但这并不意味着汉语中“夜”字的语义内容与“白夜”不相容。汉语中既有“白夜”的词组搭配,许多中国人也有“白夜”的常识。在“夜”字广义的词汇背景信息中可以容纳对“白夜”的联想。辞书中列举“夜”字的搭配时,完全可能出现“白夜”的搭配。

维、科二氏尽管也承认,一民族语言词汇的概念意义和词汇背景中的民族文化语义成素,有可能进入另一民族语言的词汇的概念意义和词汇背景,但所举的例子都是某一语言中反映本民族特殊事物的词汇作为外来语进入其他语言的现象,如俄语词 Совет, стахановец 被引进其他语言。而一般性词汇,如“房子”、“书”、“衣服”等,其词汇背景中似乎不能包含与其他民族生活有联系的内容。所以他们认为,“白夜”不是赤道地区民族生活中的事物,因而他们语言中表示“夜”的词汇中不可能包含与“白夜”有联系的内容。

概念形成的基础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感知、了解(直接的和间接的)。维、科二氏所说的词汇背景中包含的那些内容也只能依靠人对客观事物直接和间接的了解。一个现代人对某一客观事物(如“书”)的了解不可能局限于本国和本民族的现实。一个苏联人对 книга 的认识不可能只是对苏联书的反映,而应是他所了解的各国的、各种各样的书的概括;他对 человек 的认识不可能只是对俄罗斯人或苏联人的了解。所以,进入词汇背景的不可能只是与本国、本民族生活有联系的文化国情内容,而应是人关于客观事

物的全部知识和这些知识的抽象、概括。当然,一个苏联人对苏联书的了解要超过对其他国家书的了解,在他形成的“书”的概念及词汇背景中,更多的内容与苏联的社会现实联系,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为强调词汇语义中的民族文化差异而把词汇背景视为本民族文化的直接反映,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现代人与原始人不同。原始人过的是一种极端封闭的蒙昧生活,知识、信息贫乏。比如,他们对“饭”的认识只不过是和他一起生活的人每日生吞活剥的兽肉,他对“屋”的认识只不过是栖身的洞穴,而对远离他们的人群一无所知。所以,在他用的词汇的意义中,自然只能包含与他生活的那极狭小的天地相联系的内容。现代信息社会中的人的思维 and 语言,与原始人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一民族、一社会中某事物(如苏联的书)不同于另一民族、另一社会中的同种事物(如英国的书),这不一定必然导致一民族语言中表示该事物的单词(俄语 книга)的语义内容不同于另一民族语言中表示同种事物的单词(英语的 book)的语义内容,因为词义毕竟是对同类事物的概括,而不是具体事物的代号。在我们看来,过分夸大词汇语义中的民族文化差异,会走向极端,理论上陷入种种矛盾。

学习外语因对所学语言国的文化国情知识欠缺而犯错误是司空见惯的。这一类错误未必都应归结为对词汇背景缺乏了解。维、科二氏曾举过一个例子:一法国人在苏联请医生看病后问医生应付多少钱。这不过说明此法国人对苏联国情缺乏了解,不知苏联实行公费医疗罢了。如对此解释为此法国人不了解俄语单词 врач 的词汇背景,未免牵强。

一个词可能引起哪部分信息联想,这取决于每个人的经验和知识,而且不限于与本国、本民族有联系的知识;至于每个词在具体情况下会引起哪些信息联想,似乎应取决于语境。例如,一个操俄语的人用 книга 表示一本英国书时,引起的联想应是他所了解

的有关英国书的知识,除非此人对英国书一无所知。同样,此人如用 человек 表示一个非洲人时,引起的联想应是他对黑人的了解,而不是对苏联人的了解,如果此人还知道非洲黑人有别于俄罗斯人的话。

维、科二氏还用语言的“载蓄功能”来论证词汇背景理论,认为词汇是储存知识的手段,上文中所谈到的 книга 词汇背景中包含的各种知识和信息似乎就储存于 книга 这一单词中。语言有载蓄功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然而人类知识应储存于语言整体中,而且主要不是单词层面中。例如,有关“书”的各种知识主要储存于各种言语成品中,如关于“书”的各种文献资料,各类辞书中关于“书”的词条等等。很难设想,维、科二氏所举的 книга 的各种背景信息都载蓄于此单词的语义之中。

这里似乎涉及到人的语言知识与一般知识(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的区别问题。人对客观世界的知识不可能全部包含在词汇的语义中;反之,掌握了一个单词的意义和用法,绝对不等于了解了此词表示的事物的全部有关知识。如果认为词的语义包含关于词所表示的客观事物的广泛知识,那就会把语言中语义无限的扩大而不可捉摸了。利奇在其《语义学》一书中指出:应明确区分人的语言知识与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6,11)。这一意见是很值得认真思考的。

语言国情学尚处于形成阶段,许多理论问题远未定论。因此,对这样一门学问,更多的应是研究、探讨、提出疑问,而不应将已形成的一切作为金科玉律全盘接受。这也可说是本文的主旨吧。

参 考 文 献

1. Верещагин Е.,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осква, 1983.
2. Верещагин Е.,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Москва, 1980.

3. Верещагин Е. ,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О предмете , объеме и функциях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 В кн. :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Воронеж ,1984.
4. Морковкин В. О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и и некоторых смежных вопросах. — В кн. :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Воронеж ,1984.
5. Новиков Л. Семан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осква ,1982.
6. 利奇《语义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7。

(原载《中国俄语教学》1991 年第 1 期)

谈伴随意义的几个问题

孙国军

拙文《论词的伴随意义》(刊《外语学刊》1989, 2)曾以汉、英、俄语材料为依据,从普通语言学的角度,对伴随意义在句义中的地位、作用方式及其语用意义结构进行了分析,从而论证了“伴随意义是跟语境和语言使用者紧密相关的词的语用意义”这一观点。近几年,伴随意义问题受到了国内俄语界同仁越来越广泛的重视,有关著述不少。但总的说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尚有待深入。本文拟就与伴随意义有关的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的介绍和讨论。

一、“伴随意义”及其研究溯源

“伴随意义”是英语 connotation 或 connotative meaning 的汉语译术语。^①源自中世纪拉丁语 connotionem。它原本是个普通名词,意指一个词除了它的基本意义以外所具有的附加涵义。^②后来语言学家用它来指一个词或词组的概念意义以外的意义;这种意义是词在说者(或作者)、听者(或读者)的脑海中所引起的感情和想法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如 democracy(民主)这个词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有不同的感情联义,这个词原来的字面意思可以说已经扩展,包括了不同的次要意义”。^③

在俄语中, connotation 一词被翻译为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е, сопутствующее значение(附加的伴随意义),而作为语言学家术语则采用了音译的办法,即 коннотация。^④

“伴随意义”最早是由奥格登(C. K. Ogden)和理查兹(I. A.

Richardz)在1923年引入语言学著作的。他们在被后人誉为语义经典著作的《意义之意义》(《The Meaning of Meaning》)一书中,列出了意义的22个定义(definition),其中包括词的伴随意义(the connotation of a word)(Leech, 1981)。

但在以后的几十年里,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全世界占据着统治地位。以最大限度的略去语义因素,寻求语言结构关系为特点的语言研究自然使得伴随意义难逃冷落。随着当代语言学不断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尤其是语义学和语用学的兴起和发展,伴随意义问题才越来越多地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

1981年,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利奇(Geoffrey Leech)在其所著《语义学》一书中区分出意义的七种类型,伴随意义即为其中之一。他认为,伴随意义是一个表达单位(expression)具有的交际价值(communicative value),它是通过该表达单位的所指传达的信息,如woman一词的伴随意义包括了“有母性”、“穿裙子”、“脆弱”、“爱哭”、“胆小”、“多情”、“温柔”、“敏感”等概念意义以外几乎所有的妇女的次要特征(Leech, 1981)。但利奇认为伴随意义不是语言意义,而属于其它交际系统,因而它对语言来说是次要的。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生成语义学创始人雷柯夫(George Lakoff)是语言模糊(fuzziness)现象和伴随意义研究的倡导者。他在1973年发表的论文《模糊限制词和语义标准》^⑤中,充分肯定了伴随意义作为词的语用意义对句义的影响,并指出词典释义应包括伴随意义的内容。

前苏联语言学家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引进了伴随意义这一概念。早在1974年,语义学家阿普列西扬(Ю. Д. Апресян)在《词汇语义学》(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М., 1974)一书中就提到伴随意义,认为它是语用学研究的对象。他指出,伴随意义变化莫测,不同语言,甚至同一语言内部意义对应或相近的词的伴随

意义有很大的差异。虽然伴随意义不是词汇语义学的直接研究对象,但它对语义学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词正是在伴随意义的基础上用于比喻、比较、构词和其它言语过程。

另一位前苏联语言学家那维科夫(Л. А. Новиков)在1982年出版的《俄语语义学》(《Семан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对伴随意义亦有论述。他认为,伴随意义或意义联想(смыслов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指语言单位的情感——评价内容,具有主观评价色彩的词汇单位才有伴随意义,修辞色彩为零的便不具有伴随意义(见该书100—130页)。

上面两位前苏联学者的论述和美国语言学家雷柯夫对伴随意义的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他们把伴随意义纳入了语言研究的范围,另一方面他们指出或开拓了研究伴随意义的一个重要方向,即从语用学角度对伴随意义的讨论。它把伴随意义视为词的语用意义,研究伴随意义的语用性质、在交际话语中的作用、作用方式以及多义体系及其选择等等。^⑥

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伴随意义的讨论则代表了又一研究方向。在这方面前苏联学者做了大量具有开创性和富有成果的工作。他们主要是在为俄语对外教学服务的语言国情学的范围内对词的文化伴随意义的研究,^⑦这一研究对外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俄语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尤其是俄语文化伴随意义的对比,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文化学意义。^⑧

二、从伴随意义看语言的弹性机制

1. 概说 本世纪初,索绪尔把人类的言语活动区分为语言和言语,并把语言确定为语言学的唯一研究对象。以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为轴心的结构框架对大量的言语事实有很强的驾驭能力。然而,人类语言毕竟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体系,它凝聚着人类的巨大智慧,以揭示语言结构关系为宗旨的语言理论不可能涵盖纷繁复杂、丰富生动的所有言语事实。

以词汇为例 ,传统的词汇学和词汇语义学虽然对词汇及其语义体系进行了大量描写 ,以义素分析法为特点的语义场理论对词义的分析可谓细致入微。然而它们却对言语中大量的词汇活用现象无法解释。如在“他是只老狐狸”一句中 ;“老狐狸”使用的并不是概念意义 ,而是它的伴随意义“很狡猾”。在汉族人的印象中 ,狡猾是狐狸的一个典型特征。再如俄语中 Ну и бочка же она ! (字面意思为 :她真是个大圆桶 !) 这个句子 ,бочка 使用了“круглый и толстый”(圆而粗)的伴随意义 ,而不是概念意义上的“大圆桶”了。

词的伴随意义指称的都是事物的次要特征(或非本质特征)。客观事物往往有许多这样的特征 ,这些特征一旦为人们感觉和认识 ,都可能成为词的伴随意义而进入交际。可简单图示为 :

通常说 ,语言的词汇往往表现为多义体系 ,一个词汇单位的义项常常是一个以上 ,然而它一经进入话语 ,便成为确定的意义单位 ,从而使得作为语言单位的词汇的信息量和语用弹性增大。而作为外围意义的伴随意义群也表现出类似的性质 ,^⑨这样便又大大增加了词汇单位的语用潜力。

另一方面 ,伴随意义的使用打破了词汇单位通常意义上的语

义标准和语用界限,使得词汇的表达功能成倍提高,从而充分展现出语言的弹性机制。下面的例子是某电视剧中的对白:

女:都说你这个人挺驴,你今天给我驴一次看看。

男:我……

“驴”原本是个名词,是我国北方地区的常见牲畜。这个词在北方方言中有“倔强”、“固执”、“不听使唤”、“不好摆弄”等伴随意义。带有贬意的感情评价色彩。这里“驴”的伴随意义的使用打破了词的语义搭配限制(人,驴),同时也打破了语法规则的制约(“驴”已分别作形容词“挺驴”和动词“驴一次”之用了)。类似用法在现在汉语口语和文艺作品中颇是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语确是一种重功能而略于形式的语言,往往是只要表达需要,搭配合乎事理,词就可前后粘连,铺排成句。

2. 伴随意义与“联想”客观世界的事物是相互联系的。在人的思维活动中,往往是由一事物想到另一事物。如由当前感知的事物回忆起不在当前的有关事物,或由回忆中的某一事物又想到另一事物,这便是联想。^⑩而它作为人的一个重要心理活动,也正是伴随意义产生和使用的心理学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听到或看到某个词,头脑里自然会在这个词和它的所指对象之间产生联想,那么人们通常会联想到所指对象的哪些特征呢?为此,笔者做了一次心理调查。我们选了5个词(母亲、法官、狐狸、长颈鹿、书),要求被调查者写出“当看到或听到这些词,头脑里会联想到所指对象的什么特征”。结果表明,人们习惯于从典型特征上对词的所指对象作出联想,而且较为一致,尽管这些特征并不一定都是科学意义上的。下面我们列出其中两个(词后的特征按一致程度依次列出):

“母亲”慈爱、慈祥、母爱、伟大、可亲、无私奉献、关心子女、耐心、朴素、唠叨。

“长颈鹿”:长长的脖子、温和、安静、有斑点、样子可爱、吃叶子、对周围事物莫不关心,等等。

我们说,正是这些联想特征构成了伴随意义的内容,从而成为词义结构的一部分。而联想的一致程度越高的伴随意义(如狐狸的“狡猾”、法官的“公正”、“威严”,等),其使用频率也就越高。因此,从这一角度讲,伴随意义是人们对词的所指对象的典型特征的联想,是词的概念意义以外的外围意义。

联想不仅是伴随意义形成的基础,也是它进入话语、实现其交际功能的心理学基础。当伴随意义进入句子后,它便和相应成分发生联系。例如:В его докладе много воды。“报告”和“水”是不相关的事物,在逻辑和语义搭配上属异常。只有在“报告”、“水”、“水的伴随意义”之间建立起联想,才能理解这个句子的真正含义:Его доклад многословный и бессодержательный。再看汉语的例子:“在工人们眼里,老厂长就是慈祥的父亲。”句中的“父亲”自然不是概念意义上的父亲,厂长和工人们并不构成“父子关系”,只有在“工厂”——“厂长——父亲的伴随意义(亲切、可接近、严格要求,等)的联想基础上才能使用和理解。也许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有的前苏联学者也常把伴随意义叫作“语义联想”(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或“意义联想”。

3. “原型转移”与义值 在联想基础上产生和使用的伴随意义,进入话语后将和语言中其它的表达方式构成同义,但二者又有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为修辞色彩或情感评价意义的不同,也表现为语义义值及其强度的差异。试比较:

(1) Она хитрая лиса.

(2) Она хитрая женщина.

лиса(狐狸)在俄语中有“хитрый, льстивый, злой”等伴随意义,两句构成同义。但由于句(1)使用了 лиса 的伴随意义,因而其语义义值和强度明显大于句(2);再加上句(1)有 лиса 作参照,所以其义值较为清晰,而句(2)则相对模糊。

“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人们对事物进行分类是按照‘原型’(prototype)或自然范畴进行的。”^①当代西方语义学家也引入这一

概念讨论谓词 (predicate) 与其所指事物的关系。^⑫在语义学中,谓词的原型指含有谓词的表达单位所指的被认为是非常典型的客体。^⑬这里我们运用这一概念进一步讨论伴随意义的义值问题。

一般说来,事物在人们的头脑中都有一个原型。如“女人的头发”和“男人的头发”原型就不同。女人的头发通常要长于男人的头发。因此在下列两句中“短发”的义值是不同的。

(1) 她留着一头短发。

(2) 他留着一头短发。

句(2)让人想到“小平头”,而句(1)则不然,它让人想到的起码是“齐耳短发”,同是“短发”,义值不同。同理,如果说“她留着一头长发”,会令人想到“披肩发”,而“他留着一头长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女人披肩发”的原型。这正是原型不同导致的同一语言表达的义值差异。

伴随意义的使用,使得句子主体原型发生转移,导致相关成分义值变化,从而使语义强度大大增加。如:女人就是磁石,我就是一块软铁。(朱自清)句子使用了“磁石”的伴随意义“有吸引力”,伴随意义的使用,使“女人”的特征原型和“磁石”的特征原型发生转移,从而使“有吸引力”的义值发生变化,从而使其语义强度加大。下面是俄语的例子:

(1) Его дача большая и великолепная.

(2) Его дача — настоящее поместье.

两句同义,不同的是句(2)使用了 поместье (庄园)的伴随意义 большой и великолепный。由于句(2)发生原型转移(别墅→庄园),因而 большой и великолепный 在两句中的义值不同,句(2)的语义强度明显加大。再看两个英语例子:

(1) Waves which seemed as high as mountains rocked the boat from side to side.

(2) High waves rocked the boat from side to side.

由于句(1)的原型转移(high wave —— high mountain),因此 high

在两句中的义值是不同的。

另外,从上面几组例子还可看出,使用伴随意义的句子的信息清晰度也明显大于相应的同义句,后者则相对模糊,这也是原型转移的结果。

4. 伴随意义与词义发展 语言就是这样一种奇妙的“装置”:有限的词汇,有限的规则,却表现出无限的组合弹性,语言的这一特点也表现在伴随意义与词义发展的关系上。

一般说,伴随意义的使用有很强的创新性,它表现为使用者的个人选择,往往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如:瘸腿老头是个老牛贩子,他一进牛市所有买牛卖牛的都拿眼睛挖他……(雁宁)

词的某一伴随意义如果使用得多了,渐渐为社会接受,就会成为约定的伴随意义。如“爬”常用于“慢慢上升”的伴随意义:“太阳已爬上了地平线”;“日头已爬上树梢”;“皱纹已爬上额头”等等,英语中也有 The sun has already climbed above the horizon 的说法。这种约定的伴随意义经过社会的广泛选择会发展成为词的独立意义。如下列词的伴随意义都已成为固定词义并在词典中反映出来:汉语的“寄生虫”,英语的 parasite,俄语的 паразит,都可指“不劳而获、靠剥削为生的人”,再如英语中 wolf 一词有“好色的男子”的义项,汉语中也有“色狼”一词,它们都是由狼的伴随意义“贪婪”发展而来的。俄语中 лиса, петух 分别由“狡猾”和“好斗”的伴随意义发展为独立义项,指“狡猾的人”和“好斗的人”。

这样的例子很多。实际上它反映了语言中词义发展的一种途径,可大致示意为:

伴随意义的个人用法 社会选择 约定的伴随意义
广泛的社会选择 词义

三、研究伴随意义的文化学意义

语言是文化的一面镜子。透过它可以窥见人类文化的历

史,这正是研究伴随意义的文化学意义之所在。下面我们仅从汉、英、俄语中对“马”、“牛”的伴随意义的不同使用看东西方文化史的差异。

在英、俄语中“马”常被用于伴随意义:

伴随意义	英语	俄语
“健壮”	as strong as a horse	лошадиное здоровье
“力大”	horse-power	лошадиная сила
“温驯肯干”	work like a horse	рабочая лошадь
“能吃”	eat like a horse	

而在汉语中,则常取“牛”的这些伴随意义:壮如牛(“健壮”)、牛劲(“力大”)、老黄牛(“任劳任怨”)、牛一般胃口(“能吃”)。汉语中只取“马”一词“跑得快”和“能骑”的伴随意义,如马上,马到成功,一马当先,快马加鞭;马扎,马桶等。

这反映了“牛”和“马”在东西方文化历史中作用的不同。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曰:“牛,事也,理也”。段玉裁注:“事也者,谓能事其事也,牛任耕。理也者,谓其文理可分析也。”^⑭可见,牛在悠久的中国农业历史中作为主要农耕工具的重要作用。因而食牛肉、饮牛奶不可能成为汉人祖先的习惯,它只能是古代西方游牧民族骑马放牧(牛)以食其肉、取其奶的历史写照。从伴随意义的使用看,“马”在古代西方作为使役工具的作用是很大的,而从汉语中“马”一词常使用的伴随意义看,在中国古代可能多作为骑具和用于战争(如马到成功,一马当先等)。此说可引《说文解字》之释义为证:“马,怒也,武也。”怒,言马字之造形,武则言马之功能。段玉裁注:“释名曰:大司马;马,武也,大总武事也。”^⑮

四、余 论

1. 伴随意义的使用是言语活动中较常见的语言现象。在传统的语言研究中,一部分伴随意义的语用现象归入修辞学,即从修辞方式的角度归纳为某些“辞格”。由于传统语义学的局限,人们不能从意义角度对词的伴随意义作出解释。因此,对它的研究是对语义学的良好补充。

2. 伴随意义研究会使我们更全面和进一步地认识词与客观事物的关系。由于这一关系的联系中介是人,因而通过人脑反映出的这一关系是极其复杂的。科学概念毕竟是科学家们长期研究、高度概括的结果,是中性的,而人是社会的、有感情的动物,中性的科学概念无法取代人的生活概念,这正是语言的特殊性所在。

3. 对伴随意义的研究也可为计算机全面理解自然语言创造条件。伴随意义的使用对机械的计算机而言难以理解,因此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提是对伴随意义的深入研究。

附 注:

- ① 据笔者所知“伴随意义”这一译法最早是廖东平同志于1982年首先采用的。详见雷柯夫著(廖东平译)“模糊限制词和语义限制”,刊《国外语言学》1982. 2。此外,也有人译为“涵意”、“内涵意义”等,但“伴随意义”这一译名作为语言学术语正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 ② 参见 The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xf. Univ. Press, Vol. 1, 1933. 其原文释义为: The signifying in addition; inclusion of something in the meaning of a word besides what is primarily denotes; implication.
- ③ 引自哈特曼等著、黄长著等译《语言与语言学词典》,第75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 ④ 见 Мюллер В. Г. Англ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с. 160, М., 1981.
- ⑤ 原标题为: Hedges and Meaning Criteria, 文章收录于 R. I. MCDavid, Jr., A. R. Dukert 主编 Lexicography in English (1973), 中译文见《国外语言学》1982. 2。

- ⑥ 这方面的讨论可参见拙作“论词的伴随意义”,刊《外语学刊》1989, 2。
- ⑦ 参见 Верецагин Е. М.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М., 1980.
- ⑧ 国内学者中,吴国华同志在这一研究方向的工作引人注目,著述较多。
- ⑨ 同⑥。
- ⑩ 引自杨清主编《简明心理学辞典》,吉林出版社,第327页。
- ⑪ 引自“雷柯夫、菲尔摩教授谈美国语言学问题”刊《国外语言学》1982, 2。
- ⑫ 这里,谓词指可以作句子谓语的任何词(或词的组合),如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见 Hurford J. R. & B. Heasley, Semantics: a coursebook, Camb. Univ. Press, 1983, pp. 46 - 88.
- ⑬ 参考书目同⑫,见该书第88页。
- ⑭ 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50页。
- ⑮ 同⑭,见该书第460页。

参考书目

1. Hurford J. R. & Heasley, B. Semantics: a coursebook. Camb. Univ. Press, 1983.
2. Leech G. Semantics. Penguin Books. 1981.
3. Webster's Third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G. & C. Merriam Co., 1976.
4. Апресян Ю. Д. Лексическая семантика. М., 1974.
5. Новиков Л. А. Семан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82.
6. Мюллер В. Г. Англ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1981.
7. Ожегов С. М.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1975.
8. 《辞源》。商务印书馆, 1980。
9. 《现代汉语词典》,语言所编,北京, 1978。
10. 罗竹风主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1989。

(原载《外语研究》1992年第4期)

论词的文化伴随意义与翻译

王秉钦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一种语言代表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即使同操一种语言的不同国家,由于地理的隔离,也反映着不同的文化。甚至在同一国家里,由于操不同语言,文化也不同,最典型的是印度。印度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国内使用着印地语、马拉西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英语等 15 种语言,1600 多种方言,每一地区的人语言不同,举止不同,习俗不同。例如,在印度北方妇女戴头巾被视为出身体面、有教养、有德行的表示,而在南方则被当成寡妇;又如,在北方妇女摇头表示否定,而在南方则表示肯定。一个国家尚且如此,那么处于不同语系的俄汉两个民族的语言差异则可想而知了。

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波及层面很大,从词汇层、语法层直到语境层无不受文化的制约。因此,就翻译而言,译者须抛弃过去的“语言工具观”(即只考虑语言工具本身)。而应建立“文化语言观”,既考虑语言,又考虑文化。换言之,从研究文化差异入手去研究语言差异。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传达语言载体所承载的全部信息(包括文化信息)。

这里,我们只讨论文化对词汇层的影响,也就是词的文化伴随意义与翻译问题。

1.0 文化“空白”论与文化伴随意义

苏联翻译理论家 Ю. 索罗金等人在论述话语及其民族文化特点时提出一种“空白”(лакуна)理论。所谓“空白”是指原语中存在某种为异族文化接受者所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易于误解的

东西,造成异族文化的空白。他们把这种空白分为四种类型:1)主观型,即反映属于不同语言文化的交际者的民族文化特点的空白;2)交际活动型,即反映交际方面具有不同活动类型的民族文化特点的空白;3)文化空间型,即反映文化背景不相一致的空白;4)话语型,即由于话语作为交际工具而产生的空白。^①翻译家常借助这种“空白”概念描述词的文化伴随意义结构,采取各种补偿手段填补这些空白。既是空白,就标志着存在某种想象世界的空间,为译者提供一个联想的天地,在心理上构成一个“联想链”,去分解文化伴随意义——“民族文化意义——相关(连带)意义——联想意义——象征意义”。不同的词汇可表现为不同的文化伴随意义,翻译时当忠实译出。

1.1 译出相关(连带)意义(относите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有些词常同一定事物相关联,其文化伴随意义则表现为相关事物意义,或连带事物意义。最常见的如 *белый* 一词,常与“冰雪”概念相关联。因此 *белая Олимпиада* 不译“白色的奥运会”,而应译为“冬季奥运会”,*зеленая Олимпиада* 译为“夏季奥运会”。同样,*белый рельс* 不译“白色的航线”,而应译为“北极航线”。又如 *голубой* 一词,常与“水”事物相关。请看下面几句译文:

Голубой городок будет открыт в мае 1966 г.

(Моск. тел. новости, 1965, 15 авг.)

水上活动中心将于 1966 年 5 月对外开放。

句中 *голубой городок* 是指综合性水上运动设施,即“水上小城”之意。

Урожай **голубых плантаций** ... Только с одного пруда Кемеровского рыбопитомника “снято” 16,5 тонны.

(Правда, 1965, 14 окт.)

养鱼池获得丰收……仅克麦罗夫斯克一家养鱼池就“拿下”16.5 吨鱼。

句中 голубые плантации 有人译为“ 蔚蓝色的种植园 ”,这是误译。плантации = пруды ,应译为“ 养鱼池(塘)”。

1.2 译出联想意义 (ассоциационное значение)

众所周知 ,词的意义是多层次的。有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 ,概念意义是词的词典定义 ,而内涵意义对概念意义具有一种补充和延伸的价值。它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造成某种联想气氛 ,产生特定的联想意义 ,呈现出某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和效果。然而这种联想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它是依据两种事物间外部表象(即形似)或内部本质(即神似)的类似点而进行比较的复杂的心理过程。这种联想对某些具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词汇来说 ,尤为明显。因此 ,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文化伴随意义则表现为联想意义。

例如 :Красная , как сафьян , краска залила ее свежее лицо.
(Мирн. , Гулящая)

她那娇嫩的脸上浮起一阵象红花一样鲜艳的红晕。(精制的上等山羊革(红色)→红花)由两事物间颜色相似而构成联想意义。

Круглолицая , с большими серыми глазами , удивленно подковками бровей , с ямочками на аппетитных , румяных щеках , вся она была по-здоровому сильная и крепкая : и ноги , и плечи , и даже голос. (А. Кузнецова , Земной поклон)

圆圆的脸上 ,长着一对灰色的大眼睛和两道惊奇地扬起的月牙眉 ,招人喜爱的红润的双颊上配着一对小小的酒窝。她健壮、结实 ,从头到脚 ,甚至连声音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句中由 подковка (马蹄铁)与“ 月牙(眉)”的形状相似联想而成。但这种联想在汉语是不可能产生的。汉语中要形容女人眉毛 ,往往联想到“ 柳叶眉 ”,而绝不是“ 马蹄铁形眉 ”,这是俄汉民族文化差异的一种表现。

这说明俄语中有些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可能通过两事物间外部

表象(颜色、形状等)相似而构成联想意义。这种联想可称为“形似联想”。

还有一种联想,通过两事物间的内在本质,如性质、特征、功能、情理、意念等相似而构成联想,可称为“神似联想”。

例如:

Но чуть ли еще не тяжелей было, когда на бесконечной пелене снега ярко сияло солнце; так бы и улетел куда-нибудь в эту степь, которая начиналась на другом берегу и расстилалась к югу одной непрерывной **скатертью** тысячи на полторы верст. (Дост., Записки из Мертвого дома)

当阳光照射在一望无际的、白雪皑皑的地上时,往往会更加使人感到心情沉重,人们简直想要向那宛如一条连绵不断的地毯、由对岸一直向南延伸 1500 俄里的大草原飞去。

句中 **скатерть** (桌布)与“地毯”性质功能相似而产生联想意义。

上述俄语词 **сафьян**, **подковка**, **скатерть** 的这种文化伴随意义在汉语中几乎是“空白”。其意义只能通过联想才能再现。

1.3 译出象征意义 (символичное значение)

所谓象征,是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俄汉两种语言中有许多词饱含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象征美好意义。

1.3.1 俄罗斯人的“берёза”与中国人的“竹”

берёза (白桦树)与俄罗斯传统文化有着深远的关系。**берёза** 是北半球种植极广的一种树木。在俄国北部和中部地区到处是一片繁茂的桦树林 (**березник**, **березняк**)。所以俄国人把 **берёза** 称为“国树” (**русское дерево**)。在别尔姆斯克州、奥尔洛夫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有用 **берёза** 命名的“白桦村” (**села березовка**);在乌拉尔山脉有“白桦山” (**березовые горы**);还有被用于人名:

Березкины , Березины , Березовые. . .

然而更重要的是 берёза 的象征意义。例如：

березовый месяц (白桦月) 象征一年的第一个月；

березовый Новый год (白桦新年) 象征用白桦树庆祝新年 , 标志一年的开始 , 这种风俗延续至 14 世纪中叶 , 现改用枞树。

праздник березки (白桦节) 象征庆祝春季农活结束。березовая ветка (白桦枝) 象征在求亲时表示姑娘同意出嫁。

берёза 还表示女性的坚强、忠诚、纯洁、美丽 , 表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例如：

— Ты любишь меня , Даша ?

— О , — она снизу вверх кивнула головой , — люблю до самой березки.

— До какой березки ?

— Разве ты не знаешь , у каждого в конце жизни — холмик и над ним плакучая береза.

(А. Толстой , Сестры)

“ 你爱我吗？达莎？”

“ 啊！”她点点头；“我爱你 , 直到种上那棵白桦树。”(象征 “ 至死不渝 ”)

“ 什么白桦树？”

“ 难道你不知道？每个人死后都要立一座坟 , 在坟上栽上一颗如泣如诉的白桦树。”

那 “ плакучая береза ” 低垂墓旁 , 如诉如泣 , 象征对故人的哀思。

берёза 更是祖国的崇高象征。例如：

Березы , березы России , —

Вы все вместе с нами прошли.

И нету конца вашей силе ,

Идущей от русской земли ! (А. Дементьев , Березы

России)

白桦树啊 ,俄罗斯的白桦树 ,——
你永远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
你有无穷无尽的力量 ,
它来自俄罗斯大地 !

“ 竹 ”却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极深的关系。《 孔子家语 》曰 :
“ 山南之竹 ,不博自直 ,斫而为箭 ,射而达。”即教人正直、坚强。从
正面赋予竹以高尚的道德哲理内涵。中国历代文人赏竹、咏竹、慕
竹之高洁与坚贞 ,成为历久不衰的高雅风格。如郑板桥的咏竹名
句 :“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
西南北风 ”。竹之神韵在翠。修竹挺节 ,高于森霄 ,紧贞疏节 ,清
风拂影 ,普普通通的竹反映了中国人的高尚志趣 ,凝聚了中华民族
仁人志士坚竹、虚心、高达、旷远的文化心理。竹 ,是我们中化民族
性格的象征 !

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文人象俄国人以 берёза 取名一样 ,以竹
取字或号。如魏晋的嵇康、阮籍等世称“ 竹林七贤 ” ;唐代李白、孔
巢父等人号“ 竹溪六逸 ” ;北宋廖正一自号“ 竹坡居士 ” ;南宋诗人
林希逸号“ 竹溪 ” ,明朝名士管辑自号“ 竹木山人 ”等等。

从 берёза 与“ 竹 ”的比较中 ,可以清楚地看出俄汉两民族文化的
异同以及以物明志、以物喻人的象征意义的表达 ,何其相似乃
尔 !

1. 3. 2 俄罗斯人的“ медведь ”与中国人的“ 龙 ”

медведь 是俄国人非常喜爱且崇敬的一种动物。它具有图腾
意义和吉祥的象征 ,常被作为“ 吉祥物 ” ,1977 年前苏联中央电视
台“ 动物世界 ”节目倡议在全国开展征集 1980 年在莫斯科举行的
第 22 届奥运会的“ 吉祥物 ”活动 ,得到数万名观众的积极响应。
结果得票最多者首推 медведь ,共 20 ,000 余张。(其余的 :鹿 8 ,
000 张 ;驼鹿 7 000 张 ;黑貂 2 000 张 ;松鼠 1 000 张.....)《 共青
团真理报 》,1977 年 12 月 20 日)

俄罗斯人喜爱 медведь 还体现在以熊取名上 , 诸如 Михаил , Михаилo , Миша , Мишка , Мишук 等。

谈到象征意义 , Медведь 象征 хозяин(主人)。例如 :在俄罗斯谚语中有这样的说法 :

Хозяин в дому , что медведь в бору.

家中之主犹如林中之熊。

медведь 还象征 жених(未婚夫)。姑娘在梦中梦见熊 ,象征将要出嫁。例如 ,在普希金抒情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塔吉娅娜的梦)中写道 :

Но вдруг сугроб зашевелился ,

И кто ж из-под него явился ?

Большой взъерошенный медведь. . .

突然雪堆微微动了起来 ,

是谁从雪堆下面迈出蹒跚步态 ?

——原来是一只毛蓬蓬的大熊.....

值得一提的是 , медведь 也有“ 蠢笨 ”的一面 ,这是该词的转义 ,并非象征意义。例如 :

Слыхали мы о господине Бельтове : и в чужих краях был , и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х служил ; куда нам , провинциальным медведям ! (Герц. , Кто виноват ?)

我也听到人家谈起别利托夫先生了 ,他去过外国 ,又在大臣手下做过听差 ,象我这种土包子 ,哪里能跟他相比 !

当然 ,除 медведь 之外 ,还有许多词具有象征意义 :如 сова (猫头鹰)在俄国人心目中是智慧的象征 ,而在中国人心中却是不祥之鸟 ,毛利人认为在军事会议期间有猫头鹰从头顶上飞过则预示着“ 胜利 ”。 журавль (鹤)在俄国人心目中是“ 春天 ”的象征 ,而在中国人心中鹤是“ 仙禽 ” ,是“ 长寿 ”的象征。由于两种文化差异 ,两词象征意义之不同而引出一则笑话 :一位中国画家将一幅画有 9 只神态各异的仙鹤图赠给一位 80 高龄的苏联友人。寓意 :祝您长

寿。翻译将题名译成《Журавль》，友人不解。按苏联人习惯，журавль 象征“ весна идет ”，因此闹出了笑话。（应译为《Долголетие》）

说到“龙”，在中国人心中是神圣的象征。据《辞海》中解释，龙在古代传说中是一种有鳞有须能兴云作雨的神异动物。在封建时代用龙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的象征。如龙颜，凤子龙孙。可是在俄国人眼中，龙是又凶恶又丑陋的怪物。《圣经》记载龙是被乔治用梭标杀死的。外国人把打人的警察叫做“龙”。翻译时应注意这种文化的差异。如“亚洲四小龙”应译为“четыре тигра в Азии”，英译为“four tigers”。

2.0 具有文化伴随意义的词汇与翻译

E. 维列夏金和 B. 柯斯多玛罗夫在其专著《语言与文化》中把词的非概念意义之和称为“词衬”（лексический фон），认为有些词除概念之外，还包含着某些其他的意义，其中包括文化伴随意义。而有些词，其概念意义就是文化背景意义，称为“背景词”（Фоновые слова），或称“国情词”（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е слова）。根据我们主编的《俄汉文学翻译词典》（商务印书馆，即出）对数百部名著名译的研究资料，具有鲜明的文化伴随意义的词，主要表现在下列一些词类上：如颜色词、动植物名词、人体器官名词、事物名词、专有名词等等。

2.1 词与颜色及其翻译

词可以反映物质世界的变化，可以反映思想的发展，可以反映时代的进步，同时也可以反映彩色世界的多彩。颜色词在语言科学中已经构成了一个特殊的领域。它们在文学作品中具有极其丰富的表现力。这里我们且举 Л. 托尔斯泰《哈泽·穆拉特》中一段关于“花的世界”——“彩色世界”的描写：

Есть прелестный подбор цветов этого времени года :
красные , белые , розовые , душистые , пушистые кашки ;
молочнобелый , с яркой жёлтой серединой “ любишь-не-

любишь ”, с своей приятной , пряной вонью ; **жёлтая** сурепка с своим медовым запахом ; высокостоящие **лиловые** и **белые** тюльпановидные колокольчики ; ползучие горошки ; **жёлтые** , **красные** , **розовые** скабиозы ; **лиловый** , аккуратный , с чуть **розовым** пухом и чуть слышным приятным запахом подорожник ; **яркосиние** на солнце и **голубые** и **красные** вечером и под старость васильки.

在这个时节 ,野地里开满了千紫万红的花朵 :有绛红的、洁白的、粉红的 ,芳香而毛绒绒的蓝翘摇 ;有乳白色的、花芯黄橙橙的、浓郁袭人的“ 你爱不爱 ”花 ;有气味象 蜜饯一样的黄色的山芥 ;有亭亭玉立的 ,和郁金香一样淡紫的、雪白的铃儿花 ;有匍匐缠绕的豌豆花 ;有黄的、红的、粉红的山萝卜 ;有淡紫的、整洁的、带着红茸和清淡香味的车前草 ;有在阳光下和青春时候是蓝莹莹的 ,而在傍晚和进入暮年时候是蓝色和红色的矢车菊。

这是一段运用颜色词的典型的、绝妙的描写 ,是一段精彩的译文。然而 ,颜色词既表示颜色 ,又不表示颜色。翻译之难 ,恐怕在于“ 颜 ”外之意 ,在于其民族文化意义。

仅以 **красный** 和 **зеленый** 为例 :

Оставьте **красный** мне колпак , Пока его за
прегрешенья не променял Я на шишак. (Пушкин)

请把那红色的尖顶帽留给我 ! 在我因为罪过戴上尖顶盔之前。

这是 1817 年普希金失去自由被流放服军役时写的。诗中“ **красный колпак** ” 是古代小亚细亚弗里基亚人的一种传统头饰 : 高高的 , 帽顶向前弯曲着 , 颜色为红色。后来 , 为获得自由的奴隶所戴。于是这种帽子便成了“ 自由、解放 ” 的代名词。翻译时 , 应作必要的注释 , 或译成“ 自由帽 ” , 类似我国的“ 解放帽 ” 的说法。

不同的民族对颜色的观感是不一样的。对“红色”，俄汉两民族基本一致，翻译时困难不大，认为“红”往往表示“昌盛、幸福、美好、快乐、革命、权力”。可是在英美人眼中，具有类似特点的颜色是绿色和白色（“白宫”代表美国政府），而红色则令他们联想到“危险”和“极端”。故而戴维·霍克斯译的《红楼梦》中把“怡红院”译为“绿色庭院”，将“怡红公子”译为“绿色公子”。更有趣的是，中文中的“红眼病”，译成英文也成了“green-eyed”。

谈到“绿”，俄语中 **зеленый** 却另有其文化色彩。例如：**зеленое золото** 绿色金子（指非洲的天然牧场），**зеленый мост** 绿色桥梁（指蔬菜从生产到供应一条龙），**зеле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绿色潜力（指农作物的生产潜力），**зеленая Европа** 绿色欧洲（指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在农产品销售方面的联合），**зеленая стоянка** 绿色锚地（指旅游船在风景优美地方的停泊点）等。

А потом круто покатылся вниз. Из-за дружбы с **зеленым змием**. (Абрамов)

后来，他忽然摔跌下来，为的是和杯中物结下不解之缘。

俄语中有 **зеленое вино**（伏特加酒）说法，是指用绿葡萄酿造而成。**змий = змей**，是圣经中怂恿夏娃偷吃禁果的蛇魔。“绿色的蛇魔”说明酒的诱惑力，难怪 **до зеленого змия** 译为“酩酊大醉”呢。

又如：

Было у него еще одно развлечение, в которое он втянулся незаметно, мало-помалу, это—по вечерам вынимать из карманов бумажки, добытые практикой, и, случалось, бумажек — **жёлтых и зелёных** ... (Чехов, Ионыч)

他还有一种娱乐，是不知不觉中渐渐上瘾的，那是每天傍晚从口袋里掏出看病赚来的钞票点数。这些钞票有的是黄色的，有的是绿色的……

俄罗斯喜欢用各种颜色表示货币的面额。жёлтая (бумажка) 指 1 卢布票面, зелёная 过去指 3 卢布票面, 现在指 50 卢布。此外, синенькая 指 5 卢布, красненькая 指 10 卢布, червонец 指 25 卢布, крокодил 指 50 卢布, радужная 指 100 卢布等。在黑话中把美钞叫做 зелень (因美钞是绿色的而得名)。中国人没有这种习惯, 有时在报刊上却常看到用钱币的形状指称“钱”的, 如“孔方兄”(因旧时铜钱方形孔而得名)。

2.2 词与形象及翻译

词的形象性是语言内在生命力的表现。每一个词的形象性通常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色彩。而这种文化色彩在每一种语言中都是由具有语言外部性质的各种外在联想关系决定的。这种言外因素可以反映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从一个语篇中, 从一个词的意义色彩上都可以映照出一个民族的历史、生活和文化。比如,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замок 不译“法国锁”, 而译“暗锁”; японский скворец 不译“日本椋鸟”, 而译“绿背椋鸟”。这是以产地命名产品和鸟类, 自然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下面我们列举用动植物名词、专有名词、人体器官名词、事物名词来反映形象性的几个例子:

1. Между прочим, вот не чувствовал я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к этому столичному **льву**. (Кочет., Братья Ершовы)
比方说, 我对那位首都名流就没有好感。
2. Начнешь ему про **огурцы**, а он тебе на **бобах** откликается! (Дост., Честный вор)
你跟他说东, 他却跟你扯西。
3. Ты всегда останешься для него русским **Иваном**, низшим существом, быдлом. (Горбат., О смерти и жизни)

在他眼里, 你永远是俄国蠢货, 下等动物, 干活的

牲畜。

4. Ведь если опомниться , так уж пить будет нельзя :
тогда **зубы** на полку. (Гарш. , Встреча)

要知道如果我觉醒 ;那就没法干杯了 ;到时候只
好喝西北风。

5. О , ради такой девушки можно не только стать
земцем , но даже истаскать , как в **сказке железные
башмаки**.

(Чехов , Дом с мезонином)

哦 ,为了这样的姑娘 ,做个地方自治会的人不仅
值得 ,而且象童话故事里描写的 ,就是踏破铁鞋去找
也甘愿哩。

句中 **железные бешмаки** 来自俄国民间故事《Фнист—ясный
сокол》(雄鹰菲尼斯特)。故事讲述一个人为寻找爱人穿破了用
铁制的靴子。这和我们常说的“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工
夫”几乎同出一辙。

从以上廖廖数例可以充分表明 ,词的形象性具有鲜明的文化
伴随意义 ,是文化翻译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程。

(责任编辑 尚文)

注 释 :

①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Текст и перевод》,1988 ,стр. 76

(原载《外语教学》第 14 卷 , 1993 年第 1 期 ,
原标题为“文化与翻译三论”)

从汉语看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可译性问题

钮菊生

语言国情学最初把无等值物词汇(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ая лексика)^①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因为它们的存在说明文化之间的差异,即语言的民族文化特点。在俄语教学实践中,当这种文化差异被充分揭示之后,就需要对它们进行语言之间的转换,即翻译,以帮助初学这一语言的人能够正确地认识、理解并掌握、运用。不过,这样的词汇既然是无等值物的,翻译起来总是困难的。有人甚至认为:严格地说,无等值物词汇是不可译的。本文试从汉语这一具体的语言出发,对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可译性问题作一次初步的探讨。

一. 汉语与无等值物词汇

每一种语言都各有所长,都有其丰富的词汇以表达本民族文化的特征。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语言之一。从文献上看,汉语已经有六千年的历史,而实际上汉语肯定远在有文献记载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汉语在词汇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单音成义,适应性强,任何新的概念都能用它完满地表达出来。但是,任何一种语言又都不是万能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发展的,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在语言发展史上,民族间的战争、贸易和文化交往等,导致不同文化及其语言之间不断地相互接触和影响,促成语言间词语的相互借用。借词就是丰富语言词汇的重要方法之一。语

言间词语互相借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民族间文化的差异及其在语言中的反映。一个民族的某些表特有事物的词语在另一个民族的语言中没有相应的概念,这样的词汇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等值物词汇。

汉语历史悠久、词汇丰富、表达力强,许多对别的语言来说属于无等值物的词语,被借用到别国的语言之中,并丰富了这些语言。如除 tea(茶,闽南方言 te 的音译)、silk(丝)以外,英语中还有 China-aster(兰菊)、China-rose(月季)、China-berry(石竹)、litchi(荔枝)、China-squash(南瓜)、China-pea(莞豆)、China-bean(豇豆)、ginseng(人参)、China-grass(苎麻)、tung-oil 或 wood-oil(桐油)等。俄语中也有 чай(茶)、шёлк(丝)、гаолян(高粱)、кан(炕)、кули(苦力)、сампа(舢板)、фанзы(房子)、дацзыбао(大字报)、женьшень(人参)等等。但总的来说,被借入别的语言的汉语词汇较之被借入汉语的外语词汇要少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汉语共借入各种外语词汇在一万个以上。

历史上汉语对各外语中无等值物词汇的借用,按其来源和时代主要可分为:

1、先秦两汉时代对源于中亚诸语言的无等值物词汇的借用(公元前 221 年至公元 220 年);

2、魏晋南北朝时代对源于梵语的无等值物词汇的借用(公元 220 年至公元 580 年);

3、唐宋元时代对源于突厥语、蒙古语的无等值物词汇的借用(公元 618 年至公元 1368 年);

4、戊戌政变(1898 年)至辛亥革命(1911 年)时期对源于日语的无等值物词汇的借用;

5、“五·四”运动(1919 年)以后对源于英语的无等值物词汇的借用;

6、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源于俄语的无等值物词汇的借用;

7、对源于南洋诸语言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无等值物词汇的借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无等值物词汇往往从一种语言被借用到另一种语言,一旦被借,便被称为借词。但并不等于说,所有无等值词汇都将成为借词。一种语言之所以需要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汇,虽然是因为没有相应的概念,但主要还是由于被借入的词语对该语言有用处,能丰富自己。我们说的借词,是指已经进入汉语词汇的外语词。因此,借词只是无等值物词汇的一部分,许多无等值物词汇都不会被借,也没有必要借用。如俄语中的 *матрёшка*、*юннат*、*третий семестр* 等。与此同时,也不等于说凡是借词都属于无等值物词汇。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间的接触而产生的文化交融,使得大部分借词的概念及其所表示的事物也会渐渐溶入各自语言的词汇和文化之中。如被借入汉语的坦克、苏打、咖啡、卡片、啤酒、芭蕾舞、马力、篮球、蜜月、闪电战、破产、干部、客观、情报、狮子、葡萄、玻璃、佛、站、塔、电话、电视、五年计划、共青团员、人造卫星等等,一般人已经将它们当作汉语中固有的词汇,而不觉得是外来的了。究其原因,就是这些被借用的外语词已经由最初的无等值物词汇变为概念上相对应的词了。而一些具有强烈民族特色的表示传统特有事物的词语,仍为无等值物词汇,如茶饮、和服、三明治等等。

二. 汉语处理无等值物词汇的一般方法和原则

我们知道,无等值物词汇是指一种语言中的某些词语,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与其概念相同的对应物,它们表示一个民族的特有事物。随着民族间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流,要求人们尽可能地将这种具有民族文化特点的词语及其概念,用别的语言进行贴切的转换。对于无等值物词汇,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不能采用一般词语在语言中相互转换的方法,而必须采取特殊的处理办法。

汉语在处理无等值词汇方面,长期以来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方法,主要有:

1、音译。音译是汉语(乃至其它各种语言)处理无等值物词汇的最简便的方法。其特点是,由汉字表示出来的外语无等值物词汇,汉字已经不表意,只表音。因此,这种方法处理无等值物词汇,一方面简便迅速,另一方面由于语音相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某些异族情调。其不足是,如果没有适当的注释,读者便不知其为何物。如清朝的总理衙门及其洋务机关,最初把英语中的 president(总统)译作“伯里玺天德”,把 ambassador(大使)译为“奄巴萨托”,把 ultimatum(最后通牒)译成“哀的美敦”,等等。然而,也有部分音译的外来词,不仅音相似,义也相近。如 romantic—浪漫、humor—幽默、index—引得、club—俱乐部、vitamin—维他命、DDVP—敌敌畏、платъе—布拉吉、трактор—拖拉机、печь—壁里砌、машина—马神、хлеб—裂耙^②等等。音译外语中的无等值物词汇能取得如此效果,这要归功于汉字的特点。汉字的音、形、义三者有机结合,便能辨其形、明其音、知其义,往往还可以清楚地看出字形同字义、字音同字义之间的某种联系。汉字的这种功用,是许多别的语言所望尘莫及的。

归纳起来,历史上汉语音译外语中的无等值物词汇主要集中在以下这些方面:

- (1) 计量:磅、盎司、加仑、蒲式耳等;
- (2) 货币:镑、先令、便士、马克、卢布等;
- (3) 人名: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海明威、托尔斯泰、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等;
- (4) 地名:伦敦、纽约、莫斯科等;
- (5) 饮食:三明治、热狗、肯德基等;
- (6) 音乐:波尔卡、倍司、华尔兹等;
- (7) 体育:高尔夫、多米诺等;
- (8) 医药:阿司匹林、阿托平、吗啡等;

- (9)化学 :铀、滴滴涕、尼古丁等 ;
- (10)物理 :安倍、瓦特、伏特等 ;
- (11)建材 :士敏土、克罗米、马赛克等 ;
- (12)神祇 :宙斯、阿波罗、维纳斯、雅典娜、所罗门等 ;
- (13)宗教 :菩萨、喇嘛、释迦牟尼、阿门、伊斯兰、阿訇等 ;
- (14)文艺 :模特儿、蒙太奇、拷贝等 ;
- (15)缩称 :纳粹、欧佩克、克格勃等 ;
- (16)其它 :戈壁、哈达、图腾、沙发、法西斯等。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汉语本身的特点,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不喜欢借音,更喜欢用自己的语素来构词。因此,很多音译词后来都被意译词所代替。例如:德律风→电话,士敏土、水门汀→水泥,喀秋莎→火箭炮,裂粑→面包等等。保留下来的音译词主要为专名、术语和一些已约定俗成的词语。

2. 音译加意译。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所借用的外语无等值物,词汇既有音译部分,也有意译部分,音意互补,传神达意。这里有以下几种情况:

(1)外语原词为一个单词,汉语词的表意部分是另加的,且可以省略:香槟(酒)、威士忌(酒)、伏特加(酒)、芭蕾舞(舞)、华尔兹(舞)、吉普(车)、摩托(车)、坦克(车)、雪茄(烟)、扑克(牌)等等。

(2)外语原词为一个单词,汉语词的意译部分是另加的,但不能省略:啤酒、卡车、酒吧、来复枪、加农炮、古兰经等等。

(3)外语原词由两个以上词组成,前面一部分往往是专有名词,音译,后面部分表意,意译。在这种情况下,汉语词的表意部分不再是另加的,前后两部分紧密结合,构成一个固定的偏正词。这类词大多为专业术语,使用范围有限。如:爱克斯光、爱因斯坦方程、哥德巴赫猜想、斯坦尼斯拉夫体系、诺贝尔奖金等等。

(4)音译加偏旁。如:狮子——“犴”表示动物;苜蓿——“艹”表示植物等等。

3、意译。意译是将别的民族语言中的无等值物词汇按照汉语的构词方法和构词成份进行仿造 红军、红场、蜜月、马力、劳动日、共产党、工人阶级、集体农庄、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意译外来词,只能理解其意思,不可只理解其字面意义。这里单个的汉字已不再表意,而是整个词表达一个意思。“红场”并非是说广场的颜色红;“马力”也决不是指马的力气。

意译的外语无等值物词汇一旦进入汉语,读者理解和接受起来都比较自然,尤其是那些已由无等值物词汇变为对应词或背景词的词语,如上面提到的“蜜月”、“马力”、“劳动日”等。因此,有人主张翻译外语中这类词时,应以意译为主。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一些本来是音译的无等值物词语,正逐渐被意译词所代替。如:“青霉素”代替了“盘尼西林”、“双簧管”代替了“欧巴”、“撞锁”代替了“司必灵锁”、“圆舞曲”代替了“华尔兹”、“连衣裙”代替了“布拉吉”等等。

汉语在处理外语中无等值物词汇时一般公认的原则是:

1、一般地说,凡能意译的都应意译,无法意译时再音译;宁可意译产生新词,而不要随意音译。因为意译词往往能说明事物的性质、用途、形状和特色,使人一目了然,便于理解,如“公开性”、“新思维”等。而音译时,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汉字已不再表意,但是,许多人根据自己长期养成的阅读习惯仍会不自觉地每字求意,先入为主,以至望文生义,造成误解或全然不解。如:“淡巴菰”(tobacco)之所以被“烟草”所代替,就是因为“菰”为“茭白”的意思,从字面上“淡巴菰”无法跟“烟草”相联系,人们容易把它理解成一种蔬菜;“巴力门”(parliament)之所以被“国会”所代替,则是由于该词表示资本主义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而音译名却容易被人们将它同什么“门”相联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也与社会进步和国家交往有关系。一般说来,某些表特有事物的外语词汇起初无法意译而不得不音译,是由于这些事物尚属别的民族文化中的特有事物。一旦这类事物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间经济文化

的交流而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作为中华民族载体的汉语便有能力将其贴切地表达出来。所以“麦克风”、“德律风”、“德先生”、“赛先生”被“扩音器”、“电话”、“民主”、“科学”所代替,便是理所当然的了。

2、音译必须符合汉语规范化的原则,严格按照外语原词的读音,根据北京语音进行对译。应力戒用方言译音,如过去上海话把汽水叫“荷兰水”、广州话将冰淇淋叫“雪糕”,还有把出租汽车称为“的士”、将工头叫作“拿摩温”的。在汉字书写方面,音译外来词亦应力求简易统一,尽量避免同一音译词有几种不同的写法。如“呢龙”与“呢隆”、“法兰绒”与“佛兰绒”、“可卡因”和“可加因”、“爱滋病”和“艾滋病”等等,尤其是在翻译人名、地名时,更应慎重。

3、表示外来事物或概念的无等值物词汇一旦变成对应词后,也就是说该词的概念和该词所表示的事物都进入了我国人民的生活,并有了适当的汉语词来表达后,就无需再借用外族的语言成份了。只是在香港,人们仍把球叫“波”(ball),称邮票为“士丹”(stamp),告别时不道再见,而说“拜拜”(bye-bye),还有把现代音响设备叫作“哈飞”(hi-fi,即 high fidelity 的缩略形式,意为收音、录音设备等的高保真度)的等等,不一而足。

当然,上述种种已成为过去,所举例子今天看来大多数已经成为对应词或背景词,作为无等值物词留下来的只有少数。然而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从中可以看出汉语处理、吸收外语中无等值物词汇的某些规律。

三. 关于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可译性问题

对无等值物词汇深入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翻译的问题。尽管前人已经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也有若干规则可依。但是,在关于无等值物词汇是否可译这个问题上,却一直存在着几

种不同的观点。前苏联学者维列夏金(Е. М. Верещагин)和科斯托马罗夫(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认为,严格地说,无等值物词汇是不可译的;巴尔胡达罗夫(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却认为,说无等值物词汇在另一种语言中无等值物,并不意味着不能翻译。而保加利亚学者符拉霍夫(С. Влахов)和弗洛里恩(С. Флорин)则认为,翻译中实际上没有不可译的东西。我们认为,讨论无等值词汇的可译性问题,必须以两种具体语言的对比为前提,同一个词对 A 语言来说可能不可译,但对 B 语言未必也不可译。这里我们以汉语为背景来讨论俄语中无等值物词汇的可译性问题。在深入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先澄清什么是翻译的问题。翻译的标准和目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结论。关于翻译的定义很多,名家之说不一。在我国,古人提出“信、达、雅”,今人则要求“正确、通顺、易懂”;在国外,奈达(Eugene A. Nide)只求读者对译文的反应与原文读者的反应“基本一致”,巴尔胡达罗夫则要求在语言改变的过程中“意义不变”。这些都是所谓的一般翻译原则,无论怎么表达,其核心无非是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即尽可能使译文的效果能与原文一样。

但是,无等值词汇的概念,它们所表示的事物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既不能采用一般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翻译,也无法使译词取得与原词完全相同的效果。如日本人着和服时配穿的一种布制白色短袜(白足袋),对英语来说是无等值物词汇,译成英语时成了 white gloves(白手套),被誉为高度发挥“同等效果法则”的典范,理由是日本人着和服穿白布袜与欧美人穿礼服习惯带白手套一样。《红楼梦》英译本将“怡红院”译为“绿色的庭院”、“怡红公子”也成了“绿色公子”,原因是英汉两个民族对“红”的观感不一样。在操汉语的人看来,“红”往往象征昌盛、幸福和幸运,而在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眼中,具有类似象征意义的却是“绿色”,而红色常使人联想起“危险”、“极端”等。

翻译此种无等值物词汇是否能取得“同等效果”,方法是否可

取,当然值得进一步商榷。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无等值物词汇的翻译确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我们认为,首先应当承认语言是可以互译的,因为人类具有共同的思维,尽管表达方式不尽相同。若以汉语翻译俄语中的无等值物词汇而言,则因汉字是表意文字,具有一字一义的特点,许多在别的语言看来不大容易翻译的词语,汉语却能较好地表达出来。如:гласность—公开性,самовар—茶炊,совхоз—国营农场,верста—俄里,тройка—三驾马车,калач—挂锁形白面包,спутник—卫星等。这几个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汉译例子,虽不能说完全等值地传达了原词的意思,但中国读者已能理解其基本意思了。就是这几个俄语词,在英语中一般却只能音译:гласность—glasnost, самовар—samovar, совхоз—sovkhoz, верста—verstiss, тройка—troika, калач—kalatch, спутник—sputnik。这样简单的音译,操英语的读者从字面上恐怕一下子难以理解的。

实践证明,俄语无等值词汇的汉译基本上是可能的,虽在某些情况下需作特殊处理。俄语无等值物词汇汉译的可能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俄语无等值词汇所指意义的可译性。俄语中无等值词汇的存在,反映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点。因此,翻译俄语无等值词汇的所指意义,是指用一个汉语词来表示相同概念的俄语词,翻译虽有困难,但完全可以克服。在这方面,我们的词典编纂家们作过大量的尝试。在俄汉双语词典中的我们可以查到这样的词条:щи—菜汤,блины—油煎饼,бублик—环形小面包,пирожки—油炸包子,等等。以上几个词所表示的是俄罗斯民族的传统食物,汉语中没有与之概念相对应的词汇,便用功能与其相仿的汉族食物的名称来表示,再加上简略的修饰语说明其特征。“汤”、“煎饼”、“面包”、“包子”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加上前面的修饰语,我们基本上能想象出这些俄罗斯传统食物的大致形状和特色。这样的翻译达

到的效果是：基本相似，但不完全达意。但是，如果用巴尔胡达罗夫的话来说，这样的翻译是“完全允许的，因为这种近似等值物在某种程度上指出了所标志事物或现象的本质”。

2、俄语中无等值词汇民族文化特色的可译性。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民族特色，不仅指词汇本身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指它们与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习俗和心理特点之间的紧密联系。那么，俄语无等值词汇的汉译，究竟能否体现其民族文化特色呢？我们且看下面的译例：водка—伏特加酒，махорка—马合烟，трепак—特列帕克舞，царь—沙皇，обломовщина—奥勃洛莫夫习气，антоновка—安东诺夫苹果。这样的处理方法在翻译术语中被称为“音译加意译”，音译部分跟用来表意的汉字一起构成一个偏正结构的合成词。由于音译部分的存在，其民族特色便跃然纸上，读者不致于将它们当作本民族的事物来理解。为了更好地体现无等值物词汇的民族特点，俄汉双语词典中一般都还采用在括号内加注的方法，如：

сарафан—萨拉凡(俄罗斯民间一种女人穿的无袖长衣)。

квас—克瓦斯(一种用面包和水果发酵制成的清凉饮料)。

аршин—俄尺(旧俄长度单位，等于0.71米)。

Эрмитаж—爱尔米达日(圣彼得堡美术博物馆，一百多年前建立，世界著名的美术博物馆之一，其名称来自法语 ermitage“遁世居所”)。

通过注释，以上几个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民族文化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揭示。

除音译加意译和加注以外，在教学与翻译实践中还有许多可以用来体现无等值物词汇民族文化特色的技巧和方法。如前苏联有的学者专门研究过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翻译问题，巴尔胡达罗夫曾提出过五种具体的处理方法。国内也有人在对俄语无等值物

词汇语言国情价值的揭示和诠释问题进行探索。

需要指出的是,俄语无等值物词汇汉译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指能实现百分之百的等值。我们只是说由于汉字的表意性等特点,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汉译基本上是可能的。然而,翻译毕竟是翻译。

注 释

- ① 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е слова 或 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ая лексика 有时也被译作“不对应词”或“不对应词汇”。
- ② 壁里砌、马神、裂耙三词系我国东北方言。

主要参考书目

1. Верецагин Е. М. ,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 М. , 1973 , 1976 , 1983.
2. Бархударов Л. С. ,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 М. , 1975.
3. Влахов С. , Флорин С. , Непереводимое в переводе , М. , 1980.
- 4、王 力《汉语浅谈》北京,1964年。
- 5、罗常培《语言与文化》北京大学,1953年。
- 6、张永言《词汇学简论》,武昌,1982年。
- 7、高名凯、刘正炎《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北京,1958年。
- 8、刘正炎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1984年。
- 9、严复《天演论·译例言》,1989年。
- 10、尤金·奈达《翻译科学探索》。
- 11、李泰然《翻译——文化的移植》《中国翻译》1988年第2期。
- 12、钮菊生《俄语无等值物词汇的语言国情价值及其诠释方法》《中国俄语教学》1990年第1期。
- 13、包振南《试论可译性的限度》《翻译通讯》1983年第5期。

(责任编辑 吴国华)

(原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3 年第 2 期)

简论俄语成语的文化价值

宋传伟

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中,成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具有重要的使用价值,用得好能使语言生色,文笔增辉。然而,作为一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成语的价值不仅仅囿于此,通过它还能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如俄语成语 *камень за пазухой* 不单表示“居心叵测”,还牵涉到俄罗斯 1604—1610 年间的一段历史,弄清这条成语的来龙去脉,也就同时了解了俄罗斯的这段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讲,成语正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成语不仅仅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还反映文学、民俗等多方面情况。那么,俄语成语的文化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就此作简单论述。

一、成语反映俄罗斯民族的历史

俄语成语数量浩繁,许多成语与俄罗斯民族历史有关。如 *казанская сирота* (喀山弃儿,假装可怜的人); *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ждут* (七人不等一人,不能让多数人等少数人); *мамаево побоище* (一场混战,混乱不堪,乱七八糟)等,都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每条成语能牵出一段历史。如 *мамаево побоище* 的来源是,1380 年 9 月 8 日,蒙古金帐汗国可汗马麦统兵 30 万,莫斯科大公季米特利·伊凡诺维奇统各公国联军 15 万,双方在顿河上游库利科沃平原进行了一场血战,马麦军队惨败。

以上成语是某一史实的记录。有些成语虽不出自史实,亦反映俄罗斯某一时期的社会状况。如 *пьян как сапожник* (烂醉如

泥)即是昔日俄罗斯劳动者悲惨景况的反映。16世纪,俄国城乡手工业生产普遍发展,17世纪便有了第一批手工业工场,但工具简单,操作辛苦。手工业工人多数来自农奴和农民,生活贫困、心情苦闷,常借酒消愁,麻木度日,其中尤以皮鞋匠为甚,因为那时制鞋修鞋最被人瞧不起,困苦的生活和卑微的地位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只有借杯中物来麻醉自己,以求得片刻的忘怀,因此他们不喝则已,喝必大醉。под сукно положить(束诸高阁)则是帝俄官僚腐败的见证。帝俄时代,官僚机关的办公桌都铺饰呢绒,官吏们常将公函、呈文、诉状放在呢绒桌布下,拖着不办,以此要挟、索贿受贿,一些文件成年累月地压在呢绒下面不加处理,甚至被忘得一千二净。试比较汉语“暮虢朝虞”、“会稽之耻”、“三顾茅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二、成语反映俄罗斯民俗

俄语成语宝库珠玑璀璨,丰富多彩,反映俄罗斯民俗的成语俯拾即是,这些成语堪称俄罗斯民俗的化石。现就经济的、社会的、信仰的以及游艺的习俗惯制,分类列出一些相关成语,或略有说明,以观俄罗斯民俗之特点。

1. 有关岁时习俗的成语,如 крещенский мороз(酷寒,耶稣受洗节前后的严寒);не все коту масленица(好景不长,盛筵难再);дорого яичко к христову дню(送红鸡蛋要赶复活节(不要)雨后送伞)等。крещение(洗礼节),масленица(谢肉节);христов день(复活节)均是俄罗斯重要的民间节日。试比较汉语“八月十五过年,还差一个季节”;“腊月三十年皇历,没日子了”。

2. 有关服饰习俗的成语,如 тришкин кафтан(拆东墙补西墙,挖肉补疮);спустя рукава(马马虎虎,粗枝大叶)等。кафтан是旧时俄罗斯男子所穿的腰部束带的一种长外衣,双襟交叠处很宽,袖长可及地。这种衣服在20世纪初以前的俄国流行。俄罗斯

从前穿的衣服 ,袖子很长 ,干活时须把袖子卷起 ,如果放下袖子 ,则意味着不卖劲 ,故 спустя рукава 表示“粗枝大叶 ,马马虎虎”。试比较汉语“穿连裆裤”、“戴高帽”、“长袍短褂”、“癞蛤蟆穿大褂 ,硬充绅士”。

3. 有关饮食习俗的成语 ,如 как на дрожжах (象发酵一般快 ,非常快) ;как об стенку горох (一点不起作用) ;тертый калач (老江湖 ,老奸巨猾的人) ;калачом не заманишь (什么东西也引诱不动) ;как по маслу (非常顺利) ;как сыр в масле кататься (非常富足) ;чепуха на постном масле (鸡毛蒜皮的事) ;снять пенки (坐享其成) ;снимать сливки (取得最好的一份东西) ;за семь верст киселя хлебать (跑七里路去喝一口粥) ;кисельные берега (自由自在的生活) ;седьмая вода на киселе (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мало каши ел (阅历少) ;заварить кашу (惹麻烦) ;как хлеба искать (用尽一切办法寻找) ;есть чужой хлеб (靠别人养活) ;лопасть как кур во щи (陷入意外困境)等。从上述成语不难窥探俄罗斯族的饮食特点 :хлеб 参与构成的成语最多 ,表明这种食品 and 俄罗斯人的关系最密切 ,是他们最重要的食品。同时 ,каша ,кисель ,щи ,масло 等词频频活跃于成语中 ,显示这几种食品亦为俄罗斯人的传统食品。汉民族的饮食习惯有别于俄罗斯族 ,这从汉语的某些固定表达方式即可看出 ,如“老油条”、“大锅饭”、“炒鱿鱼”、“大海里翻了豆腐船 ,汤里来 ,水里去”、“生米煮成熟饭”等。

4. 有关居住习俗的成语 ,如 выносить сор из избы 中的 изба ,是常见于俄罗斯民间的一种木制房子。试比较汉语“青堂瓦舍”、“隔着锅台上炕”、“土阶茅屋”等。

5. 有关交通习俗的成语 ,如 пятое колесо в телеге (多余的人 ,多余的东西) ;садиться не в свои сани (不称职)等。俄罗斯地域广阔平坦 ,冬天漫长 ,сани 是俄罗斯人冬天最常见的代步工具之一。试比较汉语“老牛拖破车”、“坐轿嚎丧”等。

6. 有关婚葬习俗的成语,如 *остаться с носом* (碰一鼻子灰); *от ворот поворот* (吃闭门羹); *носить на руках* (珍爱); *ударить по рукам* (击掌为定); *перемыть косточки* (说是非,讲坏话); *закрыть глаза* (给...送终,给...合上眼睛); *выносить на своих плечах* (独自肩负重担,重任,忍受苦难,不幸)等。*ударить по рукам* 源自俄罗斯时期的婚俗。那时农民、商人阶层为子女定亲时盛行击掌许亲,订婚双方的家长互击手掌,以示同意。*перемыть косточки* 源自古斯拉夫人的丧葬习俗。人死几年后进行第二次安葬,亲人一面用酒、牛奶或香油洗他的遗骨,装入瓶内,一面颂扬他的美德、功绩,但后来发展成含义相反的成语,意为“说...坏话,议论...的是非”。试比较汉语“牵红线”;“月下老人”;“倒插门”;“马革裹尸”;“刨祖坟”;“九泉之下”等。

7. 有关迷信、禁忌等习俗的成语,如 *встать с левой ноги* (心情不佳); *правая рука* (最得力的助手); *не выносить сору из избы* (家丑不外扬); *зубы заговаривать* (东扯西拉;哄骗); *радужное настроение* (高兴的心情,乐观的情绪); *черная кошка пробежала* (有了嫌隙,发生不和); */врет/как сивый мерин* (瞪眼撒谎); *глуп как сивый мерин* (不可救药的蠢人); *лить пули* (撒谎,吹牛,瞎扯); *родиться в сорочке* (生来有福,生来幸运); *чёртова дюжина* (十三)等。从上列成语看出,俄罗斯人尚右忌左,崇拜天上的彩虹;忌讳数字13;对黑猫、灰马无好感。试看汉语“怀鬼胎”;“断香火”;“天堂地狱”;“阎王债”等。

8. 有关宗教习俗的成语,如 *до положения ризы напиться* (酩酊大醉); *святая святых* (神秘的东西); *отзвонить и с колокольни* (敷衍了事); *качать за здоровье, кончить за упокой* (开始得好,结束得糟); *подвести под монастырь* (使陷入困境); *второе пришествие* (基督二次降世,不会有的事); *земля и небо* (天壤之别)等。俄罗斯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对俄语有着深刻的影响,相当数量的俄语成语打上了基督教的烙印。如 *до*

положения ризы напиться 中的 риза 是举行祈祷仪式时神甫等所穿的法衣。有的成语源自基督教礼仪 ,如 начать за здоровье , а кончить за упокой ;有的出自基督教教义 ,如 земля и небо 等。试比较汉语“顶礼膜拜”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当头棒喝” ;“大千世界”等成语 ,都与佛教有关。

《圣经》被基督教尊奉为经典 ,除在宗教色彩的神话和有关古代犹太人的传说故事、法典、宗教教规以及部分史实等方面给人以丰富的知识外《圣经》也是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它对于包括俄语在内的许多民族语言的发展 ,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俄语中的表现之一 ,就是大批俄语成语出自《圣经》 ,如 вавилонское столпотворение (一团混乱) ;беден как иов (穷得象约伯 ,穷得象叫花子) ;алчущие и жаждущие (饥渴的人们 ;渴求(某事)的人们) ;беречь , как зеницу ока (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 ,十分精心地保护) ;египетская тьма (黑暗 ,漆黑) ;изгнать из храма (赶出圣殿 ,赶走不配呆在这里的人) ;благую часть избрать (采取于自己最方便、最有利的办法) ;бросать камень в кого (指责 ,责难) ;масличная ветвь (橄榄枝)等。熟悉这类成语的语源 ,对了解《圣经》这份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大有裨益。

9. 有关游艺习俗的成语 ,如 играть в бирюльки (做无所谓的琐事) ;бить баклуши (游手好闲) ;ход конем (绝招) ;играть в прятки (跟...躲躲闪闪) ;из другой оперы (离题太远)等。试比较汉语“唱白脸” ;“摆龙门阵” ;“马后炮” ;“围棋盘里下象棋 ,不对路数”。

10. 有关职业习俗的成语 ,如 закидывать удочки (摸底 ,试探) ;поймать на удочку (使受骗) ;ловить рыбу в мутной воде (浑水摸鱼) ;без сучка , без задоринки (一帆风顺)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归根到底 ,结果) ;довести до белого каления (把...气得发抖 ,使...火冒三丈)等。试比较汉语“开中药铺” ;“三个臭皮匠 ,合成个诸葛亮” ;“当铺里扔出孩子 ,不当人。”

三、成语反映俄罗斯族的语用心理

一个民族的语用心理往往在含动物的表达方式里表现最明显。看看“尖嘴猴腮”、“狗苟蝇营”、“狼心狗肺”、“龙行虎步”、“抱头鼠窜”、“封豕长蛇”等汉语成语,汉语的语用心理便一目了然。同样,俄语成语这面镜子亦能映照出俄罗斯族的语用心理。为此,我们列举部分含动物的俄语成语,看能从中获取什么样的信息:

устал как лошадь (疲惫至极);старый конь борозды не испортит (老马不会踩坏泥沟;老手不误事);работать как вол (辛勤工作);овечкой смотреть (看样子象绵羊,一副老实相);старый волк (饱经风霜的人,饱经世故的人);волчий аппетит (狼吞虎咽);волчий закон;волк в овечьей шкуре (披羊皮的狼,伪君子);змея подкольная (毒蛇,阴险的人);согреть змею на груди (怜惜蛇一样的恶人);как баран уперся (象公羊那么固执,固执得象头驴);лиса Патрикиевна (狡猾的家伙,诡计多端的人)。不难看出,在俄罗斯人心目中:лошадь, конь→勤劳,坚忍;овца→温顺、唯命是从;змея, лиса, волк→阴险,狡诈,贪婪;баран→迟钝、愚蠢。

四、成语反映俄罗斯的语言文字情况

汉语用“八字没一撇”比喻事情还没有眉目;“一波三折”比喻事情进行中阻碍曲折很多。这两条成语反映了汉字的构成和书写特点。撇是汉字的笔画之一,波是汉字书法中的捺,折是转换笔锋的方向。俄语亦有类似成语,如 от аза до ижицы (从头至尾);сидеть на азах (开始入门);ни аза в глаза (目不识丁);от ижицы аза не различить (一无所知);от а до я (全部);не знать ни а, ни б (一窍不通)。俄语是拼音文字,а, я, б 是现代俄语的字母,аз 是字母 а 的古称,ижицы 是古俄语中最后一个字母

五、成语反映俄罗斯的币制和度量衡制

反映俄罗斯币制的成语,如 нет ни полушки (不名分文);ни на полушку (丝毫没有);гроша медного не стоит (毫无价值);в грош не ставить (毫不尊重);без копейки (分文没有);ни алтына (分文皆无);бить рублем (经济上压榨);рубль в рубль (分文不差)。俄罗斯币制几经变化,最后才确定 рубль 为本位币,копейка 为辅币。полушка,грош,алтын 曾是俄罗斯的货币单位,现已停用。

反映俄罗斯度量衡制的成语如:на вершок от гибели (差一点死掉);от гроша два вершка (矮小的人);семи пядей во лбу (绝顶聪明);видеть на два аршина под землей (明察秋毫)中的 вершок,лядь,аршин 是俄罗斯曾经采用过的长度单位;пуд соли съесть с кем-л. (同...相处甚久,十分了解);не фунт изюму (不是儿戏)中的 пуд,фунт 是俄罗斯采用公斤制以前的重量单位。

汉语成语“半斤八两”、“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汉民族计量制的反映。

六、成语反映俄罗斯文字的基本概貌

之所以说俄语成语能反映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概貌,是基于这样事实:出自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成语在整个俄语成语中占相当高比例。以 Н. М. Шанский 编的《Опыт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ой фразеологии》为例,该词典收录 1400 条成语,源自俄罗斯文学作品的成语逾百条,涵盖三十多位不同时期的俄罗斯作家。

有的成语出自普希金作品,如 без божества, без вдохновения (没有神性的启示,没有灵感);блажен, кто смолоду был молод;блажен, кто вовремя созрел (年轻时就年

轻,该成熟时就成熟的人是幸福的);властитель дум(思想的主宰者);все флаги в гости будут к нам(各国来宾将云集于此)等。出自普希金作品的成语数量远远高出其他作家,这毫不奇怪:作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奠定了近代俄罗斯文学的基础,建立了俄罗斯文学语言的规范,是“一切开端的开端”。(高尔基语)

克雷洛夫是俄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接近人民的生活、思想和语言,并且有心为知识分子和普通老百姓写作的杰出作家,他创造了俄罗斯的寓言。他的寓言广阔地写出了生活的真实,形象地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深刻地揭露了沙皇的暴政和统治阶级的罪恶,因此为人民喜闻乐见。寓言里的不少语句成为人们表达思想的有效方式,如 а васька слушает да ест(猫儿瓦西卡一边听,一边吃;言者谆谆,听者藐藐);а ларчик просто открывался(本来问题极其简单);а воз и ныне там(毫无进展)。

果戈理的作品具有巨大的揭露力量,特别是《钦差大臣》和《死魂灵》两部作品,刻划了外省官吏集团的丑恶面貌,讽刺、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和残暴,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俄罗斯语言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象人们熟知的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кедонский—герой, но зачем же стулья ломат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是个英雄,可你为什么耍摔椅子呢?)легкость в мыслях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ая(轻佻,轻率,不假思索);сама себя высекала(自己讨打,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等成语就出自这两部作品。

还有不少成语出自其他名家的作品,如契诃夫:Волга впадает в каспийское(伏尔加河流入里海,喻众所周知,毫无争议的真理);莱蒙托夫:без руля и без ветрил(无舵无帆;没有明确的方向和目标);格里鲍耶陀夫:блажен кто верует(信者有福);涅克拉索夫:вот приедет барин—барин нас(等老爷来到,老爷判断我们谁是谁非;等上级来排解纠纷);陀思妥耶夫斯基: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ый восторг(官僚习气,官气);列·托尔斯泰:все смешалось в облонских(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高

尔基 на дне(在底层) 等等。如果了解这类成语文学背景 , 也就大致了解了俄罗斯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我们说成语反映了俄罗斯文学的基本概貌。

七、外来成语反映了俄语同其他民族语言的接触情况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 , 俄语通过多种渠道与多种语言接触过 , 从这些语言里吸收了大量成语。俄语中的外来成语数量相当庞大 , 是俄语成语宝库的有机组织成分之一。这些成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语同异族语的接触情况。

从数量上看 , 来自法语的成语独占鳌头 , 如 аппетит приходит во время еды (越吃越想吃 ; 得寸进尺); башня из слоновой кости (象牙之塔); бросить в лицо (直截了当); сыграть злую шутку (愚弄)。其次是拉丁语、德语和英语 , 如 взвесить все за и против (权衡得失); воле-неволей (不得不); всеми правдами и неправдами (千方百计) 来自拉丁语 ; вещь в себе (神秘不可知的事物); вольная птица (自由自在 , 无拘无束的人); голубая мечта (美妙的梦想 ; 无法实现的幻想) 来自德语 ; золотая лихорадка (淘金狂); терять лицо (丢脸); желтая пресса (黄色报刊) 来自英语。俄语中的外来成语主要来自以上几种语言 , 表明历史上俄语同这几种语言曾经有过密切接触。

综上所述 , 不难看出 , 俄语成语中的文化印迹是很明显的 , 可以通过成语的语源分析以及分类研究来考察俄罗斯文化。当然并非每条成语都有它的文化含义 , 但确有不少成语能够反映出俄罗斯文化的面貌及其发展过程 , 因此可以说 , 俄语成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 是研究俄罗斯文化的重要材料 , 虽然不是唯一材料。

参考书目

Словари и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М. , 1982

Опыт 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русской фразеологии М. , 1987

Русские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ы М. , 1990

《俄语成语语源词典》,周纪生主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原载《 外语学刊》1993 年第 2 期)

略论俄汉语成语的文化差异

于延春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已日益引起语言学界的关注。国内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近年来日益活跃,著述日渐增多。

苏联语言学家 В. Гак 指出:“比较是语言研究的基本方法(可能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又说:“对比语言学的任务……,即比较两种或几种语言的语言事实,以便找出其异同之处。”^①

各民族的生活条件,历史情况尽管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的思维毕竟有着共同的特点,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也往往是相通的,因此,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总能找到一些成语意义和文化涵义都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成语。例如:

ловить рыбу в мутной воде	混水摸鱼
как рыба в воде	如鱼得水
идти в огонь и воду	赴汤蹈火
подлить масла в огонь	火上加油
молоко на губах не обсохло	乳臭未干

必须看到,这样的例子虽然还可以举出一些,但是,在俄汉成语中所占比例很小。多数成语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俄汉语成语的文化涵义具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在篇幅有限的一篇文章中是不可能全面加以论述的。本文只从思想观念、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宗教信仰、文化传统等方面对俄汉语成语文化涵义上的差异做一些比较。

一、“数是人类思维发展到一定阶段,为适应社会生产活动的需要,在符号的帮助下产生的”。^②但是,由于古人认识的局限,数

被神秘化了,产生“数的灵物崇拜”。这一点各民族都有普遍性。但是,对于不同的民族来说,被神秘化的数字却是不同的。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七”就是一个被赋予神奇色彩的数字。上帝创世为七天,天体为七个(日、月、金、木、水、火、土),童话里还有喷火的七头蛇形象等等。因此,俄语里产生了一系列同“七”(семь, семеро, седьмой)有关的成语和谚语。例如:

成语:

Семь пятниц на неделе	朝令夕改
Семь пядей во лбу	聪明异常
До седьмого пота (работать)	(干得)满头大汗
на седьмом небе	如登天堂
за семь верст киселя хлебать	跑七里路去吃一点羹——太不值得
за семью замками	在可靠的保护下
седьмая вода на киселе	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谚语:

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ждут.	多数人不能等少数人
Семь раз отмерь, один раз отрежь.	三思而后行
Один с сошкой, а семеро с ложкой.	一人耕田,七人吃饭
Семь бед——один ответ.	多犯少犯反正免不了要负责任

俄国作家和民族志学者 С. Максимов 诙谐地说:“如果把‘七’被赋予神秘意义的情况做个全面的统计,可能是无穷无尽的。”^③对于上述例子稍加分析即可发现,семь, семеро, седьмой 实际上已经不表示具体的数,而是虚指多数。此外,俄罗斯人沿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多德的说法认为,天有七重,最高层为七重天,按迷信说法,七重天就是天堂。一个人能登上七重天,自然幸福无比,如登天堂了,因此产生了成语“на седьмом небе”。

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富有神奇色彩的数字要算“九”了。“‘九’这个数字的象征意义,在我国可以说历时最久,涉及面也最广。”^④九是最大的阳数,象征着天。和俄罗斯人不同,中国人把天分为九层,九重天是天的最高处,因而汉语的成语也和俄语不同,“九霄云外”,而不是“七霄云外”,还有“九天揽月”、“九天九地”等。另外,天诞日为正月初九,天子祭天一年九次。天坛,这个明清两代祭天的场所,其建筑无处不体现着“九”的象征意义。^⑤民间传说中还有“九头鸟”的故事。

中国人以“九”为大数,这也和俄罗斯人不同。刘师培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一书中写道:“凡数指其极者,皆得称之为‘九’。”^⑥《词源》中说:“九:虚指多数。”^⑦因此,汉语中有不少和九有关的成语。如:“九牛一毛”、“九死一生”、“九牛二虎之力”、“九流宾客”等等。

从上面对“七”和“九”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俄语里和“七”有关的成语多,而汉语里和“九”有关的成语多,这并非偶然,这是不同的民族文化所决定的,它们反映出两个民族不同的思想观念。

二、每个民族都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因而不同民族的一些成语的产生便和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山川物产密切相关。例如中国盛产竹。秦汉时期,由于气候比现在温暖,不仅南方,而且黄河以北地区也产竹。汉人的衣食住行便和竹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食者竹笋,庇者竹瓦,爨者竹薪,衣者竹皮,书者竹纸,履者竹鞮,真可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耶!”(苏东坡语)^⑧因此,汉语里有很多同竹子有关的成语。如:胸有成竹,势如破竹,罄竹难书,雨后春笋,立竿见影,管窥蠡测,箭在弦上,节外生枝,倾箱倒篋等。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产竹,就连 бамбук 一词还是从法语借来的,所以俄语中就不可能有同竹子有关的成语。然而,苏联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森林面积占世界森林面积的五分之一。俄罗斯人的生活同森林关系密切,因此,俄语里便产生了一些同森林有关的成语。如:кто в лес, кто по дрова (各行其是), смотреть в лес

(老是想逃,不安心在此地) как в <темном> лесу(完全不了解情况)。我国是森林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因而同森林有关的成语寥寥无几。

三、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风俗习惯。这种文化差异明显地反映在成语上。俄语里形容两个人好得不得了,说 Водой не разольёшь。(水都泼不开,如胶似漆)。这使人联想到俄国农村里用水泼开争斗的公牛的旧习俗。说一个人老是纠缠不休,用 пристал как банный лист。这句成语来源于俄国的蒸汽浴,洗蒸汽浴的时候,人们用白桦树条子轻轻地抽打身子,感到非常舒服、解乏。在抽打时,一些白桦树叶子掉下来贴到人身上。所以用这个成语形容一个人总是缠着不放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如果不了解这种文化背景,就难以深刻理解其中之妙。(работать) спустя рукава(粗枝大叶,马马虎虎(地工作)),这一成语来源于俄罗斯人的衣着习惯。古代俄罗斯人的衣服袖子很长,拖着长袖子干活,自然马马虎虎,要想认真干活,只有 засучив рукава(卷起袖子,鼓起劲来——也是成语)。Встречать с хлебом и солью 表示捧着面包和盐欢迎贵宾的习俗是大家熟知的,汉语里有“箪食壶浆”的成语,说的是古时候老百姓用箪盛了饭,用壶盛了汤来欢迎他们所拥护的军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和斯拉夫人的习俗有类似之处,但又不同,汉语成语“歃血为盟”来源于中国古代一种风俗,诸侯盟誓时,嘴唇涂上牲畜的血,以示诚意。俄罗斯人没有这种习俗,自然不会产生类似的成语。又如“金榜题名”、“烽火连天”、“狼烟四起”、“鸣锣开道”等都反映了中国独特的习俗,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бить в набат(敲警钟),звонить во все колокола(大肆宣扬),смотреть со своей колокольни(用自己狭隘片面的观点看)等则反映了俄罗斯人特有的风俗。

四、著名的语言学家、德国童话的收集者与研究者格林在其名著《论语言的起源》中说过:“我们的语言也就是我们的历史。”^⑨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名人逸闻都靠语言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成

语用最精练的形式概括了历史故实 ,总结了经验教训 ,流传后世。各民族语言的成语反映的多为本民族的历史 ,因而其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例如俄语成语 *мамаево побоище* (浴血大战)反映的是 1380 年俄罗斯军队击溃鞑靼将军马迈(*Мамай*)的激战。Было дело под Полтавой. (这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啊 !)说的是俄军在波尔塔瓦战役中打败瑞典军的胜利。其他成语 ,如 *казанский сирота* (假装可怜的人) ,*потемкинская деревня* (装出的门面)等都是本民族历史的概况。即或俄汉语中有些成语意义相同或相近 ,但所依托的历史故实也是毫不相干的。例如 ,*Пропал , как швед под Полтавой* 反映的是瑞典人入侵俄国 ,在波尔塔瓦遭到惨败 ,狼狈逃走的事实 ,其意义相当于汉语的“一败涂地” ,但文化背景却完全不同。“一败涂地”源出《史记·高祖本纪》 ,意为“一旦失败 ,会使肝脑涂地。”

汉语里反映历史故实、名人轶闻的成语十分丰富 ,而且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 ,是其他语言所不可能有的。例如 ,卧薪尝胆、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四面楚歌、三顾茅芦、乐不思蜀等等。相比之下 ,俄语中这类成语要少得多。

五、宗教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均起重要作用。俄罗斯民族笃信基督教(东正教) ,而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是佛教 ,还有道教。宗教信仰上的这种差异在成语中也有明显的反映。俄语中有不少源于《圣经》或同基督教有关的成语 ,例如 :*вавилонское столпотворение* (混乱不堪 ,喧闹嘈杂) ,*бросать камень* (指责 ,责难) ,*камень преткновения* (绊脚石) ,*неопалимая купина* (永存之物) ,*козел отпущения* (替罪羊) 等等。

汉语里与基督教有关的成语虽然也有 ,但为数甚少。如汉语的成语“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出自《旧约全书·出埃及记》(比较俄语成语 *Око за око , зуб за зуб*)。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 ,汉语里便随之出现了一些来自佛教

或同佛教有关的成语,如“一尘不染”、“不二法门”、“五体投地”、“现身说法”、“回头是岸”、“借花献佛”、“大慈大悲”、“在劫难逃”等等。道教也曾在我国流行过,但其影响远不及佛教。不过汉语里仍然有一些直接或间接来自道家的成语:“灵丹妙药”、“脱胎换骨”、“回光返照”等。

六、古代的希腊曾经有过灿烂的文化,产生过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等伟大作品。古希腊文化对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俄语里有许多成语源于希腊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或直接出自荷马史诗和伊索寓言。例如 ахиллесова пята (致命的弱点)、леркулесовы столбы (顶点,极限)出自希腊神话。гордиев узел (无法解开的结)、дамоклов меч (千钧一发)源出希腊传说。сизифов труд (работа) (徒劳无益的繁重劳动)、между Сциллой и Харибдой (进退维谷)出自荷马史诗。

古希腊文化是近代才传入中国的。因此汉语的成语未曾受到古希腊文化的影响。汉语成语主要来自浩如烟海的中国的经传典籍、寓言故事、神话传说。例如“揠苗助长”、“叶公好龙”、“杞人忧天”、“庖丁解牛”、“自相矛盾”均源于寓言故事。“夸父逐日”、“画龙点睛”、“狼狈为奸”出自神话传说。这些成语充分体现了汉民族独特的古代文化,表现出与俄罗斯文化的巨大差异。

古典文学名著是成语的重要源泉之一。一些名著的诗文语句成为广泛流传的成语。这一点俄语和汉语具有共性。俄汉语的一些成语都来自本民族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如 сидеть у разбитого корыта (落得一场空)出自普希金的作品《渔夫和金鱼的故事》。человек в футляре (套中人)源出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套中人》。медвежья услуга (帮倒忙)源于克雷洛夫的寓言《隐士和熊》。

汉语成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锲而不舍”、“实事求是”、“老骥伏枥”等均源于中国古典名著。

俄汉语中也有来自同一文学作品的成语,但为数甚少。如

“ таскать каштаны из огня ”和“ 火中取栗 ”均借自十七世纪法国作家拉·封登的寓言诗《猴子和猫》。башня из сосновой кости ”和“ 象牙之塔 ”原为十九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批评同时代消极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一句名言 ,后为俄汉语借为成语。

需要说明的是 ,上述分类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 ,实际上不少成语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归为不同的类别。例如 Было дело под Полтавой 因其反映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列为历史背景类中 ,但这句话原为俄国诗人莫尔恰诺夫(П. Молчанов)的诗句 ,因此也可以归纳为文化传统一类。同样 ,汉语里反映历史故实的成语也均出自经传典籍文学名著。

综上所述 ,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面镜子 ,反映文化 ,又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成语是语言的精华 ,是“ 浓缩的文化 ”。通过俄汉语成语文化涵义的比较 ,我们看到俄罗斯文化同汉民族文化的巨大差异 ,从另一方面看 ,正是两个民族文化的不同制约着俄汉语成语的产生及其意义的不同。从这个意义讲 ,只有深入了解俄罗斯文化和汉文化的不同特点才能深刻地理解俄汉语成语的涵义。因此 ,学习俄语必须同时了解俄罗斯民族的文化 ,同时也只有深入了解俄罗斯文化的特点 ,才能更好地掌握俄语。

注 释

① 文治《В. Г. Гак 论对比语言学》载《外语学刊》1991 3。

② 苏金智《数的灵物崇拜》载《语言、社会、文化》440 页 ,语文出版社1991 1。

③ 《Крылатые слова》Москва ,1955 ,стр. 63.

④⑤同②

⑥ 转引自《汉语大字典》一卷 48 页。

⑦ 《词源》合订本 0055。

⑧ 参见向光忠《成语与民族自然环境、文化传统、语言特点的关系》载《中国语文》1979 2。

⑨ 伍铁平《语言和文化》载《语文战线》1983 5。

（原载《中国俄语教学》1992 年第 1 期）

俄罗斯言语文化一瞥

周民权

70年代以来,俄罗斯语言学家对言语文化这门独立学科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从而推动了俄罗斯语言的深层次研究,丰富了俄罗斯语言知识的宝库,为搞好俄语教学与研究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思路。本文拟就俄罗斯言语文化的内涵和部分外在表现形式作一初步的探讨。

—

“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纷繁多样,人们对它的理解亦不尽相同。著名俄罗斯语言学家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在《语言与文化》(1976年)一书中指出:目前,科学论著中对“文化”的定义达200种之多,大到社会主义文化,资产阶级文化,小至糖文化、病毒文化,如此等等,足以说明俄国人对文化的研究是颇有兴趣的。按照大多数俄罗斯学者的观点,对“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制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抑或是指一切精神文化、物质文化以及由二者形成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通常称之为深层文化。狭义的文化仅仅指文学艺术。我们认为这种阐释较为贴切,特别是广义的理解从总体上把握住了文化这一概念的基本特征。

语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作为一种交际工具,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角度讲都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的载体,俄罗斯语言概莫能外,

它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即俄罗斯言语文化(культура речи России)。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言语文化有其特定的内容。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 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教授指出:言语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通常被视为正确的、文理通达的言语,是语言学中一个完整的分支,包括正确的话语和正确的书写,也包括研究和制定各种各样的言语规则。《俄语百科全书》主编 Ф. П. Филин 也认为:所谓俄罗斯言语文化,就是掌握规范的口头和书面标准语,即掌握发音、重音、语法和词的正确使用规则等,同时还要根据言语的目的和内容善于在不同交际条件下使用富有表现力的各种语言手段。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言语的正确性,即说话人或书写者都应遵循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规范,不得各行其是。基于这一立场,语言学家对言语的评价一般采用四个标准:1)正确的和不正确的;2)是否符合俄语表达习惯;3)容许的和不容许的;4)两种形式都容许的。例如,表示“几点钟了”这一意思时,正确的言语应该是“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而不是“Сколько время?”;“否则”这个词的重音容许有两种形式并存,既可说 иначе,也可说 иначе。俄罗斯语言学家、作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为提高言语的正确性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从罗蒙诺索夫的第一部《俄语语法》(1755年)到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1831年),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专著《俄罗斯言语的正确性和纯洁性》(1911年)到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下令编纂的俄语规范词典《从普希金到高尔基》,时至今日,俄罗斯社会各界时时刻刻都在为提高人们的言语文化素质、语感和语言兴趣而奋争。俄罗斯广播电台、电视台和《俄罗斯言语》杂志均以《词语世界》为专题,组织讨论,及时通报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而各个学校则更要求在教学中使用包括正字法在内的正确且又文理通达的口笔语,尽可能消除方言、俗语行话、不必要的某些外来语和公文用语等言语形式的影响,以免使规范的

口笔语蒙上尘芥。因此,广播电视、报刊和学校的语言被视为规范的标准语。

二是言语技能,即不仅遵循标准语规范,而且要善于从几种近似的表达方式中选出意义最为准确、修辞上中立、最富有表现力且又通俗易懂的言语形式,既要考虑到言语的上下文,又要顾及交际各方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社会习俗等语言外因素,使表达较为贴切,便于达到交际目的,比如你想请一位陌生人为你让座时最好说“Вам нетрудно подвинуться?”(劳驾您能否挪动一下?),而不要说“Ну-ка дай место!”(喂,让出座位来!),否则,难以实现自己的意图。在表达“我正在吃东西”这一意思时,准确的说法是“Я ем”,而不能说“Я кушаю”。因为 кушать 这一动词按照习惯表达方法通常是不使用第一人称形式的。

二

如前所述,言语文化这门学科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语言各个层次的客观规范形式以及发展趋向,总结语法学、修辞学和其他语言学学科的研究成果,旨在对语言实践产生重大的影响。但与规范的修辞学不同的是,言语文化学科已波及到那些尚未被列入规范语言体系的言语现象和形式。因为言语交际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涉及到各个方面,言语文化处处有。在交际过程中,只要所使用的言语形式和具体的语境相适,合乎交际准则,即使有悖于语言规范,但只要能达到成功的交际,也是可以成立的。比如俄罗斯一些偏远地区的方言土语俯拾即是,而在一些年轻的好友之间用亲昵而不拘礼节的俗语和行话互相交谈是常有的事,这本身就是一种言语文化,已引起许多语言学家的研究兴趣。

既然语境等语言外因素进入言语文化范畴,那么言语文化这门学科无疑和社会语言学、话语语言学、语用学等学科一样,也把语言单位的交际功能作为研究对象之一。众所周知,交际功能通

常是通过交际单位的功能语义场来实现的,这一语义场一般被称之为言语礼节(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因为任何交际都具有特定的社会意义,都受社会所认可的行为规范所制约,在一定的礼节范围内进行。礼貌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条准绳。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言语活动同样也受这条准绳的约束。说话要得体,举止要文明,这是交际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如何在交际中正确而恰如其分地使用语言,便成了语言学家十分关注的课题。

А. А. Акишина, 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教授经过数年的悉心研究,终于在 80 年代初写出了《俄语言语礼节》一书,其后又几易其稿,四次再版,使之更趋完善。书中对言语礼节的内容范围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它包括称呼、问候、欢迎、相识、邀请、请求、建议、同意、拒绝、同情、安慰、道歉、抱怨、怀疑、表扬、奉承、批评、许诺、祝贺、祝愿、感谢、告别等 20 多个题材,每种题材不仅有简明的理论概述,而且列有丰富多彩的言语表达形式及其使用的场合,层次分明,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堪称俄罗斯言语礼节的代表作,既成为俄语语用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大大丰富了俄罗斯言语文化的宝库,在这两个学科中分别占有重要的位置。

三

既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属于深层文化,那么,它们同社会的发展必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语言无疑具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因此,语言的使用常常带有社会的印记,从而形成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特点,一般说来,社会变革的特点常常体现在新词新义上,因为词汇较之语法、修辞等学科受社会因素制约较大,故而显得十分活跃。社会每前进一步,每每出现新的事物,新词新义便相继出现,这是社会交际的需要,同时也为言语文化不断注入新的内容。而在众多的俄语新词新义中,最能体现深层文化的言语通常表现在那些表示人的身份、职业、职务的词上,首先见

诸于妇女的职业称谓方面。大家知道,在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由于受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妇女一般只从事家务劳动,而不涉足诸如医生、工程师、物理学家、飞行员、主席、将军之类技术性、政治性的职业,所以,表示这些职业和业务的名词在标准语中只有阳性形式而没有阴性形式,它们从词义的角度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类:

1. 所有的军衔,从 генералиссимус 起到 солдат 止,无一例外。

2. 所有的行政、社团方面的职务或职称,如 секретарь、директор、ректор、посол、министр、премьер、президент 等。

3. 所有的科技方面的专家、学衔、学位、职称等,如: академик、доктор、доцент、химик、агроном、педагог 等。

十月革命后,广大俄罗斯妇女走出家门,投身于各行各业的各项工作,但在语言中并没有随之出现某些与她们的职业、职务相对应的阴性名词。因此,在表示她们的职业、职务以及荣誉称号时也应用阳性名词。例如:

1. Моя мать — лауреат Ленинской премии.

2. Эта женщина — наш декан.

3. Я была батрачкой, горничной домашним животным моего мужа, я стала профессором, агрономом, парторгом. (Горький)

如果在某些场合需要强调指出女性这一特征时,往往采用一种新的构词手段,即用 женщина 等词作表示职业、职务名词的同位语,例如: женщина-врач, женщина-инженер, женщина-судья 等。在某些场合还可采用一些语法手段,比如谓语使用阴性形式 (Секретарь вышла ; Директор у нас очень строгая.) 或者给这种表示职业、职务的名词(作同位语) 冠以女性专有名词(作主语), 谓语与主语在性上保持一致 (Лейтенант Петрова получила новое назначение.) 或者定语使用阴性形式,和被说明阳性名词

在意义上保持一致(храбрая капитан ; Пришла вторая врач.) , 但后者带有明显的口语色彩。

另外 ,有些表示职业、职务的阳性名词在口语中往往有与之相对应的 阴性 名词 ,借助于后缀 -ша , -иха 构成 ,例如 : профессорша、докторша、лекторша 等等 ,但在现代俄罗斯标准语中已很少使用 ,因为妇女和男人具有同等的权力、社会地位和作用 ,所以 ,没有必要把这些表人名词的性属严格区分开来。再之 ,这些名词的阴性形式过去通常表示某人的妻子 ,例如 инженерша (工程师的妻子)、профессорша (教授夫人)等等 ,但现在一般也不使用了。如果使用阴性形式 ,用丈夫的职位、职业来称呼女人 ,则不合乎规范 ,带有明显的贬意或讥讽意味 ,修辞上带有轻蔑色彩 ,在交际中是讳莫如深的。

其次 ,还有一些表人阳性名词虽然也有相对应的指称女性的 阴性 形式 ,例如 : писатель — писательница、аспирант — аспирантка、делегат — делегатка 等等 ,但在正式公文语体中一般使用阳性形式指称女人的职业、职务和身份。因为在公文中需要指出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职业特征 ,而其性别则退居次要地位。例如 : Г. Николаева —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азеты》 ; Вера Андреева — опытный лаборант . 如果把上述两例中的表人阳性名词改为与之相对应的阴性形式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ка , лаборантка) ,则不符合公文语体规范 ,从功能修辞学的角度看 ,就犯了修辞性的错误。由此可见 ,言语文化与修辞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不难看出 ,表示职业、职务、职称的阳性名词在使用时往往超出它本身所固有的语法范围 ,具有一定社会文化背景意义 ,若使用不当 ,则与言语文化规范相左 ,比如 ,我们有些学生在上课前问候女教师时常说 “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 товарищ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ница ” ,有不尊重女教师之嫌 ,尽管学生并非有意。规范的形式应该是使用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这一阳性形式。再比如 ,在俄罗斯商店里买东西

时,如果对女售货员以“товарищ продавщица”相称,则会引起对方不满,轻则对你置之不理,重则据理力争,纠正你的话,弄不好会引起争吵,因为女售货员以为你瞧不起她或有意贬低她。所以,应该用阳性名词 продавец。当然还可使用另一种较为流行的说法,称其为 девушка,这是一种表达习惯,即使女售货员是已婚的或是四、五十岁的中老年妇女,也可以这样称呼她,这种称呼形式也反映了俄罗斯妇女的一种言语文化心态:喜欢别人说自己年轻,年龄大一些的尤其如此。这种称呼形式在我们中国就未必适用,因为其中蕴含着国情、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因素。

四

除了表人名词之外,深层文化对俄罗斯语言的制约作用还常常反映在俄罗斯人姓名的称谓方面,这是言语礼节的重要内容之一。由于交际双方的身份、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年龄等情况不尽相同,所以,对不同的交际对象应使用不同的称呼形式。一般说来,称呼有以下七种形式:

1. 对一般的同志可称呼姓,在姓前加 товарищ 一词。例如:

1/ Товарищ Иванова! Вас спрашивают.

2/ Товарищ Гориков! Почему вы не были на собрании?

2. 年青人对年长者、下级对上级、学生对教师要用名和父称,表示礼貌和尊敬。例如:

1/ Серге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приглашаем вас к нам в гости.

2/ 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 вы пойдете сегодня в кино?

3. 长辈对晚辈、亲人之间、朋友、同学和彼此关系较为密切的同志之间一般称呼小名。例如:

1/ Коля, чем ты болел?

2/ Наташа, тебя вызывают в деканат.

4. 官长对士兵、老师对学生常称呼姓。例如:

1/ Петров! Повторите это слово ещё раз.

2/ Михайлов ! Вы сегодня дежурный по кухне.

5. 对不认识的陌生人应根据其相应的性别和年龄分别称之为 девочка、мальчик、девушка、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тётя、дядя、бабушка、дедушка 等等。例如：

1/ Девочка , как мне пройти в центр города ?

2/ Дедушка , садитесь. Вот свободное место.

6. 对不认识的男人常用 товарищ 一词称呼 ,或用该词与表示职业的名词连用 ,但这种形式目前已日趋减少。例如：

1/ Товарищ , скажите , сколько времени на ваших часах ?

2/ Товарищ официант , сколько я вам должен ?

7. 对不认识的男人或女人过去常以 гражданин 和 гражданка 相称 ,现在常常被代之以 мужчина 和 женщина ,似乎有些不拘礼节或不大礼貌 ,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变化给人际关系带来的一点微妙变化吧。试比较：

1/ Гражданка ! Подождите , вы уронили платок.

2/ Мужчина , не нарушайте очереди !

3/ Женщина , здесь перехода нет. Вернитесь обратно.

与上述称呼形式相对应的是 ,对交际另一方用 “ ты ”或是用 “ вы ”相称也往往成为判断言语文化的社会意义的重要标志。通过上述例证可以看出 ,家庭成员之间、亲朋好友和熟人之间以及长辈对晚辈常以 “ ты ”相称 ,在其他情况下则常以 “ вы ”相称 ,这也是俄罗斯言语礼节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总而言之 ,俄罗斯言语文化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 ,不仅包括语言本身的规范 ,而且涉及某些反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言语表达形式 ,我们仅仅探讨了其中部分内容 ,有许多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责任编辑 尚文)

(原载《外语教学》1993 年第 1 期)

浅谈俄语中的言语礼节

李林章

在俄语教学中,言语礼节占居很重要的地位,学习者对言语行为规则认识的重要性,决不亚于对语言规律的理解。

在俄罗斯语言文学发展的新阶段,正在有效地研究言语的表述和话语,言语产生的特点和言语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功能,言语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言语情景的运用和言语习惯,口语交际和非口头交际手段的相互关系等。诸如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辅助语言学、民俗语言学和地域语言学这样一些新的科学都是产生在众多科学的交叉之中。这集中反映出人们的一个根本愿望,即了解语言和使用语言的人,最终了解人的交际本质这个问题。正是从这些问题出发,才需要恰当地研究分析固定交际公式的特殊方式——言语礼节。

到底什么是言语礼节呢?言语礼节跟“礼节”这一概念有关。“礼节”一词,在现代汉语辞典中解释为:表示尊敬、祝贺、哀悼之类的各种惯用形式,如鞠躬、握手、献花圈、献哈达、鸣礼炮等。俄语中 *этикет* (礼节) 一词是来自法语 *etiquette*, 表示涉及待人接物外部行为规则的总和。言语礼节是为礼节服务的。从狭义方面说,言语礼节是交际双方进行交际时,选用适用于交际场合、交际者的社会特征,交际内容所需要的言语行为的社会规则。在正式进行交际之前,人们总是要采用各种方法开始接触,向对方打招呼,有所表示等等。在确立与保持和交际对方的联系时,社会就规定出了行为的礼节形式(包括言语礼节),并要求交际者遵循这些规则。人们从儿时就学会用这些礼节表达问候、告别、道歉、感谢

等意思。对于交际者不遵守或违背这些规则,人们是持否定态度的。而言语礼节的使用则能够创造出交际中的良好气氛,提高集体中人们的情绪,使关系融洽,气氛和谐。因此,我们说社会与礼节(包括言语礼节)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是很大的。言语礼节,主要地就是起着使人们之间建立联系的作用。

分析研究言语礼节,这就必然会涉及到下面一些有关言语礼节的某些理论问题。

一、社会语言学方面的问题

社会语言学研究有关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广泛问题。本文所涉及的仅是跟理解言语礼节有关的几个问题。

首先,涉及交际过程中交际者的社会地位的问题。社会各界人物是按固定的社会地位的特征划分的。社会地位的特征包括:年龄(是小孩,是青年,还是中老年),工作性质所决定的社会归属(是知识分子,是工人,还是农民),文化教育素养(是讲标准语言的有知识的人,还是讲粗俗语言的无知识的人),居住地点(是农村,还是城市)等。例如:年轻人特有的问候 *приветия, салютик* (敬礼)是老一辈人所不用的,甚至是反对用的。中老年人的问候是 *Рад вас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老一辈知识分子用)。俄语问候中 *здорово* 往往出现在男人言语中。妇女的言语更为礼貌,很少有粗鲁的言语。

其次,除了固定的社会地位特征外,在进行不同的交际时,人们还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具有变化的特征,比如可以具有行人、乘客、父母、学生、教师、客人、主人、同事、朋友、顾客、病人等各种身份。在正式交际的场合和非正式的交际场合,也都各有不同的要求。

如果交际双方的身份和年龄相当,那么言语情景就是对称的,如果交际双方的主要特征不同(年龄不等、社会地位不同,例如教师对学生,领导对被领导),那么言语情景就是非对称的。在非对

称的情景中,往往也出现交际双方平齐的现象,似乎对双方都还适合。在这种情况下,讲话时可以用平时所不用的礼节,如从城里到农村来捕鱼和狩猎的知识分子,可以对农民说:“Здорово, хозяин!”,这是他们平时所不用的。因此,言语礼节能够在总体上调节着各种类型交际者的关系。

二、修辞方面的问题

言语礼节在交谈者进行交际的时候,形成一种自然产生的口语,这主要表现在对话形式中。所有这些超语言学特征都使言语礼节接近口语。但是,交谈双方的相互关系,正式的交际和非正式的交际等情况都会影响言语礼节的用语特点。换言之,言语礼节用语的修辞标志是由交际中正式和非正式性质,交际者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的不同的社会归属所决定的。在非正式的交际中,使用不拘谨的谈话用语,可以有大量的省略成分,并往往带有一些语气词,如 Ну, пока! Всего!; Как жизнь?等等。而正式的交际中就要求加强修辞,句法结构要完整等,这表明了对遵守礼节和高度文明礼貌的强调,如 Разрешите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вас; Рад вас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等。例如,对交谈对方的称呼就存在是对陌生人还是对熟人这两种情况。这样就不论在言语礼节方式的选择上,还是对话结构特点上都不尽相同。对陌生人用的是小型对话,对“称呼+实质部分”(信息传递部分、问题请求、通知等),答话或有些寒暄语,如:

— Простите, который час?

— Без двадцати пять.

— Спасибо.

而对熟人,除此之外,还在称呼之后紧接着有相当长的实质部分,甚至扩展成独白。对亲近者的用语是属于不严谨的礼节公式,如:

— Мам, можно я пойду в кино?

— Можно.

俄罗斯人和操俄语的非俄罗斯人在回答对方询问时,属于对情况不了解,拒答的常用典型用语是: Не знаю;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Не скажу (口语),同时,还往往伴有主观表态性的插入语 К сожалению。如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могу сказать; Право (等于 к сожалению), не знаю; Право, не скажу。后一句不常见,尤其对外国人易造成误解,因为平时讲话中的 Не скажу 等于 я не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再如 товарищ 一词在称呼中就具有一定的修辞意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按职业特征的正式称呼必须有 товарищ 这个词。товарищ + 职业名称,得出具有修辞上加强的郑重意味,例如 товарищ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就带有郑重性质。由于习惯,除 профессор 可以单用以外,доцент 和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就必须和 товарищ 连用。профессор 单用不具有贬义,而其它称呼无 товарищ 一词,就会导致修辞上的贬义,产生不适宜的亲昵或粗鲁的意味。而 товарищ 一词不能和标明女性职业的阴性名词连用,不用 товарищ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ница 和 товарищ секретарша 一类称呼。

往往在称呼中不用 товарищ 还表明不满和对庄重场合人物的一种严肃态度,例如 пассажир, ваш билет — 在乘客长时间不出示车票时说。

为了避免交际中的正式性质,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服务行业的工作范围内,广泛使用 девушка 这一称呼,几乎对各种年龄的餐厅女服务员、售货员、女秘书、女理发员都可以用 девушка 这个称呼。例如, Девушка, подстригите меня, пожалуйста。这样称呼在修辞上是弱化了了的。

三、话语的产生和语法特点方面问题

如上所述,言语礼节是在交谈双方直接交际时表现出来的。所以,言语礼节中的上句和由它引出的下句一同构成了对话的整

体,即是一个交际单位。重复言语礼节的现成句型,这并不是语言的机械行动,而是要从已经了解的现成用语中进行复杂的选择,即①选择适于当时交际情况,包括交际双方固定的和交际当时产生的相互关系上的微小差别的用语;②选择讲话人最习惯,最典型和最喜欢的用语,因为这些都与他们的社会差别和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有关;③选择对方最易接受的用语,这和对方的差别特征有关。因此,在对待亲近的或平辈人,不拘礼节的情况下,上句中不仅适用修辞上中性、涵义上无微小差别的用语(До свидания),还可以用意义上有差别的(Прощай—可以说是永别;До вечера, До лета—指出分别后重新相会的时间)和具有修辞色彩的用语(Разрешите отклоняться—修辞上加强意义;Пока, Всего—修辞上减弱意义,适用于对待亲人和平辈人)。

作为对话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下句,是由参加交际的另一方说出,这一方既要考虑到交际情况和交谈对方的差别特征,又要考虑到上句话的涵义和修辞规格来选择用语。当然,修辞上中性的用语可以和修辞上的加强或者减弱用语配合。—Здравствуй! — Здоро́во!; —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Рад вас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修辞上相反的用语是不能配合的,除非双方是有意逗笑。如:Рад вас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ть! — Здоро́во!

当交谈双方以第一人称“я”和第二人称“ты”在“здесь”和“сейчас”相见时,言语礼节的情景就是直接交际情景。构成情景的各组成部分就在言语礼节的语法范围内和用语形式中反映出来。如在“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这类用语中,仅在这一句里明显地表示出讲话者“я”(动词用单数第一人称),对方“ты/вы”(代词—补语)的并存,言语瞬间的真实现在时和客观的现实表态性。

必须注意到固定的交际公式——言语礼节用语的表态性评价特点。这些用语在表面结构上有非现实的标志,如:Я хотел бы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вас!这个句子原则上不同于自由表达:Я хотел

бы отдохнуть. 对后一句可以答: Ну что ж, отдыхайте. 但是对前一句就不能用类似的回答(Ну что ж, благодарите), 因为感谢这一事实是现实的, 所以, 言语礼节的假定式没改变客观的表态性, 但是, 句子被赋予主观表态性的细微差别——在升高了的客气语调中加重了谢意。

在言语礼节这个对话整体内反映出构成对话的所有典型语法规律。这里有大量的不完全句和紧缩句等结构。与自由排列的对话不同的是, 在言语礼节内出现现成的固定公式的模仿和重复过程。言语礼节中结构上的不完整尤其突出, 如: Всего (是来自 Желаю вам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До завтра (是来自 Расстаёмся до завтра 或 Прощаюсь до завтра) 等。言语礼节也和所有对话一样, 拥有大量的语气词: Ну пока! Ах, как я рада тебя видеть!

对话整体往往是疑问句、祈使句以及感叹句, 这些都由语调结构来表示。在言语礼节中可以看到不少情感表态手段, 这些手段都反映出对话者随着情景而出现的情感: 见面时的高兴和惊讶, 要求的执着, 如: Люсь ты!? Вот так встреча! Какими судьбами? Сколько лет, сколько зим! 上述这些都在说明, 俄罗斯语文学家都十分注重言语礼节用语的语法, 特别是句法特点及其组成对话整体的方法。

四、地域语言学方面的问题

言语礼节也是地域语言学问题的组成部分, 因为它和用语的民族特点休戚相关, 并和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礼仪有关。言语礼节与言语习惯也是密切相关的。在非俄罗斯人的言语中出现的错误, 往往正是习惯用语上的错误。虽然在语法结构上正确, 却不能使用的这种句子甚多, 如: 在商店里说: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продавец! Могу я получить хлеб? 再如: 拿起电话筒先讲话的人说: Здесь Келишева. 这里主要是受母语习惯的干扰。在母语影响下, 许多外国人(非俄罗斯人和不以俄语为母语的人)常用

пожалуйста 一词向对方打招呼,如: Пожалуйста, где здесь станция метро?(代替了 простите, извините...),在欧洲各国说 Тост за здоровье!(代替了 За ваше здоровье!),在我国也常听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Ван(代替了 Товарищ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Ван)。此外,在称呼中,俄罗斯人的名字、父称对外国人是一大难点。因此,应当重视言语礼节中的民族特点。

五、非言语的交际手段

使用言语礼节的同时,还伴有补充说明意义的手势、表情、音调。辅助语言学就是研究这样一些非言语的交际手段。它分为代替言语和伴随言语两类。握手的同时可以说出问候语和道别语,也可以用手势代替言语。但是,同一种手势,用在结识和表示感谢时,就必须伴有言语。请看对代替言语手势的描述:《Со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стью, напомнившей мне рослую девочку в грубошёрстном свитере, она подбежала к Евгеше и, нагнувшись, поцеловала её щёку. Удивительно, как мног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одним движением: здесь и благодарить, и просьба извинить, и признание во внезапно вспыхнувшей симпатии и даже какое-то обещание.》(她急速地——我看就象个高个子小姑娘,身着条纹高领绒衫,跑到耶甫格舍跟前,俯下身来吻了吻她的面颊。奇怪的是,怎么能只用这样一个动作就道出了那么许多,这里既有感谢,又有道歉,既有承认突然爆发出来的感情,又有某种许诺)。(А. 克龙《失眠》)

辅助语言学研究语调和手势表情方法是很必要的,特别是从比较的角度出发。

在文艺作品中,作者不断评述着对话者的语调,以此说明那些反映交谈者相互关系的交际语调,如: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 сказал радушно, приветливо, тепло, ласково; холодно, натянуто, напыщенно, сквозь зубы. (亲切地、客气地、热情地、温柔地、冷

淡地、生硬地、傲慢地、含含糊糊地说：“您好。”）《До свидания, Андрей. До свидания, Николай!》—— тепло и тихо говорил Павел, пожимая товарищам руки. (“再见,安德列,再见,尼古拉。”帕维尔握着同志们的手,热情地低声说道。)(М. 高尔基《母亲》)

作者总是尽量从各个角度:社会差别特征、外貌、举止风度来描写书中人物,因此,各种人物的言语礼节各异。

手势,作为表意的非言语方式,可以代替相当复杂的对话。请看对手势(姿势)表达意思的一段描写:《Я буду отвечать ей свободно и, когда с балкона загремит вальс, стану перед ней вот так, слегка склонив голову, и это будет означать: — Позвольте пригласить вас на вальс.》(对她我会对答如流,所以阳台上要响起华尔兹舞曲时,我就站到她面前,微微低首,这就意味着:允许我请您跳华尔兹。)(В. 卡韦林《灯火通明的窗户》)。正因为文学作品注意到一定时期的言语礼节,才使我们有可能对言语发展的历史进行分析。通过分析可以证明,在这一微小的言语单位里也存在着明显的变化:某些东西消失了,而另一些东西出现了。对比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和现代作家的作品,就会看到本质差别。仅以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不再使用那些标明官衔等级的称呼,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综上所述,作为语言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言语礼节,它本身集中着许多重要的交际问题。本文仅是抛砖引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文献资料进行深入的综合性的研究。

(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1989年第2期)

礼貌用语漫谈

薛丽山

礼貌用语最显著的特点是习用性,即都是一定语言社会、语言群体长期形成的习惯说法,它既是语言修辞的结晶,又是社会文化的积淀。礼貌用语体现了语境和社会文化对使用语言的制约和影响,也体现了不同民族对交际方式的要求,对礼貌的重视和理解的各不相同。例如俄语和汉语都有第二人称单数的尊敬说法,但具体使用却不同:俄国人家内部基本上是不能用 *вы* 的,而在说普通话的中国人的习惯中,“您”则广泛应用。俄语中亲朋好友之间一般用 *ты* 相称,强调的是“亲密无间”一面。英语中无“您”这样的称呼,但英国人特别看重礼貌,孩子从小就要学习彬彬有礼的语言。如爸爸领着小儿子星期天洗擦汽车:

——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give me the rag, Tom?

—— Please, daddy.

—— Thanks, darling, you are so kind.

—— Thanks, daddy. It's nothing for me.

说话的口气同俄国人、美国人父子之间全然不同。

同一个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在礼貌用语的使用上也会变化。中国这个古老的礼仪之邦,封建时代繁文缛节极多,言语交往中有各种恭敬的说法。到了五四时代去掉了不少,但还有许多保留了下来。

在交际情景中,交流者身份、性别、年龄、社会关系;时间、场合、话题等因素对语言使用加以制约,因此说话和写文章不仅要做到语法正确,合乎规范,而且还得做到恰当、得体。因此,如何掌握

和正确使用体现日常交际中常用的表示“礼貌”的语句是外语教学中一个重要课题。

在高等学校专业外语与非专业外语的基础阶段的教学大纲里都明确规定了掌握基本交际用语的要求,并开列了详细的“交际意念表”或“功能意念表”,肯定礼貌用语是交际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教学的角度考虑似乎也有必要对礼貌用语作一番探讨。以英、俄语为例,下面具体谈谈礼貌用语的语法修辞特点和民族文化积淀问题。

一、礼貌用语的习用性

广义的礼貌用语,是指言语交际中的一些套式,它们是人际语言行为的先导和前提,用以建立某种人际关系和创造某种交际氛围,因而其使用频率极高。语言群体在无数次的重复使用中,将这些言语手段反复加工,千锤百炼,形成了种种套式。它们是 formula,而不是 formulations,是一些公式化了的习惯说法,这就是礼貌用语的习用性。

这种习用性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交际用语的字面意义已经淡化,重要的是它们所具有的各种交际功能。例如,说英语 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说俄语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不是问你怎么样,祝你健康,而是表示见面时的问候、致意(在汉语是寒暄用语)。Excuse me; Извините, Простите 并不是说有什么“过错”请人原谅,而往往是用于要向对方打听一些事情时引起他的注意(汉语更多用“请问”、“劳驾”,而不是“对不起”)。Good-bye, All the very best; Всего доброго, 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 也不是希望对方获得一切好的东西,而只不过是在分手话别时表示一下良好的祝愿,汉语一般情况下要说“祝你一切顺利”。其次,礼貌用语每次使用时是重复现成的东西,而不是根据逻辑和语法临时组织,这是一些套式化了的言语材料。这一点通过不同语言的礼貌用语的对比看得最为清楚。中国学生学习外语时,如果不去掌握外语中的这些

“套话”，而是把本族语逐词译成外语，就会弄出笑话来。如用 No ! No ! 表示“不用谢”，用 Много спасибо ! 表示“多谢”。请看以下一些用语在不同语言中的对比。

英 语	俄 语	汉 语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	Большое спасибо !	多谢了 !
Not at all ! You are welcome !	Не за что !	不用谢 !
Easy to bring the matter up ! It doesn't matter.	Мне это было не трудно.	小事一桩，不足挂齿 !
So it's you !	Кого я вижу ?	是你呀 !
Could I have your name ?	Простите , с кем я говорю ?	请问您是哪一位 ?
As luck would have it.	Какая (приятная) неожиданность !	(真是)太巧了 !
Fancy meeting you ! Well , I never !	Какая встреча ! Какими судьбами !	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
Good luck ! Neither down nor feather !	Ни пуха , ни пера !	祝满载而归 !

由于礼貌用语具有习用性的特点，便常常直接使用成语手段，这在俄语中表现尤为突出，如 Ни пуха , ни пера ! Большому кораблю большое плавание ! Чем богаты , тем и рады !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 Не поминайте лихом ! Спасибо за хлеб-соль ! Сколько лет , сколько зим ! 等等。

英语中有许多表示委婉、礼貌说法的句套，如表示邀请：May

I have the pleasure of inviting ... ?How would you like to come... ? Would you feel like to ... ?Will you please honor me by coming... ? We'll be pleased if you can come I'd like you to ... 等等,表示请求:Can / May / Could I ... ?Would you be so kind as to ... ? Would you mind ... ?Excuse me , will / would you please ... ? May I trouble you ?Could you possibly ... ?等等。表示询问:Excuse me , do you think I could ... ?How well can you ... ?Would it be convenient for you ... ?Would it be all right if I ... ?I'm sorry , can I ...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 ?等等;表示商议:You could / might What do you think I ought to ... ?Ought (Might) it be a good idea to ... ?Why don't you ... ?What about ... ?I wonder if you could / might If I were you ,I'd 等等。

懂得礼貌用语的习用性,才能真正理解说话人的意愿,而且,只有正确理解原意,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比如对上述英语中表示邀请、请求、询问等的礼貌语句,中国学生往往用“ Yes. ” “ No. ” 或“ Thank you. ” 来回答,结果弄得对方不知所措,或产生误会或闹出笑话来。英美人问一句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cup of coffee ?我们不能当问题来回答,用 Yes , I would. 或 No , I wouldn't. 这样就显得很不得体。也不能按中国人的礼貌习惯“ 谢谢 ” (Thank you) 来表示同意。正确的英语表达方式一般以 yes , please. 表示接受,以 No ,thank you. 表示谢绝。含糊的 Thank you 会使主人纳闷,不知你喝不喝。How would you like to come to my college ?往往表示邀请。这里不能对 how 一词作出回答,正确的答话应该是:Thank you very much ,I'd love to. 或 That's very kind of you ,but I'm afraid I've already promised ... 等等。

俄国人在路上问你 Извините , у вас есть часы ?同样不能回答 Есть 或 Нет ,而应回答 Да , пожалуйста ,给人看看表或告诉人家时间,或 Нет , извините 表示歉意。如果有人说:Вам не трудно подвинуться ?,这也是一种请求,而不是询问。应该在挪

动一下身子的同时回答 Пожалуйста ! 或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 这就是说 , 要结合说话人的题旨和语境把握用语中的深层含义。Понял ? 在特定的场合是一种警告 , 而绝不是问你懂不懂。举出一件要做的事情应该理解为对邀请的婉言谢绝 : —— Сбегаем завтра в кино ? —— Завтра приезжают англичане. 再比如 , 英语陈述句 : I'm very cold in here. 它可能表示请人做事 (如请人关窗) 、表示埋怨、不同意等。

再看下面引自《语用学概论》的两组含有礼貌用语而往往使学生费解的对话 :

I . A : I could eat the whole of the cake !

B : Oh , thanks.

II . A : Could you tell me the time ?

B : Well , the postman has come.

从表面上看 , 对话之间没有什么意思联系 , 但在特定的语境中 , 这种语言的使用是十分有效的、正确的。I . A 话中有一层意思 , 表示对 B 赠送的蛋糕的称赞 , 因此 B 的答话也就顺理成章了。

II . B 话中提供一个信息 , 使 A 从中推断出大约时间来 , 告知你邮递员已来了。

这些交际用语在使用时还往往伴有某种身姿、手势、脸部表情。要教中国学生有效使用这些语言和伴语言手段以及正确理解语言的能力达到特定交际目的是不容易的。然而这些伴语言手段毫无疑问是该民族文化积淀的有机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种习用性 , 有人把这些用语称为二级语符。

二、情景的针对性

人们的直接言语交际是按“你——我——即时——即地”四个要素组成的轴线进行的 , 因而具有极强的情景针对性。英语“Thank you”只适用于答谢赠送、赞扬、问候 , 或答谢别人为自己做事物等场合。一位美国友人邀请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到家便宴

时,这位学者在电话里不停地说 Thank you, 还加上一句 I'll try to come. 使得这位美国朋友十分为难,不知他到底来不来。

又如当别人用了 Thank you 表示感谢之后你可以用 You are welcome 作出反应。但当你赞扬别人,向别人问候而得到对方感谢之后,用 You are welcome 就显得不合适了。有些翻译或导游在接受客人的道谢时,往往用英语说: That's my duty. 这句英语通常只是值班人员的用语,含义是“责任在身,必须完成”,满怀谢意的客人会被这句不领情的话弄得尴尬万分。得体的应答应为: “I'm glad to be of help. It's a pleasure.” Excuse me 与 Sorry 在使用上似乎也有分工。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碰撞了别人,只能用 (I'm) sorry. 向别人打听消息,请求退席、让路,打断别人发言等,只能用 Excuse me. 一位英籍导师对他的中国学生说: Thanks a lot. That's a great help. 学生回答了一个 Never mind. 他想表达的是“没关系”、“不用谢”之类的话。其实, Never mind 常用于对方表示歉意,自己表示不介意的场合。Would you mind 是一个很有礼貌、很得体的表达请求的用语,可是不能将它用于向公共汽车乘务人员买票。因为后者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不能说出这样一句与社会场合不相称的话: Excuse me, would you mind selling me a ticket to the railway station? 说了只能使售票员难堪,而不会使他感到你彬彬有礼。一位中国学生问老师: “不敢当”英语怎么说。没有相对应的英语词语,要看场合: 对方说 Kindly give me your advice 这句请您指教的话,可以回答 I'll be glad to, thank you. 或 I'm honored, but I'm not sure I'm the right person. 对方恭维你 You're one of the top scholars in the field. 可以回答 Not really. It's such a small field. 对方赞扬你的发言 That was a magnificent speech. 可以回答 That's very kind of you to say so. 或者 Thank you.

有些中国学生按照说汉语的习惯用 teacher,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等(有时后面加姓)称呼外籍教师,常常使对方感到可笑甚至不愉快。为了让学生学会正确称呼,有的有经验的俄语教师采用给自

己取俄文名字和父称的办法。俄语中还有个 ты 和 вы 的问题。对于习惯用 вы 说俄语的中国学生来说,见到一个苏联小孩也会用 вы 同他交谈的。俄语有不少习惯的称呼,对我们来说是很难习惯的,如对女营业员,包括 40—50 岁的妇女,都可以称 Девушка; Гражданин 和 Гражданка 是民警等对陌生人的正式称呼。任何礼貌用语都要针对上述四要素,用得准确,用得贴切。但是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如汉语“您好”、“再见”说成英、俄语,就要在一大堆同义词中作出选择。见面寒暄的“您(你)好!”英语的说法有:How do you do? Good morning (afternoon, evening)! How are you! Glad to meet you, Hollo, Hi, How are you getting on? / How are things? / How ya doing? 等等。对一个小孩子当然不能说 How do you do. Mr. Mullins! 第一次同导师见面同样不能说 Hi, Jim, How re things goin? 同一个“再见”,俄语的说法有 До свидания, Пока, До встречи, До завтра, Будь (здоров), Бывай (здоров), Чао, Не поминай лихом... 这种针对性要包括:1. 切合谈话的对象;2. 切合时间和场合;3. 切合交际的任务。这就要弄清楚每种用语的含义和色彩。例如 Прощай 往往带有不再见面或将长时间分手的色彩;Счастливого пути 只有用于即将踏上旅途的对象(对方一般要回答 Счастливо оставаться);До встречи 或 До свидания 更随便一些,而且含有不久即可会面的附加意义。Чао 来自意大利语,一般只用于十分随便的青年朋友之间。夜间分手时要用 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 或 Доброй ночи。友好而随便的告别可以用 Счастливо, 如果当天还有可能见面,可以说 Мы ещё увидимся; Я не прощаюсь (с вами...)。如果是非常随便的伙伴之间则用 Всего! Будь! Бывай! 等不完全形式。如果在正式场合或上级、长者面前就要用 Разрешите (Позвольте) попрощаться (откланяться) 一类说法,如此等等。

在讨论针对性问题的时候,需要特别提到语体问题。不同功

能语体的对立和相应的丰富表达手段体系是英、俄语的共同特色。它的使用体现说话者对所讨论题目的态度,或说明说话者对听话者的社会关系。裘斯(M. Joos)将谈话方式分为五种风格:1)冷淡的或演说性的,如 Participants should remain seated throughout the ceremony(在整个仪式中与会者应该一直坐着);2)慎重或正式的,如 Those taking part should sit during the proceedings(与会者在会议过程中应该坐着);3)请求或商量的,如 Would you please sit during the proceedings(请你在会议过程中坐着,好吗?);4)随便或非正式的,如 Don't get up(坐着别起来);5)亲密的,如 Sit tight(好好坐着)。

英语情态范畴中同义结构是十分复杂的。它的时体形式(主要表现在过去时、过去进行体)和情态助动词的使用使说话人恪守含蓄、礼貌原则。它们的应用和理解主要依靠语境和它们各自表达的不同含义和语用功能。只给情态助动词等定出几条句法和语义规则,还是不能做到正确和合适地使用情态助动词的。这在教学中应该反复强调,给予充分的注意。请看下列句子所反映的不同礼貌等级:

- 1) Can you lend me your book?
- 2) Will you lend me your book?
- 3) Would you mind lending me your book?
- 4) Could you possibly lend me your book?

在这四句中1)、2)句是最常用的,较得体的表示请求方式,1)比2)显得更得体一些;3)、4)句一般用于较正式,特别强调礼节的场合。

再以俄语“请求”为例,不同语体便有不同的说法。中性语体可以用 Прошу, Я просил бы, Мне хотелось бы, 动词命令式 + пожалуйста 等形式来表示。在比较随便的说话口气里,可以直接用动词命令式;为了加强请求的语气,还可以在动词命令式前面加上 Будь другом。可以用比较活泼的 Не + 动词人称形式,也可以

用 Можно я这种典型的口语结构。在正式的语体中,则又是另一些说法,如 Просьба + 动词不定式; Разрешите (Позвольте) + 四格名词(Разрешите книгу...) ;或加各种客套语(Будьте добры, Будьте любезны, Если вам не трудно, Не сочтите за труд, Окажите любезность, Не откажите в любезности, Сделайте (мне) одолжение...), 这些请求便具有文质彬彬的书卷色彩。

三、礼貌用语中的民族文化积淀

语言在社交应酬方面使用的差异反应各民族的文化特点。中国人见面打招呼除了说句“你好!”“你早!”以外,还可以说:“你来了!”“上班去?”“上哪去?”“吃了吗?”还有其他场合的其它说法等等。英美人听到别人根据汉语的这些说法用英语向自己打招呼,他会十分惊讶。中国人初次见面没有什么特别的汉语说法,或者不愿讲很多话,原因可能是东方民族在性格和观念上倾向于含蓄、持重。而操英语人总要说些类似 I'm pleased to meet you 等客套话。英美人告别用语除了“Good-bye”等等之外,多半还要说些表示祝愿的话语,如:I wish you a pleasant journey home; Good luck; The best of luck 等等,或者说一声与对方会面感到愉快等表达评价的话,如:“It's nice meeting you.”,“I'm glad to have met you.”,“It's been a pleasant stay.”等等。俄国人见面除了打招呼外,常问 Как дела? Как самочувствие? 等。汉语“您好”在英语中有 Good morning (afternoon, evening)! 只是说话的时间不同而已。但他们不说 Good noon! 而 Good-night (晚安,明天见,再会)却不是打招呼的话,而是晚间告别时说的话。

英美人 Thank you, Please 用得比汉语广。但让别人先进门或上车。不说 Please, 而说 After you. 请人吃菜,也不说 Please, 而说 Help yourself to...。有人打喷嚏,中国人常开玩笑说,有人想你,说你或骂你。英国人说 God bless you! (上帝保佑你!)

再如 ,俄国人说 Будь здоров ! (祝你健康 !)。俄罗斯人习惯什么事情都要来一番祝贺 :吃饭是 Приятного аппетита ,睡觉是 Приятного сна ,洗澡是 С легким паром ,连儿子得了个五分也要说 С пятеркой тебя。英国人常用 “ Lovely weather , isn't it ? ” 等一类谈论天气的话语和别人搭讪 ,这时听话人只顺着说话人的话 ,说 “ Yes , it's really a fine day , isn't it ? ”。这些都反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用语习惯。

语言不仅有交际功能 ,而且还有储存功能 ,它能将自己民族文化一层层的沉积下来。这种积沉可以用该语言的特有词语来表示。也可以体现为不同的用词习惯 ,不同的选择频率。外国人喜欢听和说恭维的话。俄罗斯人对女性特别是年轻姑娘 ,见面什么都夸 ,从发型到服饰 ,从外貌到才智 ,从显得如何年青到气色、微笑是何等动人 ,从性格到举止、步履……等等 ,中国妇女要是听到这么多称赞 ,会以为你不怀好意 ,以为你爱上她了。一位中国女生听到美籍教师表扬她 Oh , what beautiful handwriting ! 时 ,不好意思脸红起来 ,连忙说 No , no , not at all。外籍教师听她这么一说 ,就耸耸肩膀走开了。这说明听到赞扬时 ,西方人坦然接受 ,中国人感到受之有愧。所有这些对中国人来说是很需要适应一番的 ,它们既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特殊用词习惯 ,也反映了不同的行为习惯。

С легким паром 反映了俄罗斯特色的蒸气浴。俄国人偏爱 приятный 这个词 ,除了“ 旅途愉快 ” (Приятного путешествия) 汉语与俄语相同以外 ,汉语“ 胃口 ”和“ 梦 ”一般要与“ 好 ”搭配。Какая приятная неожиданность ! 汉语的对应词应为“ 真是太巧了 ”。连向别人承认过错、道歉时也用 Неприятно 这个词 ,如 Мне неприятно ! Мне так (очень) неприятно ! Как мне неприятно ! 如按字面译过来 ,中国人一定认为他毫无承认过错的诚意(“ 我很不愉快 ”)。俄国人在礼貌用语中偏爱的词还有 пожалуйста :人家向他道谢 ,他回答 Пожалуйста ;人家请他挪动一下 ,他一边动身子一边还要客气地说 :Пожалуйста。这个词有几

十种含义 ,用于各种场合。还有 простите ,凡是汉语用“ 请问 ”之处 ,俄语都用 простите 或 извините。如果去问路按汉语习惯来上一句 Разрешите спросить ,那就明显是小题大作了。俄语礼貌用语中与“ 健康 ”有联系的说法特别多 :见面寒暄语 Здравствуй (те) , Здорово , Здорово живете (-ешь) , Здравия желаю , Доброго здоровья 等等 ;分手时可以用 Будь (те) здоров (ы) , Бывай (те) здоров (ы) ;喝酒时一定要反复为健康干杯 (За здоровье !) ,你如果对主人的款待表示感谢或称赞时 ,他必定要回答你一句 На здоровье... ;去探望病人时 ,他们有句套话 : Не болейте ! ,表示希望病人早日康复。如果译成中文“ 不要生病 ” ,就成了不允许生病了 ,病人听了会十分生气的。

语言的储存功能还可以使我们从礼貌用语中获得各种有关说话人的信息。例如见面时说 Салют ! Салюттик ! 分手时来一句 Чао ! 的肯定是年轻人 ,年轻学生。不说 Извините ,而说 Виноват 的大致是上了年纪的人 ,见面时用 Мое почтение ,分手时说 Честь имею , Разрешите откланяться 的大都是年龄比较大的知识分子。Доброго здоровьица , Не поминайте лихом 一般出于年纪较大的农村人之口。

俄语礼貌用语的文化积淀还集中表现在直接使用成语、谚语、俗语等 ,反映出民族文化的种种掌故。例如 ,祝人满载而归要说 Ни пуха , ни пера ;祝同学考试顺利也用这句话。对客人表示欢迎时说 Добро пожаловать 或 Хлеб-соль。对要上路的人说 В добрый час ! В добрый путь ! (吉利话 ,祝人家一帆风顺)。向学生介绍新老师时一般要说 Прошу любить и жаловать。祝福谁家蒸蒸日上 ,说 Желаем вам , чтобы ваш дом был полная чаша。迟到或该做的事而没及时做 ,现成的宽慰说法是 Лучше поздно , чем никогда。请人来做客 : Заходите , гостем будете ! 请人进屋 : Милости прошу к нашему шалашу。请客人随使用 : Будьте как дома。有什么招待什么 : Чем богаты , тем и рады。邀请对方坐

下 : В ногах правды нет. 英国人也会用成语表示对别人的不满 , 比如当认为某人的批评不当或意见不得体时 , 可能会说 : “ People who live in glass houses shouldn't cast stones.”

礼貌语言的使用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由于世界文化交流和对比的兴起和发展 , 各种语言都或多或少借鉴了外界模式。比如 , 中国人在发言后不再说类似 : “ 不当之处 , 请批评指正。”而说 : “ 谢谢 , 谢谢大家 ” 就是一例。甚至语言与操同一语言者的性别也存在某种内部联系。如美国妇女运动的影响 , 使社会语言学家开始关注不同性别的语用差异。当今美国妇女在社交应酬、人际关系方面的语言特点表现为 : 1. 惯用反意疑问句 2. 惯用情态动词 3. 多用 so , very , cute , adorable , lovely 以及 charming 等词语 4. 忌讳直率的表达 5. 非常注意对 “ -ing ” 的发音 , 即便是在非正式的交谈中 , 也不省略 “ g ” 的读音 6. 比男人更注意使用规范句子 , 等等。

总之 , 礼貌用语是言语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 是言语交际能力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要正确运用 , 就要密切注意、探讨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的语言习惯、特点以及各种有关语言的社会因素 , 并且调查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吕叔湘先生对于本族语 “ 您们 ” 一词是否用在书面语和口语里持相当认真的态度 , 进行调查(见吕叔湘《语文杂记》61 页)。这个例子也说明尊重社会习惯 , 准确使用礼貌用语的重要性。

礼貌用语是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语符学、语义学、语法学、修辞学竞相研究的一个领域。为了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 有必要对礼貌用语作进一步的、深入的对比研究。

主要参考书目

1.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1988。
2. 何自然《语用学概论》,1988。
3. Munby , J. Communicative Syllabus Design , 1983.
4. Акишина А. А. ,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Русский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 М. , 1986.
- 5)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Русский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М. , 1987.

(原载《外语研究》1991 年第 2 期)

论英语称赞语的交际模式

邹为诚

0.0 英语称赞语(compliment)是一种十分普遍的语言现象。它具有缩短交际者之间的社会距离、维护人际关系的社会功能。在英美文化背景中,交际者不仅要遵守其话语规律,同时,还必须遵守其社会文化规范。在话语规律、社会规范和交际需要这三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下,称赞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交际模式。

1.0 称赞语的基本话语结构是一种“配对性结构”(adjacency pair)(Wardhaugh , 1986)。这种结构的特点是两类语言行为呈共现状态。例如在问答话语结构中,问和答必须共现。称赞语也是由两类语言行为构成:称赞和回答(compliment-response)。如果 A 称赞 B , B 必须作出语言反应(verbal response)。

1.1 从社会行为的角度来看,称赞语又属于一种“支撑性行为”(supportive action)(Pomerantz , 1978)。它类似于“赠礼”、“祝贺”。A、B 之间的赠礼行为必须在双方的共同“支撑”下才能完成。称赞语用赠“美言”于他人的方式,来向交际的对方“赠送”(offer)友谊与善意,因而,被称赞的一方必须按行为规范表示“接受”或“拒绝”。

但是,称赞语的“赠礼”有别于常规的赠礼行为。这种“赠予”是间接的,它通过评价交际中的参照物(referent)来实现。因而,称赞人(complimenter)的语言行为不仅有“赠礼”的性质,而且还有“评价”(assessment)的性质。Pomerantz (1978)指出,称赞语在事实上组合两种社会行为:“支撑性行为”和“评价性行为”(assessment action),所以对称赞语的反应也必须包容对这两种行为

的反应。换言之,被被赞的一方除了要表示“接受/拒绝”的态度外,还必须表示“是/否同意”(agree/disagree)称赞人的评价。例如:

(1) A: Oh, it was just beautiful.

B: Well, thank you. UI, I thought it was quite nice.

(2) A: That's a nice outfit.

B: What? Are you kidding?

如例所示,例(1)中A的语言表面上是对参照物的评价,但由于参照物与B的特殊关系,给予参照物较好的评价,亦等于赠予B一份友谊与善意。B清楚地认识到了这层关系,因而,他用“Thank you”来表示接受A的馈赠,并用“I think it was quite nice”来表达“同意”的态度。可见,其回答模式为“接受+同意”。在例(2)中,B用反问来避免作正面直接的回答。根据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s),B的反问可以解释为对A的否定,因而,B拒绝了A的“赠予”。所以,例(2)的回答模式为“拒绝+否定”。

1.2 对称赞语的回答虽然存在着两种可能的模式,但由于改善人际关系的需要,对这两种模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例(1)的模式,即“接受+同意”,总是得到优先的考虑,而例(2)的“拒绝+否定”模式,则总是竭力避免。这体现了社交中一种“以礼待礼”的“礼貌原则”(polite principles)。在这一原则的作用下,人们喜欢用较为直接的方式来表示“接受+同意”的态度,因而,其话语言外之意清晰度(illocutionary meaning transparency)越高越好。最豁然的语言就是Thank you,它既能表示“接受”,同时又蕴涵着“同意您的评价”的态度。所以在许多交际场合,Thank you常用作合“接受”与“同意”于一身的回答。例如:

(3) A: I appreciate your work very much.

B: Thank you.

反之,当“拒绝+否定”模式不可避免时,其言外之意清晰度越低

越好 ,人们尽量用委婉的语言拒绝和否定对方。例如 :

(4) A : You did a great job cleaning up the house.

B : Well , I guess you havent seen the kids room.

很明显 ,B 的言外之意清晰度不是很高。首先 ,Well ,流露出了模式选择上的犹豫 ;其次 ,在孩子们的房间的话题之下 ,掩盖了“ 拒绝 + 否定 ”的模式。

1.3 我们可以把“ 称赞——回答 ”的配对性结构扩展为下列基本交际模式 :

Adjacency Pair	Compliment	Response
Supportive Action :	Offer	Acceptance Rejection
Assessment Action :	Assessment	Agreement Disagreement

斜体字部分为优先选择。

2.0 上图表示 ,称赞语在交际中受到严格的话语规则的制约。除此以外 ,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 ,上述模式在实现过程中还会受到诸多的文化规则的制约。称赞的一方无论在称赞目标、词汇句型和语义的选择方面 ,都要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被称赞的一方也须根据这些规则 ,对回答模式进行种种修正。

2.1 Cicourel 曾指出 ,在语言交际中 ,交际双方必须有一套共享的文化、经验阐释规则(1969)。换言之 ,双方对同一事物或行为须有相同的观察方式和评价标准。称赞语的交际也是如此 ,它要求双方懂得相同的文化阐释规则和评价标准 ,否则 ,称赞语很难顺利地实现其社交功能。为了保证交际的顺利 ,称赞人在说话前必须对对方的文化规则有个大致准确的估计 ,双方如不具备足够

的共享知识 (shared knowledge) ,称赞语的使用就必须十分谨慎。由于这一因素 ,称赞语更倾向于在熟人之间使用。

2.2 Halliday 指出 ,语义是一种功能型的意义潜势 (function—oriented meaning potential)。一种语言功能可以由无数的语义形式来实现 ,语义的选择过程 ,也就是社会文化的实现过程 (1978)。称赞语选择称赞目标的过程 ,是一种语义选择的过程 ,因而 ,也是对社会文化的体现过程。对称赞目标必须有个取舍 ,而这种选择必须符合社会价值标准 ,对标准的偏离将会极大地影响称赞语的交际效果。例如在通过评价胖瘦来称赞他人时 ,称赞人至少有下列两种语义选择 :

(6) You've lost a lot of weight.

(7) You've put on quite a lot.

对这两种语义的选择必须符合社会规范。在英美社会中 (6) 是可能的选择 ,而 (7) 不是 ,因为发胖常常被西方人看成是体质下降的一种迹象 ,它在价值体系中的地位较低。所以体胖在英美社会中是不宜作为称赞目标的。然而 ,一旦价值体系发生变动 ,称赞目标的选择也将产生相应的变化。例如 ,在中国文化中 ,“ 胖 ” 与 “ 福 ” 的概念经常相倚并存 ,人们常用 “ 发福 ” 这个词语来恭维对方长胖了 ,它在价值体系中的位置较高。所以 ,对于中国人来说 , (7) 可以用作称赞语 ,而 (6) 却不太合适。

对称赞目标的选择也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化主流。“ 个人奋斗 ” 是西方文化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 ,实现自我价值的奋斗在价值体系中居于很高的位置。例如 ,个人的外表 ,相貌 ,打扮 ,特别是服饰与发式是最常见的称赞目标 ,因为它们能体现出交际者的个性与修养水平。

(8) These surely are nice sneakers you're wearing.

(9) The dress looks really nice on you , Deb.

(10) Your hair looks good.

其次 ,个人的技巧与努力也是常见的称赞目标 ,它们能给人留下成

功的印象。

(11) Wow , this is a very good report card. You must be very smart.

(12) That was a fantastic party. (听话者是晚会主持人)

(13) You've lost a hell of a lot of weight. (听话者正在减肥)

个人物品能反映出所有者的经济水平 ,社会地位和美学修养 ,故也是常见的称赞目标。

(14) That's a beautiful necklace.

(15) Hey ! That's a really nice car.

2.3 社会文化因素不仅对语义选择有制约作用 ,对词汇句型的选择也产生出很大的影响。下列几种结构是常见的称赞语句型 ,但它们的使用频率由于受社会文化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差异。

NP + BE / LOOK + ADJ

(16) Charlie , your haircut looks nice.

PRON + BE + ADJ + (NP)

(17) That's a beautiful sweater.

I + LIKE / LOVE + NP

(18) I like this shirt of yours.

其它句型 :

(19) I know I'm talking for a lot of us , probably for all of us who have ever worked with her or for her , when I say that everything she's done in this company during her time here , she has done conscientiously and well. And not only that , she's done it with a charm , patience and tact that are highly unusual in the working world these days...

(Speech at a farewell party , she is present)

根据 Manes 和 Wolfson 的统计 (1981) , 例(16)句型的使用

频率为 53.6% ,例(17)为 14.9% ,例(18)为 16.1% ,而其它各种句型的总和仅为 15.4%。可见 ,在句型的选择上 ,称赞语也有明显的倾向性 ,即以(16)(17)(18)三种句型为主。这种选择体现了社会文化因素对交际者的制约。在(16)(17)的句型中 ,说话者可以大量使用模糊性形容词 ,像 nice , good , beautiful 等等 ,它们表达的都是一种无客观标准的评价。例句(18)的句型强调说话人自身的体验 ,指出交际者双方有着共同的趣味和爱好。这种评价的真实性(sincerity)同样无客观标准检验。上述现象实际上是交际需要和社会规范的妥协产物。根据社会行为规则 ,评价人应保证其语言的真值(truth value) ,然而 ,作为社交手段的称赞语并不要求百分之百的准确性。说他人的服装款式漂亮 ,实际情况并非一定如此。因而 ,出于交际的需要 ,称赞人便倾向于使用那些一时无法检验的模糊性形容词 ,或者突出自身的体验。这不失为一种妥协的良策 ,它既恭维了对方 ,同时又不公然地违反社会规范。

3.0 社会文化因素对回答者也有种种制约作用。尽管社交规范鼓励回答者选择“ 接受 + 同意 ”的模式 ,但在选择此模式时 ,回答者经常要兼顾其它社会规范 ,这就使得“ 接受 + 同意 ”的模式变得更加复杂。

3.1 被称赞人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在表扬面前表现自己。一般来说 ,社会规范鼓励人们遵守“ 谦虚原则 ”(modesty principles)。所以在别人的称赞面前 ,被称赞人不应再拔高称赞的程度 ,这样做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在英美社会中 ,比较恰当的做法是适当降低对方的称赞程度。例如 :

(20) A : I've been given a scholarship to Oxford.

B : That's absolutely blooming fantastic !

A : Thanks , it's quite pleasing.

上例的回答模式实为“ 接受 + 同意 ”的一种变体 :降格(scale-down)”。

有时为了遵守“ 谦虚原则 ” ,回答者把“ 接受 + 同意 ”的模式隐

藏在另一种变体之中。例如下列的 B 用介绍背景的方法来表达“接受 + 同意”的态度。

(21) A: I like your shoes. They are really cute.

B: I got these two years ago in the mall. Everybody was telling me how dumb I was to get clogs in winter, but I did wear them a lot.

还有一种保持谦虚的做法是遵守“实事求是”原则。当被称赞者觉得“有愧”于夸奖时,便采用“参照物转移”(referent shift)的办法,把称赞目标转移到别的事物上去(Downes, 1984)。因此,“接受 + 同意”的模式衍生出另一种变体:“参照物转移”。例如:

(22) A: You are the best pastry cook in town, Vera.

B: It's that Kenwood mixer.

在例(22)里, B 把 A 的称赞转移到另一个参照物(Kenwood mixer)上,从而把自己排除出称赞范围,因而 B 显得既谦虚又诚实。这种做法表面上看似是否定了称赞人的评价,其实不然。这种否定仅仅是否定“评价方向”,并没有否定评价性质,因此,在本质上,被称赞者默认了称赞者的褒义评价,接受了对方的“赠礼”。

3.2 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要求交际者之间不仅有“赠予—接受”的关系,有时,还要求有“赠予—回报”的关系。大多数人在赠予时总期望着得到某种回报。于是,“接受 + 同意”的模式产生出“回赠称赞”(return compliment)的变体。例如:

(23) A: I like your shoes, Sharon.

B: Thanks, Deb. I like yours too.

(24) A: That was a fantastic party.

B: You were the life and soul of it.

在上述两例中, B 都采用了“你夸我,我也夸你”的方式来“回赠”对方的善意。这种策略妥善地处理了对方的称赞,同时,还使交际者之间的团结性(solidarity)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4.0 综上所述,称赞语在话语规则、社会规范和交际需要的作

用下 ,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交际模式。交际中的每一步都受语言、文化和情景的制约。这充分说明 ,语言的应用远非仅仅是语法能力的实现 ,它同时还是社会文化知识的体现。

1. Cicourel. A. V. (1969) Generative Semantics and Structure of Social Interaction , International Days of Sociolinguistics.
2. Downes. W. (1984) Language and Society , Fontana Paperbacks.
3. Halliday , M. A. K. (1987)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
Edward Arnold.
4. Manes , J. & Wolfson , N. (1981) The compliment formula Conventional
Routine , Florian Coulmas (ed) , The Hauge : Mouton Publishers.
5. Pomerantz , A. (1978) Compliment responses , notes on the co-operation
of multiple constraints Studie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 J.
Schenkein (ed) , London : Academic Press.
6. Wardhaugh , R. (1986)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 Basil Black-
well.

(原载《 外国语 》1990 年第 1 期)

英语委婉语的交际功能与构造原则

于海江

1 委婉语是世界各种语言中的普遍现象。

从横向来说,目前语言学家所接触的语言中,都存在一定数量的委婉语;从纵向来说,大概从人类开始知美丑、辨善恶,而用“无花果树叶”遮羞时,委婉语就在交际中有了用武之地。由于语言交际是人类赖以维系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因而人们在交际中通常避免使用引起双方不快从而损害双方关系的语言,而是采取迂回曲折的方法来表达思想、交流信息。因此,委婉语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润滑”交际的重任。“如果没有委婉语,世界的运转会因摩擦而停止,人间将充满仇怨。”(Enright, 1985, P. 113.)

2 委婉语的交际功能

2.1 “避讳”功能

委婉语的产生与语言禁忌有关。语言禁忌起源于人们对语言与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错误认识,即把名和实等同起来。能够引起恐惧的事物,在语言中也不能提及,而只能用委婉语来代替。这样避讳禁忌,消除恐惧便成了委婉语的第一交际功能。

早期的禁忌事物无疑是那些令人敬畏的神祇和妖魔。它们的名字与其实体一样取得了超越自然的力量。神可以用它们的特征来指代(如 the thunderer),或者用活动领域来称呼(如 the rock)。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中,神的名字只出现辅音字母(如 YH-WH)。其发音也不确定,常读作 Lord (Gray, 1939, P. 263)。

这类委婉语的产生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一种语言中的禁忌,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根本不存在。同一种文化的变迁也会引起委婉语的变化。汉文化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根深蒂固,汉语中就有“膝下荒凉”、“断了香火”等委婉语。

委婉语的避讳功能至今仍起作用,某些禁忌观念在人的思想中是不易消除的。在科学昌明的今天,美国人对数字“13”仍避之不急。我们不能说委婉语的这种功能是迷信和消极的,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类基于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心理。对于无法预料,似真似幻的旦夕祸福,人们总是采取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态度。

2.2 “礼貌”功能

委婉语的另一功能是在交际中避免冒昧和非礼。当迫不得已要涉及令人不快的事件时,就要选择委婉的表达法以避免伤害对方的感情。我们可以从利奇的“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中找到这一动机的理论基础。

“礼貌原则”的否定式可以概括为“(其它情况均等)尽力缩小不礼貌的表达;”与此相应还有一条肯定式:“(其它情况均等)尽力扩大礼貌的表达。”(Leech, 1983, P. 81.)

委婉语的作用与“礼貌原则”是一致的。这为委婉语在语言交际的运用提供了依据。如在英语中,老板解雇职员不说 fire,而用 discontinue,贪生怕老的人也喜欢自己被称为 senior citizens 而不是 old men。说话者尽力避免直接提及与身体的某些功能、性、疾病等有关的事情,而采用委婉的表达法,也是出于礼貌。

2.3 “掩饰”功能

人们在交际中使用委婉的另一原因是委婉语具有模糊色彩,有相当大的欺骗性,于是成了政客、奸商骗人的工具。每当政治风云变幻之时,这类委婉语就会异常丰富。美国“水门事件”前后,官方为掩盖这一丑闻创造了大量委婉语。这一阴谋被称为 scenario(计划);窃取情报的人是 plumbers(管子工)。商人唯利是图,拔高产品质量的广告随处可见。美国航运中一等舱为 deluxe,

这样 second-class 就变成 first-class。

在现代社会中,社会问题不断增加。世界范围内的战争、犯罪、吸毒、种族等问题普遍存在。这些问题不解决,这类委婉语就不可能消亡。

3 委婉语的构造原则

3.1 委婉语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新的委婉语不断涌现,旧的逐渐消失。罗逊(Hugh Rawson)指出,委婉语的盛衰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受两大规律支配:格里什姆规律(Gresham's Law of Language)和更替规律(the Law of Succession)。(Rawson, 1981, P. 4.)

格里什姆规律起源于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其中心内容可概括为“份量不足的货币挤走份量足的货币”,纸币会把硬通货挤出流通领域。Rawson 把这一概念引入语言学中,专指词语意义的变化中坏的意义挤走好的意义。如英语中 undertaker 一词,原指“承办某事的人”。后来它有了“承办丧事的人”这个意思,从前的意义就基本不用了。

一个委婉语词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人们就会把它和所指称的禁忌事物联系起来。委婉语受到“传染”,人们又开始避免使用它,寻找新的委婉语词。委婉语不断变化,产生了更替规律。更替规律的结果是,在一些情况下是一连串的词语——更替,如 mad 先后有 crazy, insane, lunatic, 和 mentally deranged 等替换词。另一些情况下是众多的委婉语词表达同一概念。如“死”这一概念在英语和汉语中都有多个委婉语。

3.2 委婉语需要不断更新,那么新的词语是怎样产生的呢?

委婉语的构造方式多种多样,但都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心理规律和语言规律。委婉语大都是从相应的禁忌语产生的,要达到委婉目的,就既要动听,又要便于理解。要动听,就要与原词“相异”;为便于理解,同时又要与原词“相关”。任何一个语言符号都

是音与义的结合。委婉语在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拉开了一段距离,使人们心理容易接受。当然,无论用什么符号来指称事物,音与义之间都不可能有必然的联系,但交际者最终要联想到或推断出其真正所指。这就决定了人们不能随意选用任何一种表达法来表达某个委婉意思,新造的委婉语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原语言符号有一定的联系,为听话者的理解提供线索。这就是委婉语构造的相关原则。

3.3 文字相关

文字相关是书写中的一种委婉表达法。英语中常用简缩形式。在出版物中,常可发现诸如“P—”(piss),“d-d”(damned)的字样。AIDS 和 SOB 等缩写形式也起同样作用。

3.4 语音相关

在口语中,人们常用语音畸变(phonetic distortion)来达到委婉目的。如 damn 常读成 darn,dash;god 读成 gosh 等。读音与原词相似,但不完全相同。

3.5 语义相关

语音相关和文字相关是两种重要的构造原则,但大多数的委婉语遵循着语义相关的原则。本文着重分析同义、反义、上下义、喻义等几种语义关系。

3.5.1 同义相关

当某个词成为禁忌词时,常由其同义词来取代。这两个词虽有相同的字面意义,隐含意义却不同。这样就同时符合了“相关”和“相异”两条原则。

英语在历史上曾大量借用法语和拉丁语词,这使其同义词异常丰富。在涉及禁忌事物时,通常用外来词。因为拉丁词和法语词带有“科学”意味。而土生土长的本族词,却有“不洁、下流”的含义。如 defecate,urine 可在书面上任意出现,而 shit 和 piss 则遭禁。

3.5.2 反义相关

委婉语和禁忌语有时互为反义词。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一对反义词在人的思想中总是密切相关的。许多语义学著作都曾指出,说话者和听话者在语言活动中脑里常出现反义词。反义词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语义场理论和义素分析得到解释。一对反义词总会出现在同一语义场,而且它们的义素必然有重合,如:

$$\text{human} \quad \begin{cases} \text{man} [+ \text{Human} + \text{Adult} + \text{Male}] \\ \text{woman} [+ \text{Human} + \text{Adult} - \text{Male}] \end{cases}$$

反义词能比同义词更好地在委婉语和禁忌语之间拉开距离,从而使委婉语既动听又便于理解。如英语中 a fat chance 实际上指 a slim chance (希望渺茫),而 fine words 也常指 bad words (骂人话)。

3.5.3 上下义相关

更为常用的一种委婉语构造方法是用上义词取代下义词。上义词的外延较大,通常比下义词意义“模糊”。如 growth (生长物)显然要比 cancer 婉转得多。

现代英语中,人们选择的委婉语离开禁忌词越来越远。在对方能够理解的范围内,则选取最为广义的词语。如 it, problem 和 thing 就可用来指双方明白的任何事情。

She has got it. (sexual appeal)

money problem (shortage)

the Watergate thing (scandal)

3.5.4 喻义相关

无论委婉语与禁忌语之间的关系如何间接,甚至有些已无从解释,这种关系总是存在的。当英国人最初用 limb 代替 leg 时,他们的思想中必定将这两种事物的相似之处联系起来。这种联想意义我们称之为喻义。可分为两类:隐喻和借喻。

在隐喻中,喻体和本体之间有某种相似之处,这种相似之处可以是外在的,也可能是内在的。外部相似的暗喻更为常见,如美国吸毒者将可卡因称为 snowball,就是因为这种白色粉末与白雪之

间的外部相似。内部相似是在抽象特征上表现出来的相似性。如“左手”常与“笨拙”联系在一起,因而常用来指代“恶运”。中国古代官员降职叫“左迁”,英语中不诚实的恭维话被称为 lefthanded compliment。

借喻也就是换称,它与上下义相关的共同之处在于,委婉的新名比旧称外延更大。如英语的 bust 一词在 1691 年出现在英语中时,意思是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body。到 1819 年时,诗人拜伦在《唐璜》中用它来指 breasts。当代美国又用 chest 取代了 bust。

3.6 以上分析的只是几种典型的相关。有些委婉语词的理据 (motivation) 十分复杂,有的则早已丧失,无从查考了。

4 结论

以往对委婉语的研究往往局限于例举委婉语应用领域和实例。本文则尝试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委婉语的交际功能和构造原则。文中明确提出了委婉语的两项交际功能及“相关”和“相异”两条构造原则。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委婉语与禁忌语之间的多重关系。这对语言研究和语言运用都是有价值的。

参考书目

1. Condon , John C. Jr. Semantics and Communication. New York : Macmillan Publishing C. , 1985
2. Enright , D , J. (Ed.) Fair of Speech — The Uses of Euphemism.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
3. Estrin , Herman A. and Donald V. Mehus (ed.). The American Language in the 1970s. San Francisco : Boyd & Fraser publishing Company , 1974.
4. Farb , Peter. Word Play. New York : Bantam Books , 1975.
5. Lado , Robert.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nn Arbor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60.
6. Lee , Irving J. Language Habits in Human Affairs. New York and Lon-

don :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 1941.

7. Leech , Geoffrey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 Longman Group Ltd. , 1983.

8. Mencken , H. L. The American Language. New York : Alfred A. Knopf , Inc. , 1962.

(原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2 年第 6 期)

PHATIC COMMUNION 四题

朱 永 生

一. 术语的产生与含义

说到 phatic communion, 自然会想到 B. Malinowski (1884—1942)。20 世纪 20 年代初, 这位举世闻名的社会人类学家, 为了研究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社会变迁和文化习俗, 不远万里, 飘洋过海, 来到那群小岛上, 一住就是两年。他和当地的居民睡一样的帐篷, 吃一样的饭菜, 真说得上打成一片。

这位英籍波兰人通过实地调查发现,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 并不总是为了提供和获取某种信息, 有些交际只以建立和保持社会接触为目的。他(1923)在一篇题为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的论文中, 把这类交际统称为 phatic communion。这个术语很快被语言学界所接受, 这类交际也已经成为语言学, 尤其是社会语言学, 功能语言学和话语分析所要研究的一个内容。

严格地说, phatic communion 是包括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两个方面的。人们在进行社会接触时, 不一定都要借助语言这一手段。有时候, 点头、微笑、握手、拥抱也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然而, 对于语言学家们来说, 应该注重的是语言交际。

国内一般都把 phatic communion 译为“寒暄语”或“应酬语”。应该指出, 这里的“语”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语言, 而不是指与建立和保持社会接触有关的身势语。

二、应酬语在会话中的分布

应酬语是为了与他人应酬的。很自然, 它经常出现在会话而不是独白中。

人们见面交谈时,开门见山,直指正题的固然有之,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更为常见的是先说一两句闲话再转入正题。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会话者往往把应酬语安排在会话的开头,如(1)中的 hello Mrs Black, how're you 和 well thank you:

(1) Server: Hello Mrs Black, how're you?

Customer: Well thank you, can I have uh better have five... twenty cent stamps please.

S: Twenties. (S gets the stamps)

S: That's one dollar.

(S hands the stamps to C)

(C hands a dollar note to S)

S: Thanks very much.

C: Thank you. (Ventola 1987: 83)

应酬语也可以出现在会话的中途。这时,它的作用主要在于引起对方的注意,保证会话渠道的畅通。会话双方不见面时(如打电话),一方可能会说出 Are you listening? 这样的话,其目的并不是问对方在不在听,而仅仅是想表明“我”下面还有话要讲。会话双方面对面时,一方也可能说出某种话,以使对方注意。(2)中有 well, hear dear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 Did you hear about what happened me in Ardboe? Well, hear dear, you niver seen anythin like it. There was that big of a crowd. They were shovin and pushin lik, all that, an when I got to the edge of the crowd, divil the know I knowed where I was. It was that dark! It was pitch! An there was a line o buses no miss all down the road. Says I to myself, says I: I'll just walk past them buses till I come till our own (O'Donnell & Todd 1980: 116).

应酬语还经常出现在一段对话的结尾,或是告辞,或是道谢,或是祝愿。请看下例中的最后几句:

(3) ...

Mr. Angelo : By the way , Mr. Todd , do you need anything from the store ? We'd be glad to get anything you need while we're shopping.

Mr. Todd : No , thanks , but I appreciate the offer . And thanks again for coming over .

Mr. Todd : It's a pleasure , sir . Have a good day . (Progressive Reading Series , Book I 52)

有时候 , 整个对话都由应酬语组成。两个人见了面 , 匆匆寒暄几句便又分手 , 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遍现象。最短的对话大概莫过于

(4) A : Hi !

B : Hi !

有些对话比(4)长得多 , 但说来说去都是相互应酬的话。Leech 和 Short (1981) 引用过下面这样的例子 :

(5) Well ! ' the young man said.

Well ! she said.

Well , here we are , he said.

Here we are , she said. Arent we ?'

I should say we were , he said. Eeyop. Here we are.

Well ! she said.

Well ! he said. Well. How does it feel to be an old married lady ? (Dorothy Parker : Here We Are)

这里的会话者是一对新婚夫妇。他们俩在一起 , 感到局促不安。为了打破沉默 , 只好没话找话说。这样的对话通篇没有信息传递可言 , 有的只是应酬性的话语。

无独有偶。英国剧作家 H. Pinter 的长剧 The Birthday Party 中也有一段全部由应酬语构成的对话 :

(6) Meg : Here's your cornflakes. Are they nice ?

Petey : Very nice.

Meg : I thought they'd be nice. (She sits at the table.) You
got your paper ?

Petey : Yes.

Meg : Is it good ?

Petey : Not bad.

Meg : What does it say ?

Patey : Not much.

这一段对话也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内容的。剧作家通过这样的闲聊 ,生动地反映了剧中家庭关系的淡漠。然而 ,这样的例子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许多时候 ,反而正是闲聊增添了家庭成员乃至朋友同事间的感情交往 ,发挥了一种社会润滑剂的作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看 ,不会根据需要讲一些应酬话的人 ,在社交活动中是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的。会不会适当地运用应酬语 ,是衡量一个人交际能力强弱的标志之一。

在话语分析中 ,象 How do you do ? Good morning ! Thank you ! Nice weather , isn't it ? 这样的应酬语是很容易识别的。但是 ,有许多话看上去既象是在应酬 ,又象是交流信息。如两位家长见了面谈论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几位妇女碰在一起互夸对方的发式服装等 ,就是常见的例子。我们认为 ,是否把这样的谈话看作是应酬语 ,主要看它的目的是不是在于建立和保持社会接触。当一个妇女看到另一个妇女穿了一件新潮上装时说 : “ 真漂亮 ! 哪买的 ? ” 她可能只是为了使对方高兴 ,或者也是出于真心表示欣赏。她如果自己并不想买 “ 哪儿买的 ? ” 这句话就只有应酬功能 ;如果她真的要买 ,这句话就不是为了应酬 ,而是希望对方向她提供信息了。

O'Donnell 和 Todd (1989 : 77) 对应酬语的划分是比较宽的。他们把对话中属于正题之外的部分一概看作应酬语。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法是可以接受的 :

... We meet a friend , for example , and wish him Good

morning , and we chat for a few moments , perhaps about the weather or work or the health of members of the family. We may then go on to engage in serious discussion , or we may simply take our leave with some well-worn ritual phrase : Cheerio , So long ' , Goodbye , etc. The serious discussion is not phatic communion , but all the rest is.

三. 应酬功能与其他功能的关系

创造 phatic communion 这一术语的是 Malinowski , 但把应酬功能正式认定为语言功能之一 , 并对它进行比较深刻的阐述的却是 R. Jakobson。这位美国语言学家 1960 年在一篇题为 Linguistics and Poetics 的文章中 , 把语言功能分为六种 : a. 指称功能 (referential) ; b. 情感功能 (emotive) ; c. 意动功能 (conative) ; d. 应酬功能 (phatic) ; e. 元语言功能 (metalingual) ; f. 组诗功能 (poetic) , 其中便包括了应酬功能。Jakobson 还把语言功能与言语行为中的各种社会因素联系起来。他明确地指出 , 语言的六大功能分别受到语境 (context) 、讲话者 (addresser) 、受语者 (addressee) 、接触 (contact) 、代码 (code) 、信息 (message) 这六种因素的影响与支配。这就是说 , 语言功能之一的应酬功能是言语活动参加者即讲话者和受语者之间所进行的社会接触在语言中的反映。

许多语言学家虽然没有象 Jakobson 这样把应酬功能视为语言主要功能之一 , 但在他们的研究中 , 也没有忽视人们可以通过语言来建立接触、保持接触这一客观事实。John Lyons 就是其中的一位。他 (1977) 把语言功能分为三种 : a. 描写功能 (descriptive) ; b. 社会功能 (social) ; c. 表达功能 (expressive) 。他所说的社会功能指的是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的功能 , 应酬功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M. A. K. Halliday 也是一个多功能论者。他 (1978) 把语言功能分为如下三种 : a. 达意功能 (ideational) ; b. 人际功能 (inter-

personal); c. 组篇功能(textual)。他所说的人际功能含义较广,包括了 Jakobson 的情感功能、意动功能和应酬功能,也包括了 Lyons 的社会功能和表达功能,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社会功能中的应酬功能。

总而言之,应酬功能已经得到语言学家们的重视,应酬语在建议和保持社会接触中的重要性也已经得到广泛的承认。无论是在纯理论研究上,还是在课堂教学或日常交际中,应酬语和它的功能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四、应酬语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是“社会人”(Halliday 语)。应酬活动是人们建立社会接触的一个重要渠道,而语言则是进行这类活动的重要手段。Jakobson (1960) 甚至认为,在语言的诸多功能中,应酬功能是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最先掌握的功能。他还认为,连动物的语言中也有应酬功能。

应酬活动是与人类社会共存的。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离不开这类交际。但是,应酬的方式、应酬语所包括的内容,并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应酬语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学者著文立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国内何自然先生(1988)在《语用学概论》一书中就从打招呼、道别、赞扬、邀请、道谢、致歉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英语和汉语在社交应酬方面的差异,指出了文化因素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在这里,让我们再从“闲聊”这一方面看一看英美人和中国人在应酬方面的不同。

我们中国人互相闲聊时,经常问及对方的年龄,年长者对年幼者,年幼者对年长者,男同志对女同志,女同志对男同志,熟人之间,陌生人之间,一般都不大忌讳。但英美人之间却很少谈论年龄,尤其不谈论妇女的年龄。如果中国人与英美人接触时忽视这一点,很可能使对方感到尴尬。

中国人对工资数额,向来是不保密的。但英美人却不愿意告诉别人他一个月拿多少薪水。中国人常喜欢谈论所购商品的价格,但英美人却很少问别人“你这个东西花了多少钱”。记得数年前一位外籍教师买了一件中式上衣,一位中国同行便习惯地问她花了多少钱。这位外国人支支吾吾,转弯抹角,始终不肯讲出价格。另外有一次,一位美国女士在北京一家旧货商场买了一顶东北人戴的皮帽子,当一位中国学生追问她多少钱时,她竟答之以“Don't be nosy!”真使好心的学生哭笑不得。

中国人请人作客,只要提早一两天发出邀请就行了。但英美人往往提早一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就约你,而且此后很可能就不再提及,中国人碰到这种情况,心里就会纳闷:他上次请我,现在还算不算数?我去好还是不去好。

中国人到朋友家吃饭,吃完之后往往立即就走,以使主人有较多的时间洗涮、休息。但到英美人家作客,可不兴一吃就走,坐下来闲聊是比吃饭本身更为重要的事情。

我们之所以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文化传统可以影响人们的应酬方式和应酬时所用的语言。当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碰到一起时,可能会在应酬方面产生误会,甚至出现不愉快的局面,从而影响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外语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中,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适当的应酬语,应该看作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

主要参考书目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London: Edward Arnold

Leech, G. N. & Short, M. H. 1981 *Style in Fiction* London: Longman

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Donnell, W. R. & Todd, L. 1980 *Variety in Contemporary English* Lon-

don : George Allen & Unwin

Ventola , Eija 1987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Interaction London : Frances Pinter
(Publishers)

何自然 ,1988 ,《语用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

(原载《山东外语教学》1989 年第 4 期)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义位移研究

魏春木

当我们把语言看作是编织在文化这一巨大的信息网络上的系统时,理解“语义”的视野就变得更为开阔。语义有两种:一种是语言本身的意义,另一种是语言的文化意义。前者从认知的角度,揭示语言与事物之间的二元关系;后者从功能的角度,反映语言、事物及语言运用制约因素的三元关系。比如“你”和“您”都是指称第二人称,这是语言本身的意义。但选用不同形式,能够区分交际双方的关系,体现语言运用的文化情境等,这是语言的文化意义。本文讨论的是后一种语义,即文化语义。有人认为,文化语义是一种附加意义,把它置于语义的从属层面。其实,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语言的文化意义也是语言的本位意义。只要人们一张口说话,语言的文化意义也就随之产生了。只不过,文化语义具有某种易变和流动的特点。但是,文化语义是绝对有规律可寻的,语言运用的文化规则的形式化和符号化正是社会(文化)语言学的目标。

在跨文化交际中,有两套不同的规则系统作用于语言交际。从信息的角度看,语言交际是一个信息交换过程。这些信息在一定的情境中被赋予一定的意义,而实现了的语义正是意义潜势系统(即文化)中的一部分。同一文化背景、操同一语言的交际双方由于共享意义潜势系统(就质的方面而言如此,在量的方面因人而异),他们就能用对方所期待的方式进行编、解码。而文化背景不同、母语各异的交际双方因为不能完全共享两套截然不同的意义潜势系统,信息交换就不能以对方期待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就会发生偏差。换言之,在跨文化交际中,一旦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赋予信息意义在量和质上出现差异,形象地说,一旦交际双方

处于信息通道两旁的位置不能完全对接,语义位移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语义位移的后果,轻者造成交际双方的误解,重者影响两个国家的关系。1945年7月26日盟军发表要求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两天后铃木首相对记者说,日本对此采取“默杀”政策。“默杀”在日语里一般理解为“置之不理”,但日本政治家发表政见时态度常比较模糊、暧昧(此乃日本人士的见解),铃木的原意是对公告暂不评论,并暗示某种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由于翻译者不知这一文化背景,所以把“默杀”译成“不予理睬”。美国认为日本已拒绝公告的要求,8月6日,盟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之后,日本内阁对铃木用词(方式)和错译极为恼火。

语义位移有三种情况(一)信息的意义不适当地增值(二)信息的意义被人为地减损(三)信息的意义被错认,即一个意义被理解成另一个意义。假设信息发出者发出的信息负载着意义A,那么,这三种情况可用符号分别表示如下:

1. $A \rightarrow A^+$ (意义的增值)
2. $A \rightarrow A^-$ (意义的减损)
3. $A \rightarrow B$ (意义的错认)

以下是具体的分析。

一. 意义的增值 $A \rightarrow A^+$

信息接收者接收到信息并解译后,信息负载的意义增多了,这其中有两种情形;一是听话人除了赋予说话人所要传达的意义以外,还附加了说话人并未传达的意义;二是听话人把说话人所要传达的某项较弱的意义人为地给予强化。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这句话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都表示邀请,但美国人一般是邀请别人一道吃饭,并不明显含有请客的意思。对中国人,这句话通常意味着发出邀请的一方破费,所以,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人发出这样的邀请,中国人起初还以为这个美国人热情好客,哪知美国人吃完饭只付了他自己那半的帐,这使中国

人惊讶不已！(在非语言方面，点菜程序也已经暗示这句话里所含文化意义的差异)可见，中国人赋予此信息的意义比美国人已经赋予了的意义更多，使这条信息的意义值增加了。

据我调查，很多在中国生活的欧美人都认为中国人说话“overpolite”(过于客气)，有些人甚至因此心理上觉得“guilty”(负罪感)。在这里，我们不去评论他们的感受，我们关心的是这种跨文化交际的现象。中国人去拜访别人，哪怕是好朋友，在告辞时客人常说一些打扰主人之类的表示歉意的话，不过道歉的意义很弱，这通常是一种客气的方式。但同样的话对欧美人说，道歉的意义就变得很强。中国人在离开她的加拿大朋友房间时说：“Im sorry. I took you too much time.”(对不起，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加拿大人听后觉得不可理解，与事实不符，所以，立即作出认真(通过语调)而否定的回答：“No. You didnt.”欧美人之所以认为中国人说话太客气，是因为他们把信息里某些较弱的意义程度不同地强化，以致造成了意义值的偏差。

二. 意义的减损 $A \rightarrow A^-$

与前一种情况相反，当信息接收者赋予信息的意义不是信息原有的全部意义时，或者，当原有意义的强度被弱化时，意义就出现了减损。中国人邀请一位认识的意大利人喝咖啡：“我们一起喝咖啡，好吗？”这样的邀请信息，内含着中国人请客的意愿，但信息的这一方面内容往往没被对方解译出来。于是喝完咖啡出现这样一幕：一人执意一个人付款，一人希望两个人分帐。如果中国人抢付了全部，那欧美人即使受请也未必领情。再举一个邀请的例子，说明信息所含的意义强度被弱化以后造成的信息传递偏差情况。一位中国老师下课后想邀请他的美国学生到他家来玩，他说：“今晚请你们上我家来玩。”在中国人听来，这句话里邀请的意义是很强的，这是正儿八经的邀请。美国学生虽然当时答应，但最后一个也没去，致使这位中国老师十分生气。对美国人而言，邀请

里不提到确切的时间和安排,且不是一周前发出的,这种邀请的意义很弱,不必当真。有人调查过上百个美国人发出邀请的例子,发现三分之二多的邀请都不是真正的邀请,这些邀请里都没有明确的时间和安排。因此,中国人说:“请你有空来玩!”是真心真意的邀请,可如果你邀请的是一个美国人,就说这么一句话,恐怕他永远也不会上你家的门。久而久之,这一方就会觉得那一方傲慢无礼,那一方觉得这一方缺乏诚意,真是天大的误会。

三. 意义的错认 $A \rightarrow B$

信息接收者在解码时把信息的意思张冠李戴了,这就是意义的错认。一位年龄较大的中国老师看见她的美国学生感冒了,就很关心地说:“你衣服穿得太少了,回去再穿点儿吧!”这句话惹得学生很反感。欧美人也极不习惯中国人的一些招呼语,即使他们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半载的。诸如“你上哪儿去?”“出去啊?”之类的话,中国人听来是平常而又平常的,但欧美人觉得这些是私人问题,不能随便打听。一位中国老师课间给美国学生释疑解难后,学生向他表示感谢,老师说:“不谢,这是我应该做的。”美国人听了觉得受到了污辱,因为“*This is what I should do.*”意味着答谢人出于无奈或迫不得已才去帮忙,并不是真心愿意的。中国人的一些客气、推辞、谦让、谦虚常被欧美人错误地理解。欧美人夸赞中国人时,中国人按习惯会说:“不不”或“哪里哪里”,结果欧美人觉得自己是自讨没趣,有的认为中国人虚伪,归纳如下:

你衣服穿得太少了,回去再穿点吧!

A: 关心别人 \rightarrow B: 干涉别人

你上哪儿去? / 出去啊?

A: 打招呼 \rightarrow B: 打听、询问

不谢,这是我应该做的。

A: 出于自愿 \rightarrow B: 迫不得已

在交际双方对不同的文化背景相知不多的情况下,意义的错

认容易造成双方的互不信任,进而引发跨文化交际的冲突。

以上我们分析的是由信息接收者在解码过程中造成的语义位移。事实上,信息发出者本身也会造成语义位移。在编码过程中,发出者实际赋予信息的意义与本应赋予的意义之间存在偏差(要么多于,要么少于),或者发出者把实际赋予信息的意义当作了应该赋予的意义。中国人用英语进行交际时有时因遗漏了某些重要的意义而造成了语义位移。比如,一位中国人在希望得到她的美国朋友的帮助时用了“ I beg you.”如果她知道“ I beg you.”这句话含有给人叩头、下拜的意思,也许就会改用其他的结构了。在解码过程中,信息接收者的任务是把信息的意义进行还原,过多的、过少的、过强的、过弱的意义就成为理解的障碍。当然,由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收者造成的语义位移不完全相同。我们把由信息发出者造成的语义位移叫作主位位移,把信息接收者造成的语义位移叫作客位位移。客位语义位移与主位语义位移的分析见下表:

客位语义位移	主位语义位移
$A \rightarrow A^+$ 意义的增值	$A^+ \rightarrow A$ 增值了的意义
$A \rightarrow A^-$ 意义的减损	$A^- \rightarrow A$ 减损了的意义
$A \rightarrow B$ 意义的错认	$B \rightarrow A$ 错认了的意义

除了主位语义位移和客位语义位移之外,语义位移还可以分出其他类型。

从位移的出现频率可分为单循环语义位移和复循环语义位移。单循环语义位移指语义位移包含在交际双方之间说和听(编码和解码)一次性循环中。比如,甲说:“对不起,今晚占用您很多

时间。”乙答：你不应该这么说。”就只有一个循环。复循环语义位移指交际双方的说和听(编码和解码)经过两次以上的循环才得以结束。在复循环语义位移里,语义位移不止一次地出现,且有前后承接关系。复循环语义位移也是语篇的语义位移。下面的例子,是一个美国留学生拜访他的中国老师——

美国留学生:你的太太很漂亮。

(老师的妻子脸红)

老师:哪里哪里。

(学生纳闷老师为什么要问他的妻子哪儿最漂亮。)

美国留学生:脸漂亮,眼睛也漂亮,鼻子也漂亮,都漂亮。

老师:.....

在这段对话里,前后出现了两次位移。在中国,即使是朋友的妻子,在第一次见面,也不应该留意她的容貌并加以夸赞(非礼勿视)。更何况老师、领导或长辈的妻子呢!所以美国留学生出于礼貌而作出的夸赞反而引得老师的妻子很不好意思,这是第一次位移。以后这位美国留学生错把老师的客气自谦(哪里哪里。)当作了询问(哪里漂亮?),这是第二次位移。只有在语篇里发生两次以上的语义位移才能叫作复循环语义循环。如果一段对话里只出现一次语义位移,我们仍把它叫作单循环语义位移。

从位移发生的方式可分为转移式语义位移和迁就式语义位移。转移式语义位移指交际一方运用自己的母语文化背景进行解码而造成的语义位移。最常见的是欧美人把中国的姓当名字来叫。另外,为什么欧美人总是对“你上哪儿?”这样的招呼语异常敏感呢?就是因为他们的母语文化在交际中发生了迁移作用。迁就式语义位移指交际一方迁就或照顾交际对方的文化规则不当而造成的语义位移。比如:有的美国人在听到中国人称赞其中文不错时回答说:“哪儿的话!”甚至有的美国学生在老师表扬自己后对老师说:“老师,您别拍我的马屁。我的发音还差得远呢!”如果说转移式语义位移常常表现为不自觉运用母语文化规则的话,那

么迁就式语义位移倒是较为自觉地运用对方的文化规则进行交际的。

造成跨文化交际语义位移的根本原因在于语义交际背后的两套意义潜势系统在质的方面存在差异。语义实现手段的差异导致了语义位移。语义实现的手段共有六类：

- (1) 交际关系 : 熟悉与陌生、权势与非权势等
- (2) 交际场境 : 正式场境和非正式场境
- (3) 交际策略 : 直接、委婉等
- (4) 交际风格 : 严肃、随便等
- (5) 交际意向 : 如问候、打招呼、询问、邀请等
- (6) 交际势能 : 交际讯号(即信息意义)的强和弱

语义实现手段能够反映语言运用的特征,能够用来描写语义的各个方面,所以,语义实现手段也就成为进行语义构成成分分析的语义标记。语义标记亦有六类：

- (1) 关系标记
- (2) 场境标记
- (3) 策略标记
- (4) 风格标记
- (5) 意向标记
- (6) 势能标记

运用语义标记的好处是能够帮助我们深入到跨文化交际的内部,从微观的角度考察信息交换过程中的偏差情况,通过比较不同的语义标记找到语义位移的具体原因。下面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为对象分析和比较跨文化交际中的语义标记,通过语义标记我们对语义位移原因就可以一目了然(见第221页附表)。

“你吃了吗?”跟“Have you eaten yet?”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两句话的交际意向不同。在汉语社会里,“你吃了吗?”是打招呼,在英语社会里(如美国)“Have you eaten yet?”是邀请或希望约会。“我们一起吃饭,好吗?”与“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dinner with

me?”的差别也在于功能不一:前者意味着一般由说话人请客,后者谁请客则不明确。而“今晚请你们到我家来玩。”跟“Come to my home tonight, please!”在功能上倒是一致的,但邀请的意义有强有弱,这构成了信息偏差。至于下面的一组例子“I m sorry. I took you too much time.”其中歉意的强度大于汉语社会里的“对不起,占用你太多时间。”除了这一点区别外,“I m sorry. I took you too much time.”往往针对的是地位较高、关系疏远的听话人。在汉语社会里则不一定。最后一组例子与第一组的情况相似。

从附表看出,跨文化交际中的语义标记区别,可以是一个方面(如“你吃了吗?”与“Have you eaten yet?”),也可以是两个方面或更多的方面(如“对不起,占用你太多时间。”与“I m sorry. I took you too much time.”),之所以存在多方面的区别,是因为标记之间有内在的关联——不同的标记统一于深层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一内核之中。

采用语义标记是揭示跨文化交际中信息传递偏差的有效途径。通过语义标记,信息传递偏差的具体状况能直观地显现出来。以上我们虽然只列举了少量的例子,但这些例子都能充分说明问题。这些例子表明,交际关系、交际场境、交际策略、交际风格、交际意向、交际势能中的某一个因素或几个因素的不能协调是产生语义位移的直接原因。在跨文化交际中,受不同文化规则作用的交际双方彼此不容易为自己找到适当的位置,不能重新构建一个彼此适应的跨文化交际模型。正因为缺乏这样一个共通的交际模型,并且不能共享一个信息交换机制,因此,交际关系、场境、策略等都构成了潜在的冲突。它们在跨文化交际中布满了明沟暗壑,最终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语义位移。

参考书目

1. 哈里斯(Marvin Harris),1983 《文化人类学》,中译本,1988 李培荣等

译,东方出版社

2. 韩礼德(Halliday) ,1978 ,Language as a Social Semiotic ,University Pakr Press

3. 郝德森(R. A. Hudson) ,1981 《社会语言学》,中译本 ,1990 ,丁信善等译 ,社会科学出版社

4. 胡状麟 ,1984 《韩礼德的语言观》,载《外语教学与研究》84—1

5. 萨姆瓦(L. A. Samoval)等 ,1981 《跨文化传通》,中译本 ,1988 ,陈南等译 ,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罗伟)

语义标记附表：

<div>语义标记</div> <div>特征区别</div> <div>语言结构</div>	熟悉	权势	正式	直接	随便	意向	强
你吃了么？ Have you eaten yet？	+	-	-	-	+	+(招呼)	
我们一起吃饭，好吗？ Would you like to have a dinner with me？	+	-	-	+	+	+(请客)	
今晚请你们到我家来玩。 Come to my home tonight , please !	+	-	-	+	+	+(邀请)+	
对不起，占用你太多时间。 Im sorry. I took you too much time.	+	-	-	+	-	+(歉意)-	

你上哪儿？ Where are you going?	+	-	-	-	+	+(招呼)
	+	-	-	+	+	-

(原载《外语教学》1993 年第 1 期)

文化差异和不可译性

关 钰 新

语言不仅是人类思想感情的表达交流工具,还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和载体,即一定区域内国家、民族和人群在生态地域、物质文化、社会宗教直至语言文字本身等诸方面独特而客观的描述方式与现实反映。翻译归根结蒂是语言文字的转换。随着国际交往和文化交流的扩大,不同语言之间互译的增多,不同文化的差异、交流及相互影响也必然要在语言上体现出来,反差强烈的文化沟通过程中的所谓不可译性就尤其引人注目。

不可译性问题同样成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去年春夏之交在斯托尼布鲁克开会时的争论热点。从事俄译英的美国翻译家理查德·劳里曾出版过两本描写苏美关系的悬念小说以及安德烈·辛耶夫斯基的小说《晚安》和安德烈·D·萨哈雷夫自传的译著;而从事英译俄的苏联翻译家阿列克赛·米克哈雷夫则译有约翰·斯坦巴克的《伊甸园之东》和缪里尔·斯帕克斯的《琼·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年华》二书。他们在会上就“俄语为何没趣”各抒己见,这颇有译事难之叹的一席谈,分别以若干俄语和英语词例的互译来论证,既给人启迪,又不无遗憾。特摘要如下,以飨同好。

劳里首先谈了他对以下俄语词例的理解:

“коммуналка”指“公寓”。是借用表示怜爱的昵称后缀“-ка”生成俄语词的。此词使人联想到一长串棕褐色大房间,每

户一间 ,合用一个小厨房 ,室内不可名状的一切都给人一种窒息感。

“ вождь ”指令人敬畏的伟大领袖。称呼如沙皇伊凡大公、彼得大帝、斯大林 ,或许还有戈尔巴乔夫等真正的上层人士 ,难得一用。对于美国经历 ,它显然是个完全生疏的概念。有人偶尔也在期待着某个魅力超凡的领袖人物出来为自己摆脱困境 ,但这念头随即一闪而过。

“ государство ”指“ 州 ”。其份量、范围和力度实难领会 ,因为在州的状况或地位方面 ,美国和俄国经历上的差别之遥好比是在侍从与公民之间 ;况且 ,俄国的州几乎跟世界同时代。倚仗州权者 (即“ власть ”) 比起只是“ 当局 ”来 ,确属不同的数量级 ,而“ 当局 ”在美国总含有地方集团的意味。

“ тоска ”指一种依稀模糊的渴望 ,一种急需品可在任何别处获得却偏不在此地的感受。俄国人饱尝了这种体验 ,多愁善感变成他们唯一的奢侈 ,情感演化到了一种自发和虔诚的崇拜狂 ,感情调色板比我们宽 ,偏爱喜怒无常的色调 ,而文明仍然改变不了本性。

“ душа ”指“ 灵魂 ”。他们对此津津乐道 ,我们则是去打动人心 ,或更可能的是去打动那些无意识。用心理学观点分析社会的深广度 ,他们不如我们。

“ нормально ”指“ 正常、正规 ”,是“ 事情怎么样了 ? ”的通常回答。表示望尘莫及而反唇相讥的这个词 ,包含着先前降临的一切痛苦与或将出现的一切希望 ,包含着当前的伟大梦想——一个“ 正常的 ”社会。

“ достать ”指与英语“ getting ”(在此意为“ 变成 ”,表示开始处于某种状态 ,如结婚或提升等) 相对应的俄语动词。它反映出一个贫乏的社会 ,示意或冒险远征或出奇走运。俄语中唯有一词指“ 幸福 ”和“ 幸运 ”,间接表明了幸福与其说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还不如说是好运道。英语不再使用“ thou ”,再没有表达爱憎亲疏之分的代词 ,俄语也没有了现在时的动词“ 是 ”,结果连最简单的肯定

——“我是”也成了罕见结构。

他接着指出：“пошлость”作抽象名词时指伦理道德上粗俗不雅及一切相关的行为，指佯装显要、谎称美丽、平庸低劣却反以为荣的任何东西。堪称英俄语有机统一最高典范的弗拉迪米尔·内伯科夫在《果戈理传》中，竟以全书近10%的篇幅来定义并推敲这一个“无情的”俄语词，而译者处理该词必定会简洁得多。

米克哈雷夫随后也在会上用六个译例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Take care”意“当心”。这个在美国任何陌生人都可能使用的简朴而有异常亲切的词语，会一下子混淆了苏联对美国人在资本主义狗咬狗世界中表现麻木不仁、一心为己的深刻成见。俄译者对这挂念和深情的词语该如何是好？在俄语上下文中按字面译为“береги себя”，那只是在亲戚或彼此十分亲爱的人中间道别时才恰如其分；仅涉及熟人场合的，要限制在“всего хорошего（祝好运）”一类中性词语内；而初次见面后就很可能使用彬彬有礼的“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了。翻译时无意之中就过份简单化了美国人际关系的圈套，剥夺了他们天生的多情和友好。而出于某种原因，俄国人倾向于主张这种情谊只能属于自己的同胞。

“To have fun”意“有乐趣”。对俄译者这又是件频频头痛的事。在美国人眼里，乘快艇兜风、与友人同宴、赴一次舞会、甚至打上一架或赶场足球赛等等诸如此类都是“乐趣”。俄国人喜欢更明快具体地表达自己的情感：生活本身、高朋满座或玩得痛快所带来的无忧无虑的欢乐和兴高采烈的情致，决非这个简明的有伸缩性的词语所能囊括。

“To make love”意“做爱”。通常出于无奈，被译成“заниматься любовью”（干那种事）。即使英语中未必仅指性爱而言，我们大体上总把这种想法局限于纯性生活的，因此感到害羞脸红了。内伯科夫说过，两种语言的基本差别恰恰是由英语而不是由俄语所固有的“精神自由”构成的。这位艺术大师可能是对的。我们这些身不由己的清教徒要译出英语中有关爱情的任何东

西该有多难阿！

“Privacy”意“隐私(权)”。这个内涵深远的概念绝对译不成俄语。把它的空缺只归因于苏维埃时代的生活条件似乎不够公允。不过,在促使它介入我们日常生活经历方面,那十户共浴室的公寓、宿舍、几代同室的薄墙陋房以及今日城市的拥挤不堪等,实际上以往和现在几乎都是无关大局的。在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生活的时代中,俄国肯定也存在隐私权,但他们著作中未见片言只字表达与之相关的态度或看法。

“Efficiency”意“效率”。俄国人是否真有此概念,令人费解。俄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也未令人乐观到足以减轻这种疑虑的程度。当然,情况过去并非总是而现在也未必依然如此。不过,象“高效率的秘书”或“高效率的工人”一类组合,即使俄国人确实明白怎样工作得出色,也不符合他们特有的言简意微的说话风格。

“Challenge”意“挑战”。说来也怪,就连这样的词,不加一定思索还译不出来。如果是一场决斗,或是一种与公论相左的冲突,本不难译作“вызов”。也许是美国人的投机意识和冒险能力比俄国人更典型的缘故吧,甚至象“创办新公司是极富挑战性的”之类的简单句也会给俄译者带来一些问题的。

最后,他强调不可译词语肯定不止这些,但已足以旧话重提:美国人和俄国人就都那么相象了?这观点近年日趋流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呢?一个国家的思想与心理方面的两大产物——语言与文学都审慎地表明,坦率地说,相象还没到那种地步。将美国文学译成俄语的任何专家都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即几乎找不到能够充分表达一个简单英语词或词语之微义的对应词来,这里指的不是习语,也不是言谈措词特点或赋予日常生活以具体特色的细节。虽然,思考一番后知道,俄语词汇中是缺少象“订婚戒子”或“防身尖刀”等那类为美国人所熟知之物的词语,这本身也反映出两个社会在制度上、传统上和心理上的深刻迥异。但是,比这重要得多的倒是缺少了与美国人某些特有品性、感情和关系类型相对

的因而俄译时必须广泛解说的概念。

姑且不论问题答案会是什么 ,他疾呼 相互之间现有的种种成见必须摒弃。为此 ,俄英互译必须多多益善 ,精益求精。如今 ,挑战就在眼前啦 !

“不可译性”是个热门话题 ,同时也是个严肃课题。然而 ,纵观前述 笔者实在不敢苟同这两位翻译家的某种曲解甚至偏见 ,以及有某些词不可译的绝对提法。冒昧地说 ,这简直象一场硝烟弥漫的舌战 !值得欣赏的倒是那段作为尾声的呼吁 ,它点出了事理的真谛。

早在一九八六年美国语言学家奈达(Nida)博士就曾指出 :“ 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 ”(“ 翻译就是翻译意义 ”),认为要想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意思 ,译文的形式必须有所改变 ,因为“ 一切翻译的目的在于努力寻求于原文最接近、最自然的对等语 ”;“ 翻译的目标是取得‘ 功能对等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即“ 不但要充分理解原文的意思 ,而且要充分了解译文读者可能在译文语言中如何理解其意义。”

这里提出了译者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双语词典的译词实际上有的并不准确 ,就是说 ,并没有完全等同于原词 ,只是近似等同罢了。再说 ,一个孤立的单词 ,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可以异常丰富而含蓄 ,只有依靠上下文才能或多或少地把它揭示出来。俄语和英语分属差异悬殊的两大语系 ,从词义对比可知其文化内涵的范围相当明显 ,社会意义上的差别又往往使翻译中不可能利用现成的语言的“ 对等物 ” ,即找不到对等的实物、现象或抽象概念。为表达文化内涵 ,译者除借助音译法外 ,还常用仿造法 ,比如前述的“ 公寓 ”一例便是。俄语词 коммунальная квартира 仿造成英语词 communal flat 后 ,英语读者是不理解的。仿造词会派生出某种与原文差别很大的含义来 ,即使加注说明这是由房客们共同使用厨房和卫生间的公寓 ,也不免有人会问 :这样的“ 公寓 ”怎么没有房东呢 ?译者的任务之一就是引导读者去接受异域文化 ,使读者

头脑中显现的形象和产生的联想都尽量接近原作在原文读者中产生的效果。这样,以发展眼光来看,因文化差异引起的困惑就会在读者对原文民族文化的不断熟悉过程中日渐减少,直至接近消失。英语有句俗话说:“Words do not have meanings, people have meanings for them”(词本无义,义随人生)。单词尚且如此不易,更何况由语音、词汇和语法三大要素构成的语言,其难度也不会是三者的简单总和了。语言既然是个错综复杂的多面体,译者就应力争成为无所不包的知识库,虽然无法完全达到这个高度,但应尽量接近它,这可以说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吧。译者要捕获最具体的信息,最明晰的情景和最基本的共性,随着各种接触的扩大和多元认识的深化,清除文化内涵给我们设下的重重障碍,最终实现较为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沟通对象国文化。

应当承认,翻译并不总是可能的,它只是在某种范围和限度内实现。诚然,范围和限度也不是永久性的,绝对不变的。在谈到不可译性时,人们常想起译诗和译习语。它们是语言的核心与精华。说诗之不可译,只是格外强调了这种艺术性最强的语言艺术对特定形式和意境的不可分割的依存性。蝴蝶诗、十四行诗及各种文字游戏,突出了它们的超难技巧,如此而已。菲律宾华人施颖洲的莎翁“商籁”译本被公认为精品,钦定《圣经》英译本胜过希伯来文本之处俯拾皆是,亦可佐证。说习语之不可译,也只是格外强调了能够找到从形式到微义都完全等同于原作之对应语的艰辛。习语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它的往往不止一种的译法是为了注意到原文可译性和译文可读性,同时兼顾到读者的可接受性,尤其谐音俗语和特有事物典故的翻译。例如:“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以及《儒林外史》中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指我国的“寒食节”、“元宵节”)等语,可谓“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同一原文译法因人而异,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所译也不尽相同,但从总体看,开始也许“不好译”或“译不好”,可是不会永远都这样的。音译、译解、改写乃至创新就是中外译家在探索中另辟的新径。世界文学史的事

实说明 ,各民族的诗人和译者 ,在一文多译的探索过程中 ,又不断缩小了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差距 ,力求近似甚至乱真。这个过程在统一的世界语取代其它各语种之前是不会停止的。

最后笔者还认为 :学术争鸣要讲究科学性。二位所举词例中不乏常用词 ,远非“不可译”。纵然“不可译” ,也只是因为在对象国语言里暂时找不到完全对等的概念(注意 :不是词语) ,所以 ,这只能说是相对的不可译性。

(原载《外国语》1990 年第 6 期)

从跨文化角度看习语翻译

冀一志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习语又堪称是语言的精华,因而习语在体现语言的文化特征方面,比之其他语言成分,就更具有典型性。

从广义上讲,习语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涵盖是大致相同的。英语习语除了固定的短语或表达法外,还包括口语体、谚语、格言、乃至一些俚语。习语在汉语中也叫熟语。《辞海》(1989年)说它“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英汉习语在性质上有其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是在语言的长期使用中形成稳固定型的词组或句子。它们无论在语法结构、固定搭配上,或在特定含义上,都是特殊的。使用时,一般不能随意改变其结构和含义。汉语习语中还包括歇后语。这是汉民族文化独有的,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表达法。因此,歇后语所表达的文化内涵,可能会在英语中形成空白。翻译时必须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才能传达出原文的确切含义。

习语的文化特色,无不与其丰富多彩的来源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中英两国不同的地理环境都有不少反映其特点的习语,两国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也产生了大量的习语;两个民族各自的生活习惯、思维观念,亦无不反映在生动、形象、活泼的习语中。有时两个民族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认识,使得一些习语表现出某些相似的文化特征。双方的文化交流也为两种语言增添了新鲜的习惯表达法。但这只占习语中的极少部分,大量的习语则表现出迥异的语言习惯和文化特征。

语言是跨文化交际中最主要的手段。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难免不遇到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习语及其应用、翻译问

题。习语翻译实际上是如何在译入语中处理由译出语的习语表现出的各种不同的文化特征的问题。分属两种文化的两种语言进行交际时,习语在表现文化特征方面,可分三种关系类型:对应关系、半对应关系和不对应关系。

对应(corresponding)关系是指有时候英汉两种语言的习语,无论在意义上还是在形象上,都是相应一致的。这是由于双方文化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表达这些相似内容的习语,在语义和形象上就巧合地彼此相对应,相一致。在这种情况下,两者之间便可进行互译,即一种语言的习语可以用另一语言相应的习语来翻译。

例如,英语的“burn one's boat”和汉语的“破釜沉舟”就属于这种情况。公元前49年,凯撒大帝率部渡过庐比根河时,下令焚舟,表示其不获胜毋宁死的决心。当年项羽渡过河后,让部下破釜沉船,也是志在必胜。因而,由此而来的英汉两个习语都用来表达同一含义,即下定决心,不顾一切地干到底。它们的形象和喻义如此相近,几乎完全可以用来互译。如:

你按部就班地干,做到老也是穷死。只有大胆地破釜沉舟地跟他们拼,还许有翻身的那一天。

(曹禺《日出》)

If you work conscientiously you'll only die pauper. All you can do is to burn your boats and fight them in the hope that one day you'll come out on top. (A. C. Barnes)

同样一种情况,还可以从另一对英汉习语中看出。“Walls have ears”和“隔墙有耳”,在形象和意义上都十分相似。据说凯瑟琳女王在位时,在卢浮宫建造了一些特殊的墙。在一个房间的说话声可以在另一房间清楚地听到。那位多疑的女王就是用这种方法获知了不少国家机密和一些人的密谋计划。英语里的“Walls have ears”便由此而来。汉语的“隔墙有耳”出自《管子·君臣下》:“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因此,两个习语的意思都是指“秘密商量事情被人偷听”。

《朗曼英语成语词典》的解释是“even the most secret and privaten conversation may become known to other people.”有了同样的含意和形象,它们便可看作等效习语,翻译时也就可以互换互译。如:

“Shall I come to your hotel?”

“Better if we meet in the Park. Walls have ears.”

“我到你的旅馆来好吗?”

“咱们最好在公园见。小心隔墙有耳,让人偷听去。”

另外,一个语言里的有些习语是从另一语言借用来的。借来的习语补充丰富了这一语言的表达手段。久而久之,便被广泛采纳使用,成为这一语言的固定习语。这些借用来的习语仍然保留着原来习语的形象和意义,因而都表现出同样的文化特征。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不少这种借用的习语,如汉语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武装到牙齿”、“披着羊皮的狼”等习语就是从英语的“an eye for an eye, a tooth for a tooth”, “armed to the teeth”, “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移植来的,而英语的“to lose one's face”, “to save one's face”也是从汉语的“丢面子”、“保面子”借用来的。

可见,英汉语言中的确有一些等效习语。它们不但使用相同的修辞手法,表现相同的文化形象,而且无论从字面上还是从内涵上都表达同样的意义。有的具备相同的语法功能,有的干脆就源自同一出处。这些习语在诸多方面都显示出相应、一致的地方,因此,它们在表现文化特征时,彼此就成为对应的关系。

然而,巧合、借用毕竟是少数。能够表现相同的形象、意义、用法的习语也不可能是大量的。它们毕竟分属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产生。因此,对应的习语在两种语言中只占少数,大量的习语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只是部分地对应或毫无相同之处。

常见的习语多是部分对应或半对应(semi-corresponding)的关系和非对应(non-corresponding)的关系。在半对应的习语中,有的意思相同,修辞手法却不同,因而形象也不一样。有的意义相近的习语,却用于不同场合或上下文;有的只是字面意思相近,内涵

意义相差甚远 ,而且还带有不同的感情色彩 ,所以 ,它们只是部分地传达出相应的文化特征。这些习语在翻译时 ,有时候可用相当的习语对译 ,更多的情况下需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灵活处理。

比如要表达“ 两个人有同样的缺点或错误 ”或“ 指责别人而自己也犯有同样的过失 ”这样的意思 ,英语说“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 ” ,汉语则说“ 五十步笑百步 ”。例如 :

When he blames her for wasting money , he conveniently forgets that he regularly loses half his own wage by betting on the wrong horses—it's the pot calling the kettle black , I'd say.

他一面责备她乱花钱 ,一面却几乎忘了他自己赌赛马常常赌输钱 ,把自己的一半薪水都输掉了 ,——我说这实在是五十步笑百步。

但是 ,尽管意思相近 ,它们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互译的。汉语习语的含义是“ 两个人都有错误 ,只是一个比另一个程度要轻 ,”而后一部分的含义英语里则没有。因此 ,译文要根据上下文 ,对原习语做以适当调整。例如 :

Jason : Marry me , now , Sonia , we have witnesses—we could become one here and now.

Sonia : Don't be a dirty old man , you dirty old man.

Jason : Huh , the pot calls the kettle black.

杰逊 :现在就嫁给我吧。索尼亚 ,我们来些爱情的见证——我们可以现在就在这儿合为一体。

索尼亚 :来点正经的好不好 ,你这老色鬼。

杰逊 :哟嗬 ,老鸦倒嫌起猪黑啦。

互译的基础是习语的含义。内涵一致 ,所指相同 ,才能作为最贴切、最自然的译入语的习语来翻译原文的习语。然而 ,大多数习语只是在含义或形象的某一点上相似 ,其他方面都各具特色。依据表面形象来翻译是靠不住的。习语的价值首先在其意义。只有含义相似这一点才能构成互译的基础。因此 ,《英语搭配大词

典》、《现代英语用法词典》和《综合英语成语词典》都把“cast pearl before swine”译成“对牛弹琴”，因为两者都有“把珍贵的东西呈给不识货者”的含义。如果是表示这个含义，便可以考虑两个习语的互译。如：

He tried to explain the beauty of the music to his pupils but it was just 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

他试图向学生讲解音乐的美妙之处，结果却落得个对牛弹琴。

然而，这两个习语尽管意义上有相近之处，却并不完全对等。首先它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英语习语“cast pearls before swine”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说：“Give not that which is holy unto dogs, neither cast ye your pearls before swine, lest they trample them under their feet, and turn again and rend you.”汉语习语“对牛弹琴”则出自南朝·梁·僧佑的《弘明集·理惑论》：“昔公明仪为牛弹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闻，不合其耳矣。”因此，两个习语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色彩。除其基本意思外，它们还有不同的内涵、用法和感情色彩。汉语习语除了“把好东西给不能欣赏的人”这一含义之外，还有“对不懂道理的人讲道理，看不起对方白费口舌”的意思，而且还用以讥笑说话人不看对象。所以，这个汉语习语不象英语习语用来指实物，而是指抽象的道理。在感情色彩上，“对牛弹琴”也比“cast pearls before swine”要轻。钱歌川先生对此有一段话，说得很清楚：你以贵重的珍珠投猪，它不但不知感激，反而要来咬你，等于以怨报德，是不是值得这样做？中国的成语说的“对牛弹琴”，意思就轻得多了，因为牛虽不能欣赏美丽的乐曲，但它并不会对弹琴的人进攻呢。

如果“对牛弹琴”和“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在含义上还有相近之处，有时还可以互译的话，“明珠暗投”则与这一英语习语基本上没有什么相同之处。“明珠暗投”原义是说“珍贵的东西得不到赏识”。后来常用来比喻有才能的人得不到赏识，不被重用”或

“好人失足参加坏集团”，而原义已经基本上弃之不用了。比如《三国演义》五十七回中，鲁肃和庞统有一段对话，就用了这个习语的喻义：

肃曰：“公报匡济之才，何往不利？可实对肃言，将欲何往？”统曰：“吾欲投曹操去也。”肃曰：“此明珠暗投矣。可往荆州投刘皇叔，必然重用。”

Brewitt-Taylor 将这一习语译为“*That would be flinging a gleaming pearls into darkness*”。这一译法倒是与《史记》中有关该习语出处的记载十分相似：“明日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于道路”。但与“*cast pearls before swine*”的含义和用法大相径庭。可是《新英汉》、《英华》和《综合英语成语词典》都把这一英语习语译成了“明珠暗投”。《汉英词典》和《现代汉英词典》也都把这两个习语对起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表面上，这两个习语的确有相似之处。英语习语用“*pearls*”指“有价值的东西”，而 *pearls* 的汉语意思恰好是“珠”，亦是珍贵的东西。另外，*cast* 的动作又恰与“投”的动作一致。行为动作一致，字面形象一致，两者都有“珍贵的东西得不到赏识”的意思，对应起来岂不是很自然的么？实际上，上述词典的译法正是将这两个习语进行表面对应的结果。但是，从字面语义的对应上来译习语，既违背了原作者使用该习语的目的，也违背了翻译的原则。我们弄清了这两个习语的喻义和内涵，便可看出，这两个习语在实际意义和用法上差别是泾渭分明的。英语中的 *pearls* 一般用来指事物，而汉语习语中“明珠”则主要指人，而且是有才能的人。因此，这两个习语根本不对应；“*cast pearls before swine*”的意思不是“明珠暗投”。

有人建议用“投珠豕前”来译这一英语习语。这一译法倒是保留了原文的表面意义和形象，却仍未表现原文的内涵。它实际上是对原文字对字的直译，而直译法对以半对应关系来表现文化

特色的习语来说,是很不保险、很靠不住的。

若用直译法翻译非对应(non - corresponding)关系的习语,则可能译十错十。这类习语无论在意义还是用法或是文化特征上,都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有各自的含义和用法,表达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色彩。如果硬要找出什么相似之处的话,有的习语只是在字面形象上近似。比如“ child's play ”和“ 儿戏 ”,表面上看,二者简直一字不差,但它们是不是对应的习语呢?“ child's play ”的意思是“ 非常容易做的事情,不大重要的事情。”《朗曼当代英语词典》的解释是“ something very easy to do, something not very important ”,而汉语的“ 儿戏 ”则用来比喻“ 对重要的工作或事情不负责、不认真 ”。它们的共同之处在哪里?把它们对应起来翻译,能达到正确交际的目的吗?

的确,一些习语字面上的形近意近,实在太诱感人了,极容易形成翻译陷阱。例如“ eat one's words ”很容易让人将其与汉语的“ 食言 ”或“ 食言而肥 ”对应起来,因为它们在表面形象和语义上太接近了。可是“ eat one's words ”的意思是“ 收回说过的话,承认前言有失,说错了 ”,而且还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是“ 羞惭地、不光彩地 ”认错。如果一个人不得不“ eat his words ”《简明牛津词典》解释说,他就得“ retract them in humiliating manner ”;而汉语“ 食言 ”是说一个人“ 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不履行诺言 ”。因此,两个习语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可言,互译也就根本不可能。例如:

After all his boasting that he would drive the other company out of business, Mr. Angus had to eat his words for the other company flourished more than his did.

安格斯先生曾大言不惭地吹嘘要把另一家公司挤垮,但那家公司比他们公司更兴旺,他只好惭愧地承认前言有失。

可见“ eat one's words ”跟“ 食言 ”完全是两码事。“ 食言而肥 ”更不是“ eat one's words ”的正确译文。一个人“ 为了自己占便宜而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 ”,可说是“ 食言而肥 ”了。毛泽东著文说:

“蒋先生不但食言而肥 ,而且还派遣四五十万军队包围边区 ,实行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 ,必欲置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后方守留机关于死地而后快。”这是说 ,蒋先生原先同意建立同时承认陕甘宁边区 ,后来又不但不实践其诺言 ,而且还采取敌对的行动。可是 ,这个习语在《毛选》的英译本里却译成了“ Now Mr. Chiang Kaishek has not only eaten his words ,but he has gone so far as to . . . ”。本来一个揭露、声讨对方蓄意不守信的檄文句子 ,却译出了被声讨对象“羞愧地承认错误”的效果。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笔误。

统观之 ,英汉习语在表现语义和文化特征时 ,可分为三种类型 :对应的、半对应的、不对应的。属于第一种类型的习语 ,一般情况下可以互译 ,因为它们表现出基本相同或相近的形象、含义和文化色彩。属于后两类的习语 ,就不能相互直译 ,而应弄清它们的文化内涵和实际含义 ,再根据上下文适当处理 ,先达意 ,后传神。

习语都是受文化制约的。由于它们的来源都各不相同 ,他们无不表现出各自特色的文化面貌、习惯和特征。在此文化里习以为常的说法 ,在彼文化里可能就是一个空白。同样的意思 ,在此文化里是这种表达法 ,在彼文化里可能完全是另一种表达方式。比如形容胆小 ,英语习语有“ as timid as a hare ”(胆小如兔) ,汉语则说“胆小如鼠” ,因为鼠在汉民族文化里是胆小的象征 ,兔却是敏捷、迅速的象征 ,因而又有“动如脱兔”之说。有意思的是 ,胆小的鼠在英语民族文化中却成了安静的喻体 ,所以他们说“ as quiet as a mouse ”。同一意思 ,在汉语文化里 ,则用“静如处女”来表达。可见 ,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习惯。翻译习语时 ,必须照顾到不同民族文化的习惯和特点。

由于语言和文化不同 ,大多数英汉习语在表现文化特征时 ,只是相对对应甚至根本不对应。有时候 ,有的习语在表面形象或意思上显出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 ,然而正是这些表面上的相似 ,经常为习语翻译设下了陷阱。人们一不小心就会犯文化错误。正如胡文仲教授指出的 ,文化错误比语言错误更严重、更糟糕。这就要

求人们在翻译习语时,需要敏感地意识到习语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

习语是文化的产物。它们不是受文化制约,便是某一特定文化独有的。人们很难把习语里包含的所有成份,从表面意义和形象到深层内涵和文化特征,全都保留在一个译文里。可以说,文化的多样性限制了习语的可译性。换言之,习语翻译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这个范围随习语对该文化附着程度的不同而伸缩变化。凡是那些对文化传统附着程度大、文化色彩浓厚的习语,翻译中就大多只能译义,难以传神。歇后语的翻译就是很好的例证。它是汉民族语言文化的特产,英语就很难达意传神地进行翻译再现。

语言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的问题。内文化交际(intracultural communication)一般问题不大,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里则理解和表达的问题共存。习语翻译就是理解和表达这一对矛盾在跨文化交际中的突出表现。要解决这对矛盾,译者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敏感性。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bilingual competence),而且还要有双文化(bicultural)乃至多文化(multi - cultural)的知识,从而适应在不同文化环境中进行有效交际的需要。

参考书目

McMordie, W. English Idioms and How to Use The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胡文仲《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陈文伯《英语成语与汉语成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III. Beijing: Foreign Lan-

guages Press , 1975

张培基 《习语汉译英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9

(责任编辑 罗伟)

(原载《外语教学》1993 年第 1 期)

论东西方思维方法差异及其翻译^①

王 秉 钦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里 ,人类的语言反映着人类普遍的共性。各民族语言虽然不同 ,但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 ,称谓事物 ,解释词义。正是这种共性为不同民族文化交流提供了可行性依据 ,为不同语言的翻译提供了可译性基础。然而 ,不同民族的思维方法也存在着个性 ,突出地反映在人类语言表达的方式上。正是这些个性 ,即差异 ,构成了文化传通——翻译的障碍。诚如卡尔·普利布兰姆在《思维方式之矛盾》中所指出的 :“ 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睦的关系之所以受到阻碍 ,不仅是由于语言的复杂多样 ,更是由于思维模式的差异——就是说 ,是由人们确定知识来源和进行有条理思维方法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当然 ,这种差异是有限的 ,它受人类共同的交际需要所制约 ,不能无限扩大。

那么 ,东西方思维方法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 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又造成哪些差异 ? 从翻译角度应该如何处理 ?

长期以来 ,人们一直习惯用东西方对峙的两分法来描述其思维方法的差异 :东方的思维方法被描述为“ 精神的 ”、“ 内向的 ”、“ 综合的 ”和“ 主观的 ” ;而西方的思维方法则相对地被描述为“ 物质的 ”、“ 外向的 ”、“ 分析的 ”和“ 客观的 ”。这种两分法是否科学则众说不一 ,本文这里不想展开论述 ,只试图从思维、语言、翻译三者关系上探察其差异 ,寻求其解决的途径。

^① 这个“ 东 ”与“ 西 ”已不是地理上的方位 ,而是文化概念 ,这个概念源自欧洲。(见许国璋《西方文化史选读第一讲》)

§ 1 东西方思维方法差异与语言表达方式差异

思维是人脑的一种机能,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在于思维的不同角度决定了语言表达形式的多样性,思维方式不同必然影响表达思想内容的相应的语言形式的不同。

一、从本体论角度比较

从本体论角度比较,东方人是本体的,注重整体和谐,受《易经》哲学影响强调从多归一的思想;而西方人,包括俄罗斯人是分析的,重视分析原则,强调由一到多的思想。思维方式:西方人采用焦点视思维方式,中国人则采用散点视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方法反映在俄汉两种语言的造句法上便出现了显著的差异。俄语的句子以主语和谓语两大支柱为核心(焦点)控制句内其他各种成分(如各种短语、从句等),由主到次,递相迭加,形成“由一到多”的空间构造。这种句法有人称“营造学法”,有人称“空间型构造法”,而汉语则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先后)逻辑事理为顺序,横向铺叙,形成“由多归一”的流水式的“时间型造句法”,有人称“编年史法”。这说明汉语的造句注重的不是空间构架的严整,而是线性的流动、转折,追求流动的韵律、节奏,不滞于形,而是以意统形,自上而下是一个形散意合的系统。有人形容汉语造句“如大江流水,后浪推前浪”,俄语则“如参天大树,枝繁叶茂”。

因此在翻译时,应按各自造句法的特点,重新组合排列。该顺译则顺译,该逆译则逆译,或合或分,顺其规律,无一定的模式。这样做才符合各民族成员的文化接受心理,反之则会出现汉译“欧化”或俄译“汉化”的句子。

这里,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具体把握并消除由于两种造句法差异所造成的障碍的途径。

Большинство портретов Владимира Ильича не в состо-

янии передать того впечатления особой одаренности , которое быстро шло на смену первым впечатлениям от его простой внешности , как только вы начинали несколько ближе в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в его облик.

此句本身并不难。这是一个典型的由主到次、由一到多、句中成分递相迭加的句子。它按照俄国人的思维方法从前到后递次展开 ,顺势而下 ,而译成汉语 ,照此顺译则行不通 ,必须反其道而行之 ,从后向前逆译 ,才能为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所接受 ,才符合事理逻辑。试看 :只要稍微细看一下 ,你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朴实外表得来的最初印象会马上消失 ,随之而来的就是你对他的特殊天赋的印象 ,而许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肖像都没有能够表达出这种特殊天赋的印象。

二、从实用主义角度比较

东方人倾向实用主义 ,西方人倾向以保护自我为目的的个人主义 ,日本中村元教授曾指出 :“ 中国知识社会所追随的哲学传统和哲学研究是以实际目的为中心的 ” ; “ 在这一方面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与大多数欧洲经院哲学家和理想主义哲学家的思维方法 ,是有所区别的。”因为中国人受佛教影响很深。佛教是“ 从没有具体自我的一种印度宗教成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宗教 ” ,遵从了中国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的传统 ,长期以来 ,中国人形成了以人为中心来思考一切事物的方法。这种思维方法反映在表述一些概念的方法上便产生了与欧洲的差异。具体表现为 :当在印欧语系中以一些抽象概念作主语时 ,中国人则用一定概念的人作主语。例如 ,西方人说 :“ 苦难陪伴着我。”而中国人则将同样的句子说成 :“ 我经历了重重苦难。”这种差异在俄汉翻译中是很普遍的 ,一般都是进行主客体转换。(当然不是绝对的)比如俄语中一些表示感情的词汇 ужас ,страх ,смех ,тоска ,досада ,скука ,отчаяние ,зависть ,раздумье 等与动词 брать ,найти ,охватывать ,овладеть ,закрыться ,оказаться 等连用 ,其主语是这些抽象名词 ,而

译成汉语时则以人为主语。

例如：

1. Раздумье его берёт. (直译：沉思控制住他)。他陷入沉思。

2. Когда я увидел эт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на меня нашло сомнение: не подослан ли он к нам врагом.

当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怀疑起来(直译：怀疑碰上了我)：他是不是敌人秘密打入我们内部来的呢。

3. Счастье оказалось на моей стороне. (直译：好运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交了好运。

三、从理性主义角度比较

东西方的理性主义是不同的。中国的理性主义趋于具体化，称“具体的理性主义”。比如中国人好多举例子，好就事论事；而西方的理性主义趋于抽象化，称“抽象的理性主义”，比如西方人多谈观念、方法、法则等。这种思维方法的差异反映在语言表达方式上则出现词语概念的虚实转化问题，即词义的概括和具体的转化问题。俄语往往习惯使用表达同类事物的整体的词语来表达其中的具体事物（或现象），而汉语则相反。例如：

1. В старом обществе ему с малых лет пришлось тяжело трудиться, так как семья его всегда терпела нужду.

他在旧社会从小就受苦，全家缺吃少穿。

2. “Съезжу-ка я в Сараны, — решила Дорофея. — Привезу одежду и кой-чего из хазяйства.” (Пан., 《Времена года》)

“我回萨拉尼村去一趟吧，”多罗菲娅打定了主意。“我去拿点衣服和锅碗瓢勺来。”

有时，俄语中常使用某些抽象概念的词语来表达一些具体的思想、感情、行为或现象等，而汉语则往往化抽象为具体，喜好具体化。例如：

Он думал, что деревья больше людей достойны друж-

бы ,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 лгут в довольстве , не жалуется в несчастьи. . . (Леон. , 《Русский лес》)

他心想 ,草木比人更值得爱护 ,它们既不隐瞒自己的风姿绰约 ,也不哀怨风雨的摧残.....(草木的“ 满足 ”具体化为“ 风姿绰约 ” ,草木的“ 不幸 ”莫过于“ 风雨的摧残 ”了。)

§ 2 东西方思维方法在感知和取向上的差异与翻译

一、感知

何谓感知? 马歇尔·辛格在《文化:一种感知途径》中指出,感知是“个人对外部世界的刺激进行选择、评价和组织的过程。”思维方法不同,感知世界的方式也不同。人们行之若素全是出于对世界的感知方式。要想了解对象国的文化差异和词语的文化伴随意义,就必须了解他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对词语含义的解释要受各种各样不同解释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有人说词语的意义在于人而不在词本身,此话有理。因为语言不过是一种有组织结构的、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无不打上民族文化的印记。

(一)文化因素对感知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对相同的词语会产生特有的内在反应。这就是文化因素对词语的影响。记得哈里·С·特里安迪斯在《文化对感知的影响》中曾说过“文化因素则可能提供感知中的某些意义,因此,文化因素对于感知过程就有着本质的影响了”。举几个例子:

1. Главный инженер—Новая метла в виде бороды.
(Ажаев , 《Далеко от Москвы》)

总工程师是一把新笤帚,就象他那胡须似的新笤帚。

俄国谚语 Новая метла чисто метет (新笤帚扫得净) 比喻新官上任,大刀阔斧。

2. ... он встал с левой ноги. (Шолохов , 《Поднятая целина》)

.....他今天起床左脚先下地,真晦气!

俄国人有个习惯:清早起床若左脚先下地,表示一天不吉利,右脚下地才是吉利的兆头。翻译时加上“真晦气”表达出了词语的文化伴随意义(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由此看出,文化因素对于感知过程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二) 情感因素对感知的影响 谈到情感因素对感知的影响,首先想到各民族对数字的喜好与忌讳。西方人喜爱“三”,把“三”看成完美的数字,他们认为:世界由“三”组成——大地、海洋、天空;人体有三重性——肉体、心灵、精神;大自然有三个内容——动物、植物、矿藏;基督教主张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等等。俄国人喜爱奇异的 семь,俄语中由 семь 及其有关各类数词组成的成语,居其他数词之首。中国人喜爱九,九起初是龙形(或蛇形)之图腾化文字,后来演化出“神圣”之意,例如北京城有九门,天安门面阔九间,紫禁城房间有 9999^① 间等等。然而日本人却忌讳九(与“苦”同音),还有四(与“死”同音)以及带四和九的双位数,如 14(重死)、24(二重死)、49(始终苦)等。西方人忌讳 13 这个不吉利的数字已为众所周知了。

那么,对翻译来说,如何处理呢?常见的方法有:

转换成各自喜爱的数字:凡各民族语言中喜用的数字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它们是该民族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结果,因此翻译时应遵从各自的民族历史和民族习惯。例如:

1. 古人有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红楼梦》,第 2 回,第 27 页)

Ведь древние говорили, что “сороконожка и после смерти не падает”.

这里的“百”、“сорок”均为“多”、“众”、“大量”之象征,又都

① 另一说:1973 年曾进行一次实际调查统计,结果是:大小院落 90 多座,房屋 980 座,计 8704 间(见《每周文摘》,1990 年 6 月 20 日)。

是两个民族各自所喜用的数字 转换之后 效果等同。又如：

2. Эка что творят , ровно о семи жизнях ! (Леон. ,
《Русский лес》)

他们这样蛮干 ,莫非有三头六臂 ?!

舍弃数字 :可转换成形象词语或相应的不带数字的习语。例如《红楼梦》第 78 回有一段王夫人笑论晴雯的文字。其中一句说道 :俗语又说 “ 女大十八变 ”。Панасюк 的俄译文是：

Ведь пословица гласит : “ Пока девушка вырастет , с нею произойдет восемнадцать превращений ”.

女大十八变是指女孩子长大时各方面发生变化很大。这里的十八显然是个虚数、概数 ,并非实数 ,因此照实译来 ,似嫌不妥 ,不如套译成相应的不带数字的俄语现成成语 :Вербa идёт , верба растёт.

— Как же её узнать , мама ? Ведь Люся была не такая . . .

— Вербa идёт , верба растёт.

(Перв. , 《Честь смолоду》)

“ 怎么认得出是她呢 ? 妈妈 ! 那时候柳霞不是这样 ”

“ 女大十八变嘛 ? ”

(三) 思维方式对时空感知的影响

对时空的感知也受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西方人思维方式习惯从小处着手 ,以小见大(从小到大) ,而中国人的时空顺序则习惯从大处着眼(从大到小) “ 纲举目张 ”。所以俄英语与汉语表示地点和时间的方式恰好相反。例如 :汉语说 1989 年 8 月 7 日 ,俄语则说 7 августа 1989 г. 说到地点中国人由国而省→市→区→路→道→胡同 ,而英美人、俄国人则恰恰与此相反。

二、取向

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对行为、事物、观念上的取向存在着广泛而

重要的差异,这是各民族思维方法差异的反映。我们从翻译角度研究这些差异,目的在于对翻译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一种文化解释。且举例说明如下:

(一) 颜色取向 汉语中的“红茶”为什么译成俄语、乃至英语却变成了“黑茶”(black tea—英 черный чай—俄)。此乃何故?这是由于不同民族对颜色的取向不同所致。中国人着眼于茶水的汤色,而俄国人、英国人看到的却是茶叶的颜色。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的茶,原产于我国,16世纪下半叶茶才开始传到欧洲,于是汉语“茶”这个词也借入西方语言。例如法语“茶”叫 the,德语叫 tee,都源于闽南方言“茶”的读音[te]。俄国人对茶知道较晚,17世纪初通过荷兰传到俄国,不久便直接从我国西北地区进口,俄语“茶”叫 чай,正是从北方方言“茶”[tsha]音译的。茶文化帮助我们解开了“红茶”翻译之谜。

另一种情况是:有的民族取颜色作为区分概念的差异,而有的民族同一概念则取其他角度,反映了两民族思维方式的不同。例如:中国人说“黑色金属”与“有色金属”(以颜色作为属差),英美人则不同,以“成分”作为属差,说 ferrous metal (含铁金属,即黑色金属)与 nonferrous metal (非含铁金属,即有色金属)。

(二) 喻体取向 同一形象不同民族有各自的表达方式。例如蒲宁的中篇小说《乡村》中有一句子:Ну, да ненадолго лягушке хвост! [直译:青蛙尾巴长不了啦!]译成汉语恰恰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这就牵涉到喻体的取向了。俄国人从“有无”角度取向(幼蛙蝌蚪长成青蛙就没有尾巴了)。中国人从“长短”角度取向(兔子的短尾巴永远也长不长)。

在研究喻体取向时还必须涉及兽性取向,即关于兽类本性的善恶问题。西方人对人性取向研究较多,认为人类本性的善恶有三论:性恶论、性善恶论和性善论。美国人是性恶论者,他们认为人性基本上是恶的,但又是可教化至善的。也有的人认为人性是善与恶的混合体。中国人则是性善论者。“人之初,性本善”。在

人性取向上东西方有很大差异,可是在兽性的取向上则基本相同,尽管使用的喻体不同。例如:中国人说“披着羊皮的狼”,俄国人则说“披着鹿皮的虎”:

Они — тигры, подделывающиеся под оленей, чтоб лучше заманить и сожрать нас. (Серебряков, 《Юность Маркса》)

(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打算更好地来引诱和吞食我们。)俄语中也说 волк в овечьей шкуре。反过来,中国人说“如虎添翼”,俄国人则说“如狼添翼”: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 волку, да еще и крылья!(Абрам) 羊、鹿性属温顺,狼、虎性属凶狠,兽性取向相同。

(三) 时间取向 时间取向受制于文化差异,各种文化都必须处理有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概念,所不同的是对这三种选择在“时间级序侧重点”上有所区别。俄国人、美国人立足未来,中国人则注重面对过去看问题。这一点从俄汉民族对“前”与“后”的概念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且举 последний(最后的)和 впереди(在前面)为例:последние известия(最新消息,新闻), последний номер журнала(最近一期杂志);Об этом речь впереди(此是后话)。Его слова ещё впереди(他的话还在后头呢)等等。

(四) 命名取向 所谓“命名”取向,这是指观察和概括事物的方法和角度。在表达复杂概念时,由于思维方式不同,词语组成方式也不同,取向不同。因为语言体系就其语义组织方式而言,反映了不同民族对客观世界的看法。

汉英比较:

1. 挂钟 Wall clock

2. 座钟 desk clock

汉语侧重方式,英语侧重地点。

3. 跑表 stop watch

汉语侧重用途,英语侧重随时可停的特点。

4. 隐形眼镜 contact lenses(直译:接触眼镜)

汉语侧重外形(形式),英语侧重方式

汉俄比较:

5. 高压锅 скороварка

汉语侧重物理性能,俄语侧重速度(快慢)。

6. 面包车 микроавтобус

汉语侧重外形,俄语侧重大小。

7. 名片 визитная карточка

汉语侧重内容,俄语侧重用途。

8. 方便面 упакованная лапша

汉语侧重省时,俄语侧重包装。

§ 3 中国古典思维方式及其翻译

一、喜好在古典中寻求“权威”

中国古典思维方法主要表现在对待古典的态度上。中华民族对自己的古典历来持尊重态度,视祖先的典籍为不可挑战的权威,甚至人们常常喜欢在有关的古典中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寻求权威。正如日本中村元在《古典思维方法的继续》一节中说:“中国文化保持和尊重一些思想方法,其原因恰恰在于它们是古代思想,这是中国文化的特异的现象。”他还说:“中国人常常重视先例,以先例作为先决模式。换言之,古代人昔日经验的成果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唤起一种确实感。”(见《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

中国古典思维方法既然是“中国文化的特异的现象”,无法与其他民族相比较,只想从译者心态上探求其应用的轨迹。所谓心态,就是对人、事物和意义以预先决定的方式作出反应的倾向和意向。译者在选词琢句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倾向。君不见在翻译家笔下不是常常可以看到他们运用词语时在古典文学中寻求“权威”,重视“先例”的思维轨迹吗?

1. Стих Пушкина — это вековечный образец, неумирающий тип русского стиха: не было и не будет лучшего

(Бел., 《Речь о критике》)

普希金的诗是俄国诗歌的永久典范,不朽典型,真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读罢译文,不禁使人想起唐代诗人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不正是译者在古典诗词中觅到的“权威”吗?运用得何等准确。

2. Урожай бывает в иных местах сам-пятнадцать.

(Дост., 《Записки из Мертвого дома》)

说到作物收成,有些地方常常是春播一升谷,秋收万斗粮。

句中 сам-пятнадцать 意为 15 倍于种籽的。我们可以感觉到译者在译这个词时想到了唐代诗人李绅《古风二首》中那脍炙人口的名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3. Был он, может, выдающийся личностью с могучим интеллектом и какой-то атомный миг испарился, превратился в мираж, в ничто.

他或许曾经是一位智力非凡的卓越人物,但在原子弹爆炸的一瞬间,化为幻影,灰飞烟灭了。

想必,译者想到了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羽扇纶布,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名句了。这样的优秀译例不胜枚举,关键在于运用得当。

二、喜好形式齐整的传统修饰风格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典思维方法之一重要特性是喜好修饰之文风。中国僧人道安曾说过:“胡须尚质,秦人好(美)文。”(《出三藏记集序》)。汉语是一种艺术化语言。它讲究韵律、格调、节奏等齐整的形式。中国学者喜好修饰之风格,古人如此,今人亦如此,创作如此,翻译亦如此。从以下译例(词、句、段)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译者继承中国古典思维中的传统修辞风格。

1. Не было на свете ни одной живой души , которая помнила бы о нём. Вениамин , Дюдя детства , юности ?... Мираж , мираж ! (Фад. , 《Последний из Удэга》)

世界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想到他。维尼阿明 , 久嘉 , 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好友呢 ? 都是镜花水月 , 水月镜花 !

我们看到译者在译 мираж 一词时 , 没有照原文简单地重复 , 而是运用颠倒词序手法 , 产生了强烈的修辞效果 , 读来感到对称和谐 , 韵味浓郁 , 富于节奏。这是一种常见的古典修辞手法。

2. Болезнь уже так умножалась , что никакого способу не остаётся оную прекратить. . .

В присутственных местах все дела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 приказные служители заражаются.

Приемлю смелость просить мне на сие злое время отлучиться. (Шишк. , 《Емельян Пугачев》)

疫事猖獗日甚一日 , 已非人力所能扑灭.....官员皆染病在身 , 一应公务不停而自停 , 大小官署不闭而自闭。为此斗胆恩请陛下恩准微臣蜚离 [莫斯科]。

原文一个句子译者却用了两个句子表达。把 в присутственных местах 译为“大小官署” , 把 все дела 译为“一应公务” , 而将 остановились 两次重复 , 分别译成“不停而自停” ; “不闭而自闭” 。两两对称 , 形式齐整。充分显示了译者古典思维方法之精通 , 技巧运用之娴熟 , 可称运用古典思维方法翻译之佳例。

尊重中国古典 , 继承中国古典思维方法 , 提倡多种思维模式 , 是提高翻译质量的一条重要途径。

(原载《外语教学》1992 年第 4 期 , 原标题为“文化与翻译三论”)

文化翻译与语用学

刘 先 刚

一、文化特征与翻译

文化特征的研究包孕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一位成功的译者或优秀的译评专家,往往是充满两种文化意识与精通两种有关语言的真正意义的文化人。

什么叫文化?狭义论者认为:文化只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指人类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艺术、传统、习惯、社会风俗、道德伦理、法的观念和社会关系等。在广义论者看来,文化几乎无处不有,无所不包,从生态学、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到语言文化。不管是广义的文化还是狭义的文化,都包含许多层次和方面,天文地理,人情风俗,俚语方言,历史事件,小说人物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而具有广泛性、历史性、交变性和多维性,所谓翻译,就是借助语言这一多功能符号体系,进行各种文化信息之间的转换。因此,任何翻译都离不开文化;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王佐良:翻译中的文化比较,1984.1,《翻译通讯》)。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工作显然具有在其自身固有的繁杂艰巨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各民族习俗迥异。比如,汉语中的“自由主义”与英语中的 liberalism 差别很大。前者指目无组织纪律或行为任意性,是贬义词;后者指一种颇为开明的政治、哲学态度,反对给人施加政治的、精神的外来束缚或限制。汉语成语“春雨贵如油”只有放在特定

的中国文化历史背景下才能被理解,西方人或春季多雨的热带国家的人听来都是十分费解的,因为那里春雨(或农田灌溉用水)既不难得,油也并不很贵。

2. 各民族说法不一。譬如汉语中的“一箭双雕”或“一举两得”,到了德国人那里就成了“beide fleign mit einer klappe zu schlagen”(一个拍子打两只苍蝇);英国“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打死二鸟);法国为“faire d'une pierre deux coups”(一块石头打两处);俄国人则说“одим выстрелом убить двух зайцев”(一枪打死两只兔子)。

又如我国石油工人习惯上讲的“井次”,指的是“工作量”的大小,英语只用 times(次数)或 wells(井数)表示就行了。well-times 一语简直使洋人莫名奇妙。这是因为要用有限的词汇指称无限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每种语言所属的文化都必须按自己的特别需要和兴趣所在对现实进行切分。文化重点,直接影响着语言词汇的多寡、特化程度和分化程度,造成原语中的指称对象在译语文中不存在的现象。

3. 各民族典故有别。典故是用一种简单符号传达复杂信息的方法。Edgar Snow 在 Red Star Over China(《西行漫记》)一书中描写当时北京的状况时,提到和穷苦、饥饿、正在反抗异族侵略的中国人形成鲜明对照的饱食终日的外国人 could live in their own little never-never land。又如,我国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将出自苏格兰作家巴利(Barrie. J. M. 1906-1973)的幻想小说 Peter Pan 的 Never-Never Land 译作“世外桃源”这一中国典故,最有效地传递了原文信息,使译文读者得到了与原文读者颇为相近的感受。

4. 各民族用语内涵不同。如 revisionism,我们通常译为“修正主义”,并赋予它与马列主义完全相对立的政治内容。但是,这个词在世界论坛上意思是为某一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做翻案文章,词义主要是积极的,是对历史上已有的结论作出不同评价的意思。又如,在中国人看来,“龙”是神圣、帝王的象征。“真龙天子”

过去世代被奉若神明,顶礼膜拜。“龙腾虎跃”、“生龙活虎”、“龙飞凤舞”等说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是,大家所熟悉的“亚洲四小龙”,决不可真译为 dragons,原因在于“龙”给英美人的印象很可怕,据《圣经》记载;“龙”是罪恶的象征。英美人对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无法理解。许多英文报刊顾及英美读者的习惯,译文经过文化转换处理;“亚洲四小龙”成了“亚洲四虎”(four tigers),堪称十分恰当的妙译。

二、文化转换

由于两种文化差异的存在,为向译文读者忠实地转达原文语用信息,有时要作适当的文化转换。双关语是个典型的例子。英语单词多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音节构成,同音字很少,因此英语的双关语很多是以同一个单词的不同词义为基础的。汉语词多为单音节或双音节,以元音开头的情况较少,再则一般无辅音连缀,所以音节组合总数较少,同音字特别多。这就使得汉语中谐音双关语大大多于英语。例如,莎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二幕第四景中 Mercutio 讥讽老乳母为娼妓时,用了 hare 一词:

Romeo: What has thou found?

Mercutio: No hare, sir.

hare 本义为野兔,俗语有娼妓之意。显然这是莎翁的双关语表现手法所在。梁实秋先生把这段对话译为:

罗:你发现了什么:

墨:倒不是野鸡,先生。

“野鸡”为“野妓”的谐音。“野兔”变成了“野鸡”,恰与“野妓”谐音双关。译者译此词时一定颇费心思,在文字上琢磨了一番(黄维梁:丽典·可乐·美配露——“雅译”漫谈,香港《明报月刊》1984年6月号),使得语用意义在语法平面上、语言文化上、文字结构上和行文风格上达到了形式对等,曲尽其妙。

三、文化翻译与语用学

由于历史、地域、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不同,中国人和外国人往往对同一事物的思维、理解、看法和说法不尽一致,甚至有很大差异。

1. 社会文化方面。例如某单位宴请几位外国专家,虽餐桌上是美酒佳肴,但主人起身盛情举杯:“今天饭菜不好,请多包涵。来,先干上一杯。”这番话对中国人来说,自然恰到好处。然而,如果直译出,势必让外国客人大为不解:既然宴请,为何用不好的菜肴?话语就是在环境之中发生了意义功能嬗变。这里我们不去评论讲话者的涉外水平如何,需要的倒是如何运用语用学的策略和原则,随机不动声色地进行灵活处理,以保证交际的顺利进行。此句不妨译作:These are the best dishes we were able to prepare. Please make yourselves at home. Now, to everyone, cheers!这么一变通,宾主皆大欢喜。

又如宴请外宾活动结束,宾主握手告别,按理,主人表示Thank you for your coming 当再妥不过,可他突然说到“照顾不周”。同理,对象如果是国内客人,倒也无可厚非。可在这种场合,没有过失而道歉,就让客人不可思议了。面对这种情况,不论用译语的等值语法和词汇替换原语的语法和词汇即在译语中寻找等值物(式),还是求得译文在译语中所引起的效果应等同于原文在原语读者中所引起的效果,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语言符号具有以民族文化和历史、地域的变异,这种变异会导致语义功能的改变。再者,民族心理和意识倾向,不仅可以导致不同的思维特征、思维方式和思维风格,而且产生不同的审美意识系统。所以,不同民族心理对语言承载的信息感应不可能等效。因而绝对不能简单地对号入座,要讲究语用意义对等,即从语用学角度来考虑,遵循交际中的合作原则,包括礼貌原则,策略原则,大方原则,满意原则和呼应原则等,描述其不间断的、非具体的涵义。根据量准则

(maxim of quantity) , 提供适量的信息 , 表示谢谢客人的光临 , 道别就行了。

利奇提出的“ 礼貌原则 ”(politeness principle) , 是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学说的基础上产生的。他认为 , 人们在交际中不仅仅遵循合作原则 , 同时也遵循礼貌原则 , 以达到更好的交际效果。换言之 , 在交际中 , 讲话者注意遵循礼貌原则 , 讲话者认为听话者也注意遵循礼貌原则 , 讲话者肯定听话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 这是语用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南京大学 80 年代初欢迎法国总统米特朗访问南大时 , 校内发了一篇题为“ 辛苦了 , 米特朗总统 ” 的欢迎词 , 当时围绕着这个题目的译法 , 争论颇多 , 经过几番斟酌 , 最后采用了“ Allo , President Mitterrand ” 的译法。这个译法应该说是依照了礼貌原则 , 同时以最经济、最富有表达力而又最客气的语气方式——allo 传递了南大师生的信息。这里 , 合作原则与礼貌原则互为益补、相得益彰。

在我国人们爱讲“ × × × , 辛苦了 ” 这句话。通过以上分析 , 我们可将这句话依据语言功能的特点和具体语境场合分为五种情形来译 : 1) 客人远道而来 , 以此表示欢迎 ; 2) 以此祝贺对方所取得的成就 ; 3) 以此为对方的工作热情、干劲和工作效率表示钦佩之情 ; 4) 针对他人工作的辛苦性以此表示赞叹 ; 5) 以此作为纯粹的问候语。五种情形 , 其语言系统的三个层次——语义层(semantic level)、语法层(lexicogrammatical level) 和音位层(phonological level) 以及每一层的各个系统都不尽一致 , 其社会符号(social semiotic) 的语景结构的场(field)、旨(tenor)、式(mode) 三个方面也不尽一致 , 因而译法自然各异。这样 , 才能真正把握住说话者的会话含义。

2. 语言文化方面。语用学学派理论认为 , 对语法准则可以分成类别进行抽象的描述 , 而语用原则却不能分成类别。语用涵义是超过句子语法含义之外的“ 实际意思 ”。例如 dog eats dog 的语法含义只是说明这是一个陈述句式 , 陈述一事实 , 即由于其具有

极强烈的形象意义被人们所误译的“狗咬狗”现象,而这句话的语用涵义是凭动物本身力量战胜对手,激烈竞争,进行一场“fair fight”,而不是贬义的互相勾心倾轧,更不是坏人之间的内讧残杀。值得注意的是,dog 在英美的形象非但没有一点点的可恶,而且要可爱得多。同理,they are playing cat's cradle 根本不是“他们在玩猫的摇篮”,这种望文生义式的翻译的根源就在于形象思维中的具象与某些形体动作干扰的结果掩蔽了 cat's cradle 的语用意义——翻绞绞游戏,因形见义的汉字特点干扰了分析屈折语的正常的翻译思维过程。

3. 科技文化方面。当今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科技革命愈益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存方式,愈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科学社会化和社会科学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人们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或文化氛围中生活,时时处处承受着它的陶冶作用。举例来说,英美人士外出就餐或者住店就餐,都要首先同“menu”(菜单)打交道。由于习俗条件,他们久而久之便对 menu 产生了一种亲近感,于是一见到 menu,他们便会联想起一桌可口的佳肴。menu 一出现在计算机屏幕上,就会给他们一种愉快的令人满足的意念。但是在我国除较正式的饭店宾馆里使用“菜单”之外,一般的饭铺吃摊是用不着的。因此,众多的中国人对“菜单”的感受与英美人士对“menu”的感受大相径庭。为了让译语读者准确地理解解释传递来的信息,做出了与原语读者相应的反应,亦即完成听话者所承担的任务,“menu”一词还是译作“目录单”为宜,这样名正言顺,名副其实,自然易于为中国读者所接受,体现了避免晦涩和歧义的方式准则(maxim of manner)。

我国石油工业中,有一项用以增产的压裂施工作业,施工中常常用到“砂比”这个表示加砂量大小的技术参数指标,可是在英文里,它不是 sand ratio,也不是 sand content,而是 concentration,只此而已。因为在外国人看来,所提到的“砂”不应是简单的砂子,而是泛指砂子、陶粒之类呈固体颗粒状的支撑剂。随着科学技术

的飞速发展,这类支撑剂的数目和种类日益激增。这是国外的概念。它和我们明显有一种文化、地域方面的差异。这种差异无疑会导致语义功能的变化。因而对号入座式的机械译法无法捕捉其真正信息,达不到语用涵义的等值传递的效果。这个例子无疑证明了功能学派语言学家马丁内的说法:“一种语言和另一种语言的词汇意义和功能的分布情况是各个不相同的”;“每一种语言都按自己特有的形式来组织和它相对应的经验材料”。

四、结语

王佐良先生早就指出:“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种族渊源、历史变迁、宗教信仰、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差异,各个民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各个社会集团也都形成了自己的次文化,这种结果导致了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语用学的任务恰好是发现和研究不同的语言社团如何使用不同的语言准则,其重点在于语言之间的不同点,而不在相同点(Leech,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P. 80 Longman)。从以上对文化翻译与语用学的相关分析和实例解剖中,可以引出下两点结论:

1. 要深入了解翻译的规律性,全面把握翻译的实质,就必须扩大视野,在继续肯定翻译是语言和言语活动的同时,采用一些新的或过去不曾用过的理论对翻译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的考察,拓宽我们的研究领域。引入语用学机制,不失为跨越文化翻译屏障的一项颇有意义的尝试工作。

2. 为了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错解原文,译者不仅要掌握原语的语言系统,还应尽量多地接触与了解该语言所属的整个文化系统,并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在特定环境中的实际应用及其交际功能保持高度的意识,尽可能全面地捕捉原语所发出的真实信息——会话含义。

(原载《山东外语教学》1989年第4期)

文化·语言·翻译

刘重德

文化、语言与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翻译工作者要想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有必要来关注和研究它们互相依存、互相影响的关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个初步探讨,求正于广大读者。

首先谈谈文化和语言的关系。

本文所指的文化,很难找到一个满意的解释,笔者愿在这里介绍三种说法,使它们收到互相补充的效果:

第一种说法:文化的经典定义,是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泰勒之后,人类学家们又给文化下过很多种定义,但是这些定义中的大部分仍以泰勒的定义为基础。现代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具有如下的四个本质特征(1)文化是经由社会习得的,而非遗传获得的(2)文化是一个社团所共有的,而非某一个人所独有的(3)文化具有象征性,语言是文化中最重要象征系统(4)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文化中的每一方面都和其他方面相互关联。”^①

第二种说法:所谓文化,有多种含义。本文所指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价值观和行为观。这些观念时刻在控制指导我们的行为,无论是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伴随语言行为(paralinguistic behavior)或是非语言行为(non-verbal behavior)。所以,要驾驭一门外语,学习者一定得经历从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

etence) 的成熟到社交语言能力 (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 的成熟, 最终到文化能力 (cultural competence) 的成熟这一必经的过程, 缺一不可。

文化与语言有相辅相成的关系, 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学习其语言文化的过程。文化具有其自身的……规律, 因此, 文化并不玄秘而是有章可循的。”^②

第三种说法: 语言文化特性的研究包孕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它牵涉到一种语言所代表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和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将语言文化特性分为五类:

1. Ecology 生态学,
2. Material Culture 物质文化,
3. Social Culture 社会文化,
4. Religious Culture 宗教文化,
5. Linguistic Culture 语言文化。”^③

综观上述三种说法, 不难看出文化与语言之间的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化包含着语言, 并影响语言, 而语言则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保存文化、交流文化和反映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工具。文化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

各民族的文化既有共性, 又有个性, 共性来自于人类(包括各个不同的民族)共有一个客观的大自然, 对于大局的认识基本相同。由于交流对客观存在事物的认识(思想)的必要, 人类就有了语言。各民族语言的构成形式虽不同, 但表述认识的句法框架则基本相同, 也就是说, 各民族的句法都由主语和谓语两大部分组成。而个性则来自于各民族所处的小环境不尽相同。根据奈达的分类法, 便是所处生态环境、物质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宗教文化环境的不尽相同, 从而产生了语言文化的不尽相同, 不仅在词汇上如此, 在句法的细微结构上也是如此。譬如说, 英语有冠词, 而汉语则无这种词类。英语限定性定语从句一般都在所修饰的中

心词之后 ,而汉语的类似修饰语则一般放在它的前面。对于否定问句的回答 ,英、美和我们的出发点也不同。英美是以答句的肯定或否定为主。如答句本身为肯定式 ,便答 Yes ,反之答 No。我们则以问句为准 ,如同意问句所否定的事实 ,便答“ 是的 ” ,反之答“ 不 ” ,或“ 没有 ” ,视具体情况而定。这就是说 ,英美文化和中国文化各有特色 ,思维方式有时也有所不同。

再如“ 汉语有一组动词表示‘ 用体力负运东西 ’ 的动作：扛、荷、挑、担、抬、背、驮、负、提、挎 ” ,不但说明了负运的工具与方式 ,而且限定了负运的事物(如 :荷 锄、挑土、担水、提箱子) ,真是细密之极。从下义关系看 ,它们是一组下义词(co—hyponyms) ,但汉语竟然没有一个词充当上义词 ,造成上义词空缺这一不规则现象。……拿英语来比较 ,只有一个 carry 泛指这些动作 ,却没有用什么词来对译‘ 扛、荷、挑、担…… ’。汉语中指用体力负运东西的动作如此丰富 ,是否与我们祖先的某些生活习性有关呢？”^④

这段话基本上谈得很好 ,但美中似有不足之处 ,建议作如下修订和调整：

第一“ 驮 ” 字一般用于马和其他畜类的运输 ,以作为上义词“ 运输 ” 的下义词之一为宜 ,如驮运 ,车运 ,船运等等 ;其余“ 荷 ”、“ 挎 ” 等词则属人的动作。

第二 ,说这些表示人的动作方式的词在汉语中竟然没有一个词可充当上义词 ,似与实际不符。根据使用的场合不同它们可以分别有两个上义词。如用于随身携带的场合 ,其上义词为“ 携带 ” ,如“ 农夫日暮荷锄归 ”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天黑时 ,农夫携带着(具体说 ,是扛着) 锄头回来了。放学后 ,学生都挎着(概括说 ,是携带着) 书包回家了。“ 抬 ” 指两个人的动作 ,也可以用于携带的场合。例如 :张家两弟兄参加了授奖大会 ,回校时抬着一大包奖品。如用于搬运的场合 ,它们的上义词便是搬(运)。但“ 荷 ”“ 负 ” 两词为古汉语 ,搭配能力极差 ,如“ 荷锄 ”“ 负薪 ” 等 ,在口语中已很少使用 ,最好不把它们归入“ 搬(运) ” 的下义词 ,其他动词

都可以视具体情况随使用。譬如说,请你们两位把这张书桌搬到(具体说,是抬到)新宿舍去;你把这个包包拎到(概括说,是搬到)那里去;你把这副担子挑过去,等等。

可以看出,语言特点的不同,生动地反映了文化的差异。

其次,谈谈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明确了文化与语言互相依存的关系,也就明确了文化与翻译的密切关系。翻译之所以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容易,乃是因为语言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在不同的文化里,相同的词语可有不同的文化涵义,例如英汉两种语言中都有龙的概念,但 dragon 在英语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可怕的恶的象征。在汉语中则恰恰相反。在我国古代,龙就是皇帝的象征,后来又引申为高贵、珍异的象征,语言中也就相应出现了“龙颜”、“龙袍”、“龙庭”和“望子成龙”等等褒义表达法。从这种意义上说,“龙”是我国文化的“特产”,是一种文化个性。^⑤

相反,不同的词语也可以有相同的含意。例如英语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 和汉语的“一箭双雕”表面的表达方式不同,但它们的含义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两者表达“一举两得”的意思。

在表现法中,“习语具有强烈的文化特征,是语言的核心与精华。”习语翻译要同时处理语言和文化两对矛盾。处理文化差异成为习语翻译成功与否的关键。常见的传统处理方法有:^⑥

1. 避而不译。绕过难点。

“这两件事都是实的,倘若审断起来,体面上须不好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卷卷行李,一溜烟急走到省城去了。”(吴敬梓《儒林外史》第5回)

“Both complaints are true, and if I have to appear in court I shall lose face. Better make myself scarce. He bundled some things together and fled to the provincial capital.”(Translated by the Yangs.)

笔者按:译者在此绕过的难点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前

一部分,后一部分的基本涵义还是译出来了。其实,就译者的才能来说,翻译这句成语是易如反掌的。笔者认为,一为保存原作者“丰姿”(鲁迅用语),二为如实传播原语文化,以直译加注为好。似可译成:Of the thirty-six strategems, the best is to quit.”这样译法,凡懂得英语的外国读者,根据上下文,都是可以理解的。再加上脚注,那就更不成问题了。

2. 用异语文化替代原语文化。

班门弄斧

“Teach one's grandmother to such eggs.”

笔者按:这个成语,不论是孤立的翻译,还是夹在上下文中的翻译,均以采用直译为宜。《汉英词典》是这样译的: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可供参考。译得很好,因为增减得当,灵活实用。撇开无关宏旨的“门”字不译,文内增补了画龙点睛的同位语 the master carpenter,本身自明。译者在有上下文时可参照灵活处理并加脚注。这个译法,基本上仍可说是直译。

3. 直译加注,传达形象。

“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象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笑道:“若真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了;不但不为新奇,而是更是可厌。”(曹雪芹《红楼梦》第34回)

“Can this be another absurd maid come to bury flowers like Taiyu”? he wondered in some amusement. “If so, she's Tung Shih imitating Hsi Shih”, which isn't original but rather tiresome. (Translated by the Yangs.)

笔者按:东施、西施、黛玉的音译,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根据标准的汉语拼音方案,应分别拼成 Dongshi, Xishi 和 Daiyu。* 表示加有脚注,在此从略。

笔者认为,这种译法应视为习语翻译的基本译法,以便再现原语风貌和充分传达原语文化。

4. 直译保存形象。

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毛泽东选集》第1499页)

The Americans have sprinkled some relief flour in Peiping, Tientsin and Shanghai to see who will stoop to pick it up. Like Chiang Tai Kung fishing they have cast the line for the fish who want to be caught. But he who swallows food handed out in contempt will get a belleyache.

笔者按:北平、天津等地名采用的是旧式拼法,根据汉语拼音方案,北平应拼为 Beiping,天津拼为 Tianjin。姜太公照新拼音变为 Jiang Taigong。此译甚佳,但加脚注说明成语来源则更为完善。

5. 直译加意译。

Men sent flowers, love notes, offers of fortune, And still her dreams ran riot.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y! What a door of an Aladdin's cave it seems to be. (Th. Dreiser, Sister Carrie)

男人送花,送情书,送时运给她。可是她还幻梦无边。这一百五十块钱!这一百五十块钱!真像藏着神灯似的山洞为阿拉廷打开了门。

笔者按:必要时,译者可以这样灵活处理。这种方法也算得上一种好方法,因为它依然保留了原语形象和文化。

6. 在正文中引出典故情节。

(中文引文同3)

"Can this be some silly maid come here to bury flowers like Frowner?" He wondered. He was reminded of Zhuangzis story of the beautiful Xi-shis ugly neighbour, whose endeavours to imitate the little frown that made Xi-shi captivating produced as aspect to hideous that people ran from her in terror. (Translated by Haw-

kes)

笔者按, to hideous 显系 so hideous 之印误, 不能归咎原译者, 但这种译法, 已不是翻译, 只能称之为编译, 根据上下文, 在 He was reminded of 之后, 本来接上 the story of Dongshi imitating Xishi 等 6 个字已经足够, 而他却用了 31 个词, 编多于译, 不足为训。此类情况, 仍应采用“直译加注”的办法来解决。

习语翻译, 一般说来, 比较困难, 尤其是遇到字面意义与实际涵义相反的那类成语时, 要特别注意, 稍不小心, 就会出错。“例如中国有句古语, 叫作‘知子莫如父’, 英国也有个成语: 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knows his child. (The Merchant of Venice) 乍一看, 两句成语意思相近, 其实涵义相反。汉语强调父亲最了解孩子, 英语却用‘It is (a wise father) that. . .’这种句型来反衬即使是父亲也不一定了解孩子。如果不注意民族文化中思维方式的差异, 就不可能恰当予以传译。”^⑦

“对待原文, 应当以作者的民族文化背景为依据, 力求予以正确地理解; . . . 有时还要顾及操同一语言的不同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据说, 一个英国人在美国打长途电话, 美国电话员接通线路后问他: Are you through? 英国人刚说了‘Yes, . . .’还没有来得及同对方讲话, 美国电话员已把线路切断了。这个笑话说明, 即使我们翻译的是英语, 也还是结合作者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去理解和表达。”^⑧为什么会发生误会呢? 因为“Are you through?”这句问话, 美国话务员是用来询问那位英国人“话讲完了?”而英国人则认为是问他“接通了吗?”因而阴差阳错; 驴头不对马嘴”。

本文前面所举的例证, 多为民族性强的习语及其译法。其实, 就连反映文化差异的普通生活中常用词也不易翻译。例如 uncle, aunt 等等亲属称谓究竟怎么译才符合实际, 有时也成为头等难事, 例如马克·吐温的 Uncle John Quarles 中的 Uncle 一词的译法, 在我国出版物中的译法很不一致: 有译作“叔叔”(“叔父”)、“舅舅”(“舅父”)、“大伯”(“伯伯”)的。张廷琛为此进行了考证, 写了专

论,证明 Uncle John 只能是吐温的姨父^⑨,与姨父结为夫妻的 aunt 也只能是吐温的姨母了。遇见这类难题,译者必须不殚其烦地查清来龙去脉,绝不可主观臆断,免得闹出“叔叔”和“姑姑”成为夫妻之类的笑话。

对于文化差异的译法,我的基本观点和倾向已表现在讨论传统译法时的笔者按语中,下面我想就形象翻译问题谈点意见。我曾以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为对象,作过一番调查研究,摘引十处,汉英对照,分析概括,结论如下^⑩:

综观上引十处,形象比喻的译法,一共使用了四种,而这四种译法在形象翻译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既适用于汉译英,也适用于英译汉。现分别把它们的特点以及应该注意的地方略加阐述:

第一是保留形象的直译法。例如:“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直译为“foot-bindings of a slattern long as well as smelly”。这种直译法多达九条,好处是生动活泼,正像鲁迅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保存原作的“情调”和“丰姿”,但也不能胶柱鼓瑟,一成不变,直译出来必须达到使读者能够根据上下文心领神会译文的含意。否则,就应考虑转换形象或其他译法。

第二是转换形象的活译法。转换形象的好处,是在转换之下仍然保存了语言的生动性。转换形象有两种情况:一是局部转换,例如“看菜吃饭”(“fit the appetite to the dishes”);一是全部转换,例如“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a mere bag of bones”)。

第三是保留原文的意译法。已如上面(指第七条)所作分析,不可滥用,免得损害形象以至丧失形象和语言的生动性,不过有时也不可避免。使用这种译法时务要注意做到尽管字面上看起来有些出入,甚至大相悬殊,但其实际含义仍然一致,互相吻合。……现以汉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句成语为例再进一步谈谈。如采用保留原有形象的照字面直译过去,外国读者就很难领会其真正喻义,如采用意译法把它译成一个解释性的词语,那又会使人感到淡而无味。根据上述应力求形象化这一原则,不妨考虑采用转

换形象的活译法译成英语成语 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Like attracts [or draws to] like) 以便收到言简意赅、形象生动的效果。汉英这两句成语基本含意相同 ,均喻指“ 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

第四是保留原音的音译法。例如“ 瘪三 ”之译为“ piehsan ” (现为 biesan)。使用这种译法时 ,要注意 除非像毛主席这样在本文上下文中已对有关词语作了说明 ,就必须另加脚注或附注予以适当的解释。否则 ,外国读者可能不知所云。这种译法 ,虽不普遍 ,只在第十处中出现过 ,但也不可偏废。其实 这种译法 ,由来已久。

就文学翻译中形象比喻的译法而论 ,从毛选一篇文章所归纳的四种译法 ,虽仅一叶 ,但足以知秋。如再加上两种切实可行的译法 ,则更为完善。一是“ 直译加意译 ” ,例见上引传统译法 5 ,二是“ 借用类似成语 ” ,例如汉语成语“ 有其父必有其子 ”之与英语成语 Like father , like son , 等等。

通过这次对文化、语言和翻译的密切关系的调查研究之后 ,我更深入一步地明确了我们在艺术语言的文学翻译中必须坚持“ 直译方法为主 ,其他方法为辅 ”的原则。这样做的好处很多 ,其最显著者有三 :一是保留鲁迅所说的原语文化的“ 情调 ”和“ 丰姿 ” ,使读者感到新鲜生动 ;二、充分传播原语文化 ,扩大读者的知识视野 ;三、更加有效地促进交流 ,以丰富和提高民族文化。

(原载《 外国语 》1992 年第 4 期)

注释 :

- ① 柯平《 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 》《 中国翻译 》,1988 年第 1 期。
- ② 李磊伟、李文英《 文化与语言习得 》《 外国语 》,1988 年第 4 期。
- ③ 杨永林《 文化比较与翻译 》《 中国翻译 》,1987 年第 3 期。
- ④ 李冬《 下义关系的不规则性——兼谈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 外国语 》,1987 年第 3 期。

- ⑤ 参看谭载喜《文化对比与翻译》《中国翻译》,1988 年第 5 期。
- ⑥ 参看穆雷《从接受理论看习语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中国翻译》,1990 年第 4 期。
- ⑦⑧ 刘山《翻译与文化》《翻译通讯》,1982 年第 5 期。
- ⑨ 张廷琛《马克·吐温几个亲属称谓的译法商榷》,《外国语》,1985 年第 3 期。
- ⑩ 刘重德《翻译漫谈》,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文化背景知识、文化背景学和外语教学^①

俞约法

前 言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的兴起,是苏联近二十年来外语教学界(特别是对外俄语教学界)的头等大事。人们在理论上多方面地不断探索这门学问的种种大小问题,在教学实践中大量引进这方面的实际材料。但我国对苏联这个学术领域的动向尚未见过有系统的专门研究。笔者认为,苏联在这方面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做过以及正在做的工作,对我们今天改进自己的外语教学不无借鉴意义。因此,抛砖引玉,拟比较系统地介绍其基本情况,并联系我国实际,作为初步探讨。

但在正式讨论实质性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现行的译名提出订正,并通过正名,首先考察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一术语的所指、它的对象等等。这是因为:第一,现行译名未能准确反映原文术语的实质,未能表达其全部主要内容,易引起不了解情况的读者的误解;第二,这个术语在苏联外语教学界的使用也极其混乱,在探讨它之前,必须先赋予确切的涵义,并严格遵循这一理解来讨论问题,这是任何学术讨论的起码准则。当然,这样的正名工作和对术语所赋予的内容今后是否为人们所接受,那是另一回事。这只是限于本文的范围内为便于讨论才暂时这样“约定”的。

一、文化背景教学、文化背景教学法和国家概况教学、国情学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是一门新兴的而且正处在发展中的学

科,这个术语本身也是正在发展中的概念,难怪乎各家之说极为不一。据笔者管见所及,最早正式提出这一外语教学法范畴并加以系统科学论证使其成为一门新学科的是科斯托马罗夫和维列夏金二氏合著的《语言与文化》(1)一书。不妨说维、托二氏是这门学科的奠基人,而这部书则是这门学科的奠基性著作,苏联外语教学界奉为经典。它先后三次出版(1973年初版,78年修正二版,83年修订三版),每次出版,作者都作了大量的,甚至是原则性和体系性的改动,对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样一个标新立异的术语定义、范围等等都有不同的说法,即以最新的第三版而言,其先后的界说也不一样。该书不同的版本,甚至同一版本的不同章节,对这个术语的解释和使用都有不一致乃至自相矛盾之处。此外,科、维二氏在不同时期发表的不同论文中,对该术语所赋予的含义也不大相同。至于别的作者在论及这个问题时,对该术语的理解更是五花八门。更需指出的是该术语同另一术语——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在俄文外语教学法文献中的使用,作为两个概念,无论是在内涵上还是外延上,都十分混乱,两者常处于极其复杂的关系之中:有时呈包含关系,有时则呈交叉关系(或部分叠合关系),而有时又表现为并列关系(或全异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甚至相互通用,彼此不分。科、维二氏在前述书中虽曾试图把二者严格区别开来,而且曾数次对它们下定义,然而在下定义以后,作者在自己以后的行文中却并未严格遵守。在各种论著中相互混淆或代替的情况更层出不穷。由于以上种种原因,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和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两个术语在教学法文献中实际上都是“疆界未定”的概念。

本文只是求同存异,以多数作者对该二词所作的解释的共同部分以及笔者个人对科、维二氏代表作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字面)的理解为依据来正名,并赋予含义,以便于本文范围内的论述和探讨。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一词在俄文中有两层基本意义:

(一)作为外·语·教·学·中·新·的·,也即第·五·个·方·面·。苏联外语教学

法传统把外语教学分为三大方面(аспекты),这便是语音方面、词汇方面和语法方面,也即语言三大要素的教学;以后又增加了第四个方面,即语体修辞方面的教学。最后增加的新方面,便是这里所说的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11,第49页)。这个新的方面所授的基本内容和对象,实际上是与语言或语言教学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这一点从《语言与文化》一书的书名以及该书大部分篇幅所讨论的实际内容可以得到充分的证实。另外,还可参照笃马辛的解释:“背景知识是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的基本对象”见4之②,这是苏联整个外语教学界所普遍接受的观点。)据此,本文把用于外语教学的第五个方面意义上的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一词暂拟译为“文化背景知识”或“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这些译法似更有助于揭示该词实质。这一点还可从欧美各国外语教学法界的提法中取得旁证:英美作 background knowledge(背景知识)或 language and area(语言和地域),德国作 Kulturkunde(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法国作 langue et civilisation(“语言与文明”教学)等等。笃氏在前述论文中对《语言与文化》一书提出的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个术语,根据科·维二氏原意,作了权威性的解释,认为如果用英语来表述,便应是 culture oriented teaching of a foreign language.

(二)作为外语教学法科学中的一门新分支学科。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也可作为研究文化背景知识在外语课上如何进行教学的各种理论问题的专门性学问,实际上是 лингводидактика(语言教学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于这个意义上的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本文拟译为“文化背景学”或“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法”。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既然有前述两层不同的基本意义,用“国情学”一个译名远不能揭示其内容,而且违反术语学“一词一义”的起码要求,故为本文所不取。其实,“国情学”这一译名用之于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倒是基本合适的,因为俄文的这个术语,大体上相当于我国所用的“所学外语国家概况”课。故本文今后在讲到相当于俄文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时,仍取“国情学”这一译名,以兹区别

前述分别用“文化背景知识”(“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和“文化背景学”

(“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法”)两个译名来表示的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里还必须着重指出,苏联外语教学法家虽然在理论上严格区分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和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两个术语,但是在实践上在实际使用中却始终未能如愿。可以说,无论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使用情况都是混乱不堪的。其实这两词在俄文中使用始终没有区分开,而且也很难区分开。最高权威学者本人在下完定义后自己都无法严守。更何况别的作者呢!因此,我们在讨论问题时,就不能咬文嚼字,拘泥于学术权威一时一处的定义,而是要靠自己从大量原始资料中得出对这一概念的基本理解,并以这个理解为依据来行文论述。

本文对“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这一术语的理解,以科、维二氏《语言与文化》最后一版的经典定义(11,第49页)为基本依据,并参阅全书内容以及二氏的其他著作以及别的作者的有关重要论著,对它的内容和意义的要点作如下表述:

1. 它是外语教学中五大方面中的一个方面 2. 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落实交际性原则和完成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两大任务;并以此为目的,从外语教学论的角度来实现语言的载储功能,使学生熟识所学外语国家的家喻户晓的种种文化背景知识,特别是当代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典型现象(对苏联对外俄语教学来说,还着重向学生介绍“苏维埃生活方式”) 3. 在教学法上具有语文教学的性质;介绍学生熟识前述种种文化背景知识和现实生活的种种典型现象一般要通过外语作为工具结合所学外语言语材料来进行,而且要在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来实现。

以上对“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这一术语的内容的表述是初步的,以后将作进一步阐明。

在一篇为中学广大外语教师专门撰写的知识性的比较权威的科普文章中,从三个方面来说明“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这一概念的

三个特点 1. 教外语的同时 ,还要教所学外语国家的民族文化的要素 2. 在教学过程中 ,语言不是当作各种(语言)形式或手段的简单的集合体来教 ,而同时当作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教 3 对内容平面的注意不少于对表达平面的注意。(见 8 之①)

二、作为外语教学第五个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以及学习它的理论和实际根据

(一) 广义的文化背景知识

作为外语教学第五个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从广义上来说 ,包括以下实际内容 :所学外语国家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教育、文艺、宗教信仰、社会制度等各个方面的概貌以及社会背景、生活方式、风土民情、社会传统、集体习俗、生活习惯、大小礼仪、民族心理、道德标准、行为规范、伦理观念、社会意识形态等等 ,它包括国情学或“ 所学外语国家概况 ”课的全部内容 ,并广于传统“ 概况 ”课。

作为外语教学第五个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 ,并不是一门高深的专门化的学问 ,而是一些基础知识乃至基本常识 ,是一门杂学。它是实践课的一个组成部分。教授它的目的在于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理解外语 ,更恰当地使用外语。文化背景常识教学是一种密切结合而不是脱离语言实践的教学。文化背景知识是在实践课上随时随讲授和获得的。

学习外语为什么要强调同时学点文化背景知识 ? 理由可以从理论上和实际上作如下的解释。

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社会交际的工具。这个工具又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历史生活实践中约定俗成的。每一种语言都是在具体的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每一个国家的民族语言中都有大量的只为该国该民族语言所特有的带有特定社会历史色彩具有鲜明个性的现象。只有了解所学外语国

家和人民及其过去和现在,才能深刻理解所学语言。

要使用一种语言,必须具备以下两类实际知识:

(1) 有关该语言本身的结构/体系方面的知识,也即所谓“语言三要素”——语音、语法、词汇三个方面的实际知识(不一定是语言学化了的系统理论知识);

(2) 与该语言有关的各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方面的实际知识,包括各种“非语言的”或“超语言的”交际知识、交际规则。

既要知道在不同交际场合“怎样说?”,又要知道“说些什么?”。

只有语言的使用者同时具备以上两种知识,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过去外语教学中只教第一类知识;“就语言本身教语言”。这当然是必要的和主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同时教第二类知识。

语言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本质和最主要的当然是它的交际功能,但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功能。外语教学中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些因素。在这些功能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语言的“历史——文化功能”或“载储功能”(cumulative function/кумуля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即积累和贮存文化历史经验的功能,因为这个功能在苏联外语教学中过去受到了忽视。如果说交际性原则是从对语言的交际功能的认识中得到的教学法启示,那么提出“考虑文化背景原则”则是由于苏联外语教学法家已经意识到了语言的历史——文化功能的结果:民族语言同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后者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离开民族文化,不可能全面地掌握该民族的语言。

如果因不了解外国民族文化而没有掌握外语,那么这样的外语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其交际的功能。因此,必须认识到:语言的交际功能又是同它的载储功能紧密相联系并互为条件的。E. M. 维列夏金指出,交际必须具备以下三个要素:①参加交际者要有共

同的语言 ;② 他们要有共同的社会历史经验 ;③ 他们要有一定的言语情境 ,也即要有进行该项言语活动所需的种种具体条件。这三大条件的② ,就涉及语言的载储功能。维氏认为 :① 使交际成为可能 ,② 则规定交际话语的内容 ,③ 规定这个交际话语的形式。(均参见 2①)

由此可见 ,对所学外语国家的文化背景知识越丰富 ,在同外国人交际中越能达到完全的相互了解。这里也包括阅读该外国的各种出版物。

每一种外族的民族文化中 ,都有大量为该种文化所特有而为本族文化所无的特殊现象。这些现象在使用外语的社会成员的生活中经常起作用 ,并反映在语言之中 ;反之 ,有些在本民族文化中习以为常的现象 ,在外国文化中却无此传统和习惯。如果不了解这一点 ,在同外人交往时往往会通过语言(外语)把本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强加给对方 ,使人惶惑不解 ,有时甚至失礼。

试通过几个实例 ,结合中国人学外语(特别是俄语)的实际 ,对前述各项原理作点说明 :

① 中国人路上碰见熟人 ,寒暄开场白往往是 :“你到哪里去?”“吃过饭没有?”之类。英俄语民族则无此习惯。他们认为这种提问很不礼貌 ,特别是英美人 ,会认为是对个人私生活的干预。

② 初次见到刚来自远方的朋友 ,中国人习惯的问候和欢迎用语往往是“您一路辛苦”、“旅途劳累”之类。如果用俄语来说这类话 ,必会使俄国人感到莫名其妙 ,因为这不合俄罗斯文化习惯。人家说的是 С приездом ! Как съездили ? 之类话。

③ 中国文化一向把谦虚视为美德 ,所以当一个人受到赞美和夸奖时 ,总要客气一番 ,说“哪里 ,哪里” ;“不敢当” ;“我不行”之类。这不合西方文化传统 ,特别是美国。人家把这种过谦视为自卑 ,在人面前显示自己是无能之辈。他们的文化背景是 :夸奖人家的人总是希望对方对他的赞扬作出肯定的评价和积极的反应。应说类似“谢谢”、“谢谢您的鼓励”、“我把这当作鼓励来接受”之类

话。

④ 我国打电话 ,要找对方的电话机号码 ,一般都自查《电话用户簿》。而苏联则无此习惯。因此以下一段对话虽然在语言形式上没有半点毛病 ,但却不能为苏联人所懂 :—Я забыл номер. —Посмотри в книге.

⑤ 没有社会文化背景知识 ,听外国人说话 ,即使每个词都熟识 ,语法规则也知道 ,但却只能作字面的理解 ,而不明白其中的真正含义。例如 У тебя есть две копейки ?这句话的主要目的在苏联并不是问对方身边有无两戈比零钱。通电话每次需付两戈比。

以上实例 ,在现实生活中 ,比比皆是 ,随时随地都可碰到。由此可见 ,如果不懂外国文化背景 ,而从本国文化背景出发来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交际 ,说出来的话 ,即使语音、语法、词的搭配都正确、流利且合乎“语言规范” ,但人家却听不懂或说了有失礼貌 ,达不到交际目的。表达方面如此 ,理解方面的情况也类似。

简单的日常交际尚且如此 ,阅读作品想求得深刻的理解 ,更需要文化背景知识。以我国的古典诗词为例 ,恐怕能把问题说得更明白一些。

⑥ 豪放派代表作 ,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学习汉语的任一个外国人 ,如果没有关于长江的知识 ,不知道三国赤壁之战的一段历史故事 ,无论他古汉语掌握得如何之好 ,他读此词 ,绝不会得到中国读者所能得到的感受和体会。只靠简单的注解 ,在这种场合也无济于事。

⑦ 再以苏轼的另一首词《浣溪沙》为例 :“难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 ,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对缺乏中国基本地理常识的外国读者来说 ,很难领会作者的用意。原来中国的主要江河流向一般都由西而东 ,由东而西的就成为稀见的奇迹。诗人把常年东流的江水比作从少年到白头的人生自然历程 ,似乎是难以逆转的。但当他发现自然界也竟然有一反常规的水西流的现象 , (词前《小序》云 :“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便产

生了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认为人生也可能出现由老年返回少年的奇迹,应奋发有为,超脱白居易“黄鸡催晓”、“白发催年”一类悲观消极情绪。这对一些主要河流流向由东而西(如法国)或南北流向(如苏联)的国家读者,是很难领悟出其中的妙处来的。

⑧ 俄文诗歌中 берёза 一词,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是俄罗斯大自然的代表,是俄罗斯大地的象征。没有这种文化背景常识的人(例如一般的中国人)碰到含有此词的诗句,就不会引起这样的联想。

⑨ 苏联人一说起莫斯科和被称之为 матушка 的伏尔加河,也会引起众多的联想以及与此相应的思想感情,没有这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的外国人则只是把这两个词作为一般的地名,并不赋予同样丰富的内容。Аврора 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的代号。诗歌中一出现这个词,苏联读者就会联想起当年群众起义攻打冬宫的激动人心的壮烈场面,产生相应的思想感情。没有此种文化背景知识的外国人则感到平平常常。如此等等。

由此可见。无论是为了理解,还是表达,人们都离不开文化背景知识。

以上我们分别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简要说明外语教学中教授文化背景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了论证和探讨文化背景在外语教学中的地位,苏联学者在这个题目下写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本文以上所作的说明,只是这些论著基本观点的要点的转述而已。

(二)狭义的文化背景知识

狭义的文化背景知识,仅指在语言中所反映出的文化痕迹或从外国语言中能考察得到的外国民族文化因素:从语言中看文化,“从一粒沙中看大千世界”。组成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这个术语的前一构词部分——лингво,就是语言的意思。这样就规定了狭义文化背景教学的对象是:① 无等值词;② 有背景意义的词;③ 有文化感情色彩的词;④ 成语典故;⑤ 名言警句;⑥ 客套用语。

这些都是民族语言中直接反映出来的民族文化成素(культурный компонент)。这里从语言级层的观点来考察,也可说分属三个高低不同、逐步递增的等级:①—③属词一级;④属词组一级;而⑤和⑥则属句一级。因此,“狭义的文化背景知识”又称“词语文化知识”,除了前述六个类别以外,苏联教学法家还把“无词语言”也归入狭义文化背景知识的范畴。现分别简介如下。(并请参考文后附言)

(1) 无等值词(безэквивалентные слова)。这类词汇只有在所学外语中才有,而在学生母语中是没有的。例如对于学俄语的中国人来说,象 самовар , большевик , совет , колхоз , субботник , стахановец 一类词就是。正是这些词,集中反映了俄罗斯文化和苏联社会现实的特色,表示了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特有的概念或事物、现象。据统计,它们占现代俄语常用词汇的 6—7%(12②, 第 142 页)。苏联教学法家把 реалии 作为文化背景教学的重要对象。这个术语在教学法文献中指:“文化中存在的事物、现象、概念等等”。正是无等值词,反映了俄罗斯文化的个性。有许多人还把表所学外语国家人、地名的专有名词(特别是那些有历史典故、同传说或民间文学有关的人、地名的专有名词),也划归无等值词的范畴。

(2) 有背景意义的词(фоновые слова)。母外两种语言中有大量的一类词,经过对比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在意义上由两个部分组成:①表概念的部分,这是词义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在两种语言中是相同的,双语词典里所译解的,就是概念上的对应;②表文化背景信息的部分,这是词义的附加部分,但却十分重要,这部分表现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在两种语言中并不完全一致,然而这种不一致的地方,在一般双语词典中却都没有什么反映。因此学生在学习外语的这类单词时,往往只是学到与母语词中对应的概念部分,而很少知道其表异国异族文化背景知识的部分。例如,以法语为母语的法国人,在学习俄语时,遇到 университет 这个词他

用相应的 universit   来理解 ,有时就会出差错 ,可以用俄语来说 за-
писать   в Париж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这同法语在本国的用法一
致) ,但却不能说 записать   в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这里只
能用 поступить。这种用法上的差错不是语法的 ,也不是词汇的 ,
而是文化背景的 ,因为苏法两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和制度均有各自
的特点。俄语的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与美国英语中的 university 所含的
文化背景知识差别也很多。这个俄文词同我国的“ 大学 ”一词 ,在
文化背景信息上所含意义也不一样 ,它只指综合大学。而我国的
大学却包括一切高等学校 ,如工业大学、师范大学、医科大学、农业
大学等等 ,这在俄语中要分别用 институт , академия 等词表示。
如此等等。有文化背景知识的词在外语中数量众多 ,学习外语时
要随时注意。对于这类词来说只学到其概念对应部分是远远不够
的。也正是这些有背景意义的词 ,为外国学生掌握俄语造成了障
碍 ,而无背景意义的绝对等值词 ,在外语中的数量则十分有限。

(3) 有文化感情色彩的词(коннотативные слова)。这类词
所包括的文化背景内容很多 ,能引起该民族文化集体内每个成员
的众多带有感情色彩的联想。例如本文前面提到过的 Аврора 之
类词。又如前面所提到的 берёза 一词 ,在许多场合下不能只单纯
地理解为白桦树 ,它是祖国、故乡的象征 ,而在许多别的异族文化
中则用别的树木来表示 ,例如橡树(德国)、槭树(加拿大)、垂杨
(波兰)、柳树(捷克)等等。在这些国家中 ,对白桦树不能引起对
故国故土的任何联想。中国人一读到“ 若把两湖比西子 ,淡妆浓
抹总相宜 ”这样的诗句 ,由西湖、西子二词会浮想联篇 ;而没有中
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外国人 ,即使受过很高的教育 ,也不会引起相应
的感情。

(4) 成语典故(фразеологизмы)。许多成语典故都反映民族
文化的特色或历史陈迹。例如 бить баклуши , тянуть канитель ,
спустя рукава , отложить в долгий ящик , казанская сирота ,
сбрасывать со счётов , коломенская верста , приложить руку , с

красной строки , тёртый калач , как калач печь , на ять , Лиса Патрикеева , пятое колесо в телеге , не всякое лыко в строку , за-
дать пару , пристал как банный лист 等等。这同中国的“杞人忧
天”、“滥竽充数”、“自相矛盾”、“完璧归赵”之类有历史典故反映
中国文化特点的成语 ,情况类似。

(5) 名言警句(афоризмы)。这里包括以句子形式反映外国
文化特点的各种语言单位。其中包括 (а) 俗语(поговорки)和
谚语(пословицы)——起源于民间口头文学 ,反映民族文化观点
和价值观念。属前者的 ,例如 ;Погиб , как швед под Полтавой.
Мал да удал. Не в службу , а в дружбу. 等等。属后者的 ,例如 В
гостях хорошо , а дома лучше. Не имей сто рублей , а имей сто
друзей. Старый друг лучше новых двух. Век живи , век учись.
Ученье—свет , а неученье—тьма. 等等。(б) 名言警句(крыла-
тые слова) ,一般出自名人之口(笔) ,为某一文化集体成员所熟悉
并常加引用。例如俄语中列宁和高尔基的名言 :Лучше меньше ,
да лучше. Шаг вперёд , два шага назад. Кто—кого. Пусть силь-
нее грянет буря. Человек—это звучит гордо. 等等。(с) 著名的
口号(лозунги , девизы)和号召(призывы)。这指所学外语国家
政治生活中家喻户晓、尽人皆知而且深入民心的现成语言单位 ,例
如在苏联 ,Вся власть советам. Учиться , учиться и учиться.
Коммунисты , вперёд ! Всё для человека , всё для блага человека.
Если враг не сдается , его уничтожают. 等等 ,都属这一类。它反
映了苏联当前或现代历史上文化的一些本质方面。(d) 社会科学
方面的公理(формулы)和自然科学方面的公式(формулиров-
ки)。这往往反映一个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特征 ,反映民族文化
的重要方面 ,例如 ,在苏联 ,Практика—критерий истины. Труд
создаёт человека. От каждого—по способностям , каждому—по
труду. 等等表示公理的现成语句 ,都代表该国所奉的意识形态准
则。如此等等。

(6) 客套用语(формулы речевого этикета)。每个民族语言中都有为它所独有的交际上常用的套语,为别的民族所没有,例如熟人见面时打招呼、寒暄;与人首次见面时自我介绍、请求对方通名报姓;分手时的用语等等,都是现成的句套,反映民族文化的某些侧面。诸如汉语中的久违久违,别来无恙乎?久仰久仰,请教尊姓大名,尊姓?……反映出我国是“礼仪之邦”的讲究礼节的社会文化风貌。日本人的口头禅“请多关照”之类,也属此范畴。这都是别的民族所没有的。这在俄罗斯文化中也有反映。“Ну, как дел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这种讲法,在俄罗斯人认为是失礼:一、长辈和晚辈见面,后者不能先开口询问对方“事情怎么样了?”“身体好吗?”这样的话应由前者先说;二、称呼师长,要用“大名+父名”,不能直接只用职业名称(如教员、老师之类)。而法国人则可以说 Comment allez-vous? 之类。在俄罗斯民族“文化共同体”中生活的人,可以根据称呼和寒暄客套的不同,立即判断出说话双方的亲疏关系和社会身份,而不了解这种文化背景的外国人,即使学了俄语,也听不出其中的“弦外之音”来。例如:《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ладимир Петрович!》,《Приветик, Володенька!》,《Салют, старик!》这三句对同一个人见面时所说的不同套话,反映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关系。如此等等。

(7) 无词语言(невербальные языки)指手势、表情、习惯性动作等等有声语言以外的辅助交际手段,虽非前述(1)——(6)真正的语言单位,却因这里面也有民族文化成素,所以一般也把它归入文化背景知识的范畴。例如,有些民族文化中,点头表示肯定,摇头表示否定,而另一些民族则恰巧相反,还有些民族文化中,则这两动作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的意思,而表示别的什么意思。意大利人用来表示“再见”的手势,在俄罗斯人却理解为《Иди сюда!》,反之亦然。真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不懂得所学外语国家的这种“无词语言”,在交际中也不免会出乱子;另外即使对学习外语来说,也会妨碍对一些插图、影片、剧本演出等等的理解。

作为外语教学第五个方面的文化背景知识,近几年被大量引进实践领域。如果我们把近 20 年出版的苏联中小学外语课本同 60 年代初期外语教改以前的教材作一比较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课文在题材和内容上,有关所学外语国家各个方面知识的比重大大增加了。如果说教改以前苏联外语课本(特别是初级阶段的课本)中,有许多课文是“用外语来介绍、叙述和议论本国国情”的话,那么 60 年代以来,这样的课文在数量上的比重已明显下降。

在同一时期,苏联的官方指导性刊物《中小学外语教学》(ИЯВШ)增加了一个叫作《所学语言国家》的栏目。每一期都为此栏提供相当的篇幅,刊载语言难易程度同各年级学生实际水平相应的介绍所学外语国家概况的外语(英、德、法)文章,供中学生作为补充读物之用。

大学公共外语教材在内容和题材上,也发生类似的变化。

最值得专门提出的是苏联对外俄语教学。在这个领域里,俄语是作为外语对苏联以外的各国学生(包括留学苏联的外国人)教授的。所学语言国家就是苏联。文化背景知识也就是有关苏联社会历史文化各方面的知识。在对外俄语教学的教材里,课文几乎是“清一色”直接或间接介绍“苏联现实”、“苏维埃生活方式”以及苏联各方面情况和风貌的材料。课文如此,练习内容也具有这方面的强烈的倾向性。苏联对外俄语教学指导性刊物《国外俄语教学》(РЯЗР)上,也开辟了《苏联、人物、事件》专栏,向国外俄语教师提供有关苏联文化背景教学的种种具体材料。

三、作为外语教学法科学的一个新分支的文化背景学简况

至于作为外语教学法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文化背景学则是一门专门学问,是一整套理论。它主要研究各种类别和程度的外语教学中,文化背景知识应包括哪一些(教学具体内容);按怎样的顺序出现以及怎样教(教法)。另外也研究文化、语言、外语教

学研究三者之间关系的一般理论问题。这种研究,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从苏联社会学和苏联社会语言学以及传统语文学(филология)的角度,结合当代教学理论,从根本上来解决外语教学中的文化背景学问题,以期提高外语教学的效益。

在文化背景学的研究方面,苏联学界所做的工作最多,成绩最大。

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近十多年来苏联发表和出版的文化背景学方面的重要论著不下百种,其中最有影响的当首推前述科、维二氏合著的《语言和文化——对外俄语教学中的文化背景学》。

总之,文化背景学是当今苏联外语教学法学科中的新兴热门学科。正因为它是新兴的,所以也就不成熟,无论在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本身,都尚有许多没有定论的地方,甚至还有难于相对稳定的成份。

正因为这是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所以文化背景学家们在其论著中便都千方百计论证本门学科在外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便取得社会对它的学术地位的承认。这样也就免不了出现言过其实的现象。

四、传授文化背景知识的原则和方式

(一) 开设专门的课程 “国情学”课或“普通国情学”课,相当于我国一些外语院系的“所学外语国家概况”课。另一门是作为“杂学”的“语言国情学”课。这种课程如果设置在第一学期,一般用学生的母语讲授,如果在中、高年级开设,则以所教外语讲授(或以外语为主)。在这里,文化背景是一门独立的课程,内部有自己的知识系统,并不属于实践课,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H. H. 索芬斯基编的《苏联》(供外国留学生俄文先修班——预科用)。

(二) 作为实践课的一个组成部分,随时碰到随时教,细水长流,集腋成裘,不讲究系统性。这里又有两种不同情况:①通过实践课的教材,在课文(和练习)的题材和内容上体现,其中也包括

课外读物和辅助课本。例如对外俄语教学教材的课文中,绝大部分是介绍“苏联现实”、“苏维埃生活方式”或同苏联国情各方面有关的例如课文《莫斯科》等等。这里面包括了有关苏联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②通过词汇教学,除揭示生词和成语的表概念部分的词汇意义外,还要讲点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词源典故,例如:колхоз,只知它是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的复合缩写是不够的。碰到 русская кухня 这个词组,就顺便介绍一点俄国人的饮食习惯和常吃的饭菜。遇到 кричать на всю ивановскую 等,可讲点典故。这种讲授,也提倡用外语来进行,但并不排除用母语。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教参是由 Ю. 普罗霍罗夫编写,科斯托马罗夫审校的《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е тексты》,主要提供教师备课时使用。

以大专院校外语专业和短期外训班以及外国留苏生为对象的俄语教学,都兼取①、②两种方式;中小学外语教学则只采用②。

中小学讲授文化背景知识的基本原则是: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寓于实践课教学之中,而不单独另搞一套,以免影响学生实践掌握外语。用苏联外语界的话来表述:“通过和借助所学外语并在学习外语过程中”传授文化背景知识。在外语教学中,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学生实践掌握外语。它是为学生更恰当得体地使用外语和更深刻准确理解外语服务的辅助手段。必须处理好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同实际言语训练的关系。

五、几点教学法结论

从前述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和语言使用的实例中,可以得出一些重要教学法结论。这些结论所包含的思想,在苏联外语教学法文献中只是分散零星地提到过,而且并不明确,更未来得及系统加工并上升到教学法理论高度来加以总结。笔者试图在此把这工作再略向前推进一步,对有关的教学法结论作如下的集中系统的表述。

(一)用外语交际,只知道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知识并具备

相应的言语熟巧和技能,这仍是不够的,还必须懂得外语交际所需的各种背景知识。

(二)教授外语,就不但要使学生学会外语的语言规范和言语行为准则,而且还要使其学会交际所需的各种非语言规范和非言语行为准则,因为交际非但要符合语言规范,而且还要符合文化规范。

(三)外语教学中要语言教学(包括言语活动能力的训练)和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同时并举,后者为前者服务,保证学生在外语言交际中的正确理解和表达。

(四)要正确处理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同语言三要素教学(以及四种言语活动能力的教学)之间的关系。前者只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后者;是补充后者之不足,而不是取代后者。

(五)外语教学中非但存在母语的干扰作用,而且还存在本国文化对学习的干扰作用。学生往往把本国的民族文化内容不加审辨地套用到外语交际中去。由于两种民族文化中诸多差异因素,因而套用的结果,往往会严重地影响理解和表达的准确性。这时本国文化对外语言交际任务的完成就发生了“负迁移”的作用。这种干扰,如果在事先不加防范,必然会自发起作用,学生处处用本族文化去“比附”外国文化。这一行为在外国人用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相统一的眼光来评价,便认为是出了差错。

(六)对本国民族文化对外语交际的干扰作用是可以预防的。有效的防范措施便是:1. 讲授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2. 这种讲解应当是有针对性的,而这种针对性又是通过母外两种文化的对比而得出的;主要讲两种文化背景中的差异部分,要把这些差异部分交待清楚(是一次交代,还是分数次讲完,则是技术问题)。特别是讲解生词时,如果它属“有背景意义的词”,那么除了讲清其概念部分外,还要授予该词所含的不同的文化背景知识。以防止用词搭配上的错误。

(七)外语教师非但应当有母语和外语两种语言的对比语言

学修养 ,而且还应当有本国和所学外语国家两国比较文化背景学方面的一定学识 ,前者用来克服外语教学中的“ 母语干扰 ” ,后者则用以同“ 本国文化背景对外语交际的干扰 ”作有效斗争。

(八) 为了作好教学中的后一种对比工作 ,教师可以利用各种“ 所学外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词典 ”。

(九) 外语教学中必须贯彻“ 考虑文化背景原则 ”。但在贯彻这一原则 ,进行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时 ,还必须优先考虑精讲多练原则、交际性原则 ,使前者在后二者的制约下进行。做到加强 ,而不是削弱外语教学的言语实践倾向性和交际倾向性。

(十) 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要尽可能用外语作为工具来讲授 ,而为提高使用这个工具的能力服务 ;主要结合外语实践课进行 ,在实践课的自身的教学过程中实现。

(十一) 从实践课教学的立场来看 ;“ 文化背景 ”的重点在“ 词语文化 ”的教学。

六、从教学法发展历史的观点看今天苏联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学

从外语教学法思想发展的历史来看 ,外语教学应重视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这样一种主张 ,并不是最近二十年才提出来的。这在苏联国外 ,早是“ 古已有之 ”的事。即使在苏联也并非最近二十年才对这个问题有所考虑的。

西欧古典语法翻译法(以及以后的苏联自觉对比法)一直十分重视采用所学外国语国家的原文名著(或节选本或改写本)作为主要教材^② ;与此同时简要介绍所学外语国家的文学史和名作家生平等的知识。实际上这就是文化背景知识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世界各国大学的欧美语文系 ,都开设《 圣经》、希腊神话、罗马故事等课程。这不仅因为这些典籍有文学价值 ,而且更因为它们欧洲文化的渊源之一。

现代直接法的代表人物贝力子、叶斯珀森等 ,都主张外语教学

应有文化背景方面的内容。甚至连提倡句型操练著称的听说法主要代表人物拉多(R. Lado)也提出外语教学不能忽视文化背景因素一类观点(见他所著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 ",1957),德、法两国的对外德(法)语教学中一直重视文化背景教学(如我国外语界熟识的教材“*Cours de Langue et de Civilisation Française*”“*Le Français et la Vie*”)。

苏联外语教学一直有重视古典原文作品(并以此作为主要教材)的传统。苏联对外俄语教学的教材的课文内容也一直以介绍苏联为主。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现在苏联外语教学界又把文化背景知识教学作为一个似乎是新的问题提出?笔者曾对此作了几年探索,初步找到了一些答案。原来,苏联外语教学在60年代初教改以前是把“教育——教养目的”置于首位。实用目的在实践上是处于从属地位的^③苏联外语教学界重视所学外语国家古典作家进步作品的选读,对外俄语教学界向学生介绍苏联概况,主要的都是出于“实现教育——教养目的”的考虑,而不是出自实际掌握外语的需要。

作为民族文化载体的民族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文化中却有相当一部分是有阶级性的,属意识形态范畴。在讲究保持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任何一个国家,对外国的意识形态的异端,决不采取放任态度,特别是在中小学普通国民教育的阵地上,更不能允许这种异己思想的自由泛滥。在苏联人看来,诸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中就有许多学不得的东西。苏联中小学外语教学虽然重视古典文学作品的选读,但其所选的也只限于有教育——教养意义的进步作品。

正如前面所说,语言同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要学习一国语言,而又要完全避开其文化中对本国意识形态纯洁性会发生有害影响的那一部分,最好的办法便是用没有阶级性的外国语言来作为本国文化的载体。这便是教改以前苏联外语课本中充

斥大量“用外语(如英语)谈论苏联”的课文的根本原因。

另外,以前在苏联对外俄语教学领域内,虽然也用俄语这个载体来载“苏联文化之道”;“文”和“道”、语言和文化似乎是统一的,但其基本出发点仍是为了实现“教育——教养”目的,为了“认识方面”(познавательный аспект),而不是为了外国学生实际掌握俄语,且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

60年代初教改以后,由于实际掌握外语已成为苏联社会的一种迫切需要,外语教学界开始把实用目的置于首位。(在对外俄语教学界也几乎同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为了更有效地实际掌握外语这一交际工具,必须较全面地了解所学外语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近20年来社会语言学在苏联国内外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兴起,对国内外的外语教学直接和间接地发生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国外产生了功能/交际法。而在苏联国内的反映,便是交际性原则作为主导教学法原则的提出。有计划有系统地传授文化背景知识,便是贯彻交际性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对外俄语教学法的新近理论中,“考虑文化背景”原则是作为对“交际性”这一主导教学法原则提出的补充(参见А. В. Фролкина等五人合编的《Методика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КИ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обучения》1983. М., стр. 12)。由此可见,苏联当今提倡文化背景教学与教改以前的区别主要在于现在的做法是在社会语言学新理论指导下系统的自觉的教学活动,其目的首先在于提高学生实际掌握语言的质量^④

这一点,要做得彻底全面,只有在对外俄语教学领域里才有可能,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做到了。这是因为俄语同苏维埃文化本来就是高度统一的,是自然结合在一起而且结合得十分自然的。在对外俄语教材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⑤。当然,这样做从政治上来看也不妨说是对外宣传的一种手段和渠道。这对改善苏联在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颇有好处。可达到扩大政治影响和掌握语言

“一箭双雕”的目的。

对于苏联来说,在对外俄语教学领域里,通过文化背景教学既能使学生更有效地掌握好俄语,同时又能把政治巧妙而自然地渗透到业务中去,这当然是完全符合其本国利益的事。因此,它除在本国这样做之外,还通过 МАПРЯЛ 这个国际性学术团体,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这一做法。从 1967 年以来,МАПРЯЛ 就一直在大力提倡苏联文化背景知识教学,而其中的重点又是当今苏联的社会现实和“苏维埃生活方式”。对外俄语教学实际上是苏联对外宣传其社会制度优越性的重要阵地。

在别的语种,诸如英、德、法、西班牙等等,因所教语言国家属资本主义范畴,其文化中有许多成分是为苏联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做起来仍未免打折扣。苏联今天对外国文化的开放,只是在范围上放宽了一些尺度,但远未达到一切都可持“拿来主义”态度的程度,对许多意识形态异端,仍抱拒绝和批判态度。特别是在中小学教育阵地,不能为了要更好实践掌握外语而使正在成长的学生在思想上受到西方文化的腐蚀。宁肯牺牲一些文化背景知识也不能让学生受到异己意识形态的影响。

由此可见,尽管苏联外语教学界把“加强文化背景教学倾向性”的口号叫得响亮,但落到实处,除了在对外俄语教学领域内完全做到以外,在各类一般外语教学领域,所做都比较有限,未免有令人“雷声大,雨点小”之感。但较之以前,还不能不说有很大进步。

苏联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在外语教学中的一切情况下,实践课都不采用“引进教材”,即使这种教材语言是绝对地道,又以最自然的方式结合了文化背景。中小学如此,高校外语专业以及公外教学情况也类似,教材都是自编的。对“哪些文化背景常识可以进教材?”以及“教材中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如何评价?”都是很有选择和讲究的。苏联自编的外语教材中绝无宣扬“美国生活方式”的东西,即使偶有涉及,也抱批判态度。个别外语短训班采用

“引进教材”,也只是作为一种次要的参考辅助读物。

最后,还应指出一个问题,苏联外语教学界针对过去忽视文化背景知识而大力加强这一薄弱环节,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在理论研究上却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倾向。从一些文章来看,显然把文化背景知识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强调过头。如果这种观点占了上风,成为一种指导教学实践的理论,那么势必影响到外语课的实际训练。

七、苏联处理文化背景知识教学的经验和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历史教训之我见

最后,联系我国外语教学界实际,提出一些改进工作的建议。

苏联近20年来重视文化背景知识教学,无论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进步,而且取得了一定成绩。这对改进我们今天的外语教学颇有借鉴意义。因为我国外语教学所走过的道路(其中包括处理文化背景知识问题的实际做法),前十七年同苏联相似。例如教材(特别是初级教材)中大量的课文都是用外语来叙述和议论中国的人和事。例如《北京》、《刘胡兰》等等,几乎是必不可少的“传统课文”。高年级则是大量的译文,主要是由中文译成外文的政论文,如此等等,相形之下,用外语来“载”外国文化背景知识之“道”的课文比重极小。这类以中国的种种为题材和内容的材料,对学生来说,在语言形式上虽然是新的,但在内容上却是十分熟识的,往往不费任何力气,一猜就猜得出来;有的内容则是小学低年级程度甚至幼儿园程度的东西。

这从信息论的角度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学生通过外语所得到的新信息,主要是语言形式方面的,至于教学中每次给予的思想内容方面的信息量,则几乎等于零。

(二)这一结果对培养学生用外语来吸取新信息的能力(而这又恰巧是外语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十分不利。学生长期同“用

外语谈论自己熟识的本国文化背景”的课文打交道,成了习惯,一旦接触到真实的外语或外文的“原件”(例如所学外语国家出版的原文报刊、广播、电视、外国人的谈话、讲课、著作等等),理解起来就很费力气,有时简直不可理解,严重影响到语言交际活动的正常进行。这是因为语言形式同文化背景在外国人的交际中本来就是自然地统一在一起的。要想学好人家的语言却又人为地硬要脱离他们的文化,当然就不能有效地掌握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的外语。以上主要是从培养理解能力的角度来看;至于从培养表达能力的角度来看,情况更是如此。用此种使外国语言与外国文化相割裂的办法,是学不到地道外语的。这样学到的外语,外国人听(读)起来虽也勉强能懂,但他会立即感觉出来异族人在说话。

再从学习心理来看,由于所学课文在内容上无任何新信息可言,学生学习起来,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学,学习兴趣减低,严重影响学习质量。这在高校外语专业新生中的情况最有代表性。他们在中学期间已学过基础外语,外语的形式方面对于他们已不是新信息。如果说还欠缺使用语言形式的熟巧和技能的话,那么至少知识还是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让他们主要去学习用简单的外语编写的议论他们早已熟识的中国现实的课文,语言和内容两个方面均无任何新信息可言,自会感到学习没有意义。而低年级又是强调要练好基本功、打好基础、取得良好的外语熟巧和技能的阶段,要练的对象只能是比较简单常用的语言形式(其中绝大部分又都是中学学过的基础外语),但要求练得娴熟正确,交际时能随机应变,使用恰当得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内容上毫无或很少有新信息,这就必然导致学习积极性的下降^⑥。

前17年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受到苏联60年代以前的外语教学法理论和实际做法的影响外,还有我们自己特有的“国情”(一)强调政治思想教育在外语课上的“挂帅”地位,因此倾向采用由中文翻译成外文的政论文章、用外语记述和颂扬我国的英雄人物……等等的课文为教材,认为这更能收到政治思想教育的

效果(二)在“引进”和“输出”的关系上,认为学习外语,主要在于对外宣传我国的经验……等等。

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当年“左”倾思想和与此相联的闭关锁国主义在外语教学中的反映。虽然现在已极少人再持这样的论调了,但作为一种学术见解来看,似乎尚未在理论上分清其是非。因此本文拟略评一二。

坚持在外语教学中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反对“纯语言训练”或“只顾语言而不管政治思想内容”的倾向,这是正确的。对这一点,我们今天不能因采取“对外开放”政策而有任何的放松和放弃,特别是中小学外语教学中的思想阵地更应坚守,但政治思想教育必须紧密结合外语教学的特点,不能简单化,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前17年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外语教学中“是否应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而是“怎样进行?”

有关本国的人和事学生既然早有所知,在外语课本中就没有什么必要再以此为主要内容而编成课文。中国自己的英雄人物要宣传,用中文来写,在语文课上教,效果会更好。毛泽东思想要学习,通过中文学习《毛选》原著,岂不比通过译文更能领会精神实质?“文以载道”,用学生已实际掌握而且较好掌握的中文来载中国特有的思想之道,其教育效果当然要比用学生尚未掌握或只是初步掌握的外文更好。用外语来载道,因学生外语程度的关系,必然会受到很多限制,这样也就必然会使政治思想教育的实效打很大折扣。这种用中文载道能更有收效的工作,应交给语文课和政治课去做。中文已经学过的内容,通过外文译文再学一遍,从政治思想教育的角度来看,又有什么必要?非但无必要,而且简直是一种时间和精力浪费!与其重复已学过的熟识的老内容,不如学习些新知识。所学外语国家文化中,除了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外,有他们自己的民族英雄、革命烈士、共产主义战士等等,外国文化中也有许多我们可以吸取的东西。这些对学生来说,都是新信息。用已初步掌握的外语这样一种信息载体为工具去获取有关所学外

语国家文化背景各方面的新信息,并在获取这类新信息的过程中逐步扩大有关外语工具本身的新信息,岂非能更有效地达到外语学习和文化背景知识学习相互促进、业务和政治双丰收的目的?更何况外语课的基本教学目的是实际掌握运用外语这个交际工具的技能,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寓于其中,而不能另外再形式主义地去单独搞一套。学习外国文化背景知识,既有思想教育作用,更有助于学生实际掌握外语,我们在考虑外语教学特点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在处理“进”与“出”的关系上,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对绝大部分学习外语的人来说,恐怕“进”是第一位的。“出”——对外宣传我国的经验和成就,主要是专业翻译工作者和外事工作者的事。对一般人来说,学习外语,主要是掌握一种借鉴外国的工具,所以首先要培养用外语来吸取它所“载”的外国文化(包括科学技术)之“体”的能力。以“用外语来谈论中国”的课文为主要教材,是培养不出这种能力来的。为了更有效地实现这个目的,有必要在学习外语的同时,学习外国文化背景知识,而且要在二者相统一的自然结合的过程中来学习。

以上仅针对前17年中我国外语教学忽视文化背景知识的偏颇提出的一些意见。

十年动乱期间,一切外国文化,无论古今,都成为被打倒的对象,外语教学领域里的做法,更为极端。其谬误和荒唐十分明显,就不再赘述。

粉碎“四人帮”以来,外语教学战线在拨乱反正后,各方面都出现新气象,一切蒸蒸日上。文化背景知识在不同种类和层次的外语教学中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这方面还仍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合理解决。

(一)一些大学外语专业和外语训练班,直接引进欧美原文教材,以此作为教学的主要依据。这类教材语言地道,外语和外国文化结合自然,从掌握语言角度来看,当然是最好不过的教材了。但

从思想内容来看,这类教材对外国文化抱“肯定一切”的赞场态度,实际上是在无条件地宣传这些文化,其中包括我们不能接受也不应接受的东西。学生对此如果不抱批判态度,教师如果也抱着“客观主义”的不置可否的态度来讲授,则会使这些东西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久而久之,使学生受其不良影响。对此,在纠正过去不介绍外国文化背景知识的偏颇后,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克服的办法当然不能因噎废良,走以前“同外国文化彻底决裂和隔绝”的路,而应让学生广泛接触所学外语国家文化背景的各个方面,但却应持批判态度。而这种教育工作却又必须结合讲练,在讲练过程中自然完成,而不单独作“政治报告”式的说教。这对教师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在中小学外语教材和大学公外某些教材中,“用外语谈论中国”的课文的比例虽较前17年和文革时期有所减少,但涉及所学外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各个方面的课文在数量上仍嫌不够多,需要加强。

以上两个偏颇,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我们发现并重视,是不难解决的。

注 释

①本文初稿完成于1984年初,曾在中南地区外语教学法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其详细内容要点。

②这是一种新型词典,苏联已出了几种,主要是供对外俄语教学用的(13)。据悉正在编纂一系列这类词典。同时还出版英语和其他语种教学用的文化背景知识词典,例如《大不列颠》(M.,1978)。

科、维二氏在《语言与文化》新版本第3版18—19页批评语法翻译法无视所教外语国家文化背景教学。笔者认为此论根据不足。

③参见拙作《苏联中小学外语教学目的今昔观》(载《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2期)。

④这一点苏联在实际上也已在大力贯彻,以近年编写的教材为例,一般

都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在一部著名的按交际性原则编写的教材《Игровые задания (1—20)》(М., 1985)一书最后有一栏《文化背景知识注释》,对与每一课交际课题有关的背景知识都作了详解。

⑤这一点苏联几部近年流行的对外俄语教学课本都做得比较成功,绝大部分课文都是介绍“当代苏联现实”和“苏维埃生活方式”的。例如《通用俄语课本》第14课《Как вы отдыхаете》既介绍了一般居民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又表明了公民休息权的实际内容。又如该书第25课《Концерт Паганини》宣传苏联普通劳动人民都有高度文化素养。这样的实例课本中随处可见。

⑥这个矛盾的解决办法:语言形式方面既不能再复杂化,也不能再多加新项目,那么我们就只能在课文内容方面找出路,使学生每学一课书,总能通过熟识的但却不熟练的语言形式取得一定的新信息,其中十分重要的是所学外语国家国情和文化背景方面的新信息,这种途径,有利于培养学生通过外语工具去获取新信息的能力。

主要参考书目

1.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 и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РЯКИ. 3-е изд. М., 1983.

2. 前述维、科二氏合作之以下论著① О предмете, объеме и функциях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1980; ②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ая теория слова. М., 1980; ③ Три типа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го комментария. РЯВНШ, 1972, о 1; ④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изъяснение 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 в учебных целях. РЯЗР, 1974, о 4; ⑤ 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преподав. РЯКИ. — Там же; 1971, о 1; ⑥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К вопросу об учебной паремииографии. — Там же, 1975, о 1; ⑦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Зрительная семантизация р. слов. — Там же, 1975, о 4. ⑧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и принцип 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ости в преп. РЯКИ. — В кн.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основ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и преп. РЯ 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1982. ⑨ О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м аспекте учебника. — В кн. Содержание и структура учебника РЯКИ. М., 1981. ⑩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ОРЯКИ. — В кн. Методика/Под ред. А. А. Леонтьева. и др., 3-е изд., М., 1982.

3.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в преп. РЯКИ/Под ред.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а и

В. Г. Ксотомарова. М. , 1979. 4. Словари и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 Под ред.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а. М. , 1982. 5. А. А. Брагина : Лексика языка и культура страны : Изучение лексики в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ом аспекте. М. , 1981. 6. Н. Н.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 Русский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М. , 1982. 7. М. Н. Вятютнев : Теория учебника РЯКИ. М. , 1984. 8. Г. Д. Томахин : ① Понятие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Его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и лингводидак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 ИЯВШ 1980 , о 3. ② Фоновые знания как основной предмет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 ИЯВШ , 1980 , о 4. ③ Лексика с культурным компонентом. — ИЯВШ , 1980 о 6 ④ Реалии в культуре и языке. — ИЯВШ , 1981 , о 1. 9.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и О. Д. Митрофанова : Методиче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дл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РЯКИ. М. , 3-е изд. 1984. 10. В. С. Девятайкина :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в ОРЯКИ. — В кн. Пособие по методике ПРЯКИ. М. , 1984. 11. А. В. Фролкина :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е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обучения. — В кн. Методика ПРЯКИ на начальном этапе обучения. М. , 1983. 12. А. Н. Щукин : Методика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го ОРЯКИ. М. , 1984. 13.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е словари : ①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культура СССР (Под ред. Е. М. Верещагина и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а) , М. , 1984. ② М. А. Денисова : 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 М. , 1983. ③ В. П. Фелицына : Русские поговорки , пословицы и крылатые слова. М. , 1979. 14. Ю. Е. Прохолов :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е тексты (Из комплекса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для всех ») М. , 1983. 15. А. А. Акишина и др. Русский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 3 - е. М. , 1983. 16.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 ① Под ред. Н. Н. Софинского 4-е изд. М. , 1984. (供大学预科留学生用的教科书) , ② Под ред. К. М. Темирбаева. 3-е изд. М. , 1982 (供国外俄语教师用的教材) 。 17. Знакомимся с СССР — Под ред. М. Н. Вятютнева. М. , 1984 (К меж. олимпиаде школьников по РЯ) . 18. Н. Д. Зарубина и др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советской стране М. , 1982 (此书为文化背景和言语实践相结合的教材) . 19. М. Д. Зиновьева и др. : Москва. М. , 1980 (文化背景材料) . 20. Я. Белицкий : Слово о Москве. М. , 1984 (读物) , 21. С. Н. Сыров :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м. , 1985 (读物) . 22. Ю. Шебагин : 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 жизн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М. , 1980 (读物) . 23. С. Милославская : Н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М. , 1984 (读物) . 24. Роль и

место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практике ПРЯКИ. М. , 1979.

社会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

司徒双

一、问题的提出

我曾遇到过某外语学院的一位学生,他刚毕业便被派去给一位法国著名的歌剧院院长兼导演当翻译。由于初次接触外宾,听力有些困难,于是这位年青人大声对法国客人说:“Répète!”(“再说一遍!”)这句话一出口便把那位院长先生得罪了,从此他断然拒绝和这位年青人讲话。

有一次,我们北外法语系某届研究生与法籍教师乘车郊游,有一位研究生一上车便热情地请教师就坐,并(用法语)加上一句客气话:“您这么大岁数了,可别累着,不然会生病的……”法国老师当时没有说什么,后来他在给教师开“欧洲文化史”课时,引此例作为开场白,说他当时心中老大不高兴,心想自己才五十出头,中国人就把他当作不中用的老头子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算掌握一种外语?仅仅掌握语音、语法、词汇……能否算过关?我想上述例子足以做为回答:尽管上述学员按照我们传统的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所学语言知识(如 répéter ‘重复’的变位, ?/ gé ‘上岁数的’的搭配等)达到了会听、会说、会读、会写的要求,但这仍不足以保证实际运用语言时不犯错误。那位初出茅庐的译员由于使用了对平辈或晚辈才能用的第二人称单数命令式,一上场便得罪了一位有身份的外宾。而那位研究生则不懂得,由于东西方文化形态、心理因素的不同,人们的尊卑概念及表达尊卑概念的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异。比方在中

国,称中年以上的人为“老”,是尊敬的表示(如称“许老”等),可在西方“老”却意味着衰朽残年,来日无多,人们都忌讳“老”字,所以用中国方式对西方人表示关切,结果倒伤了人家的自尊心。

正是由于每种语言都是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的负载体,深入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而自觉培养一种“文化洞察力”(Julia Dobson 语)便成为当前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1984年在魁北克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法语教学讨论会以“文化对话”(Dialogue des cultures)为中心议题的事实便可充分说明这一点。

二、什么是社会文化因素?

众所周知,“文化”的含义是很广的。从人类文化学的观点看,文化有两个意思:一是狭义文化,或称人文文化(英文中大写的 Culture),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等。另一个是广义文化(英文中用小写开头的 culture),包括交际习惯、社会习俗、生活惯例及其它。

古德诺夫(H. Goodenough)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Linguistics)中是这样论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

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

既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如此密切,那就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不了解目的语的文化,便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外语。这一点尤其适用于学习西方语言的中国学员,因为以希腊神话和基督教为两大组成部分的欧洲文化和影响了我们近三千年的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相距之远是人所共知的。

比如“龙”在我国被视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而成为至尊的帝王的象征,炎皇子孙都骄傲地称自己为“龙

的传人”。但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龙”却是象鳄鱼类的陆生动物，能够“喷烟吐火”，是具有四足的凶残怪物，因此法语中常说的：“这个女人真是条龙！”（Cette femme est un vrai dragon！）绝不是恭维话，而是说：“这个女人真是个凶神！”狄更斯在《艰难时世》（Dickens：Hard Times，book II. Chap. 1）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斯巴塞太太总有点自认为是这个银行的‘仙女’。镇上的人们走来走去，看见她坐在那儿，却把她看作这个银行的‘毒龙’（Bank dragon），在看守那座矿山的宝藏。”

再比如，与东方礼教大相径庭的亚当和夏娃的浪漫传说在西方是家喻户晓、喜闻乐道的，即使在严肃的学术论文中它也可以径登大雅之堂：

……这颇像一种伊甸乐园式的观点，人类看来被分成语法能力和言语运用（能力），前者是一种理想的具有天赋机制的力量，而后者则更像吃（禁）苹果那样，一下子把完美的说话人—听话人推入了堕落的世界之中。（海姆斯《论交际能力》）

即便在最简单的电脑游戏的说明书中，西方人也没有忘记对它提上一笔：“这就是由夏娃在她那微型蛇计算器上设计的如同在伊甸乐园那些美好的日子一般简单的苹果游戏的程序……”（《回声》杂志1983年第33期）。

难怪那些只知道ABC而对圣经一无所知的学员，一到了真实的语言文化环境中便感到困惑，抓不住要领。

除了正式文化以外，普通文化对人的影响也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更应受到重视，因为它最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运用，而又最难从外部去观察和了解。美国华盛顿大学的诺斯特朗教授（Howard L. Nostrand）在第六届世界法语教学大会的发言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美国总统里根及夫人1983年访问日本时做错的一件事，说明他们访问前准备不够充分。诚然他们事前肯定已对一切

预计的活动有明确的安排,可是当里根夫妇与日本皇太子及公主交谈时,却按照美国人觉得十分自然的习惯,向日本皇室子女发出了访美邀请……可是在日本,这样的事情首先应取得父母的同意。如果访问者事前充分了解到日本家庭的文化价值以及子女对父母应具有的那种无限尊敬之情,那么尽管具体情况无法预见,他们也会能感觉到冒犯这一社会文化体制的基本现实可能带来的危险。

我们不妨补充几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不同的社会习俗对语言运用的影响。

中国人请客时,无论菜多么丰富,总要谦逊几句:“今天没什么好菜,只随便做了几样,请将就着吃吧……”这种客套中国人觉得十分得体,可是西方客人听了心里却想:你不做好菜招等我,可见你不尊重我……

又如“你”和“您”,在法语和俄语中都有区别:敬称是 vous, вы; 昵称是 tu, ты。按照布朗(Roger Brown)和吉尔曼(Albert Cilman)的说法,选用哪种形式取决于“权位”(power)和“亲疏程度”(solidarity)这两个因素。地位高的对地位低的用昵称,反之用敬称,当地位没有差别时,亲者昵称,疏者敬称。如果说北京话中的“你”和“您”的用法与上述前面一点相符的话,那么与后一点就有很大的差异。如在西方,对于亲近之人,不管年龄、身份相差多大,也以“你”相称,甚至可直呼名字,如电影《英俊少年》中,十几岁的孩子就管父亲叫卡尔,这在中国是绝对不行的。

再如打电话,也有个语言习惯问题。曾在我系任教的法籍教师苏比(Mme. Souby)就认为我们的学生乃至部分教师都不会用法语打电话。首先是不不知道怎么开头,往往显得唐突,冒失。其次是不不知道如何轮流讲话,在不该打断对方时抢着讲,而在该向对方做出反应时不吭声,以致于对方要停下来问:“你还在那里吗?”最后是不不知道如何收尾。这个结尾方式各种语言有不同的习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黎天睦教授(Timothy Light)讲到 he 第一次给

一个中国人打电话时,对方不说声“再见”便把话筒“咣!”地挂上了,他觉得这就像在他脸上打了一记耳光,心中老大不高兴,因为按英语习惯在这种场合下不说“再见”是很不礼貌的。但据笔者观察,中国人之间打电话结尾时大都不说“再见”,只要说“好,就这样!”“一言为定,不见不散!”……便可以了。可能在我们的概念里,打电话时只相互听见声音,并不见人,所以无需说“再见”。

由此可见,普赖德(J. B. Pride)在《社会语言学》一书的序言中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所必须掌握的东西都比他的语言的正规的或结构的特点多得多,他必须习得有关他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知识,也就是社会加在人们举止行为上的约束,包括对语言行为的制约。

三、社会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

必须承认,长期以来外语教学对社会文化因素是十分忽视的。原因很多:

首先,所有的理论语言学,不管是传统语言学,结构语言学或是转换生成语言学,都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只是语言本身。从索绪尔到乔姆斯基都认为言语行为不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他们都未能为我们提供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的知识。

六十年代初,有些语言学家提出了语言的交际功能的概念,如马丁内(A. Martinet)1960年在《普通语言学纲要》(Elément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一书里指出:

语言这个工具的主要功能是交际,比如法语,首先就是可以使操法语的人互相联系的工具。

但直到1971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海姆斯发表《论交际能力》,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交际能力这一概念:

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结合是一种积极的有益的现象,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语言)运用的(社会)规则,不掌握它们,语法

规则便会毫无用处。

其次,传统外语教学只是培养“纯语言能力”(compétence strictement linguistique),亦即具备“造出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技能”。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仅有这种能力远不足以保证人们在实际情景中进行有效的交际,因为在所有可能被造出的句子——语法和语义都正确的句子——中,有一部分由于不合乎(社会)运用规则而被屏弃。因此,成功的外语教学法还必须使学生具备语言的社会运用规则的知识并能够运用它们。也就是应该“具有言语的得体性的意识”(avoir le sens de l'appropriété du discours),或称社会文化能力。如果说我们过去多半只向学生传授“知识”(savoir),那么现在还应教给他们“本领”(savoir-faire)和“良好的教养”(savoir-vivre)。当然,强调社会文化能力,绝不意味着削弱语言能力;在这点上,我认为美国外语教师协会(American Council on the Teaching of Foreign Languages,简称ACTFL)向美国五十个州提出的外语教学大纲中的提法是比较恰当的:交际能力应包括五种要素,即四种语言能力(听、说、读、写)加上社会文化能力(能够与另一文化的人进行和谐的交往)。

最后,在外语教学上我们往往容易看到母语对学习外语的干扰,而忘却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也就是吉拉尔(Denis Girard)在他的《应用语言学和语言教学法》(Linguistique appliquée et didactique des langues)里说的“纯属语言的干扰以及属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概念)干扰”。海姆斯在《论交际能力》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社会因素对语言的干扰的概念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后一种干扰因素之所以容易被人忽略,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莫瓦朗(Sophie Moirand)在《教授用外语进行交际》(Enseigner communiquer en langue étrangère)一书中阐述的:人在学习母语时,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是同时习得的:

学习母语时两种能力相互补充——儿童是同时学会(社

会)运用规则和语言体系的规则的——例如父母或大人常对孩子说：“不许对奶奶这样说话。”“这样说话不礼貌。”“向阿姨问好。”“你该对这位先生说什么？”

然而外语多半只能在课堂里学习,老师是学生唯一的语境和社会,尤其是初级阶段的学生,只能与老师进行交际,如果教学的只是灌输语法规则的话,学生是绝对不会获得社会文化能力的。

总之,由于一批人类学家和社会语言学家揭示了语言与社会环境、社会阶层、社会集团的关系,人们终于发现书本上教的语言体系往往和社会的语言事实不相符合。原因是语言并不像许多理论语言学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套符号,一种体系,语言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海姆斯语)。

社会语言学的这一基本思想对外语教学有着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十几年来,由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不断深入,才产生了一些新的值得重视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法(如功能法或交际法)。尽管目前这些教学法还远不完善,但是把语言从书本中、从纯理论研究中解放出来,充分重视语言的实用价值和社会意义,这是外语教学的一个新方向,必将对外语教学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笔者认为,目前已有下列两种趋势值得注意:

1. 重视语言的交际价值 既然人们学习语言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掌握其体系,而且还要用它来交流思想,那么就要在教学内容上做相应的改变:即由根据语言体系编写教材,改为根据社会语言事实编写教材。过去有不少入门教材是根据传统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原则——亦即语言系统的原则——编写的,如在教授法语动词时必先教直陈式的各个主要时态,然后才给条件式、虚拟式等恰恰是表示礼貌或婉转表达所必须的时式。以动词 *vouloir* (愿意,想要)为例,学生很长时间一开口便是 *Je veux vous poser une question.* (“我要向你提个问题。”相当于英语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完全违背了社会运用规则——法国人一开口就是 *Je voudrais...* (相当于英语的 *I would like to...*) 亦即一种

委婉客气的说法,相当于“我很想……”“我希望可以……”。再如,我们有些教科书一开始便系统地讲述疑问句的各种构成,尤其是倒装句的复杂构造,但社会调查证明目前百分之九十五的法国人造疑问句时都不用例装。由此可见,如果我们能够跳出语言系统的框框,按照语言的交际价值来合理地选材和安排进度,实用的先学,少做无用功,定能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重视语言的变体 传统语言学、结构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言学都把语言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现象,社会语言学则认为语言是一个变化的系统,它和其他的社会文化习惯一样,随历史时期和地区不同而不断变化。这对社会集团如是,对每个个人也一样,也就是说由于存在着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环境、场合等的差异,人们从来不永远使用一种中性的语言,而是选择不同的语言变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法国的国外法兰西语言与文化教育局主任吉拉尔将语言变体分为七种:

1) 不同形式的变体(如口语与笔语之分)(model) 2) 不同时代的变体(Etats de langue); 3) 不同语级的变体(Niveaux de langue); 4) 不同方言的变体(Variétés dialectales); 5) 不同领域的变体(Registres de langue); 6) 反映个人言语特点的变体(Idiolectes); 7) 不同风格的变体(Styles)。

这里面有几种变体和教学的关系特别大,比如语言随时代的演变。笔者小时学英语时学过这样一条规则,就是 any 只用于否定句或疑问句,例如:I don't like apple anymore. They don't have any pencils. 可是黎天睦教授说,自从 1971 年他便在美国碰到这样的句子:They really like that kind of insurance anymore. Any more they really like that kind of icecream. (此时 anymore 是相当于汉语“了”的意思。)根据他的观察,这种变化在五年之内便普及了:“开始时,可能只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说,后来大家都说,连大学教授和电台广播员都说了,于是这个变化便完成了。”

不同语级的变体，是说随着社会环境的不同，语言分为高雅的、日常通用的、亲昵的、通俗的等多种语级。比如 Mme. Pépin (蓓萍夫人)来到失物招领处认领她丢失的伞，管理员照例要询问她丢伞的时间、地点以及伞的特点等，然后拿出几把伞来让她认，Mme. Pépin 指着其中一把说：“Le voilà, c'est le mien.”(“就是那把，那就是我的[伞]”)。如果按照培养语言能力的要求，一定是这样做机械的替换练习：

—Le voilà, c'est le tien.

(就是那把，那就是你的伞。)

—Le voilà, c'est le sien.

(就是那把，那就是他的伞。)

—Le voilà, c'est le nôtre.

(就是那把，那就是我们的伞。)

.....

事实上，每天来认领伞的女士们，绝不会按这个模式讲话；相反，由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当时的情绪不同，讲话的口气一定各不一样：

如果她对管理员的一番盘问很不满意，就会说：“这回该把伞还我了吧！”(“Faudrait me le rendre maintenant!”)

如果她已被一天的工作弄得疲惫不堪，就会这样讲：“就是右边那把，取回自己的东西还得费这么大的事！”(“Celui de droite. Quelle affaire pour récupérer son bien!”)

如果她怕丈夫发火，就会松一口气地说：“那把粉红色的，在紧里边，就是这把，可找到它了！”(“La rose, au bout, c'est bien lui, Ouf!”)

如果她爱装腔做势，就会娇声娇气地说：“在最靠里边，套在一个粉红色的伞套里，我似乎认出了我那把伞了……”(“Tout au bout, dans une housse rose, je crois reconnaître le mien...”),等等。

其实这也是一种替换练习,不过这回是社会语言学类型的替换练习罢了。改换讲话者的社会地位、身份、个性等等。当然,前一种替换练习也是必要的,但如果只停留在机械重复阶段,学生是永远也不能真正学会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语言的。

不难看出,以上特点都与社会语言学及心理语言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现代外语教学的发展要求我们学一点语言学,例如把语言置于一般文化情景中进行考察,这会帮助我们开阔视野,获得较为全面的语言观。

(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3期)

文化与语言习得

李磊伟 李文英

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学习一门外语就是掌握一套语法和发音规则,加上一大堆词汇,这样就能得心应手地用外语来交流思想,表达情感了。其实,上述三个要素只不过是语言习得的一个部分而不是整体,重要的是,文化因素是外语习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所谓文化,有多种含义。本文所指的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价值观和行为观。这些观念时刻在控制指导我们的行为,无论是语言行为(linguistic behavior)、伴随语言行为(paralinguistic behavior)或是非语言行为(non-verbal behavior)。所以,要驾驭一门外语,学习者一定得经历从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成熟到社交语言能力(sociolinguistic competence)的成熟,最终到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成熟这一必经的过程,缺一不可。

文化与语言有相辅相成的关系,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应该是学习其语言文化的过程。文化具有其自身的语法(指文化体系)及其规律,因此,文化并不玄秘而是有章可循的。下面我们将谈谈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特指美国与中国)以及如何妥善解决文化冲突的一些方法。

(一)文化作为伴随或非语言行为

文化中纷繁的非语言行为是有其严密的结构组织的。这种组合的信息从形式上来讲就与自然语言中的音节、单词及句子一样。所以,倘若非语言行为与语言行为不一致,信息就不能准确地传达

给对方甚至信息会被曲解。原因很简单,说话者的每一细微的一举一动没有得到听话者的认可。换言之,说话者不了解所说者对他或她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生交叉文化的冲突或障碍(cross-cultural/inter cultural conflict)。这种非语言行为与语言行为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交际者双方对他方社会文化行为准则缺乏了解的缘故。

(二)空间观

美国人一般有很强的空间领域感(sense of spatial territory)和个人秘密感(privacy)。由于这两种需求,他们经常用墙、门及夹板把个人工作或生活的地域隔起来。学校图书馆的书桌、教授、律师等的办公室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地域划分。如果门敞开着就意味着一种邀请,你这时便可轻轻敲门以示对办公室主人的尊重,随后就会自然地受欢迎。中国人由于其历史的原因一般具有共享地域空间的能力,因此很少意识到空间对美国人来说也是一种不可随意侵犯的财产。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人死守着自己的家园,他们所珍视的个人秘密感却常常受到家庭电话的骚扰。然而,又有一种默认的惯例:除非是亲属、密友或紧急事件,晚上九点以后一般是不通电话的。在美国人家里作客,客人也一般只能局限在客厅里,决不能因为好奇心向主人提出参观卧室的要求,否则就会被认为无礼。与空间观直接相连的是人与人交谈时的距离,距离反映了谈话者双方的社会身分,尽管在美国有人人平等的神话,在上司与下属的交谈中总保持相当宽的距离,而社会地位相等的双方交谈时空间则相对缩小。同时,故友重逢,老友相别时,美国人总喜欢拥抱接吻,相反,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这种以动作表露感情的现象就很少见。所以在与美国人交谈时中国人对于他们用手接触或拍摸肩、背等身体部位,我们总不自觉地回避(这种情况在异性交际时尤为显著)。中国人一般不警戒同性别人的接触,诸如双手勾肩,美国人对此则特别敏感,因为这种空间亲密感

是同性恋者的标志。

或许是因为美国历史上由东海岸到西海岸的殖民扩张,一般美国人对空间物体的态度总是越大越好,大房子、大办公室、大汽车等等总是与其主人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有关。上述种种都是非语言的达意方式。

(三)时间观

时间是人为的概念,它决非是固定的而是相对的。人类学家豪尔(E. Hall)把时间分为三类:技术时间(technical time),正式时间(formal time)和非正式时间(informal time)。

技术时间是指以钟表来衡量的计时手段,这在各种不同文化中的差异是很小的。

在正式时间中,美国人将时间比作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商品,时间就是金钱,既能买进又能售出。美国人的时间观很少有过去式或将来式。正如豪尔精辟指出的那样:“时间相距太远的事很难使我们[美国人]产生联想,因此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说我们几乎不可能进行长远规划。”

非正式时间与正式时间有不少共同点,但是,这种时间会因人因地而异。比如,某教授在自己办公室与学生进行十分钟谈话就和他去白宫与总统进行十分钟交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同样,学生之间的聊天与学生教授之间的讨论,虽然同样是十分钟,其含义则大相径庭。

美国人对时间常常抱着一种紧迫感,这不仅体现在所有的社交活动都需事先约会,并且体现在他们人为的忙碌上(busyness)。举通常的例子来说,锻炼长跑的美国人都喜欢带一副备耳机的录放机边跑边听音乐;又如驾车去上班时总习惯把收音机打开听新闻或其它,静止不动、沉思默念会被一般的美国人认为是无聊地浪费时间;只有活动(activity)才能证实时间的存在,才能说明某人有所作为。

(四) 友谊观

美国人善于交友,对中国人一般都很友好。但是他们的友谊观常常使我们费解,主要是因为美国人极少与朋友有什么长期不断、稳定不变的友谊关系,这种现象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工作的流动,家庭的迁异,再加上喜新厌旧的普遍心理,等等。因此,某美国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你相识,他/她会与你无话不谈,但一个月后当你用他/她的名片打电话给他/她时,他/她压根儿就忘了有你这样一个朋友。

美国人的友谊观康顿与尤索夫(Condon and Yousef)曾作了很好的注脚,他们把它称为手绢纸友谊(kleenex friendship),用完就扔,意即功用性友谊,时过景迁。

友谊常用礼品来表达。美国人一般很少收礼,更少收重礼因为他们会把礼品看成一种贿赂。应邀前去某家庭赴宴可带一小小的纪念品,这体现了你对主人的尊重与领情。然而,使中国人困惑的是,主人会马上打开礼品称赞一番,客人简直尴尬得手足无措,因为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中一般是将客人的礼品搁在一边,等送客之后才打开看个究竟的。这个实例表明了两种价值观。美国人并非要看礼物本身的价值,而只是想表示对客人礼物的(无论喜欢与否)欣赏。

中国人有句熟语,说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人也是如此,可是有不少情况下美国人是决不依赖朋友的。美国人非常强调个人自身的价值,强调自我意识而蔑视人际关系。

(五) 亲属观

美国人的家庭形式主要分成两类。一种是权威中心型家庭(authority centered);另一种是社会交际中心型家庭(social centered)。前者与传统的中国家庭相似,但在美国这种类型的家庭大多

与富庶之家相连,后者一般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家庭模式,但由于太多的美国人自称中产阶级,这一概念也就模糊不清了。笔者将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代表多数的美国家庭形式上。

首先在这种家庭中人际关系非常随便,开放,没有固定的进餐时间,家庭成员不是以家庭而是以社交场合为生活的中心,诸如友友的聚会、青年人的约会、喝酒、跳舞等等,这种家庭形式的结果是使得下一代组合家庭后感到极难在家中进行正常的对话,只有到社交场合才能交流思想感情。

这种家庭形式是由美国人引以为豪的个人主义观念造成的,这一人文思潮促使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了自私、竞争的自我意识。一旦孩子成年,老少两辈的关系就开始疏远,儿子成了富翁而父母则在政府养老院接济下惨度晚年的例子是屡见不鲜的。在美国极端的个人主义取代了中国人忍让、敬老、服从和牺牲的伦理观。

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中国人通常是以血缘、家庭和整体和谐为重,体现在自我意识的泯灭上,而美国人则注重个人的功名与成就,很少以父母亲属的成就为荣。

(六) 小 结

在上述各个部分中,我们仅向读者提供了一些基本的文化观念,希望以此引起人们对文化这一时隐时现的现象的关注。值得了解的是在学习他国文化时要回避两个极端。第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换言之,学习者总是拿自己母语的文化作为衡量任何外国文化的准绳,其结果是唯我独尊,排斥了交叉文化对话的可能性。第二种是绝对的非民族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者盲目地模仿他国文化,尽力与母语文化断绝关系,其结果是失去了自己文化的尊严和自身的价值而遭人贬视。

交叉文化的沟通时较为理想的渠道是使双方对他方文化产生一种认知感(cross-cultural awareness)。在这种情形下,双方充分

认识到对方的行为价值观 ,造就默许认可的气氛 ,使得和睦共处成为可能。事实上 ,这种情况下的文化交流并非我方与他方文化的交流而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种文化的交流。正如斯图尔特 (E. C. Stewart)所指出的 :这种文化是“ 人为造成的。在与其它社会文化接触时 ,与外国人交流时 ,人们总是学习与互享他方的一些文化因素以达到其沟通的目的。”

本文引言一节中曾提及文化语法的可学性 ,然而以为单靠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本小册子就能掌握文化整体也是一种误解。要较好地学习文化可以说是有一条捷径 :那就是细致地观察和分析自身的价值行为 ,增长对自己的了解是认识他人的起点。

References :

Cordon ,J. C. & Fathi Yousef. 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Hall ,E. The Silent Language. Stewart ,E. C. American Cultural Patterns :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原载《 外国语 》1988 年第 4 期)

英语教学与英美文化

杜瑞清

一谈及英语教学,人们往往只想到听、说、读、写、译几项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近年来,在打好基本功的基础上,又意识到要扩大知识面,为国家培养更合适的英语人才。因此,各个外语院系除继续加强基本功的训练外,还开设了不少文化知识课程,使我国的英语教学向前大大地迈进了一步。但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对英语语言所表现的英美文化我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学生虽然学习了语音、语法、词汇,有相当的听、说、读、写、译能力和一定的知识面,但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英语,常常不能用英语深入、灵活、得体和有效地表达思想,进行交际。

一位来自英语国家的友人在分手时说:“I'll be in touch.”送行者就一直等着鸿雁传书,然而,一年半截悄然而过,他连片言只语也没有收到,于是就抱怨,说外国人虚伪,不讲信用,明明表示要“联系”,为什么一个字也不写,说话不算数呢?实际上,这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为“我会保持联系”的话,只是一种告别用语,相当于“再见”,说话人并无它意,更没有做任何许诺。

一位年轻翻译,发音标准,语调自然,第一次陪外宾,每到一地总要说“You come this way, You sit here, Don't go too fast. Follow me, Don't be late.”满以为对这位客人接待热情,照顾该是无微不至了。然而,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那位外宾第二天却不愿意与他一起外出参观。在他看来,年轻翻译不懂礼貌,对他说话简直象教训小孩子一样。

至于在受到英语国家客人表扬后,连声否定,使人感到扫兴

和不可理解的事则更是层出不穷了。

以上几个事例,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语言和文化的问题。任何语言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把语言比做树,把文化比作森林,如果只顾语言,不了解所学语言所赖以存在的文化,等于见树不见林,就很难完全理解和正确、得体地使用所学语言。美国一位学者在谈及跨文化交际时说:“仅仅掌握了一种语言,并不意味着能完全同使用该语言的人进行交际。”^①有时非但达不到交际的目的,还可能会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这就给我们的英语教学提出了一个极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要把对英美文化的了解和掌握贯穿在英语教学的始终。

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无处不在,无所不包,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人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所取得成就的总和。根据人类文化学的观点,文化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在英语中大写,可称之为正式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等社会科学以及各种自然科学的成果,集中反映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另一类在英语中小写,可称之为普通文化,即人类生活中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如风俗习惯、礼义、禁忌、婚丧、庆典、节日等。总之,人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均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一定的文化熏陶和修养。了解和掌握两种不同模式的文化,需要采取不同的办法。开设相应的课程,就可以帮助英语专业的学生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学艺术等。而要熟悉那一系列不同的特征,光靠课程的开设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的,需要我们在教学的每一个环节,在各门课程中,自觉、不断和全面地加以处理。

比方说词汇教学。一个简单的 breakfast,人们总是毫不犹豫地把它同中文里的“早餐”等同起来,岂不知摆在餐桌上的东西却迥然不同。如果在教学过程,尽量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除只教这一个孤零零的单词外,稍微扩大一下范围,把中式早餐与西式早餐加以比较,则会把词汇教学置于文化背景之中,一举两得,起到事半功倍之效。英语中有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词(culture-loaded

words), 中国英语学习者往往望词生义, 或根据中国的文化传统加以理解, 要么感到迷惑不解, 要么闹出笑话, 甚至会产生人们常说的“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例如英语中的 adult books 一词, 从字面上看, 一个是“成年人”, 一个是“书”, 放在一起自然就意为“成年人用书”了。然而这样推理出来的答案只是它的字面意义。从文化内涵上讲, 它实际上是“色情书籍(刊)”的代名词。原来在西方社会, 淫秽书刊充斥市场, 为了遮人耳目, 这样一个委婉词便应运而生。再比如 senior citizens 一词, 许多学生不假思索地说它所指的是“有社会地位的公民”。而实际上, 这里的 senior 与社会地位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中国人有尊老的传统, 人们也常常倚老卖老。而西方人谁也不愿意别人说自己老, 更不想变老, 老年意味着孤独, 所以就在“公民”前面冠以 senior 这一听起来堂而皇之的字眼。对诸如此类的词汇, 我们如果只注意字面意义, 忽视其内涵或社会文化意义, 就很难真正理解, 正确运用。

再比如英美国家五花八门的宗教派别, 各种不同的节日, 人们的起居习惯, 丧葬婚娶的习俗, 餐桌上的讲究、家庭住房及其布置等, 都需要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通过各种方式帮助学生加以了解。不过, 这种了解可以是“消极”的, 就像词汇中的“消极”词汇一样, 见面认识, 了解其意思就可以了, 无需花大气力进行掌握和运用。相对而言, 这类文化也比较容易处理, 可包括在教材中, 也可通过教师讲解或利用图片、幻灯、录相和电影这些直观的教学手段就可解决问题。

比较棘手, 但在用英语交往中需要时刻注意并加以运用的是一些积极的文化模式, 如打招呼、道歉和致谢用语及称谓、禁忌、委婉词和对英语国家人民来说常常是理所当然的话语、做法和常识。有人曾讲过这样一个笑话。七十年代中期, 一名外国游客在中国某城市街头聚精会神地观看对他来说十分陌生而又新奇的宣传画。突然, 一个身穿中山服的中国人走上前来, 问了三句话: What is your nam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Follow me. 这位中国人原

想跟外国游客练练英语口语,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他那三句话从语法上讲也正确无误,问话时还面带笑容,但因为单刀直入,一点也不讲英语民族的交际方式,致使那位游客大吃一惊,以为自己在 中国领土上做了什么错事,要被拘留审查。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模式。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的运用方式集中表现了各民族的文化特征。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社会性,人们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体谅,而英美及其它西方民族则是以自我为中心。因此,中国人见面后,除说声“你好”以外,总还要问“你上哪儿?”“吃了没有?”“你在干什么?”等,还常常谈及工资、家庭、年龄、子女等问题。而英美和其他西方人士往往对以上这些打招呼用语和社交方式不理解,还认为你是在干预他们的“隐私权”(privacy)。中国人以谦逊为美德,讲话写文章喜欢客套一番,以表示虚心,免得让人家说自己骄傲自满,而讲英语的民族并不兴这一套。他们受到别人的赞扬,总要先说声 Thank you,以表示领情。要学好英语,用英语得体有效地进行交际,就必须注意并熟知诸如此类的文化特征,并采取相应的言语行动。人们常说 To be bilingual, one must be bicultural (要掌握两种语言,必须掌握两种文化)。对我们英语教学来说,要达到培养目标,使学生成为合格的英语人才,除良好的思想素质和其它业务素质外,对英美文化的掌握也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一环。这既有一个学习和了解的过程,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应当说后者比前者更难。众所周知,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文化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语言的差异,其中包括句法、词汇、表达方式、表达内容、语境、得体性等。不自觉地下功夫了解这些差异,适应这些差异,就很难把英语真正学到手。人们常说的要用英语进行思维,实际上是用英语文化进行思维。H. Douglas Brown 在他的《语言教学原则》一书中提出“文化化”的见解。他说:“每一种第二语言的使用都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化……使用外国语则会引起更大程度的文化化……学习外国语要比在本族文化环境中学习第二种语言

接触更多的文化问题。这是因为学习外语几乎每时每刻都得理解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的人。所以,外国语教学大纲通常力图解决该语言的文化内涵。”^②

Brown 所指的文化化,实际上是对另一种文化的了解、吸收和适应,也就是说,学习和使用一门外国语,必须同时学习和适应这门外国语所赖以存在的文化。实践证明,英语专业的学生进入高年级阶段时,交际的主要障碍已经不在语言本身,而在于对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对其文化及交际模式的适应性。因此,我们要在帮助学生学习和掌握英语语言基本功的同时,引导学生自觉了解和适应英美国家的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在增加英语语感的同时,提高英美文化感。

另外,“纵观世界文化发展史,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互相开放、互相交流、互相引进、互相吸收,同时又不断分化,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一条规律。”^③要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我们也必须引导和帮助学生了解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演变及各种表现形式。象在语言教学中,母语既有帮助又有干扰作用一样,母语文化对外来文化既是一种抵制力,也可以是一种推动力。要有效得体地用英语进行交际,不能想当然,简单地用母语文化代替英美文化,用母语文化模式进行英语交际。但不深刻理解并掌握本族文化,就很难进行必要的对比,深入理解并自觉适应英美文化。美国著名语言学家 Stephen Krashen 在论述语言学习时,提出:“理解输入”(comprehensible input)的观点,意思是知识面越广,理解力就越强。语言的习得和掌握绝不是一种孤零零的语言现象。学习文化也同样是如此,只有具备比较广泛的本民族文化知识,才能较好地理解和掌握另一种新的文化。对此,Douglas Brown 也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学习用另一种语言进行思维,需以对该种语言相当程度的掌握为前提,但一般说来,学习第二种语言,不必重新学习如何进行思维。与人类其它所有的学习

活动一样,学习第二种语言可发挥已有知识的作用,利用对第二种文化和第二种语言学习那些有效和有用的东西,促进第二种语言学习。需要摒弃的只是起干扰作用的洗澡水,而不是起促进作用的婴儿。^④

除在高年级开设有关文化知识课程,重视中国文化外,对英美文化的了解和掌握应贯穿在各个教学阶段、各专课程教学,以及教材、教法和测试中。低年级的口语课就是学习、了解和适应英美文化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在操练打招呼、寒暄、祝贺、道谢、告别、表示同情或遗憾、约会等日常会话中,教师可利用各种直观手段,或组织模拟训练,引导学生把自己既置于英语语言之中,也置于英美文化之中,反复进行练习,争取达到脱口而出的程度。阅读、翻译等课程也是学习和比较文化的好机会。在教学中,除强调掌握语言点外,更得注意文化点。如在 *A Higher Course of English Study* (Ronald Mackin & David Carver,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一书第四章 Text A 中,有这样一段课文: Professor wheatcroft,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n the current issue of the *BANKER*, ponders the question if, as a nation, we are overdoing the Robin Hood act. He has made a study of how income tax and surtax are hitting the big income earners. He is sure that the States is grabbing too much. 在讲授时,我们首先引导学生通过查阅有关资料,进一步了解英国文化中以 Robin Hood 为首的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民间传说,再对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及 income tax 和 surtax 加以了解,整个段落的中心意思就迎刃而解了。

对文化点的测试也应该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妨命拟下面一类选择题:

Mr. Li is introduced to Mr. and Mrs. Smith who are sitting in Mr. Brown's drawing-room. Mr. Smith stands up and shakes hands with Mr. Li warmly as they are being introduced to each other while Mrs. Smith remains seated with only a slight nod of her head as Mr.

Li is being introduced to her. According to Western culture Mrs. Smith _____.

- A. is being proud
- B. does not like Mr. Li
- C. is an unpleasant and unsociable woman
- D. greets Mr. Li in an acceptable manner

为了提高对文化因素的学习效果,我们可以借鉴词汇教学中分别积极词汇与消极词汇的作法,按照积极和消极两种文化模式,组织有针对性的教学。对积极的文化模式要引导学生反复练习、认真掌握,力争做到一讲英语就自然而然地既用英语,也用英语文化模式进行思维。对消极的文化模式,一般介绍和了解就可以了。

在英语教学中强调注意英美文化,培养学生对英美文化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势必要对教师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在教材中尽量多包括文化点,在课堂讲授中注意文化点,并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操练,教师自己就必须有较高的英语语言基本功和英美文化素养。近年来,我们聘用了为数不少的来自英语国家的专家和教师,许多中国英语教师出国进行学习,给我们在英语教学中更好地解决英美文化问题,培养文化交际能力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国际交往的增加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既对我们培养英语专业学生的文化能力和知识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更对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注 释

- ① Dean Barnlund, a lecture given at Stanford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Applie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ugust, 1978.
- ② H. Douglas Brown, Principles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entice-Hall, Inc. Englewood Cliffs, N. J. 1980, P. 130—P. 131.
- ③ 李强,“关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一点思考”,《光明日报》,1986年

8 月 20 日。

④ Brown P. 144.

主要参考书目

Brown , H. Douglas. Principles of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 Prentice-Hall , Inc. Englewood Cliffs , N. J. 1980.

Driller , Karl Conrad. The Language Teaching Controversy , Newsbury House Publishers , 1977.

Hendle , Paul. (ed.) Language , Thought and Culture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1972.

Stern , H. H.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Language Teaching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72.

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83。

(原载《外语教学》1987 年第 3 期)

社会文化因素与外语教学

王伟华

一、社会文化不同引起的问题

文化在语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化与语言是紧密相连的,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因为文化的差异,同一词,同一词组对另外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说不可能指的是同一事物而且往往会产生误解,毫无恶意的言词会使对方惊讶或愤怒,简单的一句话有时会使一方捧腹大笑而另一方全然不知其幽默之所在。

在外语教学中,尽管学生们按照我们的传统的教学大纲的要求对所学语言知识达到了会听、会说、会读、会写,但这仍不足以保证实际应用语言时不犯错误。所以学生们在学习英语中不仅要学习它的发音、词汇和语法,还应该熟悉说英语国家的社会与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帮助学生学好英语,因为语言与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反之则会出现误解。

例1:中国人见面时打招呼说“你到哪儿去?”“你出去吗?”尽管人们并不想知道你到底去什么地方。一位英国教师在去学校礼堂看电影的路上遇到学生也去看电影。学生根据汉语习惯很有礼貌地说“Are you going to see the film?”这位外籍教师觉得很奇怪,心想你明明知道我朝礼堂走是去看电影,为什么还问这样的问题呢?

例2:一位外籍教师因运动扭伤了脚,他拄着拐棍去上课。系里的老师和学生见此情景都很关心他,一见面就问他:“你的脚好

些了吗？你走路要当心啊！”每天都有几个人这样问侯他，他对这样关心的方式很难接受，反而不高兴，最后他在黑板上写道：I'm ok. Please don't ask me any more.”对此中国教师和学生都觉得莫名其妙。

例3：一次，一位五十出头的外籍教师向学生们讲述她来校时旅途见闻，并说她刚刚回来，仍觉得有些疲劳。这时一位学生很关心地说：“你今天应该好好休息，你这样大的年纪不能太劳累了。”这位外籍教师听后不十分高兴地说：“I don't think I'm that old. Please don't worry about it.”由于东西方文化形态、心理因素的不同，人们对年龄的概念及表达这一概念的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异。在中国，称中年以上的人为“老”，是尊敬的表示，如“老张”、“老李”。而在西方“老”意味着衰朽残年，来日无多，人们都忌讳“老”字，所以用中国方式对西方人表示关切，结果倒伤了人家的自尊心。

例4：一位外籍教师见到一位女学生穿着一件漂亮的连衣裙，很好看，她高兴地说：“You look very beautiful today.”这位女学生不好意思地说：“No, no. This is an ordinary dress.”再一次外籍教师夸奖一位学生的英文讲的流利：“Your English is quite fluent.”这位学生听后马上谦虚地说：“NO, no. my English is quite poor.”这两位学生的回答使得外教既惊奇又不快。惊奇的是这两位学生的回答是她没有想到的，不快的是：明明女学生穿着这件连衣裙很好看，另一位学生的英语口语很不错，而他们怎么却说“不”。好像她本人连好、坏都不分似的。

类似的例子很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广。从以上例子已大致说明一个问题：学习英语不能不同时注意中国和西方在文化上的差异。

正是由于每一种语言都反映着产生它的文化，因而任何形式的言语都有其文化内涵。现代社会交际范围日益广泛，为了提高言语效果，语言学家要加深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研究各种语言变体和言语规律，充分发挥语言的功能。从语言与社会关系来看，

语言是社会现象,语言的本质属性是作为社会的交际工具,语言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语言随着社会产生而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语言发展遵循它本身的内部发展规律,但语言作为社会现象对社会有依赖性,它是为了满足社会的交际而产生、存在和发展的。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人类思维的进步,促使语言日益丰富,日益精炼。语言的使用要受到社会的制约。人们用语言进行社会交际时,要遵守社会的约定俗成的规范。语言的发展和变化均受到社会的影响。社会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应当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语言。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都从社会语言学学科的角度探讨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因此深入研究语言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而自觉培养一种“文化洞察力”,便成为当前外语教学的一个主要课题。

长期以来,我们在教学上对这个方面重视不足,学生犯这类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学中偏重语言形式而忽视语言形式的社会意义,忽视语言在实际场合的运用。

二、什么是社会文化

“文化”的含义是很广的。从人类文化学的观点看,文化有两个意思:一是正式文化,包括文化学、历史、哲学、政治等;另一个是普通文化,即普通的社会习俗和惯例。

古德诺夫在《文化人类学与语言学》中是这样论述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

一个社会的语言是该社会的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学习文化的主要工具,人在学习和运用的过程中获得整个文化。

可以看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不了解某一外语的文化就无法正确理解和运用这种外语。这一点对于我们中国学

生学习西方语言尤为重要。因为我们东西方的社会是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所以我们的思想、信仰、习俗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比如“龙”在我国被视为吉祥的神物,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力量,因而成为至尊的帝王的象征,我们都骄傲地称自己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但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龙”却是象鳄鱼类的陆生动物,能够喷烟吐火;是具有四足的凶残怪物”,一般没有褒意,也很少用来形容人。

再如:在欧洲社会,黑色是丧服颜色,同时也是庄严集体的颜色,但在东方社会,丧服往往使用白色,我们现代习惯,在追悼会上每个参加者系一朵白花,或者带一条黑纱,甚至又系白花,又带黑纱。在欧洲,紫色一般是权力的象征,而在东方则黄色才是不可侵犯的权贵颜色。中国皇帝的龙袍是黄色的,一般庶民不得穿用黄色的衣服,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社会习惯,在这个社会的全体成员中,它是被普遍接受的。

我们也不能忽视文化对人的影响,而且应更加重视这种影响,因为它最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语言运用,而又难以从外部去观察和了解。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不同的社会习俗对语言运用的影响。

中国人见面往往相互问“你吃过饭了吗?”其实问话者并不是想知道对方是否吃了饭,这只是一种 greeting 的方式,而英语国家的人没有这一习惯。一位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学习时,经常有人这样问他,而他没有把“你吃饭了吗?”认为是一种 friendly greeting,而认为是一个 question。他不知如何回答好,对此还不高兴,他问一位学生:“你们为什么老问我吃了没有?我有钱。”显然他理解为那些同他打招呼的人以为他没钱吃饭。

中国人请客时,无论菜多么丰盛,也要谦逊几句:“没有什么好菜,别见笑,随便吃点……”。这种客套中国人觉得十分得体,西方客人听了心中会想你不好做菜招待我,可见你不尊重我。

中国人在听到别人称赞自己时 ,常说 : “我还有许多缺点 ,做的还很不够 ,希望多多帮助。”英语国家的人则常答以 “谢谢” 。如果别人对你新买的帽子表示欣赏 ,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可以说 : “你喜欢它 ,我很高兴。”而不要说 : “不好 ,只是一般的。”或 “你猜我多少钱买的 ?”你发表演说时 ,也用不着先说 “我准备得很不好”之类的客套话。

再如打电话也有一个语言习惯问题。英语国家人拿起电话常先报一下自己的电话号码或单位名称 ,如 “9722185” , “Magna Hotel” ; “Ahantic Airways” ; “Oxford University”等 ,这样对方马上能知道自己是否要对了号码。我们中国人打电话常先问 “你哪里 ?”、“你是谁呀 ?”、“你找谁呀 ?”等 ,中国人之间打电话结尾时大都不说 “再见” ,只说 “好 ,就这样 !” ; “一言为定 ,不见不散 !”等等。而英美人打电话都是以 “再见”来结尾的。

另一问题是一个概念往往在另一文化与语言中没有对等的概念。在英语国家里很难找到 “传达室”的准确译文 ,就象在中国找不到美国的 drugstore ,即使把前者翻为 guard's room , gateman's place ,后者译为 “杂货店”或 “药铺” ,语言上似乎是明白了 ,但并不是它们确切的含义。

显然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文化习俗 ,每种语言都反映着产生它的一种文化 ,因而任何形式的言语都具有某种文化的内含。要学好英语必须了解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习惯等。因为语言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十分敏感 ,任何变化都会在语言中有所反映。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不清楚 ,便不能透彻理解反映它的语言。普赖德 (J. B. Pride) 在《社会语言学》一书的序言中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

任何一个社会集团的成员所必须掌握的东西能比他的语言的正规的或结构的特点多得多 ,他必须习得有关他的社会和文化价值的知识 ,也就是社会加在人们举止行为上的约束 ,包括对语言行为的制约。

三、在外语教学中要重视社会文化因素

长期以来外语教学对社会文化因素是重视不够的。传统英语教学只是培养“纯语言能力”,即具备“造出一些意义正确、合乎语法规则的句子的能力”。然而大量事实证明,仅有这种能力是不足以保证人们在实际情景中进行有效的交际,因为所有可能造出的句子——语法和语义都正确的句子中,有一部分由于不合于社会运用规则而被屏弃。海姆斯(D. H. Hymes)认为,仅仅学习某种语言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怎样使用那种语言,即必须掌握使用那种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使用何种语体和语言形式,怎样以适当的方式表示客气(或不客气)、友好(或不友好)等等。因此成功的外语教学法还必须使学生具备语言的社会运用规则的知识并能够实际运用它们,具有社会文化能力。这里,强调社会文化能力,绝不意味着削弱语言能力。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了解英美文化,要学好英语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越深刻细致地了解所学语言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以至生活的细节,就越能正确理解和准确地使用这一语言。同时还要注意语言能力与交际能力的关系。我们既要向学生传授语言知识,还要教给他们语言本领和良好的教养,提高交际能力应包括五种要素,即四种语言能力(听、说、读、写)加上社会文化能力(能够与另一文化的人进行和谐的交往)。交际能力是“话语民族学”(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已经成为应用语言学领域里的交际教学法的核心思想。

在外语教学中我们往往容易看到母语对学习外语的干扰,而忘却社会文化因素的干扰。人在学习母语时,语言能力和社会文化能力是同时习得的。儿童是同时学会语言运用规则。如父母常对孩子说:“不许这样对奶奶说话。”“这样做不礼貌。”“问叔叔好。”“阿姨给糖了,要说‘谢谢’。”“大人讲话小孩不要插嘴。”等。

然而外语多半只能在课堂里学习,老师是学生唯一的语境和

社会,尤其是初级阶段的学生,只能与老师进行交际,如果教学目的只是灌输语法规则,只停留在机械重复阶段,学生是永远也不能真正学会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语言的,学生也绝对不会获得社会文化能力的。我们要重视语言的实用价值和社会意义,把语言置于一般文化情景中进行考察,这会有助于我们教学,使学生在语言的同时获得较为全面的语言观。

四、怎样在教学中传授社会文化知识

在教学中传授社会文化知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教师必须对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有所了解。教师不仅是向学生提供外国文化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能够使学生在不同的场合下正确表达自己。

1. 首先教材是很重要的。在教学中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国外出版的教材,在自编教材中多用一些“真实材料”(authentic material)。有些英美出版的质量较好的课本采用了不少涉及英美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材料,有些对话也是研究文化差异的好材料,因为它有文化洞察能力。对话特别适宜于揭示文化的各个方面,因为说话人都遵守规定的文化行为,对话表达了他们的正规的相互间的响应,对低年级教学较适宜。所谓“真实材料”是指从实际活动(口头、书面)中选取的材料,它的好处在于其中许多部分涉及场合、身份、相互关系等社会因素。有了教材,教师应有目的地进行文化因素的讲解。请看下面两个英国人的对话:

Helen : Hello , Susan , where are you going ?

Susan : I'm going to get a magazine and some chocolate.

Helen : Let's go to that newsagent in the corner. I want some cigarettes.

Susan : I want to go the one down the road. I've got to send off this parcel and there is a post - office in that one.

这段对话告诉我们在英国有些 newsagent s shops 不仅有糖果、香烟 ,还设有邮局带寄信件、包裹。如果没有注解 ,学生定会迷惑不解 ,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 newsagent s shops。如果我们寄信件包裹应去邮局 ,买糖到食品店。这时需要老师的讲解 ,在老师的帮助下学生们可以得到一些社会文化因素的知识。

2. 引导学生在读文学作品、报刊时留心 and 积累有关文化背景、社会习俗、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材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了解英美社会主要靠间接地阅读有关的材料。文学作品是了解一个民族的习性、心理状态、文化特点、风俗习惯、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最生动最丰富的材料。教师应选择一些能够使学生们在短时间内有助于提高交际技能的文学作品 ,其中词汇和结构能与学生们本族语形成鲜明对比的及学生本族的社会文化因素与他们所学的社会文化因素有一定差异的。教师应有效地利用好所选择的文学作品。文学作品不仅指小说 ,还包括杂志、报刊、时事等。阅读报刊杂志或阅读从报刊杂志选下来的有关文章 ,也是了解当前社会各阶层、各集团的动态、各种社会问题、社会关系的最直接的途径。这里的 information 往往是教科书中所缺少的。

3.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 ,教师不仅必须注意语言形式的正确 ,还必须重视语言运用得是否恰当 ,这无疑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课堂教学的方式之一是让学生根据所学课文编对话 ,设想自己是其中一个角色并按照特定角色的要求去进行谈话 ,这就涉及到角色的身分。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自己的角色 ,对于语言形式正确而不符角色身分或场合的话应该指出来。在句型教学中学生容易只顾形式忽略内容机械地操练 ,这就需要教师不断地从旁提醒 ,让学生从每一细节做起 ,如语音、语调、表情、用词甚至手势等。

4. 可以采用图片、电影教学等 ,如在 Mainline. Book I. 3. 中有两课“ Where ”和“ A Place of One s Own ” ,前一课讲的是房子的格式 ,后者讲室内家具 ,要想讲清楚英美一般 house 的格式 ,最好让学生看一些图片。有些专介绍社会情况的电影也能够提供丰

富有用的材料,如美国电影 Two kinds of Love《两种爱》,它反映了美国的社会、家庭的一个侧面,很受学生的欢迎。另两种教材 Follow me. On We Go 题材也很好,可以使学生们直观地了解社会文化因素。

5. 充分发挥外籍教师之所长。从学外语的角度来看,和讲这种语言的本族人接触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外出版的一些教材中,有些东西中国教师没有接触过,而只能通过字典中的 definition 讲授给学生。而外籍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生动地、形象地讲述清楚。通过与外教接触,学生们可以直接地感受到文化的差异。应请外籍教师多讲一些他们本国的社会情况、文化生活、风土人情等,学生们可以从中习得第一手资料。

在外语教学中我们应重视文化上的差异,并了解、研究这种差异。作为外语教师不仅要帮助学生们学会语言,而且要帮助学生们了解社会文化因素,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较快地扩大知识面,进而学好外语。

参考书目

1. 王德春《现代语言学研究》1983
2. 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
3. “外语教学与研究”1985.3;1984.2

(原载《外语学刊》1987年第2期)

英语教学与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

崔校平

学习语言不是一个孤立的学习过程。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生活在一定言语使用区域中的人们在一定的语境 (context) 下通过口语或书面语形式相互交际而使用的。同时 , 一种特定的语言总是和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或国家 , 以及其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等因素息息相关的。因此在英语教学中 , 我们不仅要讲解语言知识 , 训练语言运用能力 , 而且还要加强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正如语言学家拉多在《语言教学 科学的方法》中指出的那样 : “ 我们不掌握文化背景就不可能教好语言。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 因此 , 不懂得文化的模式和准则 , 就不可能真正学到语言。弗里斯 (Fries) 强调 : “ 讲授有关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情况绝不仅仅是实用语言课的附加成分 , 不是教学总目的全然无关的事情 , 不能因时间有无或方便与否而决定取舍。它是语言学习的各个阶段不可缺少的部分……。”

—

在英语听力课教学中 , 我们发现不少学生常常抱怨用于听力训练的时间不少 , 可是进步并不快。有的同学为了提高听力理解能力而专门买了录音机 , 一天往往花上几个小时 , 但碰到新的材料还是听不明白 , 理解不了。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 一方面有些同学可能是由于英语基础较差 , 掌握的词汇少 , 语法概念不清 , 发音不准确 , 材料偏难等原因 ; 另一方面 , 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英美国家的背景知识了解太少。听力与对英美文化、政治、经济等情况的熟悉程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判断一个人的听力 , 实际

上是对一个人的英语水平、知识面、分析及联想能力的综合检验。

大家或许都有这样的体会 :当我们听一些自己所熟悉的事件的材料时 ,不管是新闻、故事、报告、讲演还是有关科技、艺术等方面的 ,一般都能够很容易地听懂并能较好地理解 ,即使材料中有些生词 ,也能够根据上下文猜测出它们的意思。但是遇到一些我们不熟悉的材料或与英美文化背景知识关系密切的材料时 ,听起来就感到难得多。尽管有些材料比较简单 ,也听懂了字面意思 ,但由于缺乏文化背景知识而不能理解其中的真正含意。

例如听到这么一句话 : The path to November is uphill all the way. 这里 November 指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to be held in November. (即将在十一月举行的总统选举)。如果听者不了解 November 指“ 十一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这一背景 ,那么就很难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又如 : Sen. Edward Kennedy went downhill since Chappaquiddick. 这是一个很浅易的句子 ,学生听起来不会有什么困难 ,但是如果老师不给学生讲明 Chappaquiddick 原系美国的一个地名 ,这里用来指 E. Kennedy 在该地发生的车祸一事 ,那么学生也就不会充分了解这句话的用意所在。

再如美国人常讲的两个笑话 :

1. A : Where are you from ?

B : Ill ask her. (Alaska)

A : Why do you ask her ? . .

2. A : where are you from ?

B : How are you. (Hawaii)

这两个笑话中 ,在 A 看来 B 是答非所问 ,但如果 A 了解美国的地理概况 ,知道美国有两个远离大陆的州 :阿拉斯加 (Alaska) 和夏威夷 (Hawaii) ,那么就不会闹出把 Alaska 听成“ Ill ask her. ”把 Hawaii 听成“ How are you ”的笑话了。

由此可见 ,在英语听力课的教学中需要进行文化背景知识的

介绍。

同样,说的能力也不仅仅是语音语调的问题。学生只有在通过大量的阅读,掌握丰富的语言材料,了解西方文化的情况下才能提高口头表达的能力,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在口语训练中,要加强真实性注重生活用语,采用按生活内容分类编写的并配有录音磁带的对话课本、会话课本等,也可以从杂志、报纸中编选一些新闻报道之类的材料。因为这些材料来自现实生活,有助于学生正确掌握说话的场合,熟识语音语调,了解英美民族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否则,即使你训练有素,英语讲得正确无误,也会由于缺乏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而难免造成误会和不愉快。试看以下几例。

英语中有许多固定的表达方式是不能随意改变的。如“ How do you do ?”回答也是“ How do you do ?”买了东西问价钱时可以说“ How much , please ?”不说“ How much do you charge me ?”或“ How much do I owe you ?”吃完饭付钱时说“ Waiter , bill please. ”不说“ Excuse me , sir. We've finished eating. How much is it , please ?”打电话问对方是谁,要说“ Who's speaking , please ?”“ Who is it , please ?”不说“ Who are you ?”(您是谁?),“ Where are you ?”(您是哪儿?)“ What's your surname ?”(您贵姓?)或“ What is your unit ?”(您是哪个单位?)

英语中婉转语很多,以至于有时很难听出对方真实心情,因而回答时应特别注意。如问“ How do you like the film ?”对方回答“ I think it's very interesting. ”这往往表示对方不怎么喜欢,而不是字面意思“很有趣”。又如“ What do you think of my new coat ?”对方回答“ I think the pocket is very nice. ”表示对方不太喜欢。英美国家的人们一般不当面说不好,所以尽量只说好的,否则就该推说不知道或不了解。如“ Do you like our teacher ?”可以回答“ Well , I don't know him very well. ”有时出于礼貌,遇到不熟悉的人时可以说真话,例如 A 问 B “ How are you ?”尽管 B 患了重感冒但还是

回答“Fine, thank you.”一般不说“Not very well, I'm afraid.”之类的话。

在口语交际的过程中,说话者不仅要有好的语音语调,而且要注意使用的场合。例如有一次,一个学生在外宾听课后征求意见时说了这样一句话:“I am desirous of exploring your felling on the lecture.”外宾听了不禁为之一怔,回答说:“Your English is too beautiful to be true.”学生不服,说这个句子是书里背下来的。外宾说,用词要注意场合;“desirous of exploring your feelings”等词语不宜用于口语,应当将这一句改为“Id like to hear your views on the lecture.”或“May I have your views on the lecture?”

又如,一位年轻的女子刚刚丧偶,一个人想安慰她,对她说:“Im terribly sorry to hear that your husband has just died, but dont let it upset you too much. Youre an attractive young woman. Im sure you ll find someone else soon.”这段话尽管合乎语法规则,却不能实现言语交际的“适用性”,同时违背了使用语言的社会习俗。

民族不同,风俗习惯也不同。这些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导致了使用语言的不同。例如,当有人夸你英语讲得好时,按我国习惯应谦虚地说一些“我讲得不好”;“还不够”之类的客气话。而按英美习惯应该表示高兴,并立刻谢谢对方的夸奖。因为对英美人说“ No, I dont speak good English.”往往是不礼貌的,好象你在指责对方。

以上举例意在说明。

二

要阅读英语文章首先要有一定的英语语言基础,但阅读理解能力的高低不完全是语言水平的问题,文化背景知识也是十分重要的。阅读可以说是一个人的语言知识,文化背景知识以及其他专业知识共同起作用的过程,是根据已有的语言材料,文化背景知识和逻辑推理不断进行推测和纠正的过程。一般说来,我们学习汉语不存在文化背景知识方面的困难。“车到山前必有路”;“上

梁不正下梁歪”等谚语不会影响我们对文章的理解。“五讲四美、三热爱”、“改革开放”、“走穴”、“倒爷”等新词的涵义人们也能够充分领会。但在阅读英语文章时,中西文化的差异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困难。

美国《时代》(Time)周刊曾把尼克松访华说成是 Nixon's Odyssey to China. 其中,Odyssey 原为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的一部英雄史诗,描写 Odysseus 在古城特洛伊(Troy)陷落之后所经历的一段漫长而艰难的历程。这里用来喻指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段漫长过程,不能不说意味深长。如果我们不了解 Odyssey 这一故事,不知道 Odyssey 在这儿是“漫长历程”之意,就难以理解 Nixon's Odyssey to China 的真正含义。

邱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作的《就希特勒入侵苏联发表的谈话》是个很典型的例子。邱吉尔在谈话中借用他的私人秘书考维尔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来表白自己:

After dinner, when I was thinking on the croquet lawn with Mr. Churchill, he reverted to this theme. and I asked whether for him, the arch anti-communist, this was not bowing down in the house of Rimmon. Mr. Churchill replied, “Not at all. I have only one purpose, the destruction of Hitler, and any life is much simplified thereby. If Hitler invaded Hell I would make at least a favourable reference to the devil in the House of Commons.”

在上述这段话里邱吉尔引用了三个宗教典故:第一个是 bow down in the house of Rimmon, 源于《圣经》,是“心口不一”或“做违心的事”之意。第二个是 Hell(地狱),第三个是“the devil”(魔鬼)。如果不了解这三个典故,我们就不能深刻理解邱吉尔在这里将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比作“地狱”,并把苏联的共产党人比作了“魔鬼”。在这番话中,邱吉尔通过引用宗教典故不但使他那反共的政治立场昭然若揭,而且避免了锋芒毕露地直接点共产党人的名。当然也就不能理解作为生活在“幽默之乡”的邱吉尔用这

一类既充满浓重色彩又不乏幽默感的方式向全世界宣告 :他支持苏联反对希特勒是为了拯救人类 ,并不意味着他反共的政治立场有了丝毫的改变。

在北京大学编写的《 大学英语 》中一篇文章有这样几句话 :
“ Didn't know you were in the States , Mitty , ” grumbled Remington.
“ Coal to Newcastle , bringing Mitford and me up here for a tertiary ”.
“ You are very kind , ” said Mitty.

在这段话里 ,由于中外文化背景不同引起理解上的困难可能有两处。一是 coals to Newcastle. 在英语里这是一个常用的成语。Newcastle (纽卡斯尔)是英国产煤中心 ;“ Coals to Newcastle ”(把煤运到纽卡斯尔)的含义是“ 多此一举 ”。Remington 医生并不是在谈运煤的问题 ,而是谦恭地说 ,他们不知道 Mitty 这位医生就在美国 ,把他和另一位医生请来看病完全是多余的。另一处是 Mitty 的回答话 ,如果不知道这是“ 你说得太客气了 ”的意思 ,而直译为“ 你很仁慈 ” ,那就太可笑了。

可见 ,阅读中的困难不完全能靠语言知识本身来解决。这是因为 ,一个民族的作品总是跟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分不开的。尤其是英语作品中往往出现一些反映西方文化历史背景的典故 ,其中一部分可以在词典中查到 ,但随着社会和语言的不断发展往往会产生一些新的典故——英美读者对此熟悉 ,而这对我们是颇为陌生的背景知识或地方色彩。这些在词典中一般是查不到的。因此在阅读教学中 ,教师应在讲解语言难点的同时加强文化背景知识的讲解 ,以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

三

翻译同样离不开文化背景知识 ,因为“ 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翻译 ”(赵元任语)。在翻译实践中即使一些十分简单的词语 ,也不可不顾具体的语言环境和民族习俗 ,抛开原文上下文的联系随意处理。拿 dog 一词为例。dog 是个十分简单的词 ,但由于中英文化的不同 ,弄不好就会出现错误。“ 狗 ”一词在中国人看来总是贬义

的,如我们常用“癞皮狗”、“丧家之犬”、“走狗”、“狗头军师”等等来描绘所厌恶的人。但在英国,人们对狗的看法和我们截然不同,dog 在英语(特别是谚语)中往往含有褒情善意。如果我们把 dog 一词一律译作汉语的“狗”字或把汉语的“狗”字按字面意思译成英语的 dog,就可能会曲解原意,闹出笑话。请看下面三个简短的句子:

1. Every dog has his day.
2. You are , indeed , a lucky dog.
3. Last night my father came home dog tired.

有些初学者由于不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往往想当然地把它们分别译为:

1. 每条狗都有自己的节日。
2. 你真是一条幸运的狗。
3. 昨晚我爸爸回到家中象狗一样累。

其实以上三个英语句子的汉译应是:

1. 人人皆有得意时。
2. 你真是个幸运儿。
3. 昨晚我父亲回到家中非常累。

综上所述,在英语教学中注重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是十分必要的。教师不但要帮助学生解决语言上的困难而且要帮助学生扫除文化上的障碍,才能进一步提高英语教学质量。

(原载《山东外语教学》1990 年第 4 期)

语言·文化·外语教学

束定芳

1. 语言

1.1.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所谓动物的“语言”,仅是一种刺激反应(stimulus-bound),无论就其表达功能或复杂性来说,都无法与人类语言相比。

1.2. 语言能力是人类在漫长的生物进化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特殊的技能。生理学研究证明,人脑中有专司语言的神经区域。小孩一般7—8岁时语言神经区域就在大脑中固定了下来(Lateralized)。一般情况下,人们的语言神经区域在左脑半球,左利手或其它特殊情况者(如小时候有过脑神经障碍症者)语言区域可能在右脑半球。动物无法学会人类语言,因为它们不具备这种语言能力的生理基础。当然,人类获得语言能力,还需要后天的语言环境。一个孩子出生后,如果与世隔绝,他就永远不可能掌握语言。学语言有一个关键期,一种说法是7—8岁,另一种说法是11—12岁,过了这段时间,尽管有语言环境,小孩也无法正常地掌握一门语言。很多实验(如对狼孩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语言是人类一种具有特殊生理基础的社会现象。

1.3. 语言是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每个符号单位都由音义结合组成。音和义的结合是任意的,正是这种任意性,才使得人们能够用有限数量的音根据一定的规则进行组合,来表达和反映人类环境以及他们的各种各样的经历和感情。语言系统具有层级性,由音位、语素、词或短语、句子及组合规则等

层次组成。语言系统的这种层级性使得它具有无限的灵活性,能够不断改变和调整自身结构,以适应外界交际环境的变化。

1.4. 由于地域、职业、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的不同,人们所掌握的语言系统也就不同。根据不同的标准,我们可以分出多种语言变体、地域变体、社会变体、风格变体等等。

1.5. 在同一个语言社团中,个人可能同时掌握几种语言,或者是一种语言的几种变体。一个人所掌握的所有语言或语言变体,被称作他的“语库”(verbal repertoire)。人们在不同的场合,根据交际需要,选用不同的语言或变体,叫做“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

2. 文化

2.1.1. “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 kultur,原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指艺术和道德能力和天赋的培养。

2.1.2.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对文化下过这样的定义:“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它的能力和习惯。”^①他认为,文化是全人类所共有的,各个社会的文化之所以不同,是由于它们处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不同的阶段而已。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和批评。

2.1.3. 美国人类学家鲍阿司指出,各个社会具有各自独特的文化,正由于这样,它们才具有不同于其它社会的风俗、习惯、信仰和社会机构。^②这一观点后被广大人类学家所接受。

2.1.4. 有“现代文化学之父”之称的美国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③这一定义在当代的文化学讨论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2.2.1. 文化是学而知之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习都是文化。个人在其一生中可能有许多独特的经历,但并不为其它社会成员所共享,所以不属于文化的一部分。

2.2.2 文化的内容广泛而又复杂。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古德耶那夫认为,文化的内容中包括:形式(主要是指语言),信仰,命题,价值观,规约,公众价值观,行事方法,常规,风俗等。文化具有结构性,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可以借助科学方法进行分析。^④

2.2.3. 人们有时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把一些实物,如建筑、艺术品和历史事件等也称作是文化的一部分。

2.2.4. 然而,如果我们要对文化进行结构分析,有必要区分文化和文化产品(cultural artifacts)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化作为“通过社会而获得的知识”,显然不同于表现为具体物质形式的文化产品。文化产品是在人们的文化观念的支配下产生出来的,是文化的体现,我们可以从中探索和追溯文化观念和标准以及它们的历史,但却不能就此说,这就是文化。文化之间的不同主要不在于所观察的事物的不同,而在于观察的角度和标准不同。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文化产品对旧的文化观念的继承和新的文化观念的产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和影响。因为它们一旦被生产出来,就立即作为文化环境的一部分,直接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

2.3.1. 一个社会具有一个主导文化。但是,由于各种社会、历史、地理等因素作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集团会具有一些互相区别的特征。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可以说不同的集团具有不同的亚文化。古德耶那夫认为,主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同语言与方言之间的关系。

2.3.2. 社会成员由于各自的经历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有的可能掌握一至两种以上文化或亚文化。人所拥有的所有文化知识称作其“文化库汇”。在不同的场合,人们使用不同的文化规则 and 标准则称为“文化规则转换”。这与“语库”、“语码”转换的情况十分相似。

3. 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3.1.1. 语言是通过社会而习得的。语言知识是文化知识的一部分。但是,语言中有一部分知识并不是通过向别人学习而获得的,所以语言知识并不全部包含在文化知识里。也许,对这点有人会持反对意见,认为所有语言知识应该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在个人拥有的语言知识中,显然有一部分是个人的,不为他人所共享。英国语言学家赫德森指出,小孩在习得语言的过程中,有些语言知识是不要通过向别人学习就能获得的。^⑤而乔姆斯基则宣称,小孩在生下来之前,脑中就存在着一套普遍语法。

3.1.2. 我们一般把思维分作“记忆”和“推理”两个方面。人类的知识通常以“概念”或“命题”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这些概念或命题是人们推理的根据,而推理的结果形成了新的概念或命题,它们作为新的知识又储入记忆中,例如汉语中“油”、“水”、“漂”、“在……上”是四个不同的概念;“油”、“水”是物质;“漂”是一种动作性状态,而“在……上”表达的是一种空间关系。如果我们把它们组合成句子“油漂在水面上”,这就是一个命题。这一命题可能已经是记忆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刚刚通过推理而获得的新知识。也就是说,它可以是人们已经知道的东西,也可以是刚发现的东西。同样,一个概念既可以作为思维的范畴已经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也可以是新创造的范畴。文化是通过社会获得的知识,那么很显然,文化是记忆的一部分,即“通过社会而习得的”那部分知识。其它的是不通过社会学习获得的知识,因而不属于文化。例如:“今天中午我吃了香肠。”这一命题就不是文化的一部分。因为它仅仅是个人的实际经历,而“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这一命题显然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它是文化的一部分。^⑥

3.1.3. 赫德森认为,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 文化知识——从别人那儿习得的知识;

(2) 共享的非文化知识——同一社会或全世界人们都共有的知识,但并不是通过互相学习获得的;

(3) 非共享的非文化知识——个人所特有的知识。

根据这一分类,我们可以发现,语言知识绝大部分属于文化知识,它以作为语言单位的概念,形成这些概念的意义、概念和命题,以及决定它们使用分布的范畴的概念的形式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人们在说话或者听话时,利用已知的概念来推断命题(句子的意义),以及它们的社会意义。另一部分语言知识则不属于文化。

3.2.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表达形式和传播工具。

3.2.1. 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认为,语言符号系统是社会符号系统(文化)的一部分。语言是一种“潜在的意义系统”(Meaning potential),它由三部分组成:音位系统、词汇——语法系统和语义系统。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实现”(realization)的关系,语义通过词汇——语法得到实现,词汇——语法通过语音而得到实现。而语义则是社会结构(即文化)的一种实现。也就是说,语言体现文化,是文化的编码手段之一。

3.2.2. 语言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指称。学习语言不仅仅是学习词语,而是学会把词与适当的客观的事物联系起来。词语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态度,记载了使用语言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小孩在学习语言,同时也就是在学习文化。我们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除了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实际行为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研究他们的语言,特别是语言中的词汇部分,来了解他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内容,因为词汇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它们本身的存在和消亡就能提供有关文化发展过程的信息。例如,曾有人试图通过对某些古代语言词汇的研究来探寻最早的印欧人居住的区域^⑦。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过去的语文学实际上就是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研究的一门学科。

3.2.3. 人类社会传授文化主要有四种方式(1)通过实物的

代代相授——包括自然资源 (2) 通过示范传播行为方式和准则 ; (3) 通过语言讲述 , 用语言告诉小孩一些事实和方法 , 观念等 (4) 通过文字。毫无疑问 , 语言是人类进行文化传授的最重要的工具。

3.3. “语言相对论”

3.3.1. “言语这人类活动 , 从一个社会集体到另一个社会集体 , 它的差别是无限度可说的 , 因为它纯然是一个集体的历史遗产 , 是长期相沿的社会习惯的产物^⑧。”这就是著名的萨皮尔——沃尔夫假说之一的“语言相对论。”(根据英国著名语言学家 John Lyons ,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分两个方面 , 一是“语言相对论”。即语言之间的差异是无限度的 ; 二是“语言决定论” , 即语言决定思维)。这一段话正代表他们的这一观点。近年来 , 这一观点受到许多语言学家的批评。

3.3.2. 赫德森认为 , 人类语言和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应该属于同一模式 (pattern) , 反映了一个共同的深层“人类共性” , 因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物质世界里 , 人类语言所表达的概念之间的差异不可能是无限的 , 它们之间的差异就其本质和程度来说 , 显然要受到以下几方面的限制 :

(1) 不同社会的语言 , 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来解释词义 , 也就是说 , 它们的词义可以用“语义成分”来解释。这些语义成分对许多民族 , 甚至整个人类来说是一致的。它们之所以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 是因为这属于人类知识结构的一部分 , 例如人们辨认事物形状和颜色的能力。它们还属于人类正常环境的一部分 , 例如“垂直”和“水平”的区别 , 不同的生物种类的区别等等。

(2) 受人类共同的交际需要的限制。人们总是希望以最小的用力来获得大量的信息。这就导致整个人类倾向于选择一些“基本概念” , 而忽视比基本概念“更高一级”或“更低一级”的一些概念。人类语言中有许多相同的表示基本概念的词 (如数词 , 物质名词 , 专有名词等) , 词汇的层次结构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 尽管它们所表达的实际内容有所差异。

(3) 世界万物自身本来就具有一定的结构。人们可以利用一些“现成的”概念来作为“原型”(prototype)。这些原型,比起后来派生的概念来,对不同的社会和人来说,差异极小。所以,尽管从表面上看来,不同语言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不是任意的,无限制的,而且这也并不说明人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中。相反,如要联系到语言“原型”来看,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的差异是有限的。^⑨

赫德森的这一观点在语言学界颇具代表性。人们承认,语言之间确实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面有巨大的差异,但这是表面的,在语言结构的深层,有许多共同之处,许多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是代表人物之一)就一直致力于寻找这一共同的深层结构。莱昂斯(John Lyons)认为,语言系统受两个结构的制约,一个是“底层结构”(Substructure),即人类共同的生理特征和世界的原有结构,它使人类语言趋向于具有相同之处;另一种是“超结构”或“上层结构”(Superstructure),即各个民族不同的文化结构,它导致各民族的语言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差异^⑩。我们认为,这样解释语言的差异和相同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可信的。人类语言之间有差异,但由于多方面的制约,这种差异不可能是无限的。

3.4.“语言决定论”

3.4.1. 萨皮尔——沃尔夫假说的另一个内容就是所谓的“语言决定论”(Language determinism),即“语言对人们的思维具有直接和决定的影响”。沃尔夫甚至断言:“语言不仅仅是表达思想的再现工具,而且它本身也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个人心理活动,印象分析,心理习惯的复杂的秩序和向导。”在沃尔夫看来,语言对思想者有一种强制性的,几乎不可逃避的力量;“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愿把自然界分成类,组成各种概念,决定意义,”沃尔夫还写道,“主要因为我们是决定这些做法和协议的当事人,”无可否认,这个协议是“含蓄的,未明确说明的,但它的条款却完全是强制的。”^⑪与“语言相对论”一样,“语言决定论”也遭到了语言学家们

的批评和否定。

3.4.2. 心理学研究证明,语言对人的思维的确有一定的影响,人们很早就认识到语言中现成的词语会对记忆和感知事物产生影响。实验证明,人们的视觉感知和记忆由于倾向于与语言中常用的词语相吻合而受到歪曲。人们常常容易注意到并记住他们语言中“可编码”的事物,即语言中有现成词来描述的事物。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下结论,说语言决定人们的思维。我们必须看到,语言和思维之间具有非常复杂的关系,语言和思维各有其独自的发展规律,语言虽然是人们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最重要的工具,但并不是唯一的工具,儿童在此成长过程中(特别是在掌握语言前),都有一段运用某种非语言的象征性动作和符号的阶段。另外,聋哑人没有正常人所掌握的语言,但是聋哑人的思维能力与正常人相比并没有什么巨大的差异。尽管语言间的差异有时很大,各种语言中的颜色词数量不一样,这并不说明操这些语言的人对颜色的感知能力也不一样。恰恰相反,心理学实验证明,人们对颜色的感知能力基本没有差异,对某些颜色的原型有十分一致的意见。如果把一组不同大小,不同形状的鸟类动物给不同文化的人比较,让他们选择其中最能代表鸟类特征的原型,也就是一个典型的鸟,那他们的选择一般情况下是非常相近的。再例如,爱斯基摩语中有许多表示不同形状的雪的词,这是由于他们常年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生活劳动环境需要他们区别各种各样的雪。英语,汉语中虽然没有这么多表示雪的相应的词,但是英国人,中国人完全能辨别各种各样的雪,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给它们不同的名称。如英语可以说“powdery snow”、“spring snow”等,而汉语则可以说“粉状雪”、“春雪”等等。各种语言仅是由于使用它们的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环境不同,对不同的事物和经历具有不同程度的编码能力(codifiability)而已。另外,各种语言还可以通过转译和借用等方法来丰富其词汇,扩大其表达功能。

3.4.3. 应该说,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的结

构。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文化之间的重叠现象(overlapping)也决定了语言之间会有相似之处和重叠现象。这主要是生理物理方面的因素所导致的。但是 ,由于各民族的历史地理环境 ,社会结构 ,价值观 ,行为准则的不同 ,语言中就有相应的结构形式来反映这些内容。例如有些语言中(如德语)第二人称单数有敬语和一般用语之分 (如德语中的 sie 和 du)就反映了这些文化对他人(听话者)的价值态度。另外 ,语义研究表明 ,尽管不同语言中有些词的概念意义 (conceptual meaning) 相同 ,但各文化赋予它们的附加意义(如感情 ,评价 ,理想意义等)却很不相同。例如 ,同是“ 月亮 ” ,汉族人就会有“ 嫦娥奔月 ”、“ 美丽少女 ”等联想 ,而英美文化中就没有这种联想。

4. 语言使用与文化

4.1. “ 语言有个底座 ,说一种语言的人是属于一个种族(或几个种族)的 ,也就是说 ,属于身体上具有某些特征而不同于别的一个群。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 ,就是说 ,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 ,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⑫ 语言结构不但与文化有关 ,语言使用方式也跟文化有密切关系 ,而且比语言结构更受制于文化规则。

4.2. 例如 ,不同的文化对社会成员的语言的技能评价就不一样。有的文化奉行“ 沉默是最好的策略 ” ,崇尚语言简洁 ,明了。传说中的斯巴达王国的臣民皆以其回答简短而著称。但有的文化 ,如非洲的布隆迪 ,却认为语言技巧是一个人的智慧和能力的表现 ,不善于言辞的人要受到他人的轻视和嘲笑。

4.3. 文化也对交际的模式 ,话语结构起决定的作用。有些文化中 ,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对话 ,只可能是长辈发问或用命令语气 ,而晚辈却不能。如果他要表达这类意思 ,他也必须寻求其它间接、含蓄的办法。另一些文化则不然。

4.4. 文化标准甚至会影响话语的准确程度。例如 ,在非洲布

隆迪 ,如果你问一个布隆迪人 “ 你有几个孩子 ? ” 你得到的答案很可能不是确切的数目 , 问女的 , 她只会告诉你女孩的数目。所以 , 如果你要得到孩子的总数 , 你就一定得问 : “ 你有几个男孩 , 几个女孩 ? ”

5. 文化与外语教学

5.1. 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讨论显然对语言教学 , 尤其是外语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外语教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语言知识的传授上 , 忽视语言使用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 , 培养出来的大部分学生尽管语法知识掌握得很好 , 词汇量也很大 , 但却缺乏在恰当的场合使用恰当的语言的能力 , 有时甚至运用本族文化的言语交际标准来套用外语以至闹出笑话。

5.2. 最近一、二十的年来 , 随着语言研究的重点转向语言使用 , 一大批新学科 , 如社会语言学 , 心理语言学 , 语用学 , 功能语法 , 法位学等相继出现。这些新的研究领域的开发和大批研究成果的取得不可避免地对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外语教学工作者们认识到 : 仅仅教会学生一套机械的语法规则 , 一定数量的词汇 , 学生是无法令人满意地理解并参与目标语社团成员之间的言语交际活动的。由于人类整个言语交际活动过程要受到相应的文化规则的制约 , 什么时候对谁说什么话 , 怎么说都要涉及到文化背景知识 , 所以 , 要学生有效地掌握语言 , 必须同时向学生教授目标语社团的文化。

5.3. 外语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教学大纲的制定。我们可以说 , 任何目的的外语教学 , 不管其侧重点在哪一方面 , 一个共同的最终目标都应该是使学习者能够真正地具备领会并参与目标语社团的口头和书面交际活动的能力。因此 , 任何外语教学大纲的制定 , 即使是理工科外语教学 (其重点一般是培养学生阅读科技文献的能力) 都必须考虑到语言教学如何结合目标语社团文化的问题。

5.4. 有了一个好的教学大纲,还必须有一套相应的好教材来配合。应该允许并提倡不同学校、不同专业根据各自教学的侧重点选用或编写不同的教材。Marckwardt 等人提出,在编写结合文化教授语言的教材时,编写者们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问题:

(1) 材料重点是否集中在目标社团文化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特征上?

(2) 学生学完该材料后,是否能够对目标文化的一些明显特征有个很清晰的概念?

(3) 在使用该材料时,有些目标社团文化的主要特征或主题是否能与本族文化行为进行对比?是否能够通过某种渠道使学生对本族文化也有更好的理解?

(4) 该材料是否能使学生意识到任何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存在都具有其合法性?

(5) 该材料是否能激发学生去寻求不同价值观的历史解释?

(6) 该材料是否会引起模棱两可的价值判断?

(7) 该材料是否能使学生对一般意义上的大自然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③

材料的选择应该尽量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当然应该根据教学目的的不同有所侧重),尤其应利用大众媒介的产物,如电视广播剧、漫画、消遣性小说、广告等。这些材料也许有一定的难度,但很重要。因为它们中包含大量的文化信息。英国社会学家 Bernstein 曾提出过:“有限语码”(restricted code)和“复杂语码”(elaborated code)这两个概念。所谓“有限语码”,就是指那种常用于范围很小的、关系很密切的团体成员之间的语言,其特征往往是句子很短,很少词汇变化,其中经常出现现象:“Don't you know...”和“isn't it”等这样一些套语,需要交际者根据背景知识来补上说话者没说出的那部分信息。而“复杂语码”正好相反,使用句子较长,词汇更加明确,更加丰富多样。有些教师错误地认为,“复杂语码”要比“有限语码”高级,教给学生的应该是“复杂语

码”,而不是“有限语码”。但是,我们知道,一个语言社团的语言交际不可能总是按照一个模式,一个标准进行的。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使用的语码是不会一样的。应该让学生接触各种语言变体,同时了解不同的文化变体(或文化)以应付各种不同的交际需要。

5.4.1 外语教师显然在外语教学中起着主导的作用。教师应该成为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中介者和解释者。他应该非常熟悉外语教学所涉及的两种文化——学生的本族文化和目标语社团文化,他应该设法帮助学生克服“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帮助学生避免用本族的文化标准来衡量外族文化,使学生尽快获得一种跨文化意识(cross-culture awareness)。

5.4.2. 有人认为,只有外语是母语的教师才能有效地向学生教授该外语所对应的文化。实际上,非本族语教师(即母语与学生相同的教师)教起来要比本族语教师更有效一些。因为作为学生本族文化社团中的一员,他对本族文化和学生的实际困难更了解,知道在哪些地方应该进行对比,哪些地方应该详细讲解,而外族教师很少能用准确的语言加以描述,在学生需要有关背景知识的时候往往不能及时提供。不过,话说回来,谁也不是天生就有做好这一工作的本领。任何外语教师都应该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努力提高自身的素养,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对两种文化的洞察力。

5.5.1. 外语教学最终要体现在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身上。学生学习外语时的动机(motivation),原有知识(previous knowledge),能力/aptitude)和课外学习(learning outside the classroom)对外语教学的成败具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下面主要谈谈 motivation 和 previous knowledge 这两个因素。

5.5.2. 就学生学习外语的动机来说,不同层次的学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同一层次上,情况也不尽相同。有明确目标的学习无疑要比没有明确目标的学习收益大。在我国现在的外语教学中,有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学生学外语往往是为了应付考试,考

完就 Bye-bye。这种情况在中学和大学低年级这两个层次尤其明显。中学生初次接触外语时,学习的积极性很高,兴趣也很浓,这往往主要是出于对这一新学科的新奇感。以后,随着难度的提高,加上一些教师教学上的不得法,学生往往就见难而退了。在初中外语教学中,初二年级一般是最容易产生两极分化的阶段。这个时候,教师要特别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动机。当然,仅靠讲大道理是不顶用的,教师应该通过各种渠道,活跃课堂气氛,提高课堂艺术,增加外语课本身的吸引力,如通过 role-play, story-telling 等来提高学生对外语的兴趣。对已有一定基础的学生,应该尽可能地扩大他们的阅读面,提供大量的阅读材料,让他们从各个方面接触目标语社团文化,让他们在学习外语的同时,通过外语学到更多的其它知识,使他们在学外语的过程中真正感受学习另外一种语言的乐趣,认识到学好一门外语的重要性。

5.5.3. 学习一门外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学习另外一种用语言符号对客观世界进行编码的方式。外语学习不同于母语习得,因为学生学习外语一般是在他们已经掌握了母语之后才进行的。这个时候,学生已经在脑中具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语言符号系统。这种原有的知识对外语学习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可能帮助学生理解和消化新的语言知识;另一方面,它又可能干扰新的语言知识的获得。Pit Corder 认为,学习外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个在原来具有的语言知识系统的基础上,对原有知识和技能加以调整和改变的过程。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很好地利用学习原有的语言知识,把两种语言经常加以比较,以便学生更快,更有效地掌握所学外语。

注 释

① Goodenough, Ward H. 1981, Culture and Society Chapter 4

② 同①

③ 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P6. 浙江人民出版社

④ 同①

⑤ Hudson. R. A. 1980. Sociolinguistics Chapter 3 Cam. Uni. Press

⑥ 同⑤

⑦ Roberston , Stuar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glish , P9

⑧ 萨当尔 《语言论》商务印书馆 1964

⑨ 同⑤

⑩ Lyons , John , 1981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 Chapter 10 , Cam. Uni. Press.

⑪ 转引自《社会心理学》P336 ,1984. 南开大学出版社

⑫ 同⑧

⑬ Loveday , Leo , 1982 ,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earning and Using a Foreign Language , P54 Pergamon press

(原载《山东外语教学》1988 年第 2 期)

伴随语言手段与伴随语言学

刘光准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言语交际中的非语言手段作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文试图以俄语语言材料为素材,对伴随语言学 and 它所研究的主要对象作扼要的介绍。

一、伴随语言学的概念

伴随语言学从整体上研究非语言交际范畴,即研究伴随言语交际、参与传递信息的各种因素(如手势、面部动作、发声、言语情景等)。(6—195)

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指出:“伴随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语言学学科。它研究伴随言语交际和伴随信息传递参与者的各种因素。”(2—6)

在自然的有声言语交际中,交际参与者并非仅用纯粹的语言手段,而是常常省略某些语言手段,用诸如发声特征、身体动作、手势、面部动作、表情、姿势等其它手段,或利用交际情景因素(即交际环境、交际距离、交际时周围的事物及其特征等)作为补充。这些纯语言手段以外的其它手段和因素统称为伴随语言手段和因素,研究这些手段和因素的特殊学科称为“伴随语言学”。伴随语言手段与因素分两大类:1)与说话主体(即参与交际者)相关的因素;2)与言语交际有关的外界因素(情景等)。本文主要对前者进行论述。

二、苏联伴随语言学研究概况

早在1919年,苏联著名语言学家就指出:“……词的意义可以由各种细微的语音变化来补充,其中主要是音调变化(以及言语速度、声音强弱、各个发音器官发音的细微差别,如动作的强弱等等)此外还有手势。因此,不应认为言语过程的这些方面不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对这些现象(声调变化、手势和其他的言语辅助手段)的探讨应构成语言学的一门特殊学科。这是一门使语言学和戏剧艺术理论发生联系的学科。”(转引自9—11)这门特殊的学科就是我们所说的伴随语言学。虽然伴随语言现象早已为人们所注意,但伴随语言学这一术语首先是美国语言学家 A. Хилл 正式使用的。(5—65)

在苏联,六十年代以前主要研究具体手势和手势语。1966年,Г. М. Николаева,Б. А. Успенский 著文《语言学与伴随语言学》,对两者的关系作了论述,对伴随语言现象进行了分类,对伴随语言手段与话语的关系以及它们的交际功能等作了初步分析,从而把对伴随语言现象的研究提高到了语言学的高度。1974年,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的专著《伴随语言学》问世。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这门新学科,奠定了在苏联研究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Е. М. Верецагин,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 在《语言与文化》^①一书中,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俄语体态语进行描述。体态语现已成为语言国情学的研究对象。

三、伴随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1. 发声(фонация)

发声原指话语通过发音器官而产生的过程。作为伴随语言手段的发声是指在交际中具有补充意义或富有感情色彩的功能性发声。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称之为言语发声(речевая фонация)(2—43),Н. И.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称之为具有交际意义的发声(комму-

никативно значимая фонеция)。(8—137)

在交际过程中,一般发声特征(包括音量/сила голоса/、音质/тембр/、泛音/обертоны/、清晰度/дикция/等)就其本质来说与说话人的生理特点密切相关,并依附于说话人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人的发声是以各种方式把被发出来的话语的生理特征和交际功能特征结合在一起。就其生物性本质来说,二者是不可分的,就其功能而言,二者却是不同的。

一个人发声或说话,我们除了从词义本身领会其含义外,许多意思是通过说话人的声音体现出来的,声音可以表达人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情绪和思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听话听音”。

有时,说话人运用发声手段,使话语的实际意义与字面意义截然相反。请看下面的例子:

—Добрый день, Емельян! —подойдя вплотную, здоровается Максим.

—Добрый день! —сквозь зубы отвечает Емельян и смотрит на Максима так, словно хочет добавить: “ Гуляешь — руки в брюки. Осуществляеш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командуешь. Ну, командуй, командуй. —может быть, докомандуешься!” /В. Липатов/

这里 Максим 和 Емельян 都说了“ Добрый день! ”。Максим 是真诚的。而 Емельян 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显然,他不愿向 Максим 问候。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问候语“ Добрый день! ”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给我们的听觉造成的实际意义是: “ Ты мне противен. Я вообще не хочу с тобой здороваться. ”

又比如 Е. Носов 在“ Усвятские шлемоносцы ”中写到:父亲要上前线,已和妻儿告别,他又延迟了一会儿,这时,七岁的儿子跑到父亲跟前,叫了一声“ —Папка-а! —звenea голосом, ликуя, не веря, закричал Сергунок, выплескивая все разом в своем восклицании, в одном только слове, которое в эту минуту сдела-

лось главным , единственным , заменившим все остальные ненужные слова , ровно бы забытые начисто... ” Папка-а !”这一声呼叫 ,表达了儿子复杂的感情。这类有意义的功能性发声在言语交际中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而词义本身通常是难以表达的。

2. 身势学(кинесика)(通常称为“ 姿态 ”或译作“ 人体动作 ”)

身势学是一门特殊的研究人体动作总和的学科。这里的人体动作是指交际参与者富有交际功能意义的手势、面部表情、体态表情(通常称之为广义的身势) ,言语器官动作本身不含在内。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 ,某一相同的身势语 ,意义往往不尽相同。如俄罗斯人、中国人用点头表示肯定或同意 ,摇头表示否定或不同意 ,而保加利亚人却正好相反。因此 ,身势学可以说是研究产生于不同文化的手势、面部表情、体态表情“ 语言 ”的学问。

“ 身势学 ”这一术语来源于 kinesics 这个词 ,是美国身势语研究权威 R · L · Birdwhistell 创造的 ,原义是运动的意思。Birdwhistell 是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身势的。他还设计了一套可以用来记录面部表情和身体动作代表身势语最小单位的符号。Birdwhistell 的研究十分繁琐 ,实用价值并不大(10—320—321)。

Г. В. Колшанский 认为 “ 身势学 ”这一术语表示研究身体动作符号的专门学科 ,但不应把说话人的一切体态动作都看成与伴随语言手段直接相关。研究的着眼点是言语交际中起辅助功能(如确定言语行为的单义性、排除多义性、对省略语的补充等)的体态动作(2—44—45)。也就是说 ,应区分有伴随语言功能体态动作与纯生理性体态动作。例如 ,почесать затылок или в затылке 表示用手在后脑勺搔痒。这个动作可以是纯生理手势 ,不具有交际意义。然而在交际过程中 ,说话人可能运用这一手势伴随话语表情达意 ,在不同的情景中 ,它可以表示懊恼、困惑莫解、不可理解、误会等等。例如 “ Эх , надо же ! ”—сказал Володя и почесал затылок. 这里的 почесать затылок 就有了具体的交际意义。

3. 距离学(Проксемика)

距离学是研究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在空间上的相互关系、所处交际位置的距离的学科。当人们进行交际的时候,交际双方在空间所处位置的距离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告诉我们交际双方的关系、心理状态,而且也反映出民族和文化特点。

距离学由美国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 E. T. Hall 创立。长期以来, E. T. Hall 研究人如何利用空间和距离来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他把人际距离划分为四个区域。

(1) 亲密区/зона интимного общения/ 距离在 0 至 18 英寸之间,这个区属于亲爱者、家庭成员、莫逆之交等关系最密切的人的交际距离,在这个区域内,交际双方可以接触,如接吻、拥抱、贴身等。说话一般轻声细语。

(2) 熟人区/зона личностного общения/ :18 英寸至 4 英尺,老同学、老同事、关系融洽的邻居、师生之间交际时所保持的距离属于这个区域。交际双方彼此有话可说,但尚未到“手拉手”的程度。说话一般避免高声。

(3) 社交区/зона нейтрального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общения/ :距离在 4 至 12 英尺,进入这个区域的人彼此相识,但并不熟悉,他们能在一起交际,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如无特别原因,彼此不过寒暄一下而已。

(4) 讲演区/зона публичного общения/ :距离在 12 英尺以上,在大教室、大礼堂作报告,报告人与听众所保持的距离就属于这个区域。

现在,我们分析“基础俄语”第三册课文“Дружба”中 Петрусь 和 Эвелина 从相识到第二次见面交际距离的变化。起先,Петрусь 听到了生人的脚步声,这打破了他喜欢孤独的习惯。便对生人说, —Что же вы не уходите? —спросил он затем, слыша, что девочка продолжает стоять на месте. 这里,女孩显然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第四天,Эвелина 哼着歌曲又来到小丘,由于 Петрусь 对 Эвелина 有一种好感,便主动搭话, —Послушайте! —ок-

ликнул он ее слыша , что **она проходит мимо**. — Это опять вы ?
这时 ,交际距离已比第一次见面时缩短。双方经过交谈之后 ,Эвелина 对 Петрусь 也产生了好感 ,尽管她还不知道他是瞎子 ,却在 Петрусь 身边坐了下来。 — Какой ты смешной ! — заговорила она , **Усаживаясь рядом с ним на траве**. 当 Эвелина 误认为 Петрусь 摸她的脸和头发是坏孩子的行为时 ,Петрусь 很痛苦 ,而且放声大哭。 Эвелина 见到此景便产生了同情心 ,Тогда **Девочка присела около него на корточки** и стала успокаивать его , глядя рукой его волосы. 这时 ,他俩已靠得很近 ,Эвелина 还自然而然地运用了身势动作(抚摸)以示安慰。 当她得知 Петрусь 是瞎子时 ,她不仅十分震惊 ,而且怜悯之情油然而生 ,顿时拥抱起 Петрусь ,把脸倚在男孩身上 ,难过地哭了起来 : — Слепой ? — протянула она , и голос ее дрогнул. — Слепой ! — повторила она еще более дрогнувшим голосом. Охваченная чувством жалости , она вдруг **обняла мальчика , прислонилась к нему лицом** и сама горько плакала. 按照 E. T. Hall 的理论 ,可以说这里所描写的两个孩子的交际距离从“ 社交区 ”转入“ 熟人区 ” ,进而到“ 亲密区 ”。

在言语交际中 ,交际双方保持多大距离 ,在不同的文化、社会、地区、行业 ,不同个性的人之间存在着差异。对俄罗斯人来说 是熟人区的距离 ,英国人已认为是亲密区了。俄罗斯人认为意大利人交谈时过于靠近 ,而拉美人交谈时几乎贴身。日本人相距总是较远 ,因为他们传统的礼节是鞠躬问候 ,过近就要碰头。中国人交谈时站立距离适中。英国人与意大利人交谈时 ,往往会出现十分有趣的场面 :仿佛意大利人在不停地“ 进攻 ” ,英国人在不断地“ 撤退 ”。实际上他们都只不过是占据对自己适当的、习惯的交际距离。

作为伴随语言学一个方面的距离学 ,至今还远未得到深入研究 ,其研究的内容、涉及的方面 ,尤其是与话语的关系等等都是值得探讨的。

四、伴随语言手段在言语交际中的功能

伴随语言手段不是从语言体系中剔除出来的剩余部分,也不是对语言系统的额外补充,而是补偿口头交际中的不足所不可缺少的手段,是言语活动中具有功能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伴随语言手段不仅参与言语交际,而且与言语行为同步进行,在言语交际中二者融为一体。伴随语言手段通常完成以下两方面的功能(3—21)。

1. 作为辅助手段确定单义性功能。由于语言手段往往具有多义性,运用伴随语言手段可以确定在具体交际情景中语义的单—性。如:

—У вас есть сбивалка?

—Такая? /жест кистью вверх-вниз имитирует работу вертикального веничка для избивания яиц/... Или такая. /жест кистью вправо-влево имитирует работу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ого веничка для избивания сливок/. /Л. А. Капанадзе Е. В.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а/

2. 补偿功能。在实际交际过程中,往往省略一些语言手段,而通过伴随语言手段加以补偿。例如:

Доктор: ...Приходит ко мне одна старушка лет шестидесяти... Ну, Я ей сейчас же/звуками и жестами изображает впрыскивание/. Второй раз/изображает/...Приходит еще одна старушка, лет восьмидесяти. Зубов нет, волос нет, ни черта нет. Ну, я ей/изображает троекратное впрыскивание/. /И. Ильфа, Е. Петрова/

因此,研究言语交际中话语结构可能出现的省略或紧缩现象,分析可展示具体话语内容的非语言手段,是伴随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伴随语言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已开始被人们所重视。

应该说,这个学科里的许多问题还不甚清楚。对这门学科的深入研究不仅提供了探讨言语交际的新的理论依据与角度,同时,外语教学的内容也可以得以充实与丰富。

注 释

① Верещагин Е. М. , Костомаров В. Г.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М. , 1983.

参考书目

1. Горелов И. Н. Паралингвистика : Прикладной и концептуальный аспекты. В кн. :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культур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речев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 М. , 1977.

2. Колшанский Г. В. Паралингвистика. М. , 1974.

3. Колшанский Г. В. функции пара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средств в языков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В , 1973 р 1.

4. Николаева Т. М. Невербальные средства человеческой коммуникации и их место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языка. В кн : Роль и место страноведения в практике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ак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 М. , 1969.

5. Николаева Т. М. , Успенский Б. А. Языкознание и паралингвистика. В кн.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общей и славянской типологии , М. , 1966.

6. Розенталь Э. Д. , Теленкова М. А. 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х терминов. М. , 1985.

7.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Вы сказали “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 ” М. , 1982.

8. Формановская Н. И. Русский речевой этикет :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и метод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ы. М. , 1987.

9. А · А 阿卜杜阿齐佐夫 《论确立伴随语言手段的地位与标准》《国外语言学》, 1982 р 3. 。

10. 克特 · W · 巴克主编 《社会心理学》, 南开大学出版社 , 1986 年。

(原载《中国俄语教学》1990 年第 4 期)

俄语体素语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国情色彩

智 亚 男

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个特殊的语言分支,或称为一个特殊的语言层,这就是非词语语言。有人称它为无声语言或“哑语”。这种无声语言又分为两类:体素语言和习惯行为语言(Сома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 и Язык привычн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本文拟对俄语中的体素语言的基本特征、交际功能及其国情特色作一概括的介绍和论述。

所谓体素语言,就是通过手势动作、面部表情、姿势和某些生理体征而进行交际的“语言”。例如,你表示赞同,可以默默的点头,你向对方表示欢迎、问候,可以不必说“欢迎”、“您好”,只要伸出你一双热情的手即可,对淘气的孩子,你想禁止他的不良行为无需大声责斥,可伸出右手的食指向他表示警告。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事例说明,手势动作、表情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代替语言而沟通思想,完成一定的交际任务。

体素语言包括手势(ЖЕСТЫ)、面部表情(МИМИКИ И ВЫРАЖЕНИЯ ЛИЦА)、姿势(ПОЗЫ)、体征(СИМПТОМЫ)等部分。如,покачать головой, пожать плечами, грозить кулаком, чесать в затылке, схватиться за голову 等就是手势“语言”;наморщить лоб, кусать губы, хмурить брови, опустить глаза, скрипеть зубами, стиснуть зубы, смотреть прямо в глаза кому-н. 等属于面部动态表情“语言”。再如:

1. Городничий остаётся “в виде столба с распростёртыми руками и с закинутой назад головой”,

这是课文里的《饮差大臣》最后一场的哑剧场面：“市长像根木柱呆立在那里，伸开双手，向后仰着头”。这是一种静止状态的姿势描绘，也可称为姿势“语言”。

2. Маслова то сидела неподвижно , слушала чтеца , и смотрела на него , то вздрагивала и как бы хотела возражать , краснела и потом тяжело вздыхала , переменяла положение рук , огляывалась и опять устанавливалась на чтеца.

这一段是《复活》中对卡秋莎·玛丝洛娃的表情、动作、体征等的综合描写。译文、如下：“玛丝洛娃听着书记官宣读，眼睛盯住他，时而呆呆地坐着，时而全身一震，仿佛打算反驳似的，涨红了脸，后来却沉重地叹了口气，把手换了一个放处，往四下里看了一眼，随后又凝神瞧着宣读的人”。

那么，凡是能起到交际效果的手势表情等都可称作体素语言吗？不，决不是这样。例如：不同国籍、语言不通的两个人碰到一起，借助于手势比划也能沟通简单的思想：向对方借用一下打火机啦，借用一下钢笔啦等等。这种手势比划不能称之为体素语言。此外，一般动作描述亦不能被称为体素语言。例如：прикоснуться носа，прикусить губы，качнуть рукой，с размаху опустить руку等，皆是一般任意动作，它们没有固定的特定含义。

一般的肖像外貌描写与有特殊内涵的面部表情、体征的描写亦有本质区别，所以，一般肖像描写——例如：高高的前额，直直的鼻梁等等，也不能划入体素语言之列。

体素语言究竟具有哪些特点呢？

一、手势动作程式化，有固定的词汇组合。

凡构成体素语言的手势动作皆是程式化的，固定化的。它投射到文字表达上，也必然形成相对固定的词汇结构。例如：махнуть рукой——动作是程式化的，词汇搭配是固定的，其内涵也是不变的：在不同的交际场合它或表示放弃原来的打算，或表示被迫同意别人的意见，或表示拒绝采取某种行动。因此，Е. В. Красиль-

никова 又称手势语言为手势成语(Жесты-фразеологизмы)或成语化的手势(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жесты)。

1. Он ничего не ответил и только махнул рукой

2. О себе они/родители/не заботятся никогда. Даже удивительно : про меня все знают—что вредно , чего нельзя. Даже полезное может им показаться вредным. А на себя словно рукой махнули. /А. Алексин. Повести. /

3. Я сыт по горло этими разговорами.

4. Что ж качаешь головою ? Аль отказываешь нам ?
Аль товар не по купцам ? /А. Пушкин/ 上述例句中的手势均是固定的 ,其词汇结构也是相对稳定。

二、体素语言为民族共同体所共有。体素语言用于民族共同体内部交际中 ,与词语语言一样 ,人人心领神会。这一特点决定了体素语言必然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 ,一只手握拳并翘起大母指——在中国、苏联 ,表示称赞、夸奖 ;在其它某些西欧国家 ,则表示拦截过路的汽车或出租汽车。再如 ,表示“ 告别 ”时用的“ 挥手 ” ,这一动作也因国籍不同而有所区别 :俄罗斯人的肘部前后挥动 ,掌心向外 ;英国人的肘部左右晃动 ,掌心向外 ;意大利人的肘部前后挥动(与俄罗斯人相同) ,可是掌心向内(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使用这一动作表示招呼对方 :“ 到这儿来 !”)。因此 ,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体素语言。了解这一点 ,对于学习外语的人来说十分重要。

三、体素语言为每个人终生使用。

这类程式化的动作、表情等 ,从孩童时期(学习语言的同时)一旦学会 ,即参与交际 ,终生不断重复使用。它作为表达某种思想的固定标志代代相传 ,永不相忘。

四、同一体素特征可有不同相应词汇表示 ,其内在含意不变。

同一体素特征往往有几种表示方法 ,而这类表示同一特征概念、同一意思的不同词汇也是相对稳定的 ,不可任意改变。不同的

词汇往往具有不同的修辞色彩。例如：

皱眉：	сдвинуть (нахмурить) брови насупить брови (разг.)
眨眼：	моргать глазами (разг.) хлопать глазами (разг. пренеб.)
垂下眼睛：	опустить глаза опустить очи вниз (стар. поэт.)
指着门：	показать кому-н. дверь указать кому-н. дверь (устар.)
张开嘴：	раскрыть рот разинуть рот (разг.)

五、体素成语有强弱之分——其组成字数不同，图示清晰度亦不同。

一般来说，体素成语多则由三、四个词组成，少则独词构成。组成的词汇越多，图示清晰度越强。因此三至四个词组成一体素成语其图示性最强，两个词组成的次之，独词最弱。

положа руку на сердце 将一只手放到胸前(表示诚恳)；
послать поцелуй кому-н. 投去飞吻(表示安慰对方)；
тереть рукой лоб 搓额(在回想……)；
указывать на кого-н. пальцем. 用手指点指谁(公开批评…)；
смотреть кому-н. в глаза 正视某人(勇敢地，大胆地)；
протягивать руку 伸出手(表示友好)；
прятать глаза 把脸扭向一边；
отвести глаза 转移视线；
опустить глаза 低下头，垂下眼皮；
глядеть в сторону 转过脸去；
поклониться 鞠躬(致意，央求)；
нахмуриться 皱眉(愁眉不展)；
наморщиться 蹙额(愁眉不展)。

六、体素语言有直义、转义之分，在交际中用转义。

体素语言与词语语言一样，有直义、转义之分。其直义就是动作的简单表现，是“字面”意思，它没有特殊内涵。我们要研究的是它的转义，正是这种转义，才在交际中起到特殊的作用。例如：

положа руку на сердце—искренне, честно(转义)
послать поцелуй—успокоительный жест(转义)
тереть рукой лоб—вспоминать(转义)
указывать на кого пальцем—открыто критиковать(转义)

смотреть кому в глаза—прямо, смело(转义)
качать головой—не одобрять(转义)
моргать глазами—безвыходно(转义)
опустить глаза—падать духом(转义)
показать кому дверь—выгнать кого(转义)

也只有转义,才体现了它的本质特征和民族特色。如:

1. Инженеры сидели хмуро...и прятали глаза. Только архитектор смотрел на начстрой с восторгом. /Гладк. Энергия/

工程师们坐在那里闷闷不乐.....把脸转向一边。只有建筑师一人兴高采烈地望着工地主任。

2. Правдивый человек смотрел людям прямо в глаза, а в борьбе с неправдой имеет силу десятерых. /Изюмский, Алые погоны/

诚实的人在人前胸怀坦荡,无愧于心;同谎言作斗争时,他有十倍于人的力量。

3. [Незнамов :] У него вид чистый, он счастливец, он всякому может прямо смотреть в глаза, всякому может сказать, кто он и что он. /А. Остр. Без вины виноват. /

[涅兹纳莫夫 :]他外表诚挚,是个幸福的人。他可以坦然地面对任何人,可以向任何人说,他是谁,是干什么的。

4. Когда он злился, его движения становились учащёнными...и надо было стиснуть зубы, чтобы перестать нервничать и взять себя в руки. /Холендро,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

ка/ 当他发怒的时候,他的动作就变得异常忙乱……他必须咬紧牙关才能控制自己,让自己安定下来。

5. Ловцовым чересчур долго нянчились. Сначала его не перестали хвалить. Потом стали хвататься за голову, уговаривать, предупреждать: —Володька, что же с тобой творится? Понимаешь ты, куда катишься?

/Золотарев, Чудеса без чудес/

很长一段时间对洛弗佐夫姑息了,起初不停地夸他,后来大家拿他没办法了。又是劝说,又是警告:“沃洛季卡,你这是怎么啦?你知道你在向哪里滑吗?”

应当说明的是,尽管每个体素成语的内涵是固定的,却不意味着它的内涵单一。体素成语的多义性不仅表现在有直义、转义之分,还表现在随交际场合、交际目的改变,其内在涵义也有所不同。如前面提到的“挥手”这一动作,至少可以表示三种不同的意思:如果说话人要表示“放弃自己的原有打算”,则“挥手”的动作是——右手在肘部弯曲,掌心向下,然后手急速向下;如果想让对方停止某种行为,则这一动作是——右手肘部弯曲,手膀举至肩部高度,尔后,手腕向谈话对方急速下降至肘部高度;如果表示对某事不感兴趣、不关心,则动作同第一种。这一例子说明:同一体素成语有时以不同的动作表示不同的含义,其动作程式化的改变并不影响词汇结构的组成,仍然是 махнуть рукой。

有时动作并不改变,而是随着转义的引伸而抽象化。前面我们提到的例句——Я сыт по горло этими разговорами/обещаниями/. 这里体素成语表示“讨厌;腻味”是由吃饱之后厌食而引伸得来的。

此外,生理体征的本能表现进入体素语言行列之后,我们所应重视的同样是其转义,是反映心理、精神状态的含义。例如,人因生气或激动而“脸色苍白”,因发怒或害臊而“满脸通红”,因寒冷或恐惧而“全身发抖”、“牙齿打叩”。请看下面一些例句的内在含

义：

1. Он покраснел. /Ему жарко или он рассердился. /
2. Лицо его покрылось пятнами. /Он волнуется или он возмущён. /
3. Он позеленел. /Он злился. /
4. Он побледнел. /Он волнуется или плохо себя чувствует. /

以上我们对体素语言的组成及其基本特征作了概括的分析和介绍。下面我们对体素语言的交际功能再作一些探讨。

Н. И. Жинкин 说：“语言是交际体系，它为社会服务，并且又是社会的财富”。体素语言和词语语言一样，它是语言交际体系的分支，是语言的组成部分之一。从交际功能这个角度来看，它与词语语言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它参加交际的方式是有其特点的。

体素语言中用得最多的是手势动作和表情，动作和表情既可以伴随词语语言同时参加交际，也可以脱离词语语言而独立参加交际，其含义以它的直观形式图示出来。例如：

1. Вы нам нужны дозареза /с жестом/.
2. Вы нам вот так нужны/с жестом “ дозареза ”/. дозареза——是掌心向下，沿颈项自左向右的手势动作。这一手势的本意是“割脖子”，现代俄语中引伸为“到了极其要命的境地”，表示“极其”需要的意思。因此，这两个句子可译为：“我们太需要您了”。第一个句子既有手势，又有词语 нужны “ дозареза ”，第二个句子只用了手势；“ дозареза ”这个词没有说出来，意思是一样的。

дозареза 若离开 нужен，而与 гарантировать，устроить бы 连用，其意思相当于 полностью，совершенно，абсолютно。

3. Это меня устроило бы вот так. /с жестом “ дозареза ”/

4. ⑤Твоя мама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будет. Я тебе гарантирую
вот так. /с жестом “ дозареза ”/尤其是在口头直接
交际中 ,常常用手势动作和表情直观地表示出来 ,无须词语说
明。

体素语言的另一个特点是表示力强。它具有形象鲜明、感情
色彩浓郁等特点 ,因此 ,常常被用在文学、戏剧、乃至议论文章之
中 ,起到“ 无声胜有声 ”的微妙效果 ,激起读者、观众心灵深处的震
盈。例如 ,前面提到的“ 呆若木鸡 ”的市长(《钦差大臣》) ,像根木
柱一样呆立在那里 ,头向后仰着 ,伸着两只手——这一姿态描绘 ,
辛辣嘲讽了这位贪污受贿、巴结而又惧怕权势的卑鄙小人 ,揭示
了他精神的崩溃。

再如 ,对卡秋莎·玛丝洛娃的那段描写 :сидела неподвиж-
но——表现了她对事态进程的屈从和无可奈何 ;вздрагивала и
как бы хотела возражать , краснела ——反映出她的恐惧和无力的
抗议 ;тяжело вздыхала ——她显然看清了 ,法庭不可能作出公正
的判决。列夫·托尔斯泰着力于对玛丝洛娃的动作、表情的描写 ,
深刻地揭示了她内心的愤慨和无声的抗议 ,无情地揭露了法庭的
虚伪。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再如 :

Кипящий Ленский не хотел

Пред поединком Ольгу видеть ,

На солнце , на часы смотрел ,

Махнул рукою напоследок——

И очутился у соседок. /А. Пушкин ,Евдений Онегин/

Он нахмурил брови , стиснул зубы , неподвижный
взгляд его стал как бы еще неподвижнее. /Ф. Достоевс-
кий/

体素语言是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 ,它反映了不同民族、不同
时代的某些心理特征。因此 ,我们在学习俄语时 ,应当注意研究和

积累俄语体素语言方面的知识,它是我们了解俄罗斯民族丰富的文化和精神财富的途径之一。不掌握体素语言不仅会造成与俄罗斯民族交际中的某些困难,有时也妨碍我们对苏俄文学的正确理解。例如,在阿·法捷耶夫的《毁灭》中有一段故事,写的是一个多子女的矿工家庭。十月革命前,矿工生活十分穷困,偏偏又添了一个新生儿。这位父亲说:

“Значит, четвёртый... —подытожил отец и покорно махнул рукою. —весёлая семья.”/А. Фадеев, Разгром/

他的话和手势说明了什么呢?是为多添一口而庆幸?决不是,联系到社会背景来看,作者在这里用了幽默的笔锋。махнул рукою说明了这位父亲对命运的屈从,对贫困生活的压力感到忧愁和无可奈何。

据 Ж. З. Амбарцумова 对学生必读作品的研究,使用频率较高的体素成语约有三百个左右。苏联已经出版了“手势词典”。我们教学中重视这一特殊语言层,是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俄语,而不是提倡学生装模作样地去模仿。这是没有必要的。

有的语言学家把体素语言与聋哑人的手势语言划为一类,统称为手势语言,笔者以为这是欠妥的。聋哑人的手势语言不属民族共同体所共有,也不是文化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它是人为地规定的,它不是语言内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语言以外的一种人造交际手段。因此,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参考书目

1. 《Язык и культура》, 1983, Москва
2. 《Из опыта создания лингвострановедческих пособий》, 1977,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3.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4. 《Воскресенье》译文参用 1979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 46 页

5.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1985 , И 1с. 47 - 54.
6. 《现代语言学研究》, 1983 ,建福人民出版社
7. 《鲁迅先生小说集》, 1964 ,人民文学出版社

注释 :见《Русский язык》1985 ,No 1 ,с. 47.

(原载《外语教学》1988 年第 2 期)

俄罗斯人的身势语 与中国俄语教学

刘 刚

在交际过程中人们通常以语言作为工具。那么不用语言,即,不讲话,能否达到交际目的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熟人相会,点一下头,或握一下手,虽然没有说“您好!”,但已起到相互致意的作用。中国人以点头代替说“同意”,俄罗斯人在家里对淘气的孩子举起食指,可起到严厉斥责“别闹了”的作用。没有讲话,却沟通了思想。可见,人类交际不光靠有声语言(вербальные языки),还有无声语言(невербальные языки)。以上提到的“点头”、“握手”、“举食指”便是无声语言的一种,即身势语(СОМАТИЗМЫ)。

一、什么是身势语

身势语借助手、脚、身体、面部肌肉表达思想,它是一个特殊信息体系,我们把这个信息体系称为身势语言(соматический язык),而以上谈及的“点头”、“握手”、“举食指”,这些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信息单位就叫身势语(соматизмы)。有趣的是,身势语这种无声语言单位总是能够找到有声语言的固定描述形式,我们把这种语言单位称为身势言语(соматические речи)。身势言语在语言中有多种分支和层次。

人类运用身势语言的历史十分悠久,聋哑人就是用这套信息体系互相沟通思想,进行交谈。所以有人把身势语言叫作哑语

(немая азбука)。可见身势语是交际手段 ,但在戏剧、文学作品中它又是表达人物性格、思想情绪及人际关系的特殊手段。在舞台和作品中常有这种情况 :人物的心理状态不是用语言表达 ,而是借助感情的外在形式 ,即通过手势(жесты)、表情(мимика)、姿态(позы)、面部表情(выражения лиц)、征兆(симптомы)表现。身势语表达的所有意义全靠这五种形式完成。例如 :

1. 手势——是有意做给人看的身体动作。例 ,поманить пальцем кого 用手指招呼某人过来。

2. 表情——面部肌肉的动作。表情和手势的典型特征体现在一个“动”字上 ,例 ,Парень засмотрелся на главного ,разинув от удивления рот (Островский)。此处的“张嘴”表示“惊讶”。当然 ,身势语中也存在“静态”现象。

3. 姿态——是保持一定时间不动的身体姿势。例 ,在《钦差大臣》剧终时 ,市长的姿态为 в виде столба с распростертыми руками и закинутой назад головою。

4. 面部表情——指面部肌肉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动的状态。例 ,Он нахмурил брови ,стиснул зубы ,неподвижный взгляд его стал как бы ещё неподвижнее (Достоевский)。

手势(жесты)和姿态(позы)是对应的 ,二者都是身体的动作 ,区别在于前者体现为“动” ,后者体现为“静”。表情(мимика)和面部表情(выражения лиц)也是对应的 ,都是面部肌肉的动作 ,也体现为前者“动” ,后者“静”。以上四种形式均依赖于人的主观意志 ,是做给人看的动作。还有一种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意志 ,不是做给人看的身势语形式——征兆(симптомы)。

5. 征兆——是人生理上内在感受的外在表现形式。如 покраснел 脸红——生气或是觉得热 ;побледнел 脸色苍白——激动或是健康状况不好。

身势语是国际性的 ,不同国家的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借助身势语能够进行交际(这里指的是描述性手势)。例如 ,你做出刺

胡须的样子,你不必说话就可使对方明白,你准备剃胡须或是向他要剃须刀。类似情景如做划火柴,吸烟等动作同样可以达到交际目的。

但不同民族的身势语在形式和意义上可能有不同。这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如表示“吃”,俄罗斯人用手做勺状,凑近唇边,而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则是用两指做筷子状凑近唇边。

在语言史上,人们对身势语感兴趣还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当时,在语言起源问题上就有人提出先有身势语,后有有声语言,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时人们就认为,由于先有了哑语,后来才使身势语进入了实用阶段。当前国际上对身势语的研究进展迅速。这是深入研究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社会语言学、及交际理论的结果。

在欧洲极其重视讲演时的手势,俄国十九世纪著名国务活动家 М·斯佩兰斯基写道:“当补充某一思想时,手只能不停地动。冷静时勿需动手,只有打动人心时,才要动手。”演说家讲演时都是努力用手势表达情绪和自信。由此可见身势语在讲演时的重要地位。

那么身势语在有声语言中究竟充当什么角色呢?

1. 它伴随有声语,起补充、强调、确切作用。身势语与言语相互依赖,互为补偿。同一个句子,带有不同的语调,手势和表情其语义就不同。如句子:“вы!”伴随把手放到胸前、将头倾向侧方的姿势和伴随摇头的姿势传达的信息完全不同,前者表示赞扬,后者表示不满。

2. 身势语可以代替言语:在机场,当飞机轰鸣着准备起飞时,地勤人员通知驾驶员“一切正常”的常见方式是高高举起大拇指。

3. 身势语本身可以是独立传达思想感情的手段。如接吻、拥抱、握手等。

4. 大量描绘身势语的有声言语——即身势言语(соматические речи)已转化为成语。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证明了身势语在

有声语言中占有重要地位。例 ,умывать руки 的成语性意义为 : 推卸自己对某事的责任 ,回避参加某事。如 ,—Делайте , как хотите , 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еевич , я умываю руки. Вы будете отвечать за все , что может сейчас произойти , —наконец проговорил Шульц(Степанов).

国际上的身势语专家大致将身势语分为以下几种 :

1. 本民族各种交际场合约定俗成的身势语。例 “伸舌头”——俄罗斯人表示嘲笑人 ,在印度表示愤怒 ,在马雅人中表示英明。
2. 非约定俗成性身势语——是一种一望便知的手势、表情等。这种身势语在功能和结构上可能并不简单 ,但人们勿需有任何准备就能理解。
3. 强调身势语——本身无意义 ,但帮助人们理解以言辞表达的思想。
4. 节律身势语——说话者强调的不是个别词语 ,而是整个言语。属此类的如表示没信心 ,犹豫或不知如何用言语表达思想时进行“耸肩”、“摊手”等。

二、身势语与俄语教学

手势、表情和言语关系密切。当人表达思想时 ,按 С·伏尔康斯基的说法 ,手势“预示词 ,就象闪电预示雷声一样”。著名苏联导演斯坦厄斯拉夫斯基多次告诫自己的演员“在言语交际中 ,不是说给耳朵听 ,而是说给眼睛看。”

可见 ,身势语在有声语言中的作用早被人们所认识。在俄语教学法中重视身势语研究只是最近的事情。苏联著名教学法专家科斯托马罗夫、维列夏金等人认为 ,身势语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文学作品中 ,舞台上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 ,在实际生活中是一种交际工具。俄罗斯人善用丰富多彩的手势、表情、姿势等 ,表达感情、进行交际。所以把身势语的内容纳入到俄语教学过程有着特殊意义。在强调俄语教学要贯彻交际原

则的今天 , 尽管此问题在理论上刚刚提出来 , 但马上引起俄语教学工作者的广泛注意。

在我们的实践课(精读课)、翻译课、电影课、阅读课堂上 , 无处不遇作家对自己作品中人物性格、情绪、感受的描写 , 但没有哪个作家平铺直叙地告诉读者 , 主人公如何痛苦或如何高兴 , 而经常是用身势语把他们影射出来 , 让读者自己去领悟、感受 , 以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

下面我们观察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如何展示一场极其困难谈话的场面。谈话内容是 Каренин 告知 Долли 自己的妻子不忠。Долли испытывает большое волнение : « Дар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чувствовала , что она бледнеет и губы её дрожат ». Она хочет вызвать собеседника на откровенную беседу : «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 сказала она глядя ему в глаза , — Я спрашивала у вас про Анну , вы мне не ответили ». Каренин не идет на откровенный разговор. « Она , кажется , здорова , Дар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 — не глядя на нее , отвечал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 Долли все же удается направить диалог в нужное ей русло , но Каренину это не нравится : « Алекс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оморщился и , почти закрыв глаза , опустил голову ».

Долли выражает горячую убежденность в невинности Анны : « Я не верю , не верю , не могу верить этому ! — сжимая перед собой свои костлявые руки , с энергичным жестом проговорила Долли ». Когда все таки неверность Анны стала очевидной , Долли проникается ужасом. « Нет , нет , не може быть. Нет , ради бога , вы ошиблись ! — говорила Долли , дотрагиваясь руками до висков и закрывая глаза .

Теперь и Каренин решает , наконец , быть откровенно до конца : « Дар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 — сказал он , теперь прямо взглянув в доброе взволнованное лицо Долли. — Я бы дорого

дал , чтобы сомнение ещё было возможно». Долли совершенно точно уловила смысл этого прямого взгляда—Каренин говорил чистую правду :《 Дарь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поняла это , как только он взглянул ей в лицо 》. Долли смиряется с решением Алексе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а пойти на развод. 《 Я понимаю , я очень понимаю это , —сказала Долли и опустила голову. 》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она вызывает о милосердии :《 Она умоляющим жестом сложила руки. —Но постойте ! Вы христианин. Подумайте о ней ! 》

在这一书中作家没用一个字直接表达主人公的心理感受 ,而用了大量的文字描写主人公的手、脸、眼睛的动作及表情。主人公所讲的话固然重要 ,但揭示他们内心世界的身体语言更为重要 ,因为不是所有人的内心世界都是能用言辞表达清楚的。例如 Долли相信 Каренин 说的话是真的 ,是在 Каренин 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情况下 ,这眼神使 Долли 完全相信 Анна 真的背叛了丈夫。可见 ,交际中有时无声手段(невербальное средство)比有声手段(вербальное средство)还重要。我们在电影、戏剧、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大量对摇头、摆手、身体姿态的描绘 ,透过这些描绘我们体会到主人公的内心活动。所以我们说 ,身体语言是打开通往神秘灵魂世界的钥匙 ,是我们俄语课堂上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如果把以下做法纳入到目前的国内俄语教学过程中 ,我们的教学效果肯定会长足直进 :

1. 找出课文中的身体语言 ,并揭示其影射意义。例 ,在《复活》中 ,Маслова 在法庭上听到不公正的起诉时 ,其反应托尔斯泰做了这样的描述 :

Маслова то сидела неподвижно , слушая чтеца и смотря на него , то вздрагивала и как бы хотела возражать , краснела и потом тяжело вздыхала , переменила положение рук , оглядывалась и опять уставлялась на чтеца.

其中的身体语言可做如下解释 : сидела неподвижно 表示对事

件发展进程俯首听命的恭顺态度：вздрагивала и как бы хотела возражать 展示其惊讶、害怕及欲想反驳的状态；тяжело вздыхала—Маслова 已懂得 法庭不会作出公正的裁决。

2. 如果将以上工作列入教材的注释中,那么学生在预习时,就会对课文内容有较高层次的理解。托尔斯泰在《复活》中从未讲过 这个起诉是虚伪的、捏造的、或讲 Маслова 对此起诉愤恨不平、怒不可遏,但有了我们对身势语影射意义的解释,足以使学生明白作家的真正用心。

3. 对俄罗斯人约定俗成的身势语,中国学生无法弄懂其含义,教师要以身示教。首先使学生明白其直义,即所指身势语的外部形式,然后解释其影射意义。例 — Она ему наставила рога, — женщина приложила пальцы к голове. 此处直义是将食指和中指在头后举起,或将两食指竖在两耳上方。影射意义:她(妻子)对他(丈夫)不忠。

4. 如果在教科书对类似身势语的外部形式加以描述并加图解,解释其影射意义,那将大大减轻教师的课堂工作。

身势语象有声语言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特有现象。所以同一手势在不同民族中可能有不同理解。如俄罗斯人、中国人竖大拇指是表示赞同、满意、高兴;而在西欧一些国家以此表示拦截出租汽车或同路汽车。俄罗斯人、中国人分手时以挥手示意告别,挥手时掌心向外前后摆动;英国人此时则是左右摆手;意大利人告别时也是前后摆手,但掌心向着自己。这种手势中国人的理解是“过来”。在中国肯定引起误会。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要向学生强调俄罗斯身势语的外部形式和内含意义,要强调其约定俗成性质。在交际中不要以本民族的身势语代替俄罗斯身势语。

除向学生强调身势语本身意义外,还要强调两个民族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等。否则在实际交际中同样会造成误会甚至悲剧。笔者在苏学习期间,曾听阿基希娜教授讲过这样的例子:一个瑞士太太带着心爱的小狗在中国旅游。她走进广州一个小饭

馆准备用餐。她用手势告诉堂倌把狗带下去喂一下,同时示意她自己也要吃饭。几十分钟后,一只热气腾腾的狗用盘子端到了瑞士太太面前。欧洲人把狗看成伴侣、朋友;而在广州,狗却成了饭桌上的美味佳肴。作为中国人,我不太情愿相信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但作为用身势语交际时,不注意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而产生误会的例子,其内容却的确很生动。

不理解身势语的影射意义,不了解国情,有时会把语义完全搞错。笔者曾在二年级学生中做过一次试验:让学生读法捷耶夫《毁灭》中的一段,叙述的是一个意外的孩子出生在一个多子女的矿工家里时,父亲对此作出的反应。事情发生在十月革命前:Значит, четвертый... — подытожил отец и покорно махнул рукой. - Веселая жизнь. 读过此文,多数学生认定,父亲非常高兴,认为生活是愉快的。可见学生阅读时不注意身势言语,更不了解 махнул рукой 的影射意义,而且用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概念去理解父亲的心境,其结果必然对 веселая жизнь 的讥嘲意义毫无觉察。

我们强调身势语在俄语教学中的地位,但不赞同在课堂和交际中积极运用身势语。其原因如下:

1. 过多运用身势语这种无声手段影响正常的言语训练。
2. 我们很难做出地道的俄罗斯身势语。因此在交际中非但不能帮助对方加深理解我们的言语,反而分散对方注意力。笔者在苏学习期间就有意做过试验:与俄罗斯人交际时故意边说边打手势。结果俄罗斯人捧腹大笑。他们说,外国人打俄罗斯人的手势就象所有外国人说俄语一样,无论讲得多地道,俄罗斯人听起来总有外国味。要充分认识到,打手势时挥动手臂的幅度大小都决定着许多因素:气质、性别、民族属性、行为规范等。误会有时是由言谈时的举止引起的。因为交际在话语之前已经开始。例,怎样走近人,怎样问候(握手、拥抱、接吻)、怎样看人、怎样站、坐等,均属交际的重要环节。

3. 我们总身不由己地用本族身势语代替俄罗斯身势语,其结

果不言而喻。

三、介绍几种俄罗斯人的身势语

目前国内尚未见过介绍俄罗斯人身势语的详尽资料,这是身势语不能进入俄语课堂的主要障碍。本人做此尝试旨在对俄语教师和学生有所裨益。其次,俄苏文学原文作品中经常以身势言语描写主人公的思想感情,为了了解这些身势语的深层意义,俄苏文学工作者,尤其翻译工作者很有必要掌握这方面的资料。此外,本内容对苏俄戏剧工作者十分重要,中国人说话时不喜欢“指手画脚”,但知道俄罗斯人善用手势。所以在舞台(银幕)上扮演俄国人的演员就到处用力挥舞手臂,以至使台下真正的俄国人看后啼笑皆非。中国人很少知道俄罗斯人的手势特点:做手势时只用一只手(右),另一只或不动,或动作很小并且不重复右手的动作;如果双手打手势,那么手不会伸得离身体很远,经常以双肩或头部代替手的动作,如指示方向时,常用头;说“不知道”时耸肩比摊手多。

我们希望俄语教学工作者(包括教材编写者),俄苏文学、戏剧工作者在此能够得到一定的启发。

выставлять ① большой палец и мизинец

形式:大拇指与小指伸直,大拇指在上方,小指在下方,其余手指握向手心。

意义:表示“杯”、“酒瓶”、“喝酒”。

例:— Пойдем, — он выставил большой палец и мизинец.

— Выпить приглашаешь?

грозить пальцем

形式:食指伸直,指背向谈话对方,其余手指握向手心。手臂肘部弯曲,腕部有时上下摆动。

① 以未完成体动词为代表,以下同。

意义 1) 表示威胁 ,常伴随 Погоди у меня !

Ты дождешься ! 等语句。

例 : ... погрозила секретному агенту пальцем. Ууу , плутище , погоди у меня ! (Окуджава).

2) 表示责备、不满。常伴随 Вы хитрый человек !

Вы опять шутите ! 等语句。

例 : Глядит ей в глаза и грозит пальцем. -Вы хитрая ! (Чехов).

делать козу

形式 : 食指与中指伸向前方 ,其余手指握向手心 ,做羊角状。

意义 : 此系与孩子戏逗的一种游戏 ,常伴随 Идет коза рогатая за малыми ребятами. 等语句。

例 : А рядом с этим странным шествием идет женщина. И одной рукой эта женщина отстраняет прохожих. А другой она по временам делает козу. Она этим , видать , более забавляет малышей (Зоценко).

показывать кукиш (дулю , фигу , шиш)

形式 : 握住拳头 ,将拇指从食指与中指间伸出 ,或在此基础上再把小指从无名指和中指间伸出 ,此手势叫 двойной кукиш.

意义 : 表示粗鲁的拒绝或侮辱性的讥嘲 ,常伴随 вот тебе ! Кукиш в нос ! 等语句。

例 : Аксинья показала ему кукиш и плюнула (Чехов).

Показывать кукиш в кармане 则表示暗自气愤 ,不满 ,谴责。例 : Только бы выдаться , только бы презирать людей в открытую , а не показывать , сидя в норе , кукиш в кармане (Серафимович).

крутить у (возле) виска

形式 : 食指指向太阳穴并划圈。

意义 : 表示“ 傻 ”、“ 疯了 ”、“ 缺心眼 ”。常伴随 С приветом ; Не все дома ; Не того ; Не все шарики на месте 等语句。

例 :Петрицын покрутил пальцем возле виска , мол , “ не того ”
(Новиков).

обматывать пальцем вокруг шеи

形式 :伸直食指指向脖子并划 1—3 圈 ,然后将手指抬向头上后方。
头此时要晃 ,眼球上翻。

意义 :指“ 上吊 ”或“ 绞架 ”。

例 :Парень сделал удивленное лицо и стиснул.

И Сергунков вам добровольно уступил престол ?

— Вот уж насчёт его доброй воли—не интересовалась.

— Значит , будем ждать очередного самоповедения. Вот так :кх—хы !—он помотал пальцем вокруг шеи , показал в небо и смешно выкатил глаза (Можаяев).

показывать кончик пальца

形式 :由大拇指甲指出小指尖部分。

意义 :指“ 小数量 ”,“ 小尺寸 ”。常伴随 чуть-чуть , вот столько , вот такусенький.

例 :— Ну тебе до гроба ишо . . . Поживешь. Работа—не бей лежачего. И не совестно ведь !—искренне изумлялся дед. — Неужель не совестно ?

— Ни на вот столько. — Макар показывал кончик мизинца (Шукшин)

показывать пальцами “ я пошел (-а) ”, “ Пойдемте ”

形式 :手心向下 ,伸出中指与食指(其余握向手心)做双腿走路的动作 ,同时手要前移。

意义 :表示“ 我走了 ! ”,“ 我们走吧 ! ”

例 :Виктор показал пальцами , что пора уходить.

смотреть сквозь пальцы

形式 :用一只手或双手手指遮住眼睛。

意义 :故意没看见、不注意。

例 :Ты же знаешь , я на все гляжу сквозь пальцы. И волю вам даю : сиди она с тобой хоть всю ночь , до петухов , ни слова не скажу(Пушкин).

проводить пальцем по шее

形式 :用食指横着在喉结处划线。

意义 :吃得极饱 ,不能再吃了。

例 :Вот так наелся , —он провел по горлу (Леонов).

сцеплять пальцы

形式 :将两个小指钩在一起。

意义 :表示“ 友谊 ”、“ 联盟 ”。

例 :Пароход с гостями уплывал и мальчики увидели , как Витька сцепил пальцы и поднял руки над головой. Они поняли , что он предлагает им крепить их союз и быть друзьями. В ответ они тоже соединили пальцы.

тереть пальцами друг о друга

形式 :掌心向上 ,拇指肚反复依次磨擦小指肚至食指肚。

意义 :指“ 钱 ”。

例 :Принять—то вы примете. Знаю. А как насчет этого ?

—Иван посучил сложенными в щепоть пальцами (Абрамов).

щелкать ногтем большого пальца по зубам и провести по шее

形式 :用大拇指甲弹一下上前门牙 ,然后用食指在喉结处横着划线。

意义 :表示宁肯掉脑袋、牙齿也绝不失言。常伴 зуб даю 等语句。

例 :Ты мне не веришь ?Зуб даю !-он провел пальцем по шее.

Шелкать по горлу

形式 :用食指弹下巴底部的脖子。

意义 :表示“ 邀请喝酒 ”、“ 想喝酒 ”、“ 醉了 ”、“ 喝酒 ”。

例 (Подходит к Тетереву , щекает себя по горлу). Идем ?(Горький).

задирать нос

形式 :用食指将鼻尖戳向上方。

意义 :表示骄傲自满 ,妄自尊大。

例 :— Ну как живет Верочка ? Ты ее встречаешь ?

— Она горячка ! -Ира вздернула нос пальцем , -ходит только так , задрав нос кверху.

приставлять руки к ушам

形式 :以双手(或一只手)手掌贴在耳后 ,以提高听力。

意义 :1) 表示听力不好 ,或没听清。

例 :— Скажи , отчего ты с отцом всегда разговариваешь в дружеском тоне ?

— Ась ? -Руслан приставил ладонь к уху (Трифонов).

2) 责备对方“ 听而不闻 ”。

例 :— Эх ты ! Простофиля ! -он приставил руки к ушам.

делать рожицу (рожу)

形式 :用食指和中指将下眼皮向下外翻 ,用拇指将鼻子上戳。或用另一只手指将鼻子上戳。

意义 :此系戏逗别人的一种鬼脸 ,显然与“ 猪脸 ”有一定的联系。

例 :Мальчишки гримасничали , делая рожицы.

бить кулаком о кулак.

形式 :以一个拳击另一拳或击另一手掌。

意义 :表示沮丧 ,不满或焦虑等。

例 :Черт возьми , как ты мог допустить это ? —Олег Иванович ударил кулаком о кулак ;

— Девушка нервно стучала кулачками и приговаривала :“ Нет , проиграют они ”.

всплескивать руками

形式 :将肘部弯曲的双臂举向身体两侧 ,然后用力合掌拍手。

意义 :表示惊讶、高兴、惋惜。

例 :— Я так и думал. Брошу все и уеду.

— Ну , вот уж и не ожидала ! — вскрикнула Анна , всплеснув рукам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тереть руки

形式 搓手 :1)手掌互搓 ;

2)掌心与掌背互搓 ;

3)手心互搓 ,但双手要握在一起。

意义 表示愉快 ,或预先体验某种享受 ,快乐。也可表示内心踌躇不安。

例 :Цукасов ещё больше повеселился. — Мы сейчас поедем кормиться ! — потирая руки , заявил он (Липатов)— А может быть , и на документик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нападём , — прибавил он в сладком восторге , потирая руки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На другой день он все время нервно потирал руки и вздрагивал и было видно по лицу , что ему нехорошо (Чехов).

(原载《俄语教学与研究论丛》1991 年第 8 辑)

体语学研究与外语教学

刘汝山

1.0 引言

随着人们对跨文化交际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人体语言(body language)这一非文字语言的通讯手段,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注意。因此,体语学(kinesics)这一人类非言语交际研究中的分支学科便应运而生,而且同各语言学科的研究一样,在人类交际和外语教学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体语学又叫身势学、身姿学、身动学或举止神态学等。其研究对象包括人的手势、姿势体态、面部表情及谈话距离等的含义和使用规则等。体语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为公共关系、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等带来了活力,而且成了开启人际关系的一把金钥匙,为促进人类跨文化交际成功和提高外语教学效果提供了保证。

本文试追溯人体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简述发射信息的主要人体部位,并对人体语言的文化差异以及体语学研究与外语教学进行初步探讨。

2.0 人体语言研究的历史发展

人体语言的历史,无疑比任何自然语言的历史都要久远。有人猜测,在自然语言产生之前,人类的祖先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人体语言来传递信息进行交际的。

与人体语言的历史相比较,人体语言研究的历史要短得多。

据记载,人体语言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当时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分析过人们如何用行为来表达思想和愿望。

古今中外的文学家,大多对行为可以代替语言这一事实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他们的作品中,用描写行为举止来刻画人物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手法不乏其例。例如,Shakespeare (1564—1616)的戏剧 *The Winter's Tale* 中,就有“*There was speech in their dumbness, language in their very gesture*”的台词。可见莎翁对人体语言也颇有研究。

英国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于1872年出版的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一书,标志着人体语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达尔文发现,人类的某些手势和面部表情都是内在情绪的表露,它们同语言一样,也有交际功能。当然,他对某些人体语言现象的论述也有主观片面性。例如,他认为表示赞成或同意的点头是人类所共有的,并说它来自婴儿的母亲怀中寻找乳头的动作,显然,这没有多少科学道理或根据。

一般认为,人体语言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初建于本世纪50年代。1952年,美国人类学家 Birdwhistell 的 *Introduction to Kinesics* 一书的出版,引起了人们对人体语言的重视,为体语学的建立起了奠基的作用。这本书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体语学的概念体系。作者把所有具有意义的人体动作归纳成基本单位,并给它们相应的符号,从而使人体语言研究有了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这期间,美国的另一位人类学家 Hall 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对不同民族的非言语交际现象进行实地考察,于1959年出版了专门论述非言语交际的 *The Silent Language* 一书,阐述了文化因素在交际中的作用,揭示出了用人体语言进行交际的奥秘,为对人体语言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和丰富的材料。

1964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家 Rivers 的 *The Psychologist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一书出版。该书从外语教学的角度阐述了外语教师文化素质的重要性,其中包括教师对所教语言国家人

们的举止、手势和面部表情等的了解,从而引起外语教学界对人体语言研究的高度重视,使人体语言研究成为外语教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70年代是人体语言研究全面发展的时期。1970年,Birdwhistell的重要著作 *Kinesics and Context: Essays on Body Motion Communication* 在宾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使人体语言研究的影响不断扩大。Birdwhistell 和其他学者采用类比的方法,把人体语言的研究同其他语言学科(如音位学、语义学和词汇形态学等)并列起来,拟出了 *kine*, *kineme* 和 *allokine* 等一系列术语,使体语学的体系更加完善,从而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承认。

同年,美国著名行为学家 Julius Fast 出版了 *Body Language* 一书。该书用饶有趣味的实际事例介绍了手势、眼神、姿态及谈话者之间的距离等人体语言的含义和规则,为普及体语学的知识、帮助人们正确地表达自己和理解他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该书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当年十大非小说类畅销书之一,由此可见人们对人体语言研究兴趣之浓厚。

随着人体语言研究的深入发展,美国的许多学术刊物开始刊登这方面的理论文章和研究成果。象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 以及 *Sociometry* 等重要学术杂志都成了体语学研究成果报道的园地和百家争鸣的论坛。

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以来,体语学研究的范围越来越广泛,而且不断向其他学科渗透,为其他领域的发展发挥着作用。Nancy Henley 的 *Body Politics* 和 Ken Cooper 的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for Business Success* 等专著的出版表明,人体语言的研究已不再是人文学家和行为学家独有的领域,而且已引起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事业家的关注,为事业家们的成功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特殊的作用,使人类交际和沟通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3.0 体语信息的主要发射部位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是国外一些研究的结果表明,在人们的日常交际中,语言传递的信息仅是一小部分,而非语言因素传递的信息竟占交际信息总量的 65% 以上。Samovar (1981) 等认为,人体能够发出的体语信号达 70 万之多。

人的整个身体就是一个信息的发射站,而人体的各个部位有着发射不同信息的明确分工。Birdwhistell 曾经根据人体各个部位的动作在交际中的作用,认定人体有头部、面部、躯干、胳膊、手部等 8 个发送信息的主要部位。尽管他的分析主要是基于对美国社会中人体语言交际的观察,但是这基本上符合其他文化环境中的实际情况,与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象也大体上一致。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对双手、眼睛和面部三个信息发射部位进行简述。

3.1 双手

人的双手(包括手指)发出的信息成千上万。故手势语言种类很多。马路上的交通民警、运动场上的裁判、乐队的指挥和舞台上的演员等,无一不依靠或借助于手势语言来完成工作或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另外,据资料介绍,人们仅在讲解中所采取的手势就有上举、下压、斜推和平移等许多类,各类动作又可分类单手和双手两种,每种还可分拳式、半拳(即空心拳)式或掌式等。演说家、政治家和领袖人物正是在讲话时恰当地使用各种手势才使得他们的语言更加铿锵有力,在听众中产生理想的效果。就是普通人的日常交际中,手势也是传递信息不可缺少的工具。

3.2 眼睛

人的眼睛是发射信息最多的部位之一。据国外的有关资料统计,人们仅用目光就可以传送几千种信息。著名的意大利艺术家达·芬奇曾有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的论述,其意思就是,人们的眼神可以显示他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注意到,人们高兴时会使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气愤时会怒目而视,沉思时

会皱起眉头或两眼发滞,注意力集中时会目不转睛,而注意力分散时则会目光四射东张西望。所以,有经验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可以从工作对象的眼神中看出他们的心理状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

眼睛发射的信息不仅有显示功能,而且也有指示功能。在家庭中,小孩有过错时,家长的眼睛一瞪,就可以起到制止和教育作用。在课堂上,调皮的学生往往最怕教师那严厉的目光。在会堂里,讲话人上讲台后向厅内环顾一周,就可以起到静场的作用。

据统计,英语中有关“看”这一动作的动词和短语有 50 多个,每个词和短语都表示出不同的眼神或注意力程度。在汉语中,这类字、词和词组也为数不少,例如,瞧、瞅、睐、相、觑、盯、眈、膘、瞪、窥、瞥、睹、注视、凝视、谛视、端详、回眸、狼顾、暗送秋波、戟指怒目、看(某人的)眼色行事等。这充分说明了眼神的丰富表意功能和交际作用。

3.3. 面部

由于生理和心理的原因,人们内心的各种情绪,如高兴、悲哀、痛苦、恐惧、愤怒、忧虑、烦恼、疑惑或轻蔑等,不可避免地很快从面部反映出来。人们可以用语言说假话骗人,然而内心的情感是难以用面部表情来掩饰的。

面部发射的信息也极为复杂多样。例如,仅笑这一面部表情就可以分为微笑、大笑、狂笑、强笑、苦笑、干笑、暗笑、窃笑、奸笑、谄笑、憨笑、傻笑、嬉笑、冷笑、狞笑、咧嘴笑、抿嘴、皮笑肉不笑等,其各自的含义和差别在此无需赘述。

人的面部表情如此丰富,发出的信息如此之多,以致在各种文字语言中形成了许多表示面部表情的人体语言成语。它们言简意赅、形象生动,为文学家和黎民百姓所广泛使用。例如,汉语中的目瞪口呆、瞠目结舌、喜形于色、扬眉吐气、愁眉苦脸、嗤之以鼻、吹胡子瞪眼等,英语中的 pull a long face (搭拉着脸),be all smiles (满脸笑容),grin from ear to ear (笑得嘴角裂到两耳),foam at the

mouth (口吐泡沫 ,发怒) ,prick up one's ears (竖起耳朵 ,侧耳倾听) ,cock one's nose (轻蔑地翘鼻子) 等 ,都是面部表情的真实写照。

4.0 人体语言的文化差异

人体语言信息的传递同自然语言信息的传递一样 ,也是一个由信息发出者编码到信息接受者解码的过程 ,浸透着双方对人体语言系统的知识和各种文化因素。要使发出的人体语言信息畅通无阻地传到接受者 ,双方就必须使用同一个人体语言信息系统。因此 ,要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就必须对不同文化中人体语言的异同有所了解。

应该承认 ,如同语言和文化一样 ,各国各地区的人体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 ,英国喜剧大师卓别林在二、三十年代的无声影片能被世界各国观众理解 ,并且引起同样的笑声 ,就是例证。然而 ,也应该承认 ,由于地域、种族和文化传统的差别 ,各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体语言也有许多不同之处。因此 ,译解不同文化中的人体语言信息达到真正的沟通并非易事 ,其难度并不亚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置身于他国异邦文化中的人们 ,最初往往感到不舒服、不自在 ,即患文化震荡症(culture shock) ,除了语言和饮食方面的原因之外 ,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异邦人的人体语言不能正确的译解 ,不知如何应付。

人体语言的文化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 ,同一个信息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中用不同的手势或动作来表示。例如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或地区中 ,肯定或同意这一信息是用点头这一动作来表示的。然而在某些国家或地区的民族中 ,情况却大不一样。据 P·Farb (1973) 观察 ,在表示肯定或同意时 ,日本的阿伊努人把双臂摆到胸前并上下摇动 ,马来西亚内地的黑人把头向前猛冲一下 ,印度的旁遮普人把头向后猛仰 ,斯里兰卡人将下巴以弧形向

下低垂然后移向左肩,而孟加拉、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非洲某些国家中的人则把头左右摇摆,同我们表示否定或不同意时的摇头动作无多大区别。

其二,同一个手势或动作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有不同的含义。有些手势或动作使用于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但是表达的信息却不尽相同。把中指与食指交叉这个手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手势在我国的部分地区表示数字 10,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表示期待,在印度表示结束,在斯里兰卡表示弯曲或邪恶,在荷兰表示不相信或说对方扯谎,在尼日利亚表示把两个东西或两个数字相加,而在法国、美国、墨西哥、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则表示祈祷幸运或吉祥。此外,即使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同一个手势或动作也可以传递各种不同的信息。例如,在我国,握紧拳头既可以象征团结和强大,又可以表示愤怒和威胁;低头不语既可以是悲伤、沉思或抗议,又可以是内疚、羞愧或回忆。离开了语言所提供的信息和周围的环境因素,我们是无法理解其所载信息的。

其三,某些人体语言的手势和动作具有高度的地方性,仅使用于某一特定的地区或语言社团。正是这种手势和动作的地方性,使得人类人体语言的画面更加复杂,导致人们跨文化交际中的误解和困惑。国内国外这种事例举不胜举。

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随着旅游、贸易、电影、电视和其他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人体语言也同语言一样在迅速地传播,促进着不同肤色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逐步缩小人体语言的文化差异。例如,竖起食指和中指构成 V 字形这一手势,据说是当年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来作为反法西斯胜利之象征的。几十年后的今天,该手势已在全世界广为流行,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运动场上,这已是人们欢庆胜利或祝贺成功时广泛使用的手势,懂英语或不懂英语的人大多能够理解其含义。

5.0 体语研究与外语教学

人体语言的研究与外语教学,是促进人类跨文化交际的两个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领域。对于这个问题,Rivers(1964)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把体语研究与外语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首先,体语研究同外语教学一样,是我们进行国际交流的需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接触也日趋频繁。掌握不同文化中的人体语言就如同掌握外语一样,将有助于我们对世界各国文化的了解,帮助达到真正的沟通。

其次,人体语言研究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交际能力。人体语言是人们生活中应用最广泛、最频繁、表现力最丰富的口语交际的补加物。对规范的人体语言符号进行系统的研究、学习和运用,无疑会提高人们的表达能力,增强交际效果。有人曾经把交际中的人体语言符号比作文字描述中的插图和表格,这是很有道理的。文字中的插图和表格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说话时附以恰当的眼神和手势会增加语言的准确性、生动性和感染力,有助于信息的传输和听话者的理解。

再其次,人体语言的研究可以促进外语教学,提高外语教学的效果。外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交际既是外语教学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又是外语教学的目的和归宿。而要在外语教学中训练交际能力,就要求外语教师在具备其他素质的同时,了解并善于运用所教语言国家的人体语言动作。只有这样的外语教师才能创造出良好的语言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出真正具有交际能力的学生。

6.0 结语

体语学是一门年轻的分支学科,随着它与语言学、文化学、行

为学、人类交际和公共关系学的结合,其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可以相信,人体语言研究的深入发展,必将为我们的外语教学带来更大的变化,为不同肤色人们的交际发挥更大的作用。

主要参考书目

1. Birdwhistell, R. L. Introduction to Kinesics.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Press, 1952
2. Birdwhistell, R. L. Kinesics and Context: Essays on Body Motion Communication,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3. Farb, P. Word Pla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73
4. Fast, J. Body Language, Philadelphia: M. Evans and Company, 1970
5. Hall, E. T. The Silent Language. Fawcett Publications Inc, 1959
6. Mehrabian, A. "Communication Without Words," in Psychology Today, II (Sept, 1968), PP. 52—55
7. Rivers, W. The Psychologist and the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8. Samovar, L. A. et al.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原载《山东外语教学》1992年1—2期)